齐齐哈尔文史资第19辑

嫩水达斡尔人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责任编辑：马鸿林

刘沛霖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齐齐哈尔第一印刷厂印刷

黑新出图（89）194号

1989年6月第1版

编 者 的 话

达斡尔族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从黑龙江北岸南迁嫩江流域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民族历来以热情豪放、勇敢骠悍、淳朴敦厚、团结进取和能歌善舞著称。他们曾为守疆御敌、建立新中国而英勇战斗，也曾为齐齐哈尔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在齐齐哈尔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齐齐哈尔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有鉴于此，在市达斡尔族历史语言文学学会、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积极配合下，在内蒙一些达斡尔族知名人士支持下，终于征集并编辑成这本专辑。现将此书敬献给各界读者，并以此纪念建国四十周年

目　　录

解放前达斡尔族的
经 济 结 构 和 生 产 方 式

杜 春 志

达斡尔族居住黑龙江流域时期，主要从事农、牧、猎业生产。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由于沙俄侵入，达斡尔族被迫迁徙到嫩江流域。他们以民族部落为单位，选择依山傍水、草原辽阔、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生产，形成了农、林、牧、副、渔、猎等多种经济结构。这种生产方式，延续了数百年。本文仅据个人所闻所见将各业生产方式分述如下：

一、农业是达斡尔族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各种农具和农作物在达族语言中均有其固有名词，这是该民族从事农业生产有悠久历史的明证。达斡尔族原在黑龙江的中、上游北岸居住，因为那里气候寒冷，无霜期短，主要是种植大麦、小麦、荞麦、燕麦、谷子、稷子等早熟作物。迁居嫩江两岸后，因人烟稀少，土地辽阔、采取"轮歇游耕、广种薄收"的方法，继续耕种上述农作物。

达斡尔族耕地使用四头犍牛抬杠犁。其犁辕比牛身还长，不用绳套牵引，只用一根两米长的横杠拴在犁辕的前端，横杠就搭在四头牛的颈上，再用绳索分别系在牛的脖子下。这种古老而简易的四牛抬扛弯钩犁，直到解放初期还在使用。

开荒要选择不易旱涝的向阳坡地。先将杂草放火烧尽，待阳

春四月开始耕地播种。耕地时耕夫套上犁杖，拿一根长绳两头分别拴住里外侧两个牛鼻子上的铁环，绳中间绑在犁把上，在长杆皮鞭的把手处拴绳套于脖颈上，鞭子搭在身后，左手握犁把，吆喝着“哒哒”（往外）“咧咧”（往里）。牵动溜绳掌握方向，右手拿鞭抽打耕牛，犁杖翻地徐徐前进。翻一上午，约有一套子（十亩八亩不等）地后，将盛在“切勒奇库（柳编圆柱形的装粮容器）的子种挎在肩上，向前迈动，等距离的步子，右手满把抓起子种均匀地漫撒在开垦的土地上。然后用木架柳编耙或扫帚形的树枝耙复土盖子，不用起垄，播种就算完毕。禾苗出土后也不铲蹚，顶多拔一遍大草，至于秋后收成多少，全靠大自然的恩赐。如此“种在地里，收在天上”近乎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长时期限制着达斡尔族经济的发展。

到了清末和民国初期，官方实行土地开放政策，汉族移民迁住嫩江流域，来垦荒者急剧增多。达斡尔族原来占有的土地面积已经有限，“轮歇游耕、广种薄收”的粗放耕作法，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期。向汉族学习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已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自民国二十年伪满初期，大木犁改为小滑犁，达斡尔人将漫撒干播耕作法改为一犁挤或两犁扣，种谷子用耠耙点播，从而增强了作物抗旱、防涝的能力。同时也学会了种植大豆、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加上施肥、铲蹚、深耕细作，提高了粮食产量。

过去，达斡尔人因为劳动力少，收割庄稼一般都由几家合伙轮流收割。由于大田地离屯较远，早饭后五六人要坐上大轱辘车，携带锅、水、荞面和油盐去田间收割。割地的刀是拿旧钐刀剁成一尺多长夹在木把上钉牢的夹板刀，这样用于满垄的作物下刀能够一把一利索。割地要穿上用帆布缝制的“卡勒他秘术比”（割地专用半截服），右面是大襟，前摆左面长出约二尺，其下端有带子绑于左腿膝盖下。割地方式是挟个子，将一把把割

下的作物随时挟在左腋下，够一捆就在左大腿上捆好扔出，不摞铺子。割一气时，担任炊事的"图挖钦"去看早晨来的途中下在撂荒地里的马尾套子。那时那天都能套获一两只野鸡或沙半鸡，用开水退毛后，将其剁成小块放在放好油盐的汤锅里。把再铺皮（铺于大轱辘车上的硬板牛皮）皮板朝上铺在地上用来和荞面。等汤开锅时左手端住荞面团、右手持刀片往锅里削面。在寒风刺骨的深秋，这是很理想的野味午餐。

打场的方法：早先是将作物摊在场院用牛踩。当作物的秸秆被踩烂到一定程度后，用木叉普遍抖落一遍，再由众人用"古仁尼"又名塔日库勒（连枷）挨排拍打，直到谷物全部脱粒后，将秸秆清出场院，粮食堆起来待扬。后来学习汉族的办法，也用石滚子压。但多数作物都打攒场，如谷子、小麦等作物打面场时，也是往里圈翻，最后以场院中心出场。

居于边疆黑河一带的达斡尔族，在一江之隔的苏联影响下，从伪满洲国时期就开始使用各种马拉农机具，农业生产水平较早的进入了先进的行列。

二、园艺同农业一样，在达斡尔族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在黑龙江流域就种植过各种蔬菜，还栽培过苹果、胡桃、梨等果木。达斡尔族的菜园，大多是位于房前屋后，四周围有柳条篱笆或柞木障子，以防畜害。种植的品种较多，栽培的工艺也具有民族特色。茄子、辣椒、大头菜、黄烟都要先育苗后移植。立夏之初是育秧时节，各家要在住房西窗下挖一长方形池子，四周用垡子或木板围上半尺多高的边框，底施一层沤好的马粪，上铺一层松土。先撒子浇水，再薄薄盖一层筛过的细土、用火柴盒大小的河卵石盖上。每天清晨浇水，傍晚盖好防寒棉被或草帘。当秧苗从石缝长出二寸高时，早晨或晚上各浇一次透水。秧成后利用日落前后的时机移植到园田垄台上，早晚浇水直到成活。

达斡尔族因以敬烟为礼，出售庭烟为小商品经济，所以黄烟的

栽培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并有独特的生产方式。当烟秧从育苗池石缝长出两个叶片时，就移植在已豁出沟浇过水的垄台上，每天早晚浇水直到成活。烟秧长至一个月时，边打底叶边培土。烟茎长出大约十片烟叶后，掐尖打杈。临近白露烟叶呈现蛤蟆纹时，分五次劈收烟叶。第一次收茎底部四片小叶，若不先劈收茎底部的烟叶，影响其它，打下的茎底烟叶，达语称“瓦勒当格”，一般不用麻线穿连将散叶放在白光下晒干，“瓦勒当格”烟叶属于等外烟。第二次收茎干中间的叶子，达语称“贝当格”，属于次等烟。第三次收茎干杈子下的叶，叶子大上的足，达语称“索吐子当格”，属于上等烟。第四次收茎端两片大叶，达语称“霍如当格”、又称“乌珠月当格”，属于最上等烟。最后收茎干上枝小叶，达语称“牙考当格”，属于劣等烟。所剩余的其它残叶，达语称“萨列日当格”，又称“毛当格”等，也属于等外烟。最后收烟叶后以次排列分别堆在铺于笆篱下的苫房草上，覆盖艾蒿。等烟叶捂成金黄色后，用麻线穿起来绑在长杆上晾于院中的烟架上。晚间将烟杆并拢一起盖好苫房草以防雨水、露水和霜冻。穿起的烟叶晾干后每段剪成一庹长，装进柳条筐内上锅蒸，待蒸汽串透烟叶将其理顺摆放在板制模子里压成扁形方块，过数日取出即可成每块约一斤重的“庹烟。”在每庹烟中夹上红、兰、绿等色布条，以标志各类烟叶的等次。“庹烟”生产是达斡尔族妇女的重要家庭副业，收获的烟除了自家吸用、亲友之间还互相赠送外，还以等论价出售。“阿勒堤格”（庹烟）以其味浓可口，在嫩江流域的各族中，长期以来誉满城乡。

三、牧业是达斡尔族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龙江流域时期，每户都养有几十到几百头大牲畜。南迁嫩江流域后，以牛马为主的牧业经济仍占相当比重。利用广阔的大草原，春、夏、秋三季以部落为单位在野外集体放牧，各户轮流看管，使畜牧业稳定地持续发展。道光年间，一次特大雪灾中，倒毙了大

批牧畜。光绪年间又遭受三年水灾，谷物未收，宰杀牲畜充饥，牧业生产又一次大幅度下降。在民国年间，因土匪蜂起，再不能象从前那样逐水草自然放牧，开始以屯为单位，雇一放牧员，日出放群、日落收群，收群后各户接回各自的牧畜入圈。到了伪满时期，牲畜更是逐年减少，出现了许多无畜户。

解放前，达斡尔族饲养牲畜很少出售。养马是为了乘骑和拉大轱辘车，做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使用。养牛除了耕地使役外还要吃奶，是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尤其牛奶，是达斡尔人食物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般家庭都养一至几头母牛，专供吃奶。挤牛奶时，先放开事先栓着的牛犊，裹几口母牛的奶头当牛犊开始晃尾巴将要吸到奶汁时就拉开牛犊，然后挤奶。挤到一定程度再放开牛犊吃奶，等其吃饱后，母牛放群，牛犊栓在院中不让跟随，晚间牛群回来后再如上法挤一遍牛奶。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营养价值很高的牛肉、牛奶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达斡尔族养牛、卖奶已成为可靠的致富门路。

四、猎业是达斡尔族早期经济结构中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在农业“种在地里，收在天上”近乎野生自然生产的形式下，人们有很多时间进行狩猎活动。早期达斡尔族经常进行各部落联合围猎。由各部落首领共同推举出一位长者任“敖维达”（总猎长）负责指挥。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限度时乘猎物惊慌逃窜之时，射杀各种野兽。所获的猎物，“敖维达”分成大致相等的几堆，分给各部落，然后由部落长再平均分给每个射手。这种传统的古代猎业生产方式，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在实行。

清朝统治的年代，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每年冬春都要结伴合伙进山，用弓箭扎枪、设陷井、下套夹等工具和手段，捕杀貂、熊、狞、鹿、野猪、野鸡、飞龙等。除了“衣其皮、食其肉”和向朝廷缴纳贡赋之外，还有一部分做商品交换。

二十世纪初时，中东铁路通车，随着城镇建设的发展和集市贸易的兴起，诸如鹿茸、鹿胎、鹿心血、熊胆、熊掌等，都成了售价昂贵的药材，加之火药枪的出现和应用，使猎业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每逢草深林茂的夏季，猎民三五结伙，长途跋涉，进入大小兴安岭去猎鹿。他们身穿毛朝外的狍皮衣，隐蔽在山沟或小溪旁的树丛中，等待前来吃草、喝水的鹿群，也有用桦树皮“叫叫”吹出鹿鸣声的引诱法，使鹿靠近射程。冬季猎熊时，找到熊藏身的枯树洞，把木棍塞进树窟窿里搅动，惹熊生气至胆囊膨胀后再开枪射杀，这是人与野兽的一场殊死搏斗。貂也是主要捕猎对象。因为清朝规定：布特哈地区凡是身高够五尺的男子，每人每年要向朝廷缴纳貂皮一张。所以，人们要千方百计地捕貂，以求完成贡额。其主要方法：一是在河岸发现貂的洞穴后，用鱼为饵在其附近设下木夹子，当貂出洞找食吃时，就夹住它们。二是在冬季到貂经常出没的水边，放一块铁板。貂进水里觅食后，以冰窟窿爬出来要找平地打滚抖掉身上的水；见到平整铁板上去一滚，毛就死死的冻在铁板上。猎取灰鼠更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在白雪皑皑的十冬腊月，要有两位猎民携枪、骑马、驮上口粮和简单的行李、炊具，到深山老林后，在向阳山坡下，挖开积雪为穴宿营。拣干柴燃篝火，将途中猎获的野物溶化剥皮，火堆上架起吊锅，化雪水，煮肉粥，吃晚饭。睡觉时，将树枝、树叶铺于雪窝背风处，下铺狍皮褥子，二人合盖一床狍皮被。脱去外衣，带着皮帽，脚顶脚地躺下。狍皮被轻如鹅毛，蓬松翘起，二人要掖好各自的被头，方能保暖入睡。第二天用完早餐后，由担任炊事的“图挖钦”携带口粮、炊具，另一猎人驮上行李，分道进山。一路寻找跳跃于树枝上觅食松子的灰鼠，每天猎获几只不等。夜幕降临时，二人到达事先约定的宿营地，照例生火造饭、剥灰鼠皮、吃肉粥，准备第二天发射的弹药后就寝。至于骑的马，自有渴了吃雪、饿了扒雪啃草的本能，只喂些剩粥或

米为料。这种在寒天雪地里食宿，在林木丛生、荆棘纵横的山野中狩猎的生活，要历经一个月左右的日日夜夜，有时还要遭受猛兽的威胁。等猎人满载辛勤劳动果实，返回温暖的家时，他们那风吹火烤的面孔已如同黑人模样了。

此外，达斡尔族还进行许多带游艺性的狩猎活动。其中撵狐狸就是很有趣的一项。冬季，下大雪后的清晨，猎人三五结伴、骑快马、领猎犬，到旷野中寻找狐狸的踪迹。狐狸通常要在天放亮时出来捕捉田鼠，雪地里会留下清晰的踪迹，这样可以跟踪追去。当看到狐狸在前面奔跑时，骑手们快马加鞭，直到撵上去用藤子马棒打死。有时狐狸上山钻洞，就由猎狗进去拖出。

放鹰，也是达斡尔族最爱好的。冬初，在林落附近的山头上立一根四米多高有两个杈的树杆，杈棍中间用马尾系上一尺宽二尺长的线网。鹰飞来要落在树杈中间，碰断线网上的马尾，线网滑下来将鹰兜住。猎人跑去用小棉被将它包回来后，在鹰的两支爪子上拴好皮条，绑在能够旋转的鹰架上。鹰性烈，开始不驯服，不进食。训练要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夜间将鹰架在悬在房梁下的秋千状横棍上，用牵绳不时地扯动横棍，使鹰欲睡不能，疲惫不堪，这样几天后便驯服地吃食了。第二步，猎人带着毛朝外的狗皮手套，把鹰架在手腕上走门串户，直到鹰不再怕人为止。最后是训练放鹰，在系于鹰爪的皮条末端拴一铁环，套在腾空架起的二三十米长的细绳上。将鹰架于一端，猎人站在另一端，手提半只鸡摇晃着，口中发出“厥”、“厥”地叫声，鹰便飞过来扑食，往返多次，熟练为止。放鹰前，为了在树丛中便于寻找鹰的所在，先将一枚铜铃安置在用兽肩胛骨制成刻有透珑图案的托垫上，再把托垫缝在鹰的尾羽根部上方，这样鹰所到之处即可听见铃声。放鹰是在下午，因上午不喂，鹰饥饿难忍，不断地从架子上起飞；猎人就将其架到野外，再从草丛中轰起野鸡后放开。这时鹰立时腾空飞起，追击野鸡，猎人则骑马或徒步奔跑跟随。野

鸡只飞出二三里远就落地跑向丛林，猎鹰从空中俯冲下来捕捉。跟随猎鹰追逐嬉戏的人们，往往流连忘返，其乐无穷。

捕大雁也很有趣。秋季谷物收获时节，南归大雁成群落在庄稼地里觅食。猎人将鱼钩成串的栓在一条长绳上，钩上再下上玉米粒，使大雁上钩后连在一起，飞不起逃不脱。也有的把玉米粒用细绳系在柳条圆圈上，遍撒于庄稼地里，当大雁觅食吞进玉米粒后，柳条圈在其嘴下摇荡，大雁为解除妨碍用爪子扒，结果一支腿伸进圈里，窝着脖子不能起飞。

扣沙半鸡有绝妙的方法。冬天，在大田地里清扫积雪，露出两平米大小的土地，撒上粮食。在茫茫雪原中找不到食物的沙半鸡，发现一块黑土地就要落下来，毫无顾忌地觅食。接连几日撒粮、观察、摸透沙半鸡每天来吃食的时间后，将一块扣网支上，用浮雪掩盖好，一根长绳拴在扣网的顶部延伸到二三十米远处，用蒿子伪装上屏障，猎人持绳躲在它后面，等到沙半鸡落下来吃食时，乘其不备猛拉长绳，二三十只一群的沙半鸡就全被抓获。

狗撵兔子妙趣横生。撵兔子上瘾的猎狗，雪后清晨都要扒门嚎叫。猎人就牵着它，拎着一米多长的棍棒，到野外寻找兔子走过的踪迹。兔子在夜间走的踪迹经雪盖过虽然模糊，但仍然可以辨出。猎人跟踪到断迹处，会看到一个不大的雪包，那是兔子在趴窝。猎人将棍棒横握于胸前，从雪包的一侧悄悄地走到跟前，猛力抡打，如准确无误，就能一次击中。打不中时，兔子就一跃逃跑，猎狗随后急追。在草木丛生的深雪地里兔子跑不起来，就极力寻找道路，因力竭被狗撵上时，狡兔四腿一蹲会突然停下，训练有素的狗会以同样的动作一下咬住。如狗不会此招，就要翻跟头摔出很远，兔子乘机转身往回跑。如此往返多次，最后在猎人的堵截下，兔子从道路跳向深雪时，终会被猎狗捕住。

随着荒原的不断开发，人口的日益增多，野生动物逐渐稀少，猎业生产在解放前就已从达斡尔族的经济结构中基本消失。

五、渔业在达斡尔族经济结构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达斡尔族捕鱼工具之独特，方法之多，在黑龙江世居民族中仅次于赫哲族。

用“达若勒”（二尺多高、柳条编成的下口大上口小、无底筐形的鱼罩）罩鱼，别有民族特色。夏季，人们成帮结伙到泡子或断流的河套里，排成行向前移动，各自用鱼罩连续往下扣，可获混水中乱窜的鲇鱼、鲫鱼或黑鱼。在鱼汛期，夜间在江河的滩中，漫水的野甸子罩鱼，可获咬汛的鲤鱼和其它大鱼。

用“司额热”（鱼叉）叉鱼，令人异常兴奋。在江水清沏的秋季，夜间由一人肩扛一捆干柳条火把，在江滩急流中逆水缓缓前进，另二人手持鱼叉在两侧平行，眼看大鱼向火光照耀的地方聚拢而来，猛力叉去，身手不凡者叉叉见鱼。冰上叉鱼，有溜冰和凿冰叉鱼两种：溜冰叉鱼是在刚冻二指厚的落冰上，边滑行边将所见的大鱼叉出冰层。凿冰叉鱼，要在冬季“三九”以后。找到卧鱼的深水处，将冰刨开一条直线到彼岸，在冰缘中插上柳笆“亮子”；在中部凿开一个缺口，周围用蒿子遮住阳光或夜间点燃火炬，手持鱼叉守候；可不时叉获向缺口游聚而来的鳌花和其它大鱼。

挡“哈迪”（亮子）截鱼，是一种大规模的捕鱼方法。深秋或涨过大水后，将木桩横排插在小河中，靠木桩绑好柳笆亮子，下游开口处载上一个柳条编的兜或网袋，顺流而下的各种鱼都难以穿过柳笆亮子，只好游向开口处，淌进鱼兜或网袋里，多者一夜可截获上千斤鱼。

设“奥连库”（柳编酒壶状的鱼篓）堵鱼，是一种小型捞鱼方式。秋末冬初，在小溪两侧挡上柳笆成土堡子坝，将“奥连库”逆流安置在坝中间的缺口处，每天清晨起一次，可获顺流而下的小鱼、田鸡和泥鳅。

用“哨”（扳罾子）和“囤”（鱼囤），在夏季捕捞小鱼，

是达斡尔族中老年妇女们的活动。“哨”是用细麻绳织成的小眼网，上面拴有面团面食。把网的四角绑在用四根棍支起的架子四条腿上，将一个长竿绑在架子的顶部再拴一根长绳子，把扳罾子下到江边流水处，长竿和长绳的一头搭在江边，等候约一刻钟后，脚踩长竿的头，手拿长绳子一拉，就能捞出聚拢而来觅食的小鱼。“囮”是用薄木板围成直径一尺半左右、高四指的圆圈，桦树皮做底，细麻绳编织成盖，中间留嵌有桦树皮圆圈的拣食口，将鱼囮下在稳水处，等半个钟点起一回，就能进几条至几十条小鱼。

拉“阿勒额”（大网）捕鱼，是有组织的专业化渔业生产。拉大网要由十几人参加，要有一位有经验的长者担任“阿勒额依达”（网头），负责指挥生产；另一位年纪较大的担当“图瓦钦”（炊事员）。拉大网，要将接成数百米长的大网载于大船上拉纤，到江滩上游，在网伸向江边的一头拴上木橛子，插入砂石中由一人把住，六人分两翼滑船，二人对而立于船帮往江面撒网，网头掌舵使船横江疾驰而去。网撒至一半时船头转向顺流，继而逐渐地往回滑来，把橛子者逐渐移向下水头的起网处。这时网撒完船已靠岸，渔民们下船把网拉到岸上来。在鱼类繁盛的早期，一网可拉出少则几百斤，多则几千斤的大鱼。冬季拉网，要在冬眠鱼类聚集的大江深处或江叉子里，靠岸处凿开直径一二米冰的窟窿做为下网口；然后按圆周形的轨道每隔二三丈远凿一个三角冰眼；再用纤绳和钩竿把网向圆周线的各个冰眼以次传去；最后将大网的两头扣接于起网口，将圈住的大鱼拉上来。

在清代，鳇鱼、雅巴萨鱼是向朝廷进献的贡品。当爱辉、墨尔根、博尔多、齐齐哈尔等城镇兴起后，达斡尔族捕获的大鱼就成为商品畅销于集市。

六、林业与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大小兴安岭中生长的松、桦、柞、杨、榆等树种，曾为达斡尔人建房、盖仓、

造车、制犁、烧炭提供了足够的原材料。

放排木是运输木材一种方式，又是经营林业的主要生产活动。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兴建的瑷辉、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城镇所需木料，都是达斡尔等民族流放木排供应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达斡尔人流放的木排，除自用外大部分出售于墨尔根、拉哈、齐齐哈尔、富拉尔基等处的木材商。铺设中东铁路时需用大量枕木和建站木料，提高了木材价格，山区的达斡尔族农村，竟有三分之一的人家投入了流放木排的行业。

达斡尔族伐木放排，均有既定的规则。进山采伐，一般是在解冰前两三个月，由六七人或十几人为一伙，推举一位长者担任"塔里达"（头人），负责组织生产和木材的销售，另选一年轻人充当"图瓦钦"（炊事员）。做好各种准备后择日启程。采伐工具、米面、油盐、炊具、牧畜饲料等物资都载于若干辆大轱辘车上，晓行夜宿地到嫩江上游，在某一支流选择采伐场地，砍些树木搭成简易住房，即"阿讷额据点。"进山伐木者俩人一伙，用"快玛子"（一米多长的锯）在树的根部拉断。采伐时要严格控制住树木的倒向，一定要顺山或顺风，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倒树压断的树叉形成的回头棒或倒树后坐力的打击。采伐的木料够量后，用爬犁运到河边，等河解冰时，将事先断好的原木扎或木筏流放到嫩江。原木全部流放完毕，开始编排。将原木两头都凿出方眼用长竿子串起来，再将三节排用"嘎牛"（木制的连接器）连接起来。共用一百四五十棵木头扎成的三节排头大尾小，在头节排的两侧各安上一个"哈力贝"（用原木砍成刀形长达五六米的大棹），尾节的后侧也安一个"哈力贝"，在中节上用木料，苫房草和桦树皮盖一个能容二人住宿的"模拉日"（窝棚）。当江水涨到木排可以畅流无阻时，由"口爷"（领排人）在前放行，其他木排随后鱼贯而下。在流放的途中，要经过九十度转弯的河道，如不提前掌握住方向，木排就撞到对面的岩石上直立而起，

这叫“贴饼子”，造成排毁人亡的结果。另外，还要经过“九道亮子”。主航道两侧礁石丛立，倾斜奔流的水面仅能通过一张排，如把握不住方向，木排撞到礁石，即刻“散花”。沿途还有很多江叉，木排如果靠近叉口就有被抽进江叉的可能。木排还经常在浅滩上浅住，只有许多人下水用木杠撬向深水处才能挽救。所以，“口爷”在前引航，不时地喊着“往里打”、“往外打”的口令，巧妙地绕过浅滩，躲过暗礁。

经营柳条通，也是一种林业生产。解放前每个达斡尔族村屯都有公共条通，由集体推举出的“巴日阿斯依达”（看护条通人）负责管理，采取隔年或划分两三个区域每年轮割等保护措施，不准乱砍盗伐。割柳条是在农历二月。届时每户出一人同时开刀。柳条可编围护院寨、园田篱笆，编制房笆和各种筐篓，干柳条可当烧柴或拉到城镇出售。有些地区，至今还划出一部分条通，为达斡尔族村屯管理使用。

七、手工业，在达斡尔族经济中还未形成体系。历史上由于居住边疆地区交通不便，聪明的达斡尔族手工业者，自己制造车、犁、弓箭、扎枪、猎刀、马鞍、烟袋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达斡尔族制造的“达斡日特日额”（大轱辘车），因其轻便，轮高、有爬山越野功能，被誉为“草上飞”。在《龙城旧闻》一书中有诗赞曰：“有族达胡尔，错居嫩江澳，特产轻便车，桦柞为轮毂。”大轱辘车的结构是由“波芦”（葫芦头）、“黑额斯“（辐条）、“模日”（车辋）、“阿额勒”（车辕）、“阿达日”（车棚）、“曾格勒”（轮挡）、“滕格勒”（车轴）组成。木料用黑桦、白桦、柞木和柳条子。在农历二三月树木萌芽前采伐备料，经干燥后制造。将一尺半长的黑桦木段旋成直径二十五厘米的圆木头墩子形的葫芦头，在其中心凿出直径八厘米安车轴的圆窟窿，外沿中段周围等距离地凿出安插辐条的十六个长方形铆，用柞木砍成六十厘米长的扁形辐条以次安

插在葫芦头外沿十六个铆中钉牢。再用桦木竿围成弓形的两个车辋等距离地凿透十六个眼安进每个辐条上加牢木楔。两个轱辘做成后，再用黑桦旋成一米七十长、十二厘米粗的车轴安在一对车轮上，车轮就形成了。后来在葫芦头的两端和车轴的两头又分别嵌上车川、车键，从而提高了大轱辘车耐磨损的程度。车辕是用三米二十长、十二厘米粗的黑桦或白桦制成，在其前端各凿一个透眼安插木楔子（称除气）以便拴套。车辕的后半部用九十厘米长的八根横撑子（称依洛）将两根辕子连接好。撑子上用柳条交错编穿成车棚。在车棚两侧各立四根二尺多高的撑子，顶端用固定横棍做为轮挡。最后，在车棚中间两侧在车辕下面各安两根木橛子（称嘎乌）将车轴前后卡住，一台大轱辘车造成了。

在猎业兴盛时期，达斡尔族人用鹿、罕达罕、狍子等皮革制做外衣、帽子、靴子、手套，以及外出用的被褥和烟荷包等，鞣皮子也成为日常的手工作业。其方法有多种：（一）烧酒鞣，将晾干储藏着的毛皮泡在水里，等皮子变软后拿出来淋干水分，皮板朝上摊开放在案子上，嘴含烧酒喷于皮板上，待酒渗进皮板时用锯齿状的钝刀刮掉皮脂和肉片。经过反复几次喷酒、钝刀搔扒，皮板上的脂肪全部脱落后，将皮子晾干，再用手揉搓到柔软的程度，用梳子梳净毛上的脏物即成。（二）用哈哈面（燕麦粉）鞣。将面放进坛子里加水和少量的盐，用棍搅和成泥状，放在炕上发酵至发出强烈酸臭味时取出来，均匀地涂在用水浸过的软皮板上，将皮板朝里叠好放在桶里。几天后面浆渗进皮板里，再拿出来，和烧酒鞣法同样操作即可；（三）用酸乳鞣，跟用哈哈面鞣法相同。

解放前，达斡尔族主要是吃“巴力托斯”（苏子油），因此到冬季榨油也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作业。榨油机全是木制的，在两根间距一米、高一米八十的木桩顶部架上横梁，木桩上半部凿开穿压杠的透眼槽子，桩子底部离地一尺高处安置方饭桌大小的厚

木板，上面凿出直径一尺半的圆周淌酒的浅槽，正面向外豁出；榨油时，将蒸煮发热的苏子装进用麻绳编织成的直径一尺多扁圆形的网袋里，将其一个个垛在榨油机底盘淌油槽中间一米多高后，把压杠穿在木桩的槽子上加木楔，由二人立于两侧用重锤敲砸木楔，使压杠向下挤压装有苏子的麻袋，油就从淌油槽流出来，直到榨尽为止。

制作"埃额"（烟袋锅）。将烘干的山杏树根用脚蹬旋刀旋成铜烟袋锅形状，经锉磨光后，在安插烟袋杆"裤"的外圈镶嵌牛角套环和斑点，组成黑白分明的图案。这种烟袋锅精制、美观，是达斡尔族手工业的特产。

打造"霍贿乌"（炕柜），用上等红松为木料，除立柱、横撑之外全用薄板嵌装制成。柜体高约一米七十，长一米八十以内，柜内中间设分上下层的横格，柜子正面上方开两扇门，将四个铜制的长方形合叶用明镶在柜面的方法将门安上，两扇门中间一个有立柱，柜门的中部镶上三块长方形的铜板和两扇门间的立柱形成一体，在铜板的上方各有插门栓的固定铜环，铜板下方垂下两个铜叶片的拉手。柜面涂朱红色、刷亮油，有的还画有《二十四孝图》或鸟兽花卉图案。在炕柜的顶上配有同样木质和色泽装饰的对箱子，在对箱子上面还有两对小红匣子。这种炕柜，是达斡尔族妇女的主要嫁妆。

此外，用柳条编成的各种筐篓，用桦树皮制作的桦皮篓、盒、碗等用具，解放前在达斡尔族地区到处可见。

达斡尔人传统的民间交易

卜　　林

达斡尔人从黑龙江流域南下之前，尼布楚、雅克萨是年度集市交易中心。在清实录里康熙皇帝给沙俄皇帝的信件中写有"尼竟楚是我属民达呼尔的贸易地方"。达斡尔人很早以来，与周围的布里亚特、巴尔虎等地的蒙古族就有了以物易物的交易，达斡尔人用珍贵毛皮、药材、粮食、车辆、烟叶、船只等换取了大量的牛马。

达斡尔人南下之初，通过索岳尔济山的敖包会，继续与科尔沁的蒙古人开展以物易物的集市交易，其交易量比在江北时有成倍的增长。

清初至康熙初年，达斡尔人长途跋涉数千里，进京城排队缴纳年贡，劳民伤财，实难容忍。康熙二十二年，康熙皇帝视察索岳尔济山后，才知道达斡尔等族纳年贡之不便，遂改为就地纳贡，由当地政府官员统一送至热河。

一、"楚勒罕"

"楚勒罕"是满蒙达语中"楚古勒干"，会聚之意，汉语译为盟会，是岁献方物及互市的集会形式。

"楚勒罕"始于何年，史无确切记载。史学家认为始于康熙二十二年以后至乾隆六十年止，约有一百多年历史。何时取消

的？达斡尔副总管奇三告状后的乾隆六十年，史书记谓："从事改城中"，又记："而其部人卓城北，故俗有北关集之称"。

"楚勒罕"设于江西的因沁屯，即今日音钦屯，按照当时的年贡制度，每年阴历五月统一缴纳貂皮。那时规定布特哈民凡身高五尺以上的男性，每年献貂皮一张，而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男性则变通为交粮，每个壮丁每年向官方缴纳八旗兵用口粮毛粮一石。因此，凡筹备"楚勒罕"事宜，全落到布特哈猎民身上，由布特哈总管府负责筹办，搭棚子木材、马匹及羊、酒等，全由布特哈猎民负责供应。

每当"楚勒罕"盟会，布特哈猎民每家每户都去赶市互换日用生活用品。这种时候，布特哈猎民大轱辘车队，都篷上桦树皮车棚，全家乘坐着并携带着锅碗油盐米肉等炊事用品去赶集会。几百辆篷车住在音钦屯江畔，沿江一带，炊烟腾起，很是壮观。"楚勒罕"集市上，附近的几个蒙旗以及呼伦贝尔草原牧民，常赶来几千匹马做交易，这些马群占满了沿江一带的原野。城内的、外地的商人，搭起许多商棚子，百货俱全。牲口贩子到处收购马牛。"楚勒罕"现场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楚勒罕"开始前，先有副都统率笔贴式等人前来验收或查看年贡貂皮。当"楚勒罕"开市之际，省城将军、副都统等，从摆渡口乘上龙头船，一个接一个排成长列地来到音钦屯江边，布特哈猎民和蒙古王公牧民排列成行，用礶扎和鸣炮迎接。

"楚勒罕"选貂皮的场面，先是将军、副都统坐于堂上，协领与布特哈总管分东西两席就座。验收贡貂开始后，评上的皮分为三等，按等级在皮背打印，上黄签者为一等，绿签者次之，红签者为末。皮背无印且兽爪齐全者，认定为私货，属于列禁之品，集会上无人敢买。

布特哈猎民每岁献貂皮共三千余张，因达斡尔猎民献貂数量多，官员们总想用挑剔压等办法，对剩余皮张压价逼卖。入选皮

每张二、三两银，而甩下来的则不分大小，一律付九钱银收购，对此，布特哈猎民虽怒而不敢言。将军、副都统等转手将这批低价得到的“玛克塔哈斯”（即带肉皮之意）再高价出售，就这样从中间渔利。

岁贡结束，献貂打印封箱后，全被省衙门押送入库，将来送至热河特交官廷。

献贡仪式以后，“楚勒罕”民间贸易就开始了。山里猎民、草原牧民，以皮毛山珍或牛马换取一年所需的布匹、绸缎、金银装饰品、糖酒砖茶以及小商品等。几天期间的交易额，相当可观，然而不计物价的猎牧农民，常常被奸商愚弄，搞不等价的吃亏交易。

“楚勒罕”结束了，布特哈猎民搭设集场用的木材及柳条等，也被省城官员廉价收走，真是贪而无厌，以至后来布特哈猎民不堪忍受省衙门大小官员的敲诈勒索，发生过奇三上书事件。

由于当地官员行私舞弊贪赃枉法，奇三上书事件后，发现就地纳贡存在弊病，于是从乾隆六十年开始又复恢了各地进承德送贡制度。

二、北关集市

北关集市始于清乾隆六十年，终年可以推测到重建齐齐哈尔砖城前的光绪初年。

清光绪年之前，卜奎城的八旗官兵不准携带家眷，当时卜奎城人口稀少，不足三万人，八旗兵额中，史记为“达呼尔占半”。木城之北的北关，是一片沙丘起伏的空闲地，“楚勒罕”完毕后，北关集市便接续开始。

北关集市在每岁五月，仍是大盟会，献貂互市，仍是北关集市的主要内容。

奇三事件后，黑龙江将军府负责送运献貂进承德的权限已被

剥夺，但仍握有对献貂验等入封的检查权。在北关集市期间，布特哈猎民每年进献的三千余张貂皮，仍在北关集市中接受检验，然后再由布特哈猎民组织运力送至承德验收入库。

从清嘉庆十四年起，在北关集市的民间交易里，除了查验给中央朝廷的贡貂之外，又给当地百姓增加了向地方首领献方物的负担。地方首领又从当地百姓所献方物中，挑选精品送进皇室，算做他们的贡献，意在捞到名利和赏赐。北关集市成为了贪官搜刮民脂民膏的有利场所。

据史料记载，将军副都统及皇亲国戚要求百姓献方物的要求是：六月进白面，七月进鹰鹞，十月进鱼雉等野味，十一月进年贡（也是鱼雉、野猪等），同月又进海东青，十二月进春鱼。

史料还记载：于嘉庆十四年，黑龙江将军、副都统趁嘉庆皇帝五十寿辰，从百姓手中盘剥的方物中，向嘉庆皇帝选贡有鹤、鹿、马、堪达汉（即犴）、四不象，还有貂、灰鼠及猞猁等皮张。奇三上书事件，虽然惩治了省将军、副都统、协领等，乃至腐败透顶的那彦台被处以死刑，然而，到了嘉庆年间，为政不廉之风又重演起来，布特哈猎民又增添了双层献方物的经济负担。

北关集市的互市期间，有数千的达斡尔猎农牧民以及蒙古牧民相互交易。在集市期间，因城内食宿方便，交易额比楚勒罕有增无减，尤其是有山西小商人拥进互市，所以就更为活跃了。那时候达斡尔语和蒙古语简直成为了民间交易的官话。

三、以齐齐哈尔城为中心的市场交易

清代的情况

牲畜交易：由于地广人稀的自然环境，当时的牧畜业很发达。

在清代，布特哈及齐齐哈尔地区共有四百余民族部落，计八千多养畜户，据不确切地估数，达斡尔族地区牛存栏数约十至十五万，马二至三万，每年上市量约一万，全是以齐齐哈尔城为中

心开展市场交易，牲畜交易量占市场交易收入的首位。“无畜不富”是达斡尔人的民间格言，把养畜当做家庭主要大业去抓，所以齐齐哈尔一带野牧的“哈——日”及布特哈一带的沟牧，牧群遍野如豆，很是兴旺。

木材交易：清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因为修建齐齐哈尔木城，附近原始森林基本砍光，于是就从墨尔根及布特哈调用原木。大批落叶松原木流放到齐齐哈尔城，在葫芦头、湖园一带，当时都设有布特哈放木排人的住宿地，达斡尔人管它叫做“毛庶栅子”，形成江岸小部落。

齐齐哈尔筑木城后，达斡尔流放的排木，仍然源源不绝地进入齐齐哈尔市场，长期兴旺不衰，每年向城市提供约二至三千立方米原木，清代木材交易，可占市场交易收入的第二位。

猎业：由于清朝腐败政府的层层献方物的盘剥，限制了猎业的大踏步发展。例如达斡尔猎民每年的约四千貂皮中，贡貂就占了三千，贵重药材的鹿茸、鹿胎、熊胆等，也被圈定为贡物，其他贵重毛皮象狐、猞猁等也都是如此。这些本是市场交易的大宗收入，却被地方官员盘剥过半，所以，对猎业的积极性也就不高了。

清代城市农副产品以及水产山珍等市场交易额有限，一是八旗官兵及城市居民稀少，再则因为清政府对官兵的薪饷得不到保障，唯有木炭交易等还略为景气。

民国年间的情况

牲畜交易：因清末民初占荒开垦，达斡尔地区草原面积大大缩小，同清代相比，牧畜存栏数大有削减的趋势，尤其是社会混乱所造成的抢劫偷窃牲畜之风，使达斡尔地区养畜数猛跌至最低限度，每户每年由平均出售一头牲口以上，下降到每屯每年平均出售牲口不超二十头。在齐齐哈尔城马神庙、黄沙滩等牲畜交易所，从原少数民族包揽牲畜交易市场，已经变成只占据不足三分之一的交易量。

这里还应提到，市里西站的回民，有许多是以贩卖牛马为业，有的专门当买卖双方的中间人，他们长期同达斡尔族人交往，友谊深厚，处事公平，讲究信誉，通晓蒙、达语言，是达斡尔人进行牲畜交易难得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可以赊到成群的牛马，售出后再把钱送到各屯各户卖主的手里。

出售商品粮：到了民国初年，因为丈地和土地税加重，发生放弃土地及土地集中的阶级分化。首先，在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农村，出现了少量的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贫农阶层。到了民国二十年左右，齐齐哈尔地区一百七十七个大小自然屯中间，拥有五十至几百垧土地的地主户，约有四十几户，五十至三十垧的中地主约有一百二十户，它们占有整个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农业经营上也开始摒弃了传统地漫撒籽粗放型，改而仿效汉族地主的田间管理技术，也有的聘请汉族中有农艺专长的“打头的”帮助经营。民族地主的兴起，固属是增加了民族农民头上的剥削阶层，招致了民族农民的痛苦，然而，在达斡尔族也是破天荒地出现了向城市出售商品粮的开头。这里以笔者当时居住的敖宝屯为例：

龙江县齐台乡敖宝屯共有七十户左右，其中达斡尔族占六十二户。这六十二户里，占地五十垧以上的大地主有一户，三十至五十垧地的中地主及富农有三户，经营十至二十垧的富农、富余中农、一般中农为十七户，不足十垧地的一般中农、贫农户为二十九户，无地无畜的赤贫户为十二户。

大地主乔巴日高家，拥有耕地一百四十垧、牛八十余头、马六十余匹、羊五百只左右，雇用长工约二十，季节工可达二十余。就以年产粮食四百石计算，除自留部分外，每年都能向城市售粮近三百石，即二十万斤左右，占全屯售粮数的二分之一强，而土地面积只占四分之一强。这家地主自每年十一月中旬开始，就用二十辆牛车运粮，每车只载四袋合一石粮，三天一趟，售粮

时间约占一个半月。齐齐哈尔西城壕双盛公车店，就是乔巴日高地主固定的歇脚售粮之处。

中地主多文斋、吴存铁及富农何宝全三家，每年售粮合计约一百七八十石，即十一至十二万斤。

屯里吴高套、鄂忙海、鄂文吉、鄂好如布勤、吴哈拉库库、关延代、鄂项货、吴巴拉于巴拉坎、鄂安子等十七户，多者年售五十石，少者年售十石左右，共计年售约二百石。

当时的达斡尔族地主中，据笔者所知还有一些售粮大户，他们拥有的粮食耕地列表如下：

村　屯	地　主	拥有耕地（垧）
长岗子	鄂范五	200多
仁和台	沃来宗	180
全和台	沃维诚	70～80
罕伯岱	郭金亭兄弟	各100多
色力克	土布库	100多
色力克	西布库	100多
二沟屯	鄂先贤	100多
单宝屯	何单宝	80

村屯	地主	拥有耕地（垧）
鞍子匠屯	库西德	约100
三棵树屯	吉庆德	约80
二大户屯	鄂贤寅	70—80
齐齐哈尔屯	吴尉邦	80—100
齐齐哈尔屯	杨宪文	80—100
齐齐哈尔屯	杜某	80—100
乃门浅	鄂炳钦	100多
乃门浅	乔都都	100多
达拉台	李龙德	约100
阿拉尔	吴双海	约100

虽然在民国年间达斡尔族农业经济在齐齐哈尔及东布特哈一带有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专以商品粮生产为收入的地主，可是比起荒户售粮仍然逊色，达斡尔族城郊农村全年售粮数只占全市收粮数的百分之五强。

伐木业：清末，因为修建中东铁路需用大量枕木所以又促进了

达斡尔族山民伐木业的发展。

到了民国年间，随着齐齐哈尔城市人口的猛增，城内手工锯木业、机械木器加工业、木器家俱厂等方兴未艾，达斡尔族山民的伐木放排比起清代有了成倍增长。

据民国二十年前后所见，达斡尔人放排下来的原木，在葫芦头及湖园一带的江岸堆积如山，西江沿一带也可见到放排山民的木棚子，福仁和木材厂及机械木器厂的运木车队络绎不断。达斡尔族山民出售木材量，每年都在三至五千立方米左右，比清代增长了数倍。伐木山民放排所得，其收入相当于十几头牛的市价，在当时也是相当可观了，

毛皮及山货：到了民国年间，随清皇室倒台，贡方物也从此终止，山区猎民所获的贵重毛皮能如数拿到市场出售了。当时因为服装时装业开始兴起，裘皮业争购山民的贵重毛皮，其中以紫貂皮为贵，其次是水獭、猞猁，再次是狐狸和灰鼠皮。当时在齐齐哈尔城郊一带达斡尔族部落，有些人也开始搞裘皮加工，收进生皮后，熟妥并缝成皮筒，再到城内出售，他们的猞猁、狐狸、羊羔等皮筒，很受洪昌盛等时装商场的欢迎。

民国年间，动物药材等已无人中间勒索，能如数拿到药店出售，鼎恒升、万育堂是动物药材的最大买主。在捕鹿期内，每年约有三百只鹿茸和一些鹿胎上市，熊掌、熊胆等也有少量上市。

山区猎民的飞龙（达语称库德）、乌鸡（达语称给里莫）最为珍贵，均由市内高级饭庄收买备做招待贵客席宴用。野鸡、沙半鸡以及狍和野猪等野味，那时真是“应有尽有”。

这期间，山区猎民出售贵重毛皮及野味等收入，已经远比放排等副业高出一、二倍了。

烧炭业：由于城内饮食业的巨增，木炭销售量空前地增大。达斡尔人进山烧木炭，然后用大轱辘车运到城内出售。有特哈山区运炭车队、齐齐哈尔城郊农民进套他巴奇乌古气山区的运炭车

队，常年来往不绝，木炭副业收入相当可观。

齐齐哈尔城郊达斡尔族农村，向城市出售的烧柴、旱条子、黄烟以及水产的交易额，也是有增无减。

城市供应达斡尔族农村的日常用品

达斡尔地区农村，到了民国年间，由于能够向城市提供更多的农牧猎林等产品，购买力相对地增强了，所以对日常用品，依赖城市供应的趋势也日益增加了。

达斡尔人依赖城市的商品主要有：棉布、丝绸、供神祭品、农具、鞍具、酒茶、金银饰品、化妆品、糖、盐以及小商品等。

伪满年间的城乡交易，大致与民国相同，不再赘述。但是，不妨说一件伪满康德五年前后的见闻。那时候，达斡尔族人进城买东西，已经受到一些商号的重视，看成重要的顾客拉关系，像大德仁、瑞庆和、义生公、大来公、瑞林祥等商号，都有和某屯的固定主顾关系。这些字号的掌柜和店员都能说几句达斡尔语。他们在营业上，有时送货到村屯，常送货到大车店，而且有些情况下还可以先赊购，有钱时再结算。

四、庙会赶集

在清代，也有敖包会互市交易，但是到了清末，因为交通闭塞，地方土产品无销路，以致使敖包会三、八月的互市交易日渐衰落进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达斡尔人挤进蒙古族喇嘛庙会，以集体赶集形式，出售地方土产品。

呼伦贝尔甘珠尔庙会，每三、五年召开一次，每次开五至七天，在庙会"那达慕"期间，达斡尔人的最为受欢迎的交易物品是大轱辘车，其次是酒及副食烟叶等。伪满时的1942至1944年，大轱辘车的交易就不销，每次庙会上，莫、巴两旗能售出约一千辆，布阿两旗能售出约五至七百辆。达斡尔人制造的柞、桦木车辆，轱辘大而又轻使，过浅水越沼泽或走泥路，一般不易陷车打

误，优越于小轱辘的“勒勒车”，蒙古牧民不惜用一马换得一车。

以上介绍的情况实在是很粗，也不全，但是总比没有记载强一些。尽管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到达斡尔族在民间交易中，长期以来都是以交换、出售牧、猎、林初级产品为特征，粮及手工业品是微不足道的，民族的生产和经济发育是缓慢而落后的。还要说的是，尽管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到，几百年来，达斡尔民族的生产生活是和齐齐哈尔城相联系的，同样，这个城市成长历史上，有着达斡尔人的贡献。

达斡尔族学校教育历史述要

卜　　林

清代以后，达斡尔族子弟开始接受教育，在文献资料中也有了记载。这里根据自已从事教育工作时掌握的情况，按清代、民国及伪满洲国三个阶段分别做个介绍。

一、清代的达斡尔族学校教育

清初，部分达斡尔族部落首领进京任职，其子弟开始攻读满文义学堂，曾涌现出苏都尔、孟额德等一些学识渊博并通晓满、蒙、汉等几种语言的社会名流在清理藩院任职，后来代表清政府从事外交活动。

在达斡尔地区开办民族教育，最初是从墨尔根城开始的。

《黑龙江志稿》里说到，1696年（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请，经理藩院同意，在当时的将军衙门府所在地墨尔根，“在两翼各设一学，设助教官一员，选新满洲及锡伯、索伦、达呼尔每佐领下幼童一名，肄习国书”。这是达斡尔人子弟开始接受教育的最早记录。然而，按当时五万余人口的达斡尔族，每佐一人计算，每年入学者不足四十名，少得可怜。

《黑龙江志稿》中，记载1744年(乾隆九年)在齐齐哈尔“设官学一所，八旗每佐领名下额送学生一名肄业”。达斡尔族共二十八佐，只能入学二十八名。从清嘉庆年间开始，达斡尔族部落

按佐为单位，雇用满人等筆帖私设满文义塾，几乎是每二、三个民族部落设满文私塾一所，满文学普及率达到了20%左右。

到了清光绪年间，达斡尔族部落打破以佐为单位的私塾教学，在三十户以上的民族部落里，基本上都聘请了达斡尔族中通晓满文的人任教，按入学子弟人数，向教师缴纳学费。当时无固定校舍，轮流到各户开课，每半个月轮换一次。这时候，大量的女孩子也能同样享受教育了。

我在1929年，还见到过学生最早使用的学习用具"萨木然"。它是一块长方形宽一尺半高一尺许的木板，光面上涂动物脂肪油，用草灰和木炭末搅拌当墨水，用鹅翎羽翎蘸染习字。以后用的叫"水盘"，也是长方形木板，尺度与"萨木然"仿佛，两面光滑，用黑墨划成格，上边刷桐油，用毛笔习字。到了民国十几年，石板石笔才代替了"水盘"。另外，当时每个学生都备一条小方凳和小方桌，供上课时能用。

满文私塾授课，先要学生学会满文100多个字母字音。反复地竖念字音横念字头，每天早晨到午间，"阿、卡、博、则、民特、热、查、拉"朗读之声，响彻全屯。那时候，对学习差的学生，"色薄"（即老师）常打他们屁股板或手板，轻者则被罚跪，不过对女生却一般不搞体罚。等到满文字母背写的自如了，便开始教满语会话，满语懂个差不多了，就转而用达语翻译满文的《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再以后，就增设孔子的《论语》等课程了。那时学过私塾者，多数能够很熟练地边读满文边翻达语，他们常在每天夜晚的油灯下给家里人和邻居们读古书故事。有时候大家全被讲的故事所吸引，一直能讲到深夜。讲者讲累了，这些故事迷们会设法打几两白酒或是敬敬烟以示慰劳。

到了光绪年间，达斡地区满文私塾和满蒙文公办学堂就遍布了，逐渐办起了大型公办学堂。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根据满、蒙八旗佐民的要求，在省城齐齐哈尔开设满蒙师范学堂一所，《东三省政略》说："以满蒙方言学堂，改设内附小学一班，培其始基，并先译满蒙汉合璧教科书，以资教授虞偏废也，学堂定额百人，由布、墨、瑷、呼尔各城，扎、杜、郭三旗，平均招集，曾习满蒙文及汉文通顺者，入堂肄业，先设简易科两班，予科半年，本科一年，共三学期毕业，俟第一班毕业后，即改为完全科，其课程比照京师译学馆以译文为主课加课，普通各学，仍用汉文，至附设小学一班，仿照初等小学课程，酌加满蒙翻译读经，时用满蒙汉合璧诵习乡土志等课，亦兼用译文，更习满汉语言，限四年毕业，给奖"，对鄂伦春、巴尔虎通悉汉文者，因"百不得一，可做适当照顾"。

可见，这所学堂是为蒙八旗和新满洲八旗（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巴尔虎）等旗民子弟所设。名为师范，实际是以培养通晓满蒙汉文并有译文能力者为目标，是为当时的"笔贴式"人才的需要两办的。达斡尔族老一代额勒春、巴金保、金寿有、杨宪文、吴蔼鄂、庆同普、钦同普、孟恭元、教匡久、苍和忠、孟希舜、凌升、葆定、福龄等，都受过满蒙师范学堂的教育，他们是清末公办学堂系统地学习满蒙汉文的首批人才。

在呼伦贝尔地区，1881年（光绪七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首先开办了满文学堂，收蒙旗蒙古、达斡尔、鄂温克子弟入学。《呼伦贝尔志略》记载说："开设满文学堂一所计三间，大门一间，围绕学舍的土墙，长有二十丈高六尺，光绪八年，添设学官一名、……"。又记，1877年（光绪三年），"达斡尔部设私塾于南屯，由齐齐哈尔调任教师，教授本部子弟十余人以汉满文字"；光绪末年，"呼伦贝尔初级小学堂，继又改为两级小学校，其学生由各旗挑选，其教员由提学司派往，其学额先定六十名，以后按年限添班，其开办经费，由提学司于蒙古报效银

两项下拨发常年经费就地由牲畜毛新捐献给，以满蒙文授课。”

可见，清代呼伦贝尔只有一千多人口的达斡尔族的的民族教育，远比布特哈、齐齐哈尔两地的达斡尔族地区发达。

《黑龙江志稿》上还记载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瑷珲墨尔根两城各设初等小学一处，在东布特哈创设初等师范予备科一处，西布特哈创设初级小学一处”。博尔多初级小学、尼尔基初级小学开始招收大批达斡尔族子弟入学，给予后世达斡尔族人才培养及普及教育打下了基础。

清代以满蒙汉文合学为主要形式，蒙古、达斡尔、鄂温克等三个民族，有着较长的合办民族教育的历史。

清代及民国初年达斡尔族以满文为主的教育普及率如何？据1929年所闻所见介绍如下：

齐齐哈尔地区沿江部落西勒哈屯，全屯共二十四户，人口为一百八十余人，其中四十岁以上赶上清朝的八十余人，男性中间掌握满文并有翻译能力的，有京根、双合、特木尔等七八人，懂满文的共二十几名，占男性总数55%强，女性如舍格尔、大乃尼等三四人能将满文故事流畅地翻译成达语，另有懂满文的五六名，她们占女性总数的25%强。

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内陆部落敖宝屯，全屯约七十户，达斡尔族为六十几户。民族人口三百余人中，四十岁以上赶上清代的共八十余名，男性中间识满文的占30%，会写文章的三四人，女性中间识满文的为数不多，整个赶上清代的人们中间，懂满文的近30%。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在清代懂满文的相当多，但不普遍，文育率仍占60—70%。自1915年以后，各地基本上停止学习满文，只教授和学习汉、蒙文了。

二、民国年间的达斡尔族学校教育

民国初年达斡尔族的教育，由满文为主的教学，逐渐向以汉文为主的官学堂过渡，汉文私塾和汉文官学并存。因时局更迭，又突然改用生疏的汉文为主，因为语言关系，这期间的民族教育处于低潮。

1． 蒙旗初等、高等小学校

1914年，在省城齐齐哈尔时报馆胡同的蒙旗事务所院内开办了蒙旗初等高等小学校。

2． 黑龙江蒙旗中学校

1917年，为适应蒙旗初等高等小学校升学需要，在省城齐齐哈尔北关开办黑龙江蒙旗中学校。后来于民国十三年，因经费困难和学生来源不足，黑龙江督军兼省长吴俊升遂下令省教育厅停办。

3． 蒙旗教育委员会

经过蒙古、达斡尔、鄂温克的各地民族人士议论酝酿，一年之后，于民国十八年九月二日，由扎赉特旗巴王爷出面，具文备案黑龙江省政府和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官公署说："窃查本省各蒙旗教育事业，漫无系统，其影响教育前途，殊非浅显。敝旗等有鉴于斯，用特会同呼伦贝尔、东北布特哈暨附郭各蒙旗，共同组织黑龙江教育委员会，司理本省各蒙旗教育事宜"，说"兹推选巴达玛拉布坦为委员长，达木林扎普为副委员长。会址暂设在黑龙江省城北关一分局柴家胡同门牌一号为办公地点。并拟章程三十一条，自九月五日开始办公。"兴办教育经费，在章程第六章里提了四个来源："在各旗地方公款项下定费，官府补助，办各类事业收入，劝募。"委员会还倡议并决定筹办黑龙江蒙旗私立师范学校。

这个委员会所说的"司理本省各蒙旗"，指的是扎赉特、杜

尔伯特、郭尔罗斯（共二旗）、依克明安等蒙旗，还有呼伦贝尔、墨尔根和东、西布特哈以及齐齐哈尔达斡尔等八旗。委员会在筹办时，由扎旗巴王爷的代表图门满达胡主持，常务有杜、郭、依旗的各王爷代表及布特哈八旗代表富礼廷、齐齐哈尔八旗代表金寿有等参加。此外，达斡尔族人士额勒春、庆同普、吴蔚邦、杨宪文等都热心支持了该会工作。

4. 黑龙江蒙旗私立师范学校

1928年，经蒙旗教育委员会及蒙古、达斡尔等族热心民族教育的有识之士的不断努力，终于冲破了省督军吴俊升以财经困难为由，不同意蒙旗兴办师范学校的障碍。在吴被日本间谍炸死后，派图门满都呼、金鹤年、金耀洲等去奉天进见东北三省保委司令官张学良，争得了他的支持，同意由当地政府每年拨款大洋贰千元（此款由黑龙江省上缴税金中扣除），其余全由蒙旗教育委员会承担。这所私办公助的蒙旗师范于1930年春开始招生时，因师范生来源不足，遂先办起附属小学班若干个。接着，还未来得及送出首届毕业生，于开办的第二年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5. 奉天东北蒙旗师范学校

1928年，张学良将军与呼伦贝尔暴动队代表郭道甫私下谈判，按照对郭许诺，在奉天艾家胡同创建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招收东蒙各地的蒙古学生和呼伦贝尔、布特哈、齐齐哈尔一带的达斡尔族学生。达斡尔人郭道甫为首任校长。

从这所学校里，培养出不少的少数民族社会知名人物，如蒙古族的哈丰阿、特木尔巴根、阿思根，达斡尔族的郭东布、敖岳山、敖玉祥、滕合台、吴泽民、孟斗祥等。

6. 博尔多小学

博尔多即讷河。博尔多初级师范予科班停办后，民国初年，开办了博尔多小学，招收东布特哈子弟为主，兼收西布特哈子弟。此校是在布特哈八旗筹办处资助下，在北方唯一容纳百余名

的大型小学。为筹办此校，当时担任八旗筹办处会办的额勒春，帮办巴金保（富礼廷）、钦同普等老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他们为集资而筹办教育基金会，为救济贫苦的达斡尔族子弟就学和深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该校毕业生中，升进蒙旗师范、北京蒙藏学校以及赴日留学的人数，比任何达斡尔地区培养的人才要多好几倍。

7．尼尔基小学

清末创建，民国初年恢复开办，招收西布特哈地区小学生。它和博尔多小学是达斡尔地区最早的官办全日制学校。

8．呼伦贝尔小学

1919年，在郭道甫、福明太倡导下，由郭道甫舍财出资私办小学，得到了呼伦贝尔各族人民的赞助，也得到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各地的外国商人的筹款资助。办学之后，不断地有美、英、俄、日、德等外国客人来校参观，对郭道甫先生的兴办教育精神都赞不绝口。

不久，因为地方传染病蔓延，小学被迫停办。

9．莫克尔吐小学

1920年，因城内急性传染病久延不停，郭道甫先生说劝老父舍财助资，遂在索伦旗莫克尔吐屯私办小学一处，聘请苏联布利亚特自治共和国女教师索妮任教。此校因受苏联十月革命的政治影响，该校毕业生纷纷到苏联留学深造，其中海瑞、松贤等五名女学生，脱离封建家庭到苏留学和参加革命工作，在达斡尔族女性中间确是一件破天荒的史实。

10　齐齐哈尔屯小学

1922年（民国十一年），在齐齐哈尔屯绅士杨宪文、吴蔚邦先生倡议下，创办了齐齐哈尔两级小学校，编号为齐齐哈尔市第三部，是齐齐哈尔地区最早创办的民族小学。这所小学培养出不少人才，象杨世显、沃文德等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11．敖宝屯小学

1925年创建，是龙江县官办全日制小学之一。首任校长是莫尔登氏阿子贞，教员有乔盛勤、郑××（1925—1931年），次任校长为胡××，教员有杜文林、乔盛勤（1933—1934年）；第三任校长为刘××、教员屈文斌、屈文忠（1935—1937年）。何布台（何维忠）留日归来后，代课一个阶段，鄂鸣中、吴化民等也都代过功课。

这所学校共培养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了达斡尔族中的知名人物。笔者本人也是从这里毕业的。

12．敖宝屯女子私办小学

1930年—1931年，何秀岫借用乔家地主的大仓房，办起女子识字小学，专门招收13—16岁达族女少年上学，参加学习的女生共三十余名，打破了女性不得进入校门的旧习，给后世女子上学敞开了大门。

13．全和台屯私立小学

1929年，全和台屯卜达林嘎（汉名卜成森）学完师范后，回家创办私立小学，共有十几名学生分两个班讲课，不收任何学费。1932年起，私办转公办，沃文德长期任校长，莫尔根、白音、吴自新、茫哈等，都出身于此校。名徒辈出，实属办学得力名声在外的民族小学。

14．梅里斯小学

大约创办在1929年，是龙江县官办全日制小学中比较大型的学校，可容纳六个班级三百名学生。毕业生中，有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金增显等。

15．其它

音钦、杜尔门沁、文冈达等屯，都设有官办初级小学校；巴旗哈、哈拉、雅尔塞、黑大户等屯设有私塾。

民国年间，达斡尔族农村中有了官办全日制小学十多所，也

有些私办塾馆，这是一方面情况。还应当说的是，虽然官办小学使就学率增大了，例如敖宝、全和台、齐齐哈尔等村屯适令学童就学率达到了９０％，但因为教育上从满文为主课改成汉文为主课，汉语汉文生疏难学，尤其是文言课更难消化理解，教学效果很不可观；至于民间私办义学，同一原因，其就学率是很可怜的，但是它们在书法、珠算教学上，要比官学高出一筹，学生最低也能打珠算九归，打的快而且准。在没设官学的村屯，有的由于放弃满文学习而办不成私塾，以致又弄成无人就读的文盲村，象沿江的西勒哈二十四户子弟无处上学便是一例。这就是当时达斡尔族学校教育上的另一个情况。

齐齐哈尔一带达斡尔族人士回想起民国年间民族教育时，都遗憾地说："布特哈地区将八旗筹金七百万两用于发展民族教育，后世人才济济，给后代办了积德的事，而齐齐哈尔地区八旗处七百万两用于经济投资，如铺设齐昂小铁道投资、汇川五金行投资，也有广信公司的股份，九·一八事变后，全被日本帝国主义没收归公"。齐齐哈尔八旗处领导人庆同普失了策，给予齐齐哈尔地区民族教育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后果。

民国年间，还应当记载的是，1924年（民国十三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座谈会后，国民政府决定"给予布特哈与蒙旗相等待遇，"这就给达斡尔族子弟选送北京蒙藏学校以及赴日留学等，打开了方便之门。从此以后，达斡尔族子弟升入中央南京政治学校、北京蒙藏学校、东京俄文译学馆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陆军士官学校者甚多。培养出的首批高级人才有：郭道甫、志达图（孟星三）、鄂国璋、德古来（杰尔古郎）、敖匡海（孟和巴雅尔）、鄂序元（阿拉坦嘎达）、额尔精太、海瑞（女）、鄂德洪、郭兴元（绰罗巴图尔）、郭东布（莫德勒吐）、何维忠（何布台）等人，这些人也是本民族的首批高级人才。

三、伪满时期的达斡尔族学校教育

伪满的十四年间，达斡尔族的民族教育发展迅速。追其原因，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东北，很注意顺应和满足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发展民族教育的愿望，也企图从而培养出为日伪效劳的人才。另一方面，蒙古达斡尔上层分子则利用土地国有化的差额补贴金，通过各地兴办的蒙民厚生会、蒙民裕生会、蒙民振生会等社会福利团体资助了各地的民族教育。当时的达斡尔人在伪满初期就一律改称为达斡尔蒙古族，可以享受在伪兴安四省内各类大中学校的升学权。

下面就把伪满时期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子弟升入伪兴安省各类学校的情况做个介绍。

1．兴安军官学校

1934年建立于王爷庙(即乌兰浩特)，首任校长由原扎赉特旗扎萨克亲王、伪兴安军司令官陆军上将巴达玛拉布坦兼任，次任校长是甘珠尔扎布中将，另设日本顾问主持校务，教官由日本、蒙古军官担任。兴安军官学校从蒙族（包括达族）初中毕业生或兴安军青年战士中间招生，起初实行二年制，后改为三年、四年制。1938年开始设少年科，由小学招生，实行四年制，学完中学课程后转入军校预科二年，本科为二年制。

第一期 （1935—1936）的学生，有多祯祥（后去日本留学并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后任军校教官及伪九、十军管区参谋等职）、鄂嫩日图（后去日本留学并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敖奎祥等。

第二期（1936—1938）的学生，有沃文治（后去日本留学）、多文秀、多文珍、多恩录（后去日本留学）、单福祥等。

第三期（1939年）毕业的有屡占榜首的鄂秀峰等。

第四期（1940年）毕业的有何文贞、敖瑞祥、敖××等人。

第五期生（1941）毕业的有金福甲、金文寿等。

第六期生（1942）毕业的有鄂兴泰、金振昌、何文秀等。

第七期生（1943）毕业的有郭志勇等。

第八期的学生有：孟继庭、敖和忠、莫日根巴图，布和巴图、敖国瑞、徐兰亭等。

第九期有图布信、孟林元、恩和等。

1938—1941年，担任该校军事和学科的达斡尔族教官有郭东布（中校）、鄂鸣中（少校）、王海山（上尉）、鄂秀峰（上尉）、沃文治（上尉）、敖文俊（教导团少校教官）、多文秀（上尉）、单福祥（上尉），多祯祥（上尉）等。

这些达斡尔族军官，在光复时，多数人参加了军校师生和第十军管区的反日哗变并在解放战争初期成为我党领导下的蒙军指挥骨干，参加了围剿嫩江省光复军以及解放东北的辽沈战役，其中相当部分同志，提拔成为我军的团、师级领导干部。

2．兴安师范学校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奉天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和黑龙江蒙旗师范学校同时恢复和开办，到了1935年，伪满因建兴安局及兴安省，将两处蒙旗师范学校合并归一，改称为兴安师范学校，仍在齐齐哈尔西大桥西开办，招收蒙古、达斡尔族学生，实行五年制，为蒙旗各地培养师资。

1938年初，该校移至扎兰屯桥洞以东的新校址，设本科（五年制）、特修科（二年制），另有兴安国民高等学校(四年制)、实行三校为一体的一元化领导。

该校创建时的首任校长是图们满都呼（蒙族）、教务处长沃子书（达族）、训务处长金耀洲（达旗）。改为兴安师范学校后的首任校长为哈斯巴图尔（蒙族）、继任有阿昌阿（蒙族）、苍吉扎布（蒙族）、徐守城等。

这所学校从民国创建到伪满倒台共跨十七年，实办十六年，

办学时间长，学生人数多，是当时独一无二的一所大型学校。现今，内蒙各地主要领导干部及社会名流基本上出身于该校，象鄂嫩日图、鄂嫩、巴达荣嘎、才喜雅拉图、乌如喜勒图、萨义尔、帕格达、巴布哈等等皆是，在此校任教较长的达斡尔教师有：敖玉祥、滕合台、额尔登陶格陶呼、恩和巴雅尔等。

3. 兴安学院

1935年开办于王爷庙，直属伪满兴安局及文教部领导，是伪满独一的“国立”中学，以日本师范学校教材为主，实行五年制，是培养行政干部为目标的学校。它不同于伪满普通的国民高等学校，衣食住等由政府全包干，完全用日文教学，教员的80%以上是日本人，教育中，灌输复兴蒙古大业及日本大和精神更为突出。

此校首任院长由西科后旗扎萨克原兴安南省省长寿明阿兼任，次任院长由兴安总省省长博彦满都兼任，实际主持者叫做主事，前后有日人滕本和德宿等出任，教务长和训务长也都是日本人。教员中，只有少数是蒙族和汉族人。

该校教学质量要比其他中等学校高出一筹，尤其是日文、蒙文、数学、史地、生物、理化等课更为突出，唯独汉文水平低，接受日本奴化教育较深，入大学比例较高，占被推荐人数的90%以上。

从1939年的首届到1945年的七届毕业生里，达斡尔族学生有几十名。而第四届的学生成绩都比较优秀，有五人列毕业成绩的前十五名。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六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省正副厅级干部，有四人成为县级干部。

4. 育成学院

1940年于王爷庙创办，是蒙民厚生会领导下以专门培养留日学生为宗旨的中等学校。学制为四年，采用国高教材，在蒙旗各地属名牌学校之一。

育成学院院长由蒙民厚生会理事长玛尼巴达拉兼任。在该校担任教官的达斡尔族人士，唯有敖玉祥一人（由扎兰屯调去）。

达斡尔族学生有：金增民、阿拉玛斯、吴丁盛、何什格图、鲁克等。

5. 铁路职业学校

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参与官绰罗巴图尔先生的倡导下，1939年在郑家屯兴办了铁路职业学校，专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学制为二年，设火车司机、汽车司机、列车员等业务，毕业后分配到兴安省少数民族集聚的铁路驿站服务，衣食住全部公费。共收两期学生，达斡尔族学生占二分之一强。

6. 海拉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

简称为海拉尔一高，设在南屯北侧，专收草原蒙旗子弟，衣食住全部公费，学制为四年，全用蒙文教材授课。

海拉尔一带的达斡尔族子弟基本上由该校出身，孟公阿、诺尔布等皆是。

7. 王爷庙女子国民高等学校

1939年创办，学制为四年，半公费制，全由日本女性任教，向受教育者贯输贤妻良母思想。在该校就读的达斡尔族女学生有孟国杰、乌云毕力格、吴玉信、郭伟×、鄂明等十一名。孟国杰、乌云毕力格等曾前后担任了内蒙古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副主任及全国妇联委员等职务。

8. 扎兰屯女子国民高等学校

此校于1942年创办，学制为四年，以国高教材为主，由日本女性和达斡尔女性任教，学生的90%是达斡尔族女学生，基本上属于达斡尔族女子中学。

达斡尔族女性任教的有：索仁挂、鄂月英、乔××、鄂静娴等。

9. 卧牛河农业中学

1938年开办，是伪兴安东省布特哈旗举办的一处地方性职业中学，学制二年，以专门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为宗旨，校长是金耀洲兼任，招收二期学生后停办。校址在扎兰屯以北卧牛河马场，学生全是达斡尔族子弟，比力格、单宝玉等毕业于此校。

10. 尼尔基农业中学

1942年于尼尔基镇开办，学制为二年，专学农牧林知识，学生全是达斡尔族子弟，首任校长为斗星阿。

11. 旧三站私立农业中学

1943年，是当时任伪兴安东省民政厅长的金耀洲（额尔登）以私款筹办，以培养达斡尔族农业技术人才为宗旨，金耀洲兼任校长，委托鄂廷顺主持教务。教员有安文禄、安延昌等。有校舍十几间，实验田十几垧，衣食住全包干，学生来源全是达斡尔族子弟。金耀洲先生舍财为民的精神，当时就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称颂。

12. 兴安医学院

1943年于王爷庙创办，是伪满兴安局及文教部兼管的医科大专学校，学制三年，专收蒙达族学生，达斡尔族著名医师巴布哈任教。

13. 其它

沈阳同善堂助产士学校增设民族班，达斡尔族女性木藤、苏荣、乔淑兰、鄂明等就是由该校毕业的。

钱家店军校少年科，招收蒙达等族学生。

甘旗哈农业中学，招收蒙达族学生。

哈尔滨军医学校增设民族班，为伪兴安军培养军医人才，达斡尔族学生阿拉坦仓、多文瑞等民族名医，都是该校毕业生。

哈尔滨工业学校是白俄人私办专科学校，设工业、数理、俄语等系，达斡尔族学生鄂惠民、巴达荣嘎等毕业于该校。

达斡尔族各地农村小学，在民国年间官办公立小学基础上，到了伪满年间，一般人口集中的村屯（包括移民村屯）均设有农村小学，小学就学率高达60—70%，青年一代文盲大大地减少。

在民国时期，达斡尔中培养出十几名大学生，到了伪满年间，到各地大专就学的达斡尔族学生有成倍地增长。其中有的人现在已成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栋梁之才，这里稍占一点篇幅介绍一下。

去日留学人员有：京都帝大金增显；东京工大帕格达（沃文瑞）、才喜雅勒图（德古泉）、恩和巴雅尔；早稻田大学何什格图（何庆瑞）、白音（沃文涛）；东京法政大学鄂英海；东京中央大学滕合台（郭柏松）、鄂廷顺；东京农大敖玉祥；东京医大巴布哈；东京高师敖勤学；广岛高师外语学院巴达荣嘎（德古永）；仙台帝大乌如喜业勒图；东京陆军士官学校鄂嫩日图、多祯祥、敖奎祥、沃文治、王海山、鄂秀峰、陶振义，另有早期由日本关东军的“善邻学寮”报送的郭文通、郭兴元、郭东布等；广岛高师鄂勒保；山口高商德古来；东京“善邻学寮”高商吴泽民；麻布兽医高校阿牧(安国栋)；山口师范鄂月英；京都二高萨义尔(后入旅顺工大)；广岛高师嘎比雅图(何文勋)。还有耐日拉图（学美术）、索岳尔图、何庆珍、乔盛忠（青嘎）、奥登娃、吴瑞英、李德山、李德生（学医）等。

国内大学毕业生中：

建国大学（学制六年）毕业的格日勒泰(汉名鄂朗海)曾任布特哈旗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主任；

鄂嫩（汉名鄂平元）曾任巴克西敖宝国营农场场长；

哈萨吉尔嘎拉（汉名郭玉兴）曾任鄂伦春旗医院医师；

喜嫩曾任内蒙自治区计委处长。

色尔格楞（又名卜林）现任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

蒙和（汉名郭文通）任内蒙古自治区出版局副局长；

毕力格巴图（汉名鄂文勋）任呼伦贝尔盟畜牧副局长、内蒙政协常委；

敖东来任呼伦贝尔盟政协副主席、内蒙人大常委；

孟公阿任石家庄市医院医师。

吉林高等师范学校（学制三年）毕业的：

额尔登陶克陶呼任内蒙达斡尔文字工作委员会编辑；

斗星阿（汉名孟斗祥）曾任纳文慕仁盟秘书处副处长；

巴图卓日格曾在呼盟教育局工作；

耶拉（汉名安国梁），书法家、美术家，任内蒙古自治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勒巴图任通辽市二中校长；

纲嘎尔（汉名多有贵）任内蒙古自治区城建厅厅长，经济地理学家；

德力格尔（汉名德贵封）任牙克石市政协副主席；

乌嫩卓日格吐（汉名孟作善）任呼伦贝尔盟农林总局局长。

长春法政大学（学制三年）毕业的：

德广华伪满任过齐市检查长；

阿拉坦托勒古如（汉名德文盛）任内蒙包头钢铁厂钢铁研究所所长。

长春医科大学毕业的：达木林扎布（汉名鄂成惠），任内蒙军区后勤部军事医院副院长。

奉天南满医科大学毕业的：

乌兰陶格（汉名鄂文举）在鄂温克旗医院工作；

斡特嘎图任呼伦贝尔盟日报社社长。

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何希格图（龙江县黑岗屯人姓沃），在建国初病故。

哈尔滨农业大学的有吴丁盛，任职情况不详。

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乔淑英（女）、莫莲凤（女）分别在通辽医院和满洲里市医院工作。

此外，从哈尔滨军医校、兴安军校及国内各大学毕业的还约有五十名。

伪满年间，达斡尔族农村官办小学教育比较普及，其中：扎兰屯葛根小学（校长乌尔根达来）、第二村小学（校长包德华）、腾克小学（校长敖凤山）、阿尔拉小学、全和台小学（校长沃文德）等大型民族小学比较闻名。

四、解放初期的达斡尔族学校教育

1946年，黑龙江省蒙古师范学校原兴安师范学校（原兴安师范学校，1954年改为民族师范学校，1959年后停办）和扎兰屯纳文中学同时开办，为达斡尔族集中地培养了不少新型人才。届至文化大革命为止，这两地的民族学校输送大学生约三百名，比起伪满有成倍的发展。学生中，有些人已经成为高级科技人才，有三名荣获博士学位，获硕士学位者也有若干名。达斡尔族文化教育水平按人口比例，将成为人才济济并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文化民族之一。达斡尔族先辈们为营救民族文化落后，有的舍得家产捐助学，也有官员每月从俸薪中集资组织民族教育基金，对于家庭贫困又颇有造就前途的学生搞奖学助学，还有不图名利并一心扑在民族教育事业上的热心人等等。这些达斡尔人注意教育子弟的优良传统，无疑地促进了达斡尔教育事业发展，期望后人有所发扬光大才是。

达斡尔族教育的摇篮

——记省立师范附小第三部

何斯日·郭奇　　乌力斯·卫戎

齐齐哈尔村达族学校，是达斡尔族教育的摇篮。梅里斯区齐齐哈屯，三百多年来形成为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人的政治活动中心。

达斡尔人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历来居住在苦寒的边塞地区，文化很不发达。他们经营粗放的农业兼营渔猎生产，民习骑射弓矢，以武功闻世，在这里兴文识字是很艰难的事。齐齐哈屯建立后，在整个清朝政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没有什么文化教育可言，更谈不上正规教育了。屯中居住的人没有一个识汉字的，会说满语和汉语的人也为数很少。后来，在衙门里当官的人和富家子弟开始学习满文，经过一段时间，他们能用满文记载日常发生的事情和民间传说故事了，也有的会用满文写书信了。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达斡尔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使用满文的能力逐渐有了提高，学会满文的人，有的已经能熟练的运用满文记述和用达斡尔语讲解《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故事了。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达斡尔人逐渐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到了清末民初，随着黑龙江省文教事业的兴起，齐齐哈屯一些富户人家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省城或附近汉族人办的私塾里学习汉文。民国初年杨贤文、吴维邦、杜文林、杜文录等人毕业于黑

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们是达斡尔族中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这些人分别到了省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作，成了达斡尔族中的头面人物，并为本民族的振兴做了些有益的工作。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达斡尔族人民群众为了使自己的子女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迫切要求建立一所学校。于是在省城工作的齐齐哈屯人杨贤文、吴维邦会同本屯的杜文林等人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争得了省教育厅和省立第一师范的支持，终于在1922年秋，在齐齐哈屯建立了第一个达斡尔人自己的学校——黑龙江省第一师范附属第三部小学校。建立学校、上学读书，这在达斡尔族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开学典礼那天，人们象过年那样高兴，杀猪宰羊，载歌载舞，热烈庆祝达斡尔人第一个学校的诞生。

为了办学校，杜文林献出了自家的两间正房、两间厢房，给学校作教室和教师宿舍用，桌椅和教学设备是省立一师拨给的。学校的第一任校董是杜汉臣，第一任校长是谷松年，第一批入学的学生是附近村屯三十余名达斡尔人的子女。

校长谷松年，字学涛，汉族，拜泉县人，他富有办学经验，齐齐哈屯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谷学堂。谷校长既热心于达斡尔民族的教育事业，又堪称民族团结的楷模，他置身于达斡尔族人们之中，努力学习达斡尔族的语言，尊重达斡尔人的风俗习惯，并按照达斡尔人的习惯安排自己的生活，还让自己的儿子谷玄洲和达斡尔族学生安富贵结拜为义兄弟。他治学有方，作风严谨，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把全部知识贡献给学生，教育学生成为有用的人才。达斡尔人的孩子刚上学时，只有父母叫顺口的小名，而谷校长给每个学生都起了好听的大名。谷校长在任职期间和达斡尔族群众有了深厚的感情，在他离开齐齐哈屯去哈尔滨上大学时，全屯百姓和全校师生一起将他用船送过嫩江才洒泪惜别。至今，齐齐哈屯的人们还时常怀念这位曾为达斡尔族启蒙教育做出

贡献的好校长。

齐齐哈屯小学首届三十余名学生，除大八旗哈的修德文外都是达斡尔族学生。这些学生中有：齐齐哈屯的杜明生、鄂振华、杜文和、德海悍、德海彬、杜树德等，东哈雅屯的杨士贤、杨士贵、杨士荣、杨长海、杨金海、杨青海、吴宝喜、鄂光太、吴明瑞等，有全合台屯的帕格达、沃维城，还有万象岗子屯的沃文德，西哈雅屯的鄂秀峰，文固达屯的鄂长青，三达胡屯的鄂巨清，永哈拉屯的敖福成，黑岗子屯的沃文成以及几名女学生。这所学校，在1927年有十余名学生首届毕业。其中的高才生沃文德考入省立一师，成绩在省城名列第一名，这事一时轰动了全齐齐哈尔地区。沃文德先生师范毕业后，放弃了伪政府的科长职务，回归故里，在全合台屯开办了第二所达斡尔族小学校。齐齐哈屯学校首届毕业生的第二名学生鄂振华省立师范毕业后，考入了沈阳讲武堂，后来在张学良将军部下任东北军的中校团长。第三名学生杨士贤当过科长、处长，现七十高龄，还任内蒙古自治区建委主任。高才生帕格达到日本东京留学，毕业于帝国大学化学系，解放后长期从事纺织行业工作，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国营毛纺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鄂秀峰毕业于军官学校，解放后曾任人民解放军内蒙军区第五师第五旅旅长和师参谋长，现任牙克石市政协副主席。在其他毕业生中，多数人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参加了教育工作。

首届学生毕业后，省立第一师范于1927年，给办学有功的杜文林（后来的校董）家赠送了"热心教育"四个大字的黑底红字的横匾。

民国时期第一任校长谷松年后的几任校长分别是：潘炳耀，汉族，白城子人；关焕然，满族，后平房人。1928年，学校新盖了六间校舍，其中的四间作教室。增加了两名教员，一名是吴质彬，达族，化木屯人；另一名是李春华，汉族，齐齐哈尔市人。

这时的学校班级已增加到三个，学生有近百人。学校开设的科目有：国文（汉语）、算术（包括珠算）、自然、修身、体育、唱歌、手工（图画）等。学校根据首届学生年龄差异大的特点，给学习成绩好的、接受能力强的大龄学生增开了英语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了东北，局势动荡不安，学校暂时停办。第二年虽然复学开课，但很不正规。1935年，齐齐哈屯划归龙江县管辖，学校改名为“龙江县立齐齐哈初级小学校”。伪满时期第一任校长是金寿仁（达族），以后分别由陈××、刘汉俊、姜士选任校长。当时有教员四人，学生一百二十二人，每年由县里拨教育经费一百一十元，学生每人每年缴纳学费五角。学校又扩建两栋草房，共十六间，其中的十二间为六个教室，余下的为教员办公室和仓库等。后来学校增设了优级班，学校又改名为“龙江县立齐齐哈国民优级学校”。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两年。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对学生进行的是奴化教育，学校每周要升一次日、伪国旗还要唱日、伪国歌，背诵《回銮训民诏书》。这一时期，学校增设了日语课，并将修身课改为“建国精神”。这一切，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长期奴役中国人民这一卑鄙目的而实施的。

当时，齐齐哈学校的校训为“忠、孝、仁、爱”，当时还编有校歌（附于本文之后）。

1945年9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东北光复，大好河山又回到人民手里。1946年初，齐齐哈学校又恢复上课。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那锁臣（鄂温克族），全合台人。有教师四名，学生百余人。1947年8月，那校长调出后，由白生才、傅英杰任校长。这几年学校规模没有什么变化，开设的课程有汉语、算术、自然、体育、音乐、图画等。与此同时，学校根据东北人民政府关于“教育工作主要是服务于革命战争和土

地改革，即以战争和土地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指示精神，组织师生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他们以各种形式，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有力地配合了土改运动的开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经沧桑的齐齐哈学校获得了新生，学校教育走上正规，并不断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杨士义（达族）现任内蒙古农牧学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而后到今继任的校长有：德玉梅（达族）、魏文超、孙绍海、乔吉有（达族）、关通、何春山（达族）、刘福生、杜奎文（达族）、吴福昌（达族）、胡和（达族）、何文成（达族）等人。其中已故的吴福昌校长曾被选为省市模范教师。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教育，不论在师资配备、办学经费、设备购置上都给少数民族学校优先照顾。这样，就使齐齐哈学校得到了更快地发展。

1954年齐齐哈屯划归齐市管辖，校名改为“齐齐哈尔市郊区齐齐哈小学校”。齐齐哈尔市教育局极为关心这所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学校。

1965年春，政府拨专款给这所学校，新建了三栋校舍，计二十四间，整个校园占地一万二千六百平方米，师生们在校园四周种了榆树墙。这一年，学校有教学班十个，教师十三人，学生三百二十一人，成了齐市郊区具有相当规模的完全小学校。这个学校在市、区教育行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多次被评为市、区、乡的先进单位。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热心民族教育的校长、教师们的辛勤培育下，齐齐哈学校，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造就了很多人材，据不完全统计，有两千余人受初等教育，毕业于这个学校，他们当中有县团级以上达族的领导干部二十余人；有讲师、教授、工程师以上达族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三十余人；有中小学教师及国家

机关的达族干部上百人。齐齐哈学校是齐齐哈尔达斡尔族地区最早建立的以达族学生为主的公立学校，她在达斡尔族的文化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齐齐哈学校的建立，是齐齐哈尔地区达族普通教育的开始，自成立以来，使越来越多的达斡尔族青少年受到了初等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升入中学和大学并在“四化”建设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齐齐哈学校就是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教育的摇篮，她不仅为达斡尔族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为她的发展壮大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人们谈论达斡尔族教育的发展，都不会忘却齐齐哈学校的历史功绩。

齐齐哈学校虽经六十二个寒暑，但是，她仍然富有旺盛的生机，保持着青春的活力，过去，她把各民族的子弟教育成了社会的栋梁；今天，她又在为“四化”大业造就着人材。

前进吧，齐齐哈学校，你这光荣的名字将永远在教育史上焕发着光彩。

1＝D 4/4　中速　　齐齐哈学校校歌

1 1 2 · 1 6 5 3 5 6 1 5 — | 3 5 3 2 1 | 2 5 3 2 1 — |

齐齐 哈 尔 由来 名最古，吾校设立 首为 第三部
康德 二 年 改归 龙江县，校运消长 当局 无变迁
满蒙 杂 居 畛域 不可分，同学亲爱 一德 又一心
莘莘 学 子 负笈 来他方，德就业将 吾校 之荣光

3 2 3 5 5 | 6 5 6 1 6 5 — 6 · 5 6 1 | 2 1 2 3 2 1 — ||

民 族 特殊自古 称尚武，有 用之才全 在 读 书。
努 力 经营不休 亦不眠，方 有今日灿 然 可 观。
循 规 蹈矩言贵 由衷心，齐 家治国先 要 修 身。
英 才 荟集前途 多无量，校 运兴隆山 高 水 长。

巴金保兴办民族教育事迹

郭　明　升

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初，在布特哈、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中有一位人所共知的“四庭”之一的巴金保，又叫富礼庭，其余三位是荣宪庭、郭雅庭、禧伍庭。下面，我仅凭自己记忆的，又得到老同学巴达荣嘎（德古永）帮助，把半个世纪前巴金保等人办学的情形记下来，留给后人并供搞地方教育史的人参考。

一、以振兴民族教育为己任

巴金保出身于布特哈的达哈浅屯一个贫寒农家。布特哈、齐齐哈尔地区，历来就有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传统，所以在巴金保青年涉世之初，就对民初军阀统治下使兴办民族教育、培育民族人才成了空话的情况感到痛心，久久不能平静。继而，以他在齐齐哈尔满蒙师范仅仅学过两年的资历，竟不避艰辛挺身而出，回乡兴办民族学校，决心培养人才。

他曾经一再地对我们讲过：过去我们民族的先人们抛头颅、洒鲜血、战“罗刹”，苦守边疆。在以后，又出现有都兴阿、常顺、多隆阿、德兴阿、丰隆阿等人，这些布特哈、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出身的、衔领过将军、钦差、大臣等职的人们，都曾在清代为国效力，转战四方，参与了一、二次鸦片战争，参加了台

湾战役和中日、中法之战，抗击了八国联军侵华，也参加了新疆、云贵的平叛戍边和屯垦戍边……，但是，也只是列名北京中南海凌烟阁和颐和园玉兰堂而已，他们没有为达斡尔族后代留下任何珍贵的文化教育遗产。巴金保告诉我们振兴民族教育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

巴金保很敬佩当时呼伦贝尔教育知名人士郭道甫，郭的致力于民族教育的奋斗精神始终成为巴金保的榜样和力量。巴金保抱着复兴和提高民族文化、兴办普及教育和培养人才的志向，找了当时北京师大的高材生德古来（吉尔嘎朗）和北大学生鄂序元（鄂伯乾，又名阿拉坦嘎塔）、孟隆元（斗富）等人，一同进行过多次的探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925年冬，德古来建议并受大家委托，去呼伦贝尔的莫克尔图拜访郭道甫。郭对他们普及教育的设想很是赞赏，还嘱咐要在各地区充分发动各族同胞，取得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争取家喻户晓；还指出学校设置要注意扩大点与面，点面结合方便同胞；要选聘合适的教师，教材要好，要通俗，教育方法要改进；要鼓励学生求学上进，成绩好的可以到外地深造或派遣出国留学，等等。

二、热心劝学办学

巴金保当时是设在讷河县的东布特哈八旗筹办处会帮，他对德古来出面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

巴金保为了争取社会和学生家长支持，他在布特哈地区，走访了各乡各村的地方头面人士和很多家庭。以后，他还利用职务方便，在各次召开的地方绅士集会上，与德古来等人讲办教育对振兴民族的深远意义。

针对东布特哈有些农村满足于种好地兼一点副业就行了的思想，针对儿童入学升学需用不少经费、不能就近就读的实际困难，巴金保和德古来等人一方面走乡串户劝学，让大家明白不能

再单靠放排、狩猎、采集这些传统的、狭隘的生产方式活下去，应当有多种稳定经营，要有文化，学习汉族农耕技术和其他生产经验，另一方面，巴金保等又着手许多实际工作。他们将布哈特的纳温、讷漠尔、嘎布卡为点，以点带面分成三个教育片，在每个片根据农事淡旺季节下乡办学。巴金保分担纳温慕仁以西和江东傍江一带村屯，德古来、德树元等分担讷漠尔河沿江一带二十一个村屯。在所需教育费用方面，巴金保在额勒春总办兼东布特哈青年教育促进会会长根力支持下，从八旗筹办处达斡尔族生计地地租款内筹集了一笔经费。

三、出资让房，关怀读书后生

巴金保住在讷河镇里，家庭生活也不无困难，但是他仍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部分来资助东、西布特哈学生进县立第三高小读书。

当时讷河县立小学都没有食宿安排，巴金保就把这些学生安置到自己家里。而他也只有三间土房，那间东厢却多年无偿地供作十来名学生起伙、住宿的地方。

他每天都要抽空看望这些学生，了解学习情况，鼓励他们勤苦攻读，要做有良好品德的学生。

他常向乡亲和学生们讲：我在讷河一天，就要帮助学生上小学、升中学、念大学，上学的多了，人才也就培养起来了，我也就为本民族尽到了责任。

四、筹措、设立助学基金

1932年，在德古来等人活动下，日伪当局同意并设立了伪兴安东分省。郝在该分省将总务厅长职位，先后让于了蒙和胡图仁嘎和巴金保，自己承接了总务科长一职，以便帮助巴金保开展兴办教育活动。1933年，由巴金保倡议并经德古来、志达图、德树

元、金耀洲、莫就愚、乔树仁等的积极努力，在扎兰屯市成立了东省蒙旗协助会，是专为培养民族学生筹建助学基金的组织。它的基金筹集，是逐月从省公署及其县旗所有在职达斡尔族职员工薪中提取，提取比例是：雇员1％，科员3％，科长5％，厅长10％，省长15％。该协会由九人组成，推选志达图为会长，德古来为副会长，阿罕台为干事长，理事有德树元、莫就愚、金耀洲、郭凯章等。

这个助学基金组织在后来的活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很大，社会反响很好。它资助了在沈阳、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等地就读和留学日本的学生一百八十人左右，对拥有三千五百多小学生的民族小学，按季或破季地给予酌情补助。据兴安东分省视学官郭凯章（塔日雅图）介绍，得到该协会帮助的小学有二十八所，有四个大中院校和六个日本院校留学的学生得到过助学补助。协会的这个举动，对农村普及小学教育，对其他各旗办教育都发生了良好的影响与作用。

巴金保在达以前，对郭道甫主持的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也曾经做了大力支援。1928年，郭道甫在张学良将军支持下筹办起来的这所学校，为培养民族人才作出了贡献，当时就素称为东西蒙的最高学府。在办学经费上，除由奉天每年拨付一万四千银元外，不足部分由东西蒙的各盟旗分担，其中布特哈、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地区各年分担为一千六百至三千银元之间。巴金保、德古来、郭兴元、德树元没少为这事操劳，取得了布特哈八旗筹办处的支持。他们从达斡尔族生计地和讷河、克山、克东、拜泉、德都等县部分租银地（六十四万公顷）地租款项里筹到了这项经费。首批经费和首批选送就读的学生，一起由巴金保、德古来伴送到沈阳，受到郭道甫盛情的接待。那次会面时，郭道甫书赠巴金保，称赞他“德高望重，热心民族事业”，称赞德古来“诚恳纯朴，稳健创业”。

1932年，喀萨巴塔尔（郭谟南，蒙族）继郭道甫之后改南东北南旗师范为沈阳兴安第一师范。学校初期的经费仍由奉天省支付，后来由伪满蒙政部民政司文教科长陈丰（那木海扎布，蒙族）和该部总务司监察官德古来、玛尼巴得拉（马铭洲，蒙族）商议，拨助该校两万五千伪币，不足部分仍由巴金保、德古来、金耀洲、哈丰阿等向伪兴安东、西、南、北四省说项，得到了各省的资助，解决了该校所需的全部经费。

五、为培养人才而奔走各地

为了使一些有深造希望的各民族学生能继续读书，巴金保和他的得力助手德古来等人奔走于东北、北京、南京、内蒙各地。德古来、涂鹤令（鄂温克族）、沃子树、莫就愚、金耀洲等，在二十年代初曾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联系，以后由巴金保会同金鹤年等选派了郭兴元、志达图、德树元、杨世贤、涂景文（鄂温克族）等十余名青年进入该校学习。1924年至1927年，在巴金保倡导下，又委托德古来、金耀洲、金鹤年、鄂序元、孟隆元等向北京蒙藏学校选送了敖国海、孟德兴、敖瑞明等十三名学生。他们还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挑选出郭兴元等三名学生，由德古来操办送往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接着又送去了敖永保和郭英才。

在人口稀少的民族里，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由于有了象郭道甫、巴金保、德古来、金继洲等热心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先驱者，终于通过齐齐哈尔的满蒙师范、蒙旗师范和东北蒙旗师范、兴安第一师范，通过选送北京蒙藏学校和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以及选送出国留学等途径，培养出了上千名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人仍然战斗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各自工作岗位上。

记德古来先生

郭明升

1939年，发生过由伪蒙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三治合流"事件。同年9年1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古来先生任清查榷运总署署长，翌年任经济部长兼兴蒙委员会副委员长。正在此时，笔者本人在张市经高等官考试后，被录任该政府交通部事务官和秘书官，不久调任经济部秘书官。这样，在以后的十年间便始终在德先生身边工作，工余或随同差旅时，有许多机会闲聊，得知他本人的许多事情。1949年8月与権先生在定远营机场分手，他去了台湾。屈指算来，先生年当八十又五了，但愿有生之日能彼此重逢并畅叙旧情。

德古来（吉尔嘎朗）系达斡尔族德都勒氏。祖籍为黑龙江东布特哈部讷漠尔流域正白旗德都勒氏居住屯文察尔的杜卧格日，该处于1913年改设县制时，划归于后来的黑龙江省德都县。

德的父亲名温全（温墨日根·瓦奇）从小除务农养畜外，尤好狩猎，故得名温墨日根。游猎点多在五大连池、逊克（养给）一带，是当地闻名的猎手。德之母为郭布罗氏（莫热屯人）为人敦厚、贤慧，一生侍老爱幼，忙于园田家计，对其子女们的性格等方面的形成根有影响。

德的伯父名额勒春（字乐田，又名额勒松）农民出身，关心

邻里族众，勤于学习，精通满语、满文。在他二十六岁时苦读汉语、汉文成才。兄弟二人善于营田养畜从事狩猎，因此家境渐趋中等，经十几年合家通力经营发展，已有牛三十余头、马二十余匹、耕地十余垧。他的伯父母只生有二女，因此将先生的弟弟德古永（巴达荣嘎）过继为子。

德之父母生育他们兄弟姐妹共六人，有弟弟德古永（巴达荣嘎）、德古权（才喜雅尔图），姐姐贡日，妹妹策波、雅宝（恩勤）。

德的先妻早故，留有一子德伯麟（绰如波）和二女，长女娜克塔、次女毕亚鲁洁（呼恩乐）。续妻陈沈瑞，满族人，早年在齐齐哈尔女师毕业，通满语。陈氏生有二男一女，我与德先生1949年11月末在定远营分别时，这三个孩子各为七、五、三岁。

德先生的长辈十分重视对他们的教育与培养，所以他们兄弟几人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德古来于1920年在齐齐哈尔考入黑龙江省立一师，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于1924年考入北京师大，与他的蒙古族同学陈丰（那木海扎布）、傅连科（达瓦敖斯尔）一起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接着，他被派赴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留学并学成归国。他二弟德古永（巴达荣嘎）在哈尔滨工大毕业后，由伪兴安东省派送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理科留学。三弟德古权（才喜雅尔图）是日本东京工大毕业。德古来的长子德伯麟（绰日波）由旅顺工大毕业。

1925年德先生从北京师大毕业回到布特哈后，主动向当时还保留的布特哈八旗筹办处的青年教育促进会会长巴金保（富礼庭）倡议兴办民族教育事业，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培养民族人才，得到巴金保的大力支持。他们在博日多（讷河）邀集了地方上的民族知名人物额勒春、禧伍庭、荣宪庭、郭雅庭、安乐庭、图庆格（尼亚克列）、拉青梯、德宏、温子斌、孟定功

（徐海）、孟希舜（高希布）等集会，商定由德古来主持，选派学生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北京蒙藏学校、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深造。先后从布特哈送入这些学校的学生计有：郭兴元、德树元、志达图、阿恒泰、敖瑞永、涂景文和涂景芳（鄂温克族）、孟德兴、敖瑞明、鄂海瑞、敖忠山、敖福瑞、孟荣连、鄂成魁等。巴金保、德古来还一同到齐齐哈尔拜访了好友金耀洲、金鹤年、吴维邦等人，经与鄂范伍、沃来保、敖瑞平、苍和忠等当地民族人士集会协商后，又委托巴金保、德古来、金耀洲、金鹤年送学生到南京、北京、沈阳。齐齐哈尔派送的学生为：何维忠、何维诚、鄂国章、鄂国栋等十四名。

德古来先生还为创制、试教民族文字做了大量的、艰苦的努力。对于采用何种文字形式等问题，他曾到海拉尔拜访达斡尔族一代名人郭道甫先生，最后选定用拉丁字母创制。郭道甫在创制和推广应用中取得过一定成绩。

德先生于1925年冬和以后的1930年，从日本长崎高等商业学校返回布特哈后，几次到沈阳、海拉尔东南的莫克尔图拜访、请教很有声望的达斡尔族人士郭道甫(莫尔色)先生。两人交谈时，郭一再地指出民族内要精诚团结，为提高民族素质，要兴办民族教育，要创制民族文字，要培养民族人才。郭还讲要有民族武装，现在应当是联合布特哈、呼伦贝尔等地的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联合哲盟等盟旗的蒙古族中的有为人士，争取尽快武装起来，反对军阀压迫，解除民族灾难……。德先生遂即按郭的意图和打算，在布特哈、齐齐哈尔、呼伦贝尔等秘密开展活动，到哲盟去会见好友李友桐（阿思根）、滕续文（哈丰阿）等商量组织蒙古自治军等事情，又去了海拉尔会见郭文林，面商组织武装和策应起义等问题。经过秘密策划和准备，于1930年冬在北京万国饭店（亦称六国饭店）召集的会议上，决定首先在莫力达瓦开

始行动，其他各点也举行武装起义，造成对莫力达瓦起义的策应与支持。这次会后，他回到讷谟尔、纳文慕仁会同郭兴元组织了民族武装起义。这就是著名的"MORIN DAWAA DAOR AIMANI ZURAN CAEG (AOULI ME IN QIAN)"。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在东北和内蒙中，东部盟旗利用蒙、达族人民和东北军阀间的矛盾扶植地方实力设立各省。当年冬，在兴安四省建省之初，德古来同德树元、郭兴元、志达图、阿罕台等先行商定，以晚清遗留下的布特哈部八旗筹办处为基础，利用日寇分而治之建省的机会，建立民族的兴安东省，认为如准备充分并利用时机，是会成功的。大家协商后又委托德古来等在齐齐哈尔邀请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的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会商建省事宜。当时布特哈、齐齐哈尔的到会人员有额勒春、禧伍庭、巴金保、荣宪庭、图庆格、郭雅庭、志达图、郭兴元、德树元、孟定功、孟希舜、孟汇川、蒙和、金耀洲、金鹤年、吴维邦、莫就愚、乔树仁、沃子树、鄂范伍、沃来保、敖瑞平、杜作臣（鄂温克族）等。经过反复研讨后，大家公推出以德为首组成的布特哈、齐齐哈尔三族民众请愿建省代表，成员有德树元、志达图、金耀洲、何维忠、郭兴元、莫就愚等。他们先后见到了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韩云阶、伪满第三军管区司令官张文铸、日军驻齐师团长石井。在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后，又到长春会见过郑孝胥及谢介石，见过伪蒙政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和宫内府参议贵福（达斡尔族），还会见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凌毅、军务局长坂垣征四郎、副参谋长东条英机、第四课长酒井隆等日寇头面人物。就这样于1933年正式成立了兴安东省，省公署设在扎兰屯，日本军方派出了参与官中村（其人右眼失明）到省坐镇。在建省问题的一系列活动中，德古来起了组织者作用。

省制实现后，在人选问题上德古来很尊敬先辈，一再谦让出省长、厅长等职位，仅担任了省公署总务厅总务科科长一职。

1936年，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和华林泰、春德（都为达斡尔族）等参加赤塔满蒙边界谈判会议的代表们，在会后被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山田乙三少将以借边界谈判机会与苏、蒙通敌罪名被逮捕，略经审讯即在长春市南岭被残酷杀害了。第二年八月中旬，日寇驻阿荣旗参事官中尾在旗长郭雅庭（索宝）家酒醉后失言，向他透露要在兴安东省对达斡尔族科长以上人员和与凌升事件有牵连的五十六个人，准备在后天进行逮捕。对如此紧迫的问题，趁中尾醉烂如泥之机，索宝旗长急忙找到我这个小学教师，叫我马上骑上他的走马往扎兰屯德古来处送消息，我于凌晨三点多把信送到了。德读信后长叹一声，许久未说话，最后只对我说了句："你先休息一下，哪儿也别去，在家等我消息后再回去。"当天他大早就找到东省日本宪兵队本部去活动，又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大家免遭了逮捕和迫害的厄运。

1935年德古来从兴安东省调转到长春伪满蒙政部总务司任监察官，得到该部大臣齐默特色木丕勒的信用并视其为助手。因为他精通六种语言，善于理财，敦厚廉洁，所以在东北、内蒙各蒙旗中名声很大。

1936年8月，德穆楚克栋力布在化德蒙古军政府就任总裁，在答谢日本驻伪满大使和驻政府代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南次郎的祝贺时，正式向他们提出邀请德古来协助化德军政府工作。就这样，德古来又来到西察哈尔的化德军政府，就任了财政署署长，很受德王的器重。

1937年二三月间，化德军政府的伪蒙军由德王、李守信亲自指挥，配合两路日军进击国民党在绥的傅作义部，攻取了归绥市。四月在张家口成立伪蒙自治联盟政府时，德被任为财政部长

兼税管局长。他从财政、商业、税收、银行、外汇、企业管理、文教等方面运筹规划，从容安排，很有成绩。德王为发展和巩固伪政权建设，深感各盟、旗骨干人员十分不足，素质不高。所以他又全权委托德古来回兴安四省招聘行政和财、税等各方面人员一百余名，又专从兴安东省、齐齐哈尔招募了有工作能力的达斡尔族人员六十余名，都被充实、分配到了德王政权的各个单位。此外，德王也曾委派乌古廷、包海明、扎青扎布等人先后回东北，在伪满邀请了一些现役军官，还招募了兵士五六百人，都充实在伪蒙古军内。

1938年8月发生一起诬陷德古来的事件。德在任伪蒙政府财政部长期间，从财政上实施了很多既切合实际又不致工农牧商等各业负担过重或偏废一方的适中措施。因此，察、绥各蒙旗和德王、李守信、松津旺楚克、郭尔卓扎布、阿拉坦瓦齐尔等实权人物都暗暗赞许，但也由此而引起伪蒙政府总务部长陶克陶（白广文，苏鲁克旗人，曾认伪满蒙政部日本次长依田次郎为义父，是日本埋在德王身边的人物）的嫉恨。陶诬陷德有生活作风的问题，无中生有地说他趁部下税务处长吴宪文（巴雅尔）去伪满公出的当晚，去他家调戏了吴的妻子。而吴返回家中，则硬逼妻子承认，遭到妻子的坚决反对，被恼羞成怒的丈夫割掉了鼻尖。问题发生后，德王、李守信、乌古廷、特克希布彦、包海明、杜嘎尔苏荣（德王之长子）等，经过调查了解终于真象大白，是陶、吴的有意诬陷。德先生为防止自己家属遭到不测，于九月初，特地委托我带领其家属和他的妻妹共五人，到北京东城狮子胡同王宗乐（特克希布彦）住宅处暂住。三个多月后，问题得到澄清，他们才在厚和（呼和浩特）会合团圆。

1949年8月初，在定远营（巴音浩特、阿拉善右旗）的德

王、达理扎雅、白海峰等和李守信、乌古廷、宝贵廷、苏和巴特尔等策划组织了一个“西蒙自治政府”。11月23日宁夏的银川被解放后，这个仅仅生存三个月的西蒙自治政府，便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形成完全包围的情势下解体了。这个政府的主要人员流蹿到中蒙边境中方一侧的“拐子湖”地方后，又分成了两大部分人：德王、李守信等带领部分人进入蒙境，另一部分由吴鹤龄、扎奇斯钦、吴熙祥等从兰州用重金租了包机，从定远营机场上机飞穗赴台去了。这时的德古来先生曾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走是留，最后决断你自己定！”我当时十分惦念留在张家口一年多又杳无音信的妻小四口人的命运，不愿自顾而去，因此，我和德先生就这样在飞机舱门前话别了。

少郎代夫起义

卜　林

民国年间，1917年—1919年，雅鲁河与嫩江汇河口一带，曾发生过以少郎和代夫为首领的，以达斡尔族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另有汉族农民参加的武装起义，达斡尔人叫做“少郎代夫乌巴西戈勒”即少郎代夫造反的意思。

这三年间，依靠他们勇敢慓悍能骑善射的本领，在达汉贫困农民的支持下，在龙江泰来两县境内挥舞战刀，勇猛地向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挑战，袭击泰来兵营、各地警察派出所和地主的“响窑”，缴获武器弹药马匹以及军警服装等，这锐不可当的造反举动，使黑龙江督军兼省长鲍贵卿、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龙江道尹王树翰、龙江县知事钟行、省警察处处长张仁等人如坐针毡，龙江县第六派出所所长石文朗，一个又一个的呈报少郎代夫的“匪情”报告，龙江道道尹王树翰署名下的训令和指令，接二连三地严令龙江、泰来、讷河、布西、雅鲁诸县，要他们把“狡悍蒙匪”在限期内歼灭，否则，以警察章程条例规定，一律严惩不贷等等。

少郎代夫事件震撼了黑龙江大地，使地主官僚吓得要命，恨得要死，他们起劲地谩骂少郎是“匪贼”；甚至在封建意识较深的达斡尔族老人中，也跟着谩骂少郎代夫为“华拉格”即胡子。然而，在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的达斡尔族广大人民则不然，他们把少郎代夫说成是有“民族骨气、为穷人出了一口气”，对起义赞不绝口。每逢“阿提”“春节）的正月里，从“哈坎伯”到“乌钦”朗颂中，到处听到少郎代夫大义凛然，为民除害的赞歌。其中“抢渡雅鲁河”和（打倒军阀”等曲，非常受达斡尔人民的欢迎，在民间广为流行。

少郎代夫起义离现在已有七十多年了。起义者踏遍了这块土地，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业绩。起义发生在人口极少经济文化落后的达斡尔族里，单纯从面临的阶级剥削民族压迫的反抗出发，无论是斗争策略还是方式上，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民族压迫的精神，将永载史册。

对少郎代夫起义，在现今老年人中，尚有所闻，然而，在民族青年中间却很少有人明了，为发掘民族史料，为教育后代，现将这次起义，简要地做一介绍。

一、时代背景及起因

少郎代夫起义，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相交错的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爆发的，是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映。

政治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达斡尔族上层的反抗。

辛亥革命后，在驱除鞑虏的口号下，从袁世凯到张作霖等大小军阀，他们赤裸裸地实行民族同化的大汉族主义统治。许多达斡尔族清代官员，随着清朝的倒台，处于在野地位，清代怀柔政策下所享有的八旗官员优厚待遇，付之东流。

民国初年始，将达斡尔族上层所控制的东西布特哈衙门废止以改县制，改设为讷河、布西、德都、嫩江、雅鲁等县，从达斡尔族上层人物手中夺回了行政权，他们对于失地丧权，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上层阶层的不满，自然波及到达斡尔族各个阶层。

其次是达斡尔平民百姓的不满。

蛮横恣肆的大小军阀，在税收、丈地、户籍等政务中，无视少数民族的客观存在，公开欺侮和谩骂少数民族，将清代所受到的民族压迫造成的报复心理，转移到无辜地少数民族身上，由于军阀诸如此类的统治，引起了达斡尔族人民极大不满。

经济方面的原因。

达斡尔人来到嫩江平原之后，依赖这里的自然条件，发起半农半牧兼渔林猎等多种经营，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到了清中叶和清末，从"官田"到"招垦开荒"，达斡尔人的活动地域逐渐在缩小，到了民国三年，在垦务局占荒和丈地影响下，达斡尔人的占用土地，由原来人均熟地一垧以上，突然减少到不足五亩，草甸子一占而光，严重地影响了牧畜业的发展，因而，许多达斡尔人为了土地而呼号。

苛捐杂税负担加重。

到了民国初年，反动政府加重苛捐杂税，以维持其财政支出。土地税按以每垧抽税率，高达一石粮值比例。若交不起土地税，按以抗税论处，一律没收土地照，有的典押土地照借款纳税。在沉重土地税压力下，感到种地不合算时，纷纷将土地转让给民族亲友，由清代每家每户均有口粮田几垧，开始转向手无寸土的破落户和拥有大量土地的民族地主阶级的两极分化。

到了民国年间，牲口税由最初的几吊江帖上升到五抽一的重税，牛马羊群不断减少，严重地挫伤了发展牧畜业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的税务稽查员，到处打骂百姓，追捐警察专横跋扈，使达斡尔族农民喊天怨地，在破产、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

盗窃抢劫牛马。

民国初年的达斡尔族农业经济，仍然处在半自给自足的水平，多以解决家庭口粮及一部分牲畜饲料为目标，除个别民族地

主外，根本无余粮可售，他们日常交换日用品的主要来源是牲口，以牧畜的多寡分富贫。

自招垦开荒以来，外来流民成份复杂，有些坏人结成大小绺子或充当棒子手，专门干抢劫民族部落的牛马群的勾当，从野外盗窃到进屯抢劫，在暂短时间内，有的民族部落牲口被抢劫一空，引起了民族百姓的深恶痛绝。

奸商盘剥

奸商唯利是图，无孔不入，从"挑挑儿"到进屯开小铺，由小铺到放高利贷，不择手段的以假代真，用"良心黑账"等恶劣手法，骗取少数民族人民的钱财，相当一部分农户倾家荡产，对于奸商的盘剥行为，达斡尔族群众极为愤慨。

少郎代夫起义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不堪忍受压迫剥削的人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了。

二、少郎代夫起义成员概况

1. 少郎

少郎，又记小郎、肖郎，原籍黑龙江省龙江道龙江县甘南乡罕伯岱屯人(达语称罕白底、又记汉八代)，现属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杜尔门沁达斡尔族乡，是达斡尔族莫日登哈拉冲罗莫昆家族人。

少郎出生时间及其家庭情况，笔者走访了内蒙古牙克石林业管理总局原林业工程师副处长现离休干部莫金瑞同志，此人1903年生，现年八十七岁，是唯一了解少郎家庭情况的人，籍莫金瑞老人讲："我和少郎是一个祖根发展起来的，我们老家在瑷珲，清末才由瑷珲搬到罕伯岱屯，与原罕伯岱屯莫日登哈拉阔姓不同祖，少郎是我大爷爷的宗孙，我是小爷爷的孙子，我是少郎的叔叔辈，少郎在我十五、六岁时，他已经是四、五十岁年龄的人了，他比我大二十八、九岁，确切地生年月日不详，从我年龄往

上加起二十八、九岁，可想而知约在1874年左右生，他们造反时，我刚懂事不懂细底。少郎亲兄弟四人，少郎排老大，少郎从小失去了父亲，由寡母拉扯大的，家有老母，我从未听过少郎有妻子的事，当了多半辈光棍，从小就住德沃屯，后来才搬进罕伯岱屯，家庭贫寒，从小给人家放牛当童工。

少郎是农民家庭出身，是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光绪年间选入壮丁，每年春、秋三、八月进城接受壮丁操练，枪法准，武艺超人，称之为少"莫日根"（即武艺高超的好汉）。他从小学习骑射，养成英勇慓悍的性格。

少郎从青少年起失父，在屯里当牧童，他立志兴家立业，辛勤劳动、勤俭持家，靠其劳动所得抚养全家老少，小日子过得很不错。

在清末时局更迭的动乱年间，有些坏人乘机兴风作浪，结成大小绺子，另有小偷小摸者伺机而起，从野甸子里窃走了少郎家的六、七头牛，就剩下一匹小黑驴，从此，少郎家倾家荡产，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困境。

家庭破产后，生活无依无靠，以做季节工的收入糊口，春冬两季打草捕鱼赚一些钱，夏秋两季到西南堡一带的张家大院杨家窑做工，月资可收三石粮值的工钱，起初满不错，足够养活家眷了。

少郎年富力强，为人实在，给张家大院铲地时，将"打头的"摔掉多半垅，可累坏了"打头的"和同伙劳金，别人生气地说："别傻乎乎的给大粮户卖命。"，少郎对汉语不大通，他仍然卖力地干。有一天，在一起扛活的劳金私下商量，想报复少郎便到大地主张喜才那里通小话："少郎那个老鞑子没铲过地，把苗根都铲断了，他铲的地一棵秧也活不了……"。特意领着地主到他们已经铲坏了的苗垅望一望，大掌柜的一瞅，大吃一惊："可不，可不！"，就把少郎解雇了，不但不给工钱，反而要

少郎赔偿铲坏苗的损失，少郎憋了一口窝囊气，离开了张家大院（现属龙江县华民乡）。

少郎扛着锄头往家走，回头望一望张家大院，咬牙切齿地自语道："你他妈的张喜才，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付扁担挑着老婆孩子过来的穷光蛋，开了小铺又开大车店，拉从富拉尔基到新城（泉星）零杂客人，一夫店费收入有限，还不是发不义财才起家的吗？我少郎总有一天会和你算帐！"

少郎又到对宝山屯杨家窑扛活，少郎干活儿从不藏奸，地主领工"打头的"仍然不是他的个儿，少郎每月拿到头等工的钱。地主老婆个人都有"小分子"，从富拉尔基泉星烧锅打来高粱酒或二锅头酒，贩来麻花糖块等食品，以赊帐为引诱卖给劳金们，少数民族农村本来嗜酒成风，又加上同伙劳金们的饮酒熏陶，年达三十岁左右的少郎忘却掉家母谆谆教诲，也染上了酒瘾。地主老婆借以劳金们不识字走"良心"帐，秋后一算帐，劳金们傻了眼，扣下赊酒款，工钱剩不几文。地主老婆又设赌场"抽哄"，一到连雨天，在工房里有掷骰子的，有的推"牌九"打"天九"的，还有押宝盒的，赌来赌去，却被地主老婆"抽哄"抽去了。在民族部落无赌习的少郎，也学会了赌博，输光了工钱，想捞回本，又和地主老婆借钱，输光了又再借，到时候还不起，原本外加滚利，又变为本，本又按以五分利再滚，使得少郎背了一身债，还不了债用工钱去顶，还不清债不准走出地主大院，若不认帐，地主豢养的警察的大棒子决不轻易饶人，少郎就在地主家尝饱了藤鞭子的苦头，白白干了两年长工。

少郎回到家里，老婆孩子过着锅里没下锅米、炕上没炕席的艰难生活。他在苦闷中，又拉了王老西子小铺的酒债，大年除夕那天，王老西子到家，少郎把家唯一一匹黑驴和几斗粮顶了债。许多亲友指责他不顾家里老母和妻子的死活，使他成了一个上不够梁下不着地的人，所有这些象针扎般地刺痛着他的心，一股愤

怒的火，塞满了肺腑，使得少郎夜不入眠口不入食，在懊丧中抬不起头，成天饮酒解闷。

在莫日登哈拉氏族中，有不少年逾古稀德高望重的老人，人们都称呼他们为“乌达奇”（即老祖父）。有些老人有强烈地反对军阀的意识，他们的教诲对于少郎起了开导作用。

“乌达奇”们亲自经历了丈地的全过程，他们大骂道：“就这个杜荫由王八蛋当垦务局长时，领着张福顺占咱们的土地。”他从仓房里拿出丈尺，说道：“这个玩艺儿叫做‘阿拉当库’，开头用丈尺量地，把各屯各户的土地重新丈了一下，这个玩艺儿丈地慢费功夫，后来改用长绳量，这叫做‘得斯勒贝’，丈地的记帐的打木楔子的都骑马跑荒，这叫做‘跑马占荒’，按人均五亩以外的熟地、生计地、牧养地、草甸子、荒地等，略有余地的留给‘噶珊’（即村公所）外，其余地全划为垦荒地，从此以后，大片牛马羊群无处放，田陌连片挤到家门口了。”

“乌达奇”们针对着胡匪四起的混乱社会说道：“早古达斡尔人大批牛马羊群夜不归圈，散放在野外，就没有人偷盗牛马，为了辨别各户的牛马，到了清明那天集体组织‘骟畜节’，牲畜去势后在臀部打上烙印。到了清末出现了偷马贼，开始采取夜入圈的保护措施。有些坏家伙拉起大小绺子，持枪公开从野甸子赶走少数民族的牧群，后来进屯抢和盗，还要搞绑票，不拿金银就要人命，把财宝全抢走了。罕伯岱屯被抢八百多牲口，杜尔门沁屯更比罕伯岱屯苦，他们被胡匪抢光了，就往罕伯岱屯集中，莫呼、德沃、克木克等屯都往罕伯岱屯集中，原来莫日登哈拉聚居的百户左右人家，一下成了近三百户的大屯了。

税收稽查官员如此蛮横无礼，到处打骂百姓，许多百姓跑到野外躲避，夜不敢归宿。奸商王老西子、苏老西子窜了进来，莫呼屯开长顺也向罕伯岱屯伸手。“乌达奇”们说：“这些奸商层层盘剥你们，兑房、兑地的破产户，究竟有多少？你们把奸商们

赶出屯，将来把家底岂不是全交给人家了吗？你们活象任意宰割的绵羊，到死不敢吭一声，活象过不了冬的蝉蛐一样，唱悲歌有什么用？就没有一个人出来敢顶的……”。

“乌达奇”们的话，句句打中了少郎的心，对于吃人的黑暗社会深恶痛绝。

从这儿以后，少郎壮了胆，他一见到知己穷哥儿们就说：“‘诺彦’（官）、白音(富人)不会向我们恩赐什么的，太阳焰光不会照耀咱们家门，活不了就抢，欺负到头就要杀烧，使‘诺彦’、‘白音’再也不敢骑在穷苦百姓头上拉屎撒尿了，就得和他们碰撞…。”

天下倒霉的不只是少郎一个人，和他同命运的穷哥儿们经常来来往往，在夏季里，罕伯岱西下坎人们称为“杜如干”地方，一棵古树下，是他们乘凉的地方，是他们饮酒饮茶发泄一肚子苦水的地方。有一天，在少郎疏导下，私下商量好了，先把盗窃民族部落牛马群起家的两家地主大院好好治一治，再治屯里王老西子小铺，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把他们吞并的不义之财，重新夺来，分给穷苦百姓，非得出出这口气不可。

于是民国四年冬，少郎率领代夫、桂香等亲友，砸了张家大院和王家小铺惹了事，在王老西子和黄玉坤举发下，被捕入狱。民国六年十月六日左右越狱脱险，高举义旗，到处杀伤官警军，到处劫富济贫，惊动了黑龙江大地。

2. 代夫

代夫又记代福、岱夫，是少郎的堂弟。

代夫是少郎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的得力助手，也是组织起义首领之一。

代夫听到少郎被捕入狱，重判十六年刑，送进了齐齐哈尔城省陆军监狱后，代夫不忍自己骨肉同胞在牢狱里受折磨，他又到王家小铺进行报复，打伤了王老西子，则进城投案自首，

在法官面前面不改色，气不长舒，为少郎解脱说：“烧伤王老西子的事是我干的，偷张家大院两匹马也是我干的，少郎没有责任，你们要杀人有我一个人顶，我代夫活着进城投案，也不愿意活着离开牢狱，有什么该罚的罚我一个人好了……”。朱看守听了赞叹不已，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达斡尔人真讲义气呀！后来，代夫不但没有解救少郎，反而，被判了六年徒刑。

代夫身强力壮，慓悍异常，凡有战斗他打先阵，真有视死如归的虎劲儿，一有战斗，他总想和敌人强拼，他的冒失劲儿经常受到少郎的制止。

3．桑普勒

桑普勒是少郎同屯堂弟。

桑普勒听到堂兄少郎代夫脱险离狱，为反抗当时的军阀统治和民族压迫，遂于民国六年十月中旬，加入了少郎代夫领导的起义军，同年底参加了劫富济贫活动，如劫张家大院砸“王老西子”小铺、莫呼屯尹长顺小铺等。他们将胜利品分给张家店、莫呼、罕伯岱三屯百姓。

民国七年七月七日，在官军官警扫荡雅鲁河芦原战役中，桑普勒在抢渡雅鲁河的木舟里中弹负伤，遂被官警杀害在莫呼屯。

4．纯宝

纯宝是少郎代夫同屯堂弟，民国六年十月中旬，加入了少郎代夫起义军，与骨肉兄弟并肩战斗。

5．卓瑞

卓瑞是少郎代夫同屯堂弟，民国六年十月中旬，加入了少郎代夫起义军。

6．桂香

桂香又名桂山，原籍昂昂溪西屯，敖拉哈拉克尔哲莫昆家族人，是少郎的表妹。

桂香具有男性性格，她经常仿效清代壮丁的操练，

从小能骑善射，有甩子枪的硬功夫，专打活目标，因百发百中而驰名，达斡尔人称呼她为“刷古勒嘎您·额类公”即有名气的女人。

民国四年冬，正当少郎拦劫“王老西子”办货驴车进行报复时，桂香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当少郎判重刑后，于心不忍，随着代夫之后，她也为少郎并肩而自报奋勇进城投案自首。法庭判桂香三年徒刑，送进齐齐哈尔陆军监狱服刑。

民国六年十月十日越狱脱险后，参加了活捉巡警李胜祥、杀死马巡官、报复仇人黄玉坤、“王老西子”以及教训张家大院的活动。

民国七年四月，在一次反扫荡战役中负了伤。

7. 郭青山

郭青山属达斡尔族郭布勒哈拉、原籍罕伯岱屯人，是少郎生死与共的亲友，民国六年十月中旬，参加起义军后，经历了多次战斗，是少郎的侍从，号称“马弁子”。阿伦河口战役失利后，同少郎去嫩江县南奇岭屯匿居，于民国十年四月十日左右，同少郎一起遇难就义。

8. 军德

军德原籍罕伯岱屯，是少郎生死与共的亲友，民国六年十月中旬参加起义军，经历了多次战斗，民国八年三月，阿伦河口战斗中壮烈牺牲。

9. 军兰

军兰原籍罕伯岱屯，是少郎生死与共的亲友，民国六年十月中旬参加起义军，经历了多次战斗，民国八年三月，阿伦河口战役中壮烈牺牲。

10. 双海

双海属达斡尔族额勒特哈拉，原居烧锅屯；民国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因涉嫌于民国七年六月四日被审讯。经常出入蒙古地方

吉庙子，帮助少郎联系蒙古喇嘛及贫民阶层，被捕入狱，因坚贞不屈，敌人没抓住任何把柄，迫使官府宣布“无罪释放”。

11．林布库

林布库又记沃林布库，达斡尔族沃热哈拉霍堤莫昆人；原籍龙江县甘南乡杜尔门沁屯。

民国七年四月，加入了少郎代夫起义军，他仅参加了军阀招聘蒙古武装金保善队伍的一场误会战斗，双方说合后，少兰为请金保善设宴欢迎，派林布库返回其屯买酒，民国七年七月十九日，不意被埋伏军警抓获，当年八月二十一日被处以死刑，时年三十二岁。

12．李连福

李连福，汉族农民，原居龙江县蒙古三家子屯。

民国七年四月一日，同邻屯农民富贵喜二人，在雅鲁河畔打旱条子时遇到了少郎，在他劝导下，加入了起义军，当年十八岁。参加了青堡屯、候耳台屯、哈土半拉屯等放抢剿战斗，事后接受了到各屯富户索要子弹和侦探军警工作，于民国七年四月十四日，在泰来县大色揞屯执行任务中，被第二派出所警士李凤鸣捉住，后被处死。

13．富贵喜

达斡尔族农民，原籍龙江县莫呼屯。

14．郑文信

郑文信，汉族农民，原居龙江县腰奇克奈屯。

民国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加入了起义军，当年二十岁。

民国七年四月一日，他在哈土半拉屯击毙巡警一名，击伤巡官一名，见到少郎代夫用刀扎死马巡官的情景。还在蒙布罕屯⑤、哈拉台⑥、张家店⑦等，索取子弹西背鞑，经常出没在雅鲁河网房西李喜屯、金家地房子、济沁河山湾等树林里。在一次到哈土半拉屯一带索要子弹马匹时，在奇克奈屯⑧被军警捉住，后

被处死。

15．金钱柜

金钱柜，又名千贯，属达斡尔族金克日哈拉，原居龙江县前奇克奈屯。

从龙江县警察所长石文朗的一份呈文得知，李连福、富贵喜、郑文信、金钱柜等四人，在反讨伐战斗中很勇敢，使第二派出所巡官梁文瑞、副巡官马国权受伤，警士李兴云被打死。

16．鄂马哈

鄂马哈又名忙海，属达斡尔族鄂嫩哈拉阿协金莫昆，原居龙江县洪河屯。

民国六年冬，加入了起义军，据泰来县陆军第二十九师骑兵二十九团第一营一连连长邵斌山呈报，鄂马哈在龙江县卧龙乡额尔门沁烧劫凌福大院后，在官军追剿下，于民国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因抢渡雅鲁河时中弹负伤，被捉。

鄂马哈虽腿瘸，枪法却非常准，在鄂马哈手中被击毙的官军官警有十几人，号称“忙莫日根”（即神枪手）。他在额尔门沁屯战斗退却后，在候耳台、金家地房子与官军发生了激战，他为了掩护起义军渡江到芦原安身，鄂马哈乘坐独木舟，独自与三十二名官军作战，因作战中受伤多处，子弹已尽，不幸被俘，后被处死。

17．张喜布库

张喜布库达斡尔族沃热哈拉札木莫昆人，原籍不详。

张喜布库参加了民国七年七月一日的劫烧额尔门沁屯达斡尔族恶霸绅士凌福的战斗，七月二日官警派三十二人前来讨伐，少郎队伍难支，驰行百余里返金家地房子，在七月五日的交战过程中仍难支，张喜布库被官警俘虏，后就义。此时少郎队伍只剩下十四名。

18．刘木匠

刘木匠，汉族农民，原居龙江县哈土半拉屯。

刘木匠是少郎“把兄弟”，经常帮助起义军藏武器弹药，少郎经常出入刘木匠家。

民国七年四月一日，在官警追剿步步跟踪的紧要关头，刘木匠长子帮助站岗放哨，在哈土半拉屯打死警察事件中，得到刘木匠无私援助。

19．海郎

海郎，达斡尔族鄂嫩哈拉阿协金莫昆人，原籍龙江县洪河屯，农民。

海郎是少郎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儿，同少郎在张家店杨家窑吃过劳金。民国六年冬，加入了起义军。

20．尹布库

尹布库，达斡尔族农民，原籍龙江县莫呼屯。

于民国六年冬，加入了起义军。

21．参加起义的其他成员：

三丹，家住库布苏屯，是少郎把兄弟。民国六年冬，加入起义军，参加了罕伯岱屯官警包围起义军的突围战斗，民国七年夏初，在莫呼屯一带反扫荡战役中，为掩护安全渡江，三丹从东路牵扯官警，单独强渡雅鲁河时，在船舱里中弹死亡。

银花，少郎表妹，加入起义军后，参加了多次战斗；据传，返回罕伯岱屯向“王老西子”报复中，被官方军警打死。

还有安康、永彦、西子、八大爷，都是起义人员。

少郎代夫队伍由少变多，最多时达四十名左右。另有，“把兄弟”分布各屯，私通情报者众多，也有帮助少郎向富户索要子弹及粮油衣物等人，其联系面甚广。

二、逼债与反抗

少郎代夫从小失去父亲，寡母谆谆教诲儿女，要他们牢牢记住：一不嗜酒惹事生非，二不做伤天害人之事，三不做有损于祖先的亏心事。少郎铭记寡母的教诲。

少郎到三十五六岁，苦难经历煎熬着他。他盼望光明，但事实却和他的心愿背道而驰，官僚地主仍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贫穷老百姓仍然在苦难中挣扎，他灰心丧气，不顾寡母教导，便以酒消愁。

从宣统元年至民国四年间，光是酒帐就欠下莫呼屯尹长顺和罕伯岱屯"王老西子"一大笔。为了还酒债，死逼梁山偷了张家大院的两匹马，好容易还了王老西子的债。

就为这件事，军警到处通缉少郎，少郎只好到处匿居藏身。另有哈土半拉屯董玉坤告密，弄得少郎更不得安宁。

少郎恨透了"王老西子"，一斤水獭皮换三斤酒，一斤酒就能换支羊，打一斤酒准八两，打上一斤油一半是清米汤，好酒送给"嘎珊达"（村长），卖给穷人对水浆，好货送给"嘎珊达"，货钱记在穷人帐。三天两头吓唬百姓，谁要抗债不还帐，就威胁说："我要到马营长那里告状，说押就押，谁敢和我顶撞，准给一个台阶瞧。"这位盘剥穷人黑心肠的活阎王爷，谁都把他躲得远远的。

有一次，少郎返回罕伯岱屯，和亲友们私下商量，非给"王老西子"点厉害瞧瞧不可。经几次教训，"王老西子"再不敢在罕伯岱屯为非作歹了，最后把他撵出屯才了事。

民国四年十冬腊月那天，"王老西子"进城办货，小驴车载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当傍晚日暮时刻，唱起小调，从远方听到了"天牌呀，地牌呀，……嗯咳嗳呼哟"的声音，少郎率代夫、桂香等人，在屯东岗坡上等待拦劫。驴车到时，乘天黑你一棒我

一拳，打得“王老西子”跪下磕头哀求。大家用绳子把“王老西子”绑在驴车上，然后用火点着货物，“王老西子”差不一点丧命。

四、被捕入狱

少郎从外屯归来，“王老西子”到处跟踪少郎，少郎饮酒过量不省人事之际，“王老西子”通知马巡官和张警长，十几个警察包围了少郎家，代夫几次进屋叫他赶快逃跑，少郎一动不动地睡大觉，少郎被捕了，被解到卜奎城法庭，才感到喝大酒误了大事。

在审讯过程中，少郎面不改色，侃快地承认了自已的过失，将别人的责任都揽在自已身上，偷张家大院的两匹马，又加上伤害“王老西子”等罪，以抢劫杀人伤害罪及畏罪逃跑等情节，加重判处十六年徒刑，送交齐齐哈尔城省陆军监狱服刑。

少郎不会说汉语，请了达斡尔族会说汉语的敖拉哈拉·凌福（绰号凌胖子，是清末骁骑校、民国时期黑省军法处工作）充当辩护翻译。凌福和少郎有私怨，凌福把少郎过去的情妇硬嫁给其亲友，所以凌福有意歪曲少郎的供词，帮助官方骗供，致使加罚了少郎十年徒刑。挪内达斡尔族屈民，骂凌福是民族败类。

少郎入狱后，堂弟代夫、表妹桂香，为减轻少郎的责任，前后进城投案自首，不但未能营救少郎，他们反而被判为六年、三年徒刑。

五、越狱脱险

关于越狱的情况，民国六年十月十五日，第六派出所巡官张永祥署名的越狱情况报告称：“……此次逃犯之内并有小郎戴福桂香等三人，小郎者系经哈土半拉屯黄玉坤举发，由县警拿送之犯，现在逃出竟尔将黄玉坤枪毙，其有意复仇可知，如果不即捕

获，不但前经举发戴福桂香之屯民，有性命之险，即后地方总有匿匪亦恐无人再敢揭举……"

少郎等在齐齐哈尔陆军监狱扎龙苇塘服苦役期间，少郎认朱看守员为"干父"，朱看守为人善良，他对少郎、代夫、桂香等人，生死关头自揽责任，一心营救少郎的高尚品格所感动，对少数民族农民的诚挚和纯朴赞叹不已。在扎龙苇塘看守所里，有朱、张、李、王等四名看守武警，看管二十八名犯人，朱看守从来对少郎不加提防，经常叫进他烧水沏茶，和看守人员混得很热乎。少郎早有伺机越狱的念头，经常寻找时机，但少郎很讲意气，无论如何不能杀害为人善良的朱看守越狱逃跑，闭着眼睛杀害好人于心不忍，不干丧天良的事。

有一天，朱看守进城办事，留下的三名警察叫来少郎"侍候局"，他们一面打牌一面喝酒，少郎殷殷切切地烧茶烫酒，喝个差不多了，你一言我一句地"顶上了牛"，不久动手撕打起来，少郎乘隙拣下了一支手枪，顶上膛"巴搭巴搭"开了三枪，把姓张、姓李、姓王的警察打死在地，他跑出看守所大声高呼："你们该往外跑了！"他见到代夫和桂香，劝她们赶快逃走，和少郎一起逃跑的就有六、七人，他们带出了警服，穿上警察服当上"警察"横闯各村也不会有人阻拦。他们铁脚镣子无法锯断，沿着城东大苇塘沼泽地，好容易趴到了"小蒿子"（即烟筒屯），这里有铁匠，才算锯断了铁链，但脚镣圈说什么也锯不开，就这样身穿一身兰色红领的警服，奔包特仁屯了。这里是江汉相隔的民族部落，在网房里吃到稷子米饭"鲫瓜子汤"，吃得眼睛发亮了。他们渡了江心岛，从泰来境内直奔雅鲁河会河口的苇塘子里，这才喘了一口气，转危为安。到这里以后，莫呼屯蒙古三家子屯民族百姓，经常送吃送喝，夜间准备热炕头睡。

少郎提醒大家，一处不可长期逗留，必须经常调换住处，神出鬼没才避免敌人发现自己，必须先向黄玉坤报仇，遂即去哈土半拉屯。

少郎、代夫、 桂香三人越狱脱险， 于民国六年十月六日左右。

六，活捉警察李胜祥

民国六年十月十五日第六派出所巡官张永年报告："呈为胡匪劫抢巡枪马暨陆军追匪情形，请核转事案。查本月十一日仙人洞屯民陈国斌暨哈土半拉屯刘万年、 黄坤、 木头半拉屯⑩李不山、 富拉尔基商号兴盛永等， 被匪抢劫之陆军监狱追缉逃犯情形"。

县署收税员刘馨山之巡警李胜祥回所报告："昨日（即民国六年十月十一日）奉刘委员派往前后多罗索布罕、 木头半拉各屯，，传催各户前往封租，至晚十钟（即十点钟）时，行抵木头半拉屯，适以天晚住宿在屯长李不山家。夜半后，突来胡匪六七名，均系身着兰衣红领，各持枪械，一面声称系省陆军来屯，查拿监狱逃出人犯，一面开进屋内。巡警查其行色可疑（而李胜祥是龙江县黑岗子屯人，经常和达斡尔人接触，听到少郎说的话，不象是汉族人说的汉语，立即警觉起来），正待开枪时，而该匪（指少郎代夫）等，即行扑至巡警（李胜祥）近前，将巡警扭住不容动持，即将巡警所带之曼利夏枪一杆、子弹一百粒、鞍骑马一匹、皮靴一双，全行抢去。"少郎对李胜祥说："今天不要你的命，你和我们一起走，将逃犯提拿归案，你和我们都可以得到奖赏，你去了我们将枪和马匹还给你。你要不去、兄弟不会客气，你的性命难保……"开始不应允，但李胜祥想到答应下来，可能索回手枪和马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表面答应，一旦手枪和马匹到手，将来寻找机会逃脱，这可能是上策，不料少郎

等不但不给枪马，而且不准巡警动弹，使他无隙可乘。少郎并称自已就是从省陆军监狱逃出来的，还把裤腿向上绾起来给李胜祥看："我们腿上还带脚镣子的铁圈呢，我叫少郎，你对我的名不生疏吧！你是大派出所的人，你有什么仇，我们给你报，你帮助我们领个路，我们一起去哈土半拉屯，帮助我们向黄玉坤报个仇，之后，我们去教训教训马巡官，你看怎么样？"李胜祥听了，觉得自己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漩窝里，只好做最后扎挣，扑到少郎身上企图抢回手枪，在屋内撕打起来。他哪是少郎的个儿，少郎几拳头，就把李胜祥打趴在地，不省人事了。少郎等逃出了木头半拉屯。

李胜祥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手枪马匹全被少郎代夫缴去。不料十三日早六点钟，据该屯屯长李不山和他的兄李我拉勤，十家长李来福等达斡尔族居民来所报称："省陆军沙排长协同杨监狱长，带兵十名到屯，对李胜祥严刑拷打，非要他交代'通匪'罪状，从李胜祥身上一无所得，接着将该屯屯长李不山和十家长李来福等，先用马棒拷打，逼令他们交代李胜祥勾通'胡匪'的事，要他们出来作证，十家长等不肯，一再坚持不作丧失天良的证言，沙排长、杨监狱长进一步用压杠子等酷刑，严逼屯长李不山给李胜祥'通匪'罪状作证，李不山等跪在监狱长面前，给李胜祥说情。"李胜祥乃系大黑岗子屯土著民，平素尚属安分之人，自当巡警以来，查其服务，亦称勤谨……此次被匪抢去枪马……事出仓卒，与其他土匪的时日潜滋，可以预防者情形不同……其性命之存否，迫不得已情况下，枪马被劫……"

李胜祥被缴械，又受监狱长一番酷刑，少郎代夫听了大快，说："欺压百姓的巡警狗崽子，罪有应得。"

七、宿仇必报捅死马巡官

马国权是第六派出所副巡官，绰号"马大棒子"。

此人从清宣统元年到民国七年，从西路巡弁所到龙江县第六派出所，一直担任副巡弁和副巡官职务。在罕伯岱、杜尔门沁、莫呼、洪河，岗阿一带民族部落，一提起马国权，人们都吓得毛骨悚然、胆战心惊。从宣统元年以来，他经常下屯征收土地牲口税，谁家交不起税，按抗税论处，动用藤鞭子一打就出一道坑印，浑身一片发紫的伤痕，“达呼里哑吧牲口”等谩骂的话总不离嘴。许多人一听说马巡官来屯，都设法渡江到对岸躲避，何时离去了，才返回屯住，整个罕伯岱一带民族部落，吃尽了马巡官的苦头，这是少郎代夫为民记仇的第一点。

在光绪三十四年到民国三年，少郎率海郎和代夫，经常到西南堡一带的杨家窑张家店当季节工，他们两家地主的老底，少郎代夫、海郎等了如指掌。他们两家收买马国权等巡警人员为护身符，专为这些恶霸地主撑腰，少郎等也受过马巡官的痛打几次，这是第二点记仇之处。听到少郎等越狱消息后，马巡官从候耳台[1]屯到奇克奈屯，由奇克奈屯追到哈土半拉屯。不但如此，积极给衙门出坏主意，要用烧野清巢的办法对付少郎。民国七年三月，官方果然点火烧野，一片如海的芦原和柳丛变成一片火海，使起义军无处藏身。这是少郎所恨的第三点。

少郎代夫如何扎死马巡官？从龙江县警察所所长石文朗于民国七年四月二十日给县知事的报告中得知，民国七年四月一日，在哈土半拉屯战斗中，副巡官马国权警士李兴云阵亡之事。

民国七年四月十四日，马巡官带官警追剿少郎队伍，日出在奇克奈屯接战，起义军难支便躲到候耳台屯。在交战中马巡官负了轻伤，起义军再度受挫，官警又尾随至哈土半拉屯。

少郎到了刘木匠家打尖，“把兄”刘木匠杀了一口猪款待，打发长子到房顶上放哨，看望有无官警追来，肉煮熟了，正要吃时，刘木匠放哨的长子，发现有五名巡警从西北角切近本屯，少郎得知敌情后，布置代夫、桂香、桑普勒、郑文信、金钱柜、李連

福、富贵喜等人，在刘木匠院墙东北角展开了迎战的阵势，少郎一再嘱咐说："不到开射线，谁也不准开枪，防止打草惊蛇。"马巡官带着四名官警，晃晃荡荡直奔哈土半拉屯刘木匠家，当官警切近开射距离时，一声令下，七八支枪口对准官警，枪声响起，李兴云被击毙仆地，马巡官又一次身负重伤，活着的三名官警拼命逃跑。

少郎、代夫、桂香听说马巡官在屯外负伤，少郎高兴地闭不上嘴，马巡官送死到门好好出一出气，派人缴械了马巡官两支大枪一支手枪、子弹八十多粒，少郎代夫大摇大摆地走向马巡官。

马巡官见到少郎和代夫等老对手走了过来，从未向人屈膝乞求的马巡官跪倒在地，边磕头边哀求：

"小的家有白发老母，过去对不起之处很多，小的实在罪该万死，这次千万饶我一命，小的以后准对得起就是了。"

少郎压住马巡官的脖子，气油油地谴责说："你把××××弄到那儿去杀的？"。

"小的交给石所长了，石所长又过给军法课了，其他的小的一点也不知道。"

"你再敢不敢欺压百姓了？"

"小的今后再也不敢，再冒犯了情愿被劈雷打死。少郎老弟请你饶我一命。"

少郎拔出大刺刀指着马巡官说："如果今天饶了你的狗命，老天爷也不会答应，西南堡一带老百姓更不会答应。"卡查一下子大刺刀插进了马巡官的胸膛，去见阎王爷了。

八、劫官济贫

少郎等脱险后，已被省陆军监狱发觉，活捉警察李胜祥的消息，惊动了省道县衙门，到处追剿起义军，少郎等躲至哈拉海草原一带，活动十分困难。

少郎等查觉到若与官方作对，专靠六七人武装远远不够，此时在哈拉海、黑岗子、罕伯岱、莫呼、奇克奈等屯，努力发展组织招兵买马。民国六年冬，罕伯岱屯亲友加入起义军的就有：桑普勒、纯宝、卓瑞、马哈、郭青山、军德、军兰、银花、三丹、安廉、西子、海郎、拜布库等。

少郎代夫率起义军，于民国六年十一月间，突如其来地闯回罕伯岱屯，打死恶霸奸商"王老西子"的同时，缴获一千吊现金和手枪子弹，在莫呼、罕伯岱两屯，救济没有下锅米的贫穷百姓。

民国七年初，少郎代夫起义军反劫张家大院，把七、八十石粮和几十头牲口，发给当地贫穷农民。

民国七年初，省保安队和县巡警队六、七十人马来剿，三丹独自牵制官兵，从莫呼屯往东南方向转移，三丹中弹阵亡，在莫呼屯潜伏的其他起义军，安然无恙地到达雅鲁河彼岸的苇塘子里。

九、官方清野及起义军北上绰尔河

民国七年三月间，原雅鲁河会河口南岸，是不见人影的柳丛带和无边缘的大苇塘子，这里的江心岛口是安身的好地方。官方曾两次突击苇塘子，伤员十七、八人、大骂起义军是"狡悍蒙匪"，王树翰道尹的训令中，也承认"狡悍异常"。官方趁青草未发芽之际，采取了烧荒清野的办法。官军警约百余人，把守奇克奈、莫呼、申地房子⑲，白庙子⑳，哈土半拉等屯要道，点燃了雅鲁河畔的苇塘子和柳丛。少郎見势不妙，便退出了雅鲁河下游的游击地带，迅速撤至扎赉特旗境内，北上至扎兰屯西南的绰尔河济沁河一带山林，此处人烟稀少，是山峦起伏的茂林地带，官军无法进山追剿，暂时有了安全保障的隐藏地。

这里是走兽飞禽栖息的好地方，河水清沏如镜，也有稀稀拉拉

的鄂温克族村庄，根本不愁饮食居住。就在这里休整两个多月，一直呆到青草长起为止。

民国七年六月，起义军从绰尔河山林，绕道奔往哈拉海⑮草原的达斡尔族村庄阿拉尔屯⑯。

八里岗子一带一望无边的大草原，这里的碱草闻名江西，未到“头伏”打割季节，为了争夺好草甸子，达斡尔族各村庄，这一座那一座地搭起了许多“阿纳格”（窝棚），有额尔门沁屯⑰的，也有卧牛吐、音钦⑱、敖宝、长岗子⑲屯的，少郎等毫不忌讳地藏在各屯“阿纳格”里，从额尔门沁屯民了解到，额尔门沁屯清代官员凌福，从外地请来不少的官军警驻在，少郎代夫本想教训凌福，因驻兵把守“响窑”很难攻，少郎代夫一再研究对策。

十、烧凌福大院与济贫

少郎与凌福有宿仇，前文已经说过。

少郎代夫起义军，不是不分青红皂白，见富就杀劫烧，哈拉海草原周围有阿拉尔屯吴双海、鞍子匠屯库西德、三棵树屯吉庆德、单宝岗子单宝、二海屯鄂先贤、长岗子屯鄂范五、黑大屯赵恩福、三大户屯鄂贤寅等，都是大粮户，他们民愤不大，少郎等秋毫不犯，唯独凌福恶霸劣绅，达族百姓都憎恨他。

民国七年六月三十日，少郎让阿拉尔屯吴双海地主，前去额尔门沁屯官警送假情报，告知“少郎代夫等二十余人已进后三道岭屯行抢，要求官方立即派兵讨伐……”等，若不完成任务，要灭吴双海的九族，目的是要搞调虎离山计，乘官兵离开额尔门沁屯之际，乘隙袭击凌福大院。

官兵果然陷入了少郎的圈套，凑合五、六十人马，直奔后三道岭屯，又有中途“搭线”人的误导，又奔往哈拉海大草原。

少郎代夫乘驻兵无人把守的空隙，象闪电般地冲进了额尔门

沁屯凌福大院，活捉凌福，召集全屯“西登”会议，当众审讯公布凌福的罪状。他规规矩矩地跪在院中央，使凌“白音”威风扫地。并打开凌“白音”的粮仓和衣柜，就地分给了贫穷农民（据说在“不图外人之财”的旧观念支配下，少郎等撤出后，又退还了原主），少郎让部下纵火焚烧了凌家大院。

烧凌福大院事件后，民国七年七月九日县第六警察所所长石文朗，急忙给龙江县公署打“匪情”报告：“民国七年七月二日，调集各派出所官警三十二人，所长督同赴乡剿匪途中，闻卧龙乡额勒木气屯民户凌福家，被匪小郎等二十余名烧不堪等抢情，当即驰往跟缉、日行百余里，于七月五日追至兴让乡金家地房子，正值阴雨淋漓，该匪在屯盘踞，遂冒雨开枪进攻约二小时，匪仍据守不退，即令警士叶春霖吹冲锋号，向前猛攻，不意该警士左膝盖下，忽中流弹前入后出，胫骨穿坏，犹自吹号未息，各官警亦勇往前进，匪势不支，婾坏西墙遁走，所长即带官警闯入院内，获得徒匪张喜布库一名，带青骟马一匹，铁板开斯枪一杆、子弹四十粒、子弹袋一条，一面分队尾追，又打下杂色马三匹、鞍子三盘、衣服两包、子弹袋一条，十三太保子弹六十粒，时已九钟天复阴雨，马力疲乏，未便穷追、检点各官警共打废曼利夏子弹六百三十七粒、径口子弹四十四粒、套筒子弹五十九粒……日本三十年式子弹六十四粒，连珠子弹一百八十六粒，系属借用，请应准核销……附报暨匪犯张喜布库，业请转送军法课收押……”官警打废八百余子弹，未中伤起义军一兵一卒，而号兵叶春霖反负重伤，敌人的一场追击战又宣告失败了。

十一、桑普勒之死

烧劫额尔门沁屯达斡尔族恶霸劣绅凌福家的消息，又惊动了省县衙门公署，除了石文朗率领的三十二人官警讨伐队外，省里又派出省保安队五十名，从民国七年七月二日始，步步追剿起义军。

民国七年七月七日晨，杜尔门沁屯方向，飞尘上扬，马蹄声传至雅鲁河畔，少郎立即召集代夫、桑普勒、桂香等人商量对策，代夫主张硬拼，少郎让代夫不要盲动。桑普勒建议：分东西两路退却，主力利用河边悬崖，立即渡河布置阵地，桑普勒率两名兄弟，在河边岗坡拦击官兵，使之目标集中在桑普勒等身上，这样容易牵制做人掩护主力。就这样桑普勒自报奋勇，承担了掩护主力牵制官兵的艰巨任务，另有军德等二人，也自报奋勇。

官兵直奔莫呼屯方向开来，少郎等早已渡河过对阵，官兵发现桑普勒等阻击，几十人马驰奔"莫呼尔道"（即莫呼屯河套），桑普勒乘独木舟，边射边渡，军德等安全渡了河，桑普勒坐的小船速度慢，很快地成为北岸官兵的射击目标，桑普勒身上子弹已尽，右臂中弹被打断，摆不了船即顺河漂流；第二次又中弹，子弹穿过腹部。彼岸的刘巡官大声吼叫："这保证是小郎，抓活的不准打死，我们大家一起去领赏！"官兵顾不得水流湍急、泳进会河口拦住了桑普勒的小船，少郎等一起反击，河上十几名官兵中，受伤致死者共五名。此刻，官兵仗着人多子弹足，在两岸交战约两小时，桑普勒倒底被官方所俘。

刘巡官看着奄奄一息的桑普勒叫道："这他妈的，哪是小郎，带着死人怎能领赏？他妈的给我补一枪。"桑普勒遇难就义了。桑普勒之子乌勒金巴图尔说，他父就义在三个"七"字，即民国七年七月七日在"莫呼尔道"。

刘巡官指使郎下说："给我把尸首切开，给他妈的罕伯岱屯老达呼里看一看，今后敢不敢再造反！"

刘巡官左右助手赶忙出主意，将桑普勒遗首捧进卜奎城，大家一个口径地说是"小郎的头"，以得到上峰的奖赏。刘东阁左思右想，"这不可以，张处长他们不是一再嘱咐'捉活的'吗？将来，一旦捉到真小郎，自己的脑袋难保。把他的尸首高高悬挂在屯中大树上，叫他妈的老达呼里，挨个儿排队去看，谁敢造反就

有这样的下场，杀鸡给猴看，以免后患。”

桑普勒尸首挂在罕伯岱屯“杜如阔”的老树枝上，官警军挨家挨户的强迫百姓去看桑普勒尸首，但有“约法三章”“不准流泪哭啼，若遇此事，按以通匪论处，就地枪决。”

刘巡官原打算七月七日、八日、九日示众三天，未到期限，不知何人将尸首投入江水失踪。刘巡官下令，要捉拿偷去尸首者，就这样，莫日登哈拉家族人员挨排挨打挨讯，整整折腾了两天，这次是接连民国六年十一月，因少郎代夫拦劫“王老西子”引起的株连九族以来的第二次了，罕伯岱屯莫日登哈拉及其亲友甚受株连之害，莫日登哈拉曾一度借用的“孟”姓，罕伯岱屯莫日登哈拉全改借为“莫”姓。

十二、袭击泰来兵营和警察派出所

官署视少郎义军为眼中钉，龙江道公署于民国七年八月二十日发出第870号训令：“省署指令泰来县呈一件，为股匪小郎入境抢劫烧杀，并掳去官警暨军装枪弹马匹，请通缉由开呈单均悉，查此股匪徒迭经咨令通缉有案，迄未歼灭，虽属该匪等狡悍异常，亦系各该县缉捕无力，有以致之，兹复据报抢掠烧杀，并掳去官警凶焰益张，若不从严追缉，一致荡平，实不足以戢匪气而安，阎阎乡龙江道转命附近县局，勒限严命警团跟踪协捕、务期尽数弋获为要，要倘逾限未获，所有出事地方，该管巡官警长等，应即查照警察官吏惩奖章程，一律从严惩处，以儆玩忽，并将追缉情形，随时报告……切切此令。”

于民国七年八月六日夜，少郎起义军突然袭击了泰来县境内的第二十九师第三团第二营的军垦军一个连队，缴械枪支子弹马匹以及军装等若干。

少郎等到了蒙古地方白庙子，在喇嘛掩护下，在庙宇里呆了一昼夜。一天傍晚，从农垦军身上、扒下了军装几十套，他们穿

上军装化了装，突然开进了农垦军一个八十几人的连队，未及从梦中醒来便被缴械了。义军骑着缴获的马，背起枪弹，穿上军装，又返回五庙子一带，砸了一个警察派出所，活捉了值班警察一名。被俘的姓李的警察，不肯具供，有意逃跑，只好在半路处死了事。

民间有砸了泰来监狱，放走了所有犯人之说，但无文字记载，今后待查。

十三、阿伦河之战

少郎砸了泰来兵营及警察派出所的消息，传及各地之后，在龙江道公署870号训令下达后，各地抽调军警追剿跟踪不停，尤其是民国七年秋九月，官方纵火烧荒清野之后，少郎代夫的处境更加困难，时而躲至济沁河山林，时而到哈拉海草甸子，长期不停顿地打游击，居无常处，供给经常中断。

民国八年正月，少郎等到拉格奇屯一带草甸子里活动，他们经常注意凌福的下落。

民国八年正月末，少郎等三进额尔门沁屯，一心想给蠢蠢欲动的“凌胖子”一点厉害瞅瞅。

民国八年二月间，少郎等在阿伦河和音河的河谷间，时而北上哈拉海，时而南下三道岭、散达罕、河西等屯。

就在此刻，官方吸取了单纯追踪的失败教训，听说少郎代夫在阿伦河口一带频频活动的情报后，不惜一切代价，用了吴俊升第二十九师第二、三团兵力；外加第二、六、八警察派出所的巡警，大致动员约一千人马，从哈拉海到嫩水左岸荒甸子，由卧牛吐到刘家窑塔拉台敖乃屯，撒上了大网，采取了步步为营逐渐收缩的办法，到了民国八年三月初，将少郎等约四十名起义军，围困在额尔门沁屯以北，河西屯以东，刘家窑以西的北达散达罕屯的方圆不到十平方公里的窄小范围内，困住了起义军，就在阿伦河“塔头根”和苫房草丛里，和官军警开展了三昼夜的战斗，全

部战马落入官军警手中，寒风凛凛，无食物充饥， 搞了三次突围，西地房子、六间房一带，被官军把得紧紧的，几次突围全失败了。此刻，少郎下令，各自突围各找活路，就在此间，少郎等四人躲过官军的拉大网，在草丛里隐避而过，其中有少郎郭宵山等，其他的不幸遇难阵亡。

轰动一时的少郎代夫起义，在寡不众敌的情况下，失败了。

十四、少郎遇难

民国八年早春三月，阿伦河口战役之后，少郎等几个人，好容易冒着风险突围跑出来，官方听到少郎又潜逃他地，军警又跟踪追捕，通缉少郎日趋紧张，看来在江省附近匿居，危险很大，遂于民国八年三月初七，少郎又跑回罕伯岱屯，将情妇领到嫩江县境内匿居下来，因本人有“前科”为便于隐避，最后到嫩江县西板桥一带的南奇岭屯落了脚。

莫旗的老乡都知道，少郎乘隙在江省到莫旗一带，经常做牲畜交易，多般时间去阿荣旗查拉巴奇屯一带入山打猎，尽量逃避外界的视线。

少郎情妇莫金氏的弟弟，曾来嫩江县南奇岭屯探望过姐姐，少郎搞生易打猎，赚了不少的钱，当其家弟返乡时，少郎情妇将包着钱的红包裹偷偷交给了弟弟，少郎回家一看，钱包不见了，钱没了是小事一段，他最担心的是内弟走露消息坏事。为此，少郎产生杀人灭口的念头，乘上“吉若马”（走马）追下去，乘内弟不备，一棒子把他打死在野外，带上包钱的红包，埋好尸体回家了。

过了很多天之后， 少郎情妇发现那块红包裹， 暗自思忖：“少郎不杀其弟，红包皮怎能到他的手？八成是少郎下毒手杀了弟弟。”

少郎情妇莫金氏，对少郎怀恨在心，悄悄地和同来匿居的金

吴氏和李郭氏透露了少郎的举动。因为她们都是在少郎郭青山等逼迫下，在无中奈中被迫离乡来到这里匿居的，对男方存二心，又难奈匿居的恐惧，为此，三个女人宁可担风险，也要向嫩江县长举发。于民国十年四月初，嫩江县长李邁来到西板桥一带公干，三个女人一起去见李县长报案，李县长得知少郎底细之后，布置一区区官陶仁亭捉拿少郎。于民国十年四月十日左右，少郎在嫩江县西板桥遇难就义，时年四十七岁左右。郭青山也在同一天遇难就义。

少郎郭青山就义后，嫩江县公署发函，通知失妻的罕伯岱屯莫嘎库勒、金普清等具领其妻。同时要求付清南奇岭屯为她们所垫的伙食各费。据所在屯长赵郎海保卫甲长如祥排长常祥等清算所垫各费称，自少郎郭青山于民国十年四月十日左右遇难起，由民国十年阴历四月十二日起至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日止，食用米面油盐等项，合钱三千零五十八吊。如果不付清所垫之款，就不能归还他们的妻子。

莫嘎库勒、金普清二人，被欠下的巨款吓呆了，两个女人在半年中间的伙食费，相当于几十头大牛的的价值，这简直是讹诈。莫嘎库勒、金普清不想去领前妻，加上还不起，这样一笔巨大的欠款遂派其叔莫保全和金绍富二人，前去试领，借莫金氏金吴氏不愿返乡为由，叫她们仍留该地，以改嫁的彩礼偿还伙食费，只抱回来金吴氏的婴儿了事。

后　记

震撼嫩江大地的少郎代夫起义，迄今已整整七十五年了。这次起义再次向历史昭示，达斡尔族先辈们，在三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为了反对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

少郎代夫起义，是达斡尔族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

而且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仅就达斡尔族口头文学来说，歌颂少郎代夫的诗歌（乌钦）就多达二百多首，哈坎伯舞词七八种，歌曲多首，这些精神财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笔者是少郎代夫的家乡人，自幼耳闻他们的英雄事迹，发掘整理这份珍贵的遗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写作中得到党组织和有关部门的关怀、帮助，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本文的初稿，使我深受教益；市民委敖海林、杨优臣同志提供了大量资料，使考证历史事件有了可靠的根据；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政协邀请达族人士开座谈会，为本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借此机会，向上述单位和同志深表谢意。限于笔者的水平，加之调查研究不够周全，难免不当之处，望读者多予批评指正。

注　解：

① 赶上少郎代夫起义过程中的省长和督军如下：

朱庆澜，民国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至民国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鲍贵卿，民国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至民国八年七月六日。

吴俊升，民国六年十月，奉张作霖之令进驻齐齐哈尔，当时任第二十九师师长，民国十年三月十二日，才提升督军兼省长，他操用第二十九师军权，少郎代夫起义期间，吴俊升是省陆军讨伐的总指挥。

② 抢渡雅鲁河曲凡七、八种，巴吉热乌根词曲共三首，打倒军阀歌，是金和台屯卜达喔词曲。

③ 传自桑普勒之长子乌彻金巴图尔和莫就恩之口传。

④ 哈土半拉屯，达语称哈达巴日阿，即向阳屯之意，在奇克奈屯西南。

⑤ 索布罕屯，达语称索布如干，即塔屯之意，在黑岗子屯南边。

⑥ 哈拉台屯 达语称哈拉斯蒂阿纳根、即有树林的窝棚之意，在色力克屯南。现称广厚屯。

⑦ 张家店房称张家大院，在色力克屯附近东南。

⑧ 奇克奈屯，达语称奇克尼，即耳状之意，在色力克屯南。

⑨ 莫呼屯，达语称毛古如屯，汉语可称金地房子。

⑩ 木头半拉屯，达语称毛得巴日阿，即向林屯之意，位于奇克奈屯南。

⑪ 候耳台屯，达语称候沃白蒂，即有貉肉之意，位于奇克奈稍西。

⑫ 江心岛，在蒙古三家子东南几里处，有个三个环水的岛子，只有西口子通入，是起义军经常隐避之地。

⑬ 串地房子，嫩江东岸小部落，归属泰来县管辖。

⑭ 白庙子，在江桥右岸，有喇嘛住庙念经，归泰来县管辖。

⑮ 哈拉海，达语称哈拉刻，即荆蒿草之意。归梅里斯达斡尔族管辖。

⑯ 阿拉尔，达语称阿拉日，汉语记阿拉，阿拉尔屯共分七个部落，如：哈拉刻阿拉日，维衣阿拉日，毛给阿拉日，哈杀刻阿拉日等等。

⑰ 额尔门沁，达语称额日莫齐，即有蒿草之意，也有人说，由人名而来。

⑱ 音钦，达语称耶恩钦，即音河畔居住者之意。

⑲ 长岗子，达语称嘎拉卓布库。

莫 力 达 瓦 起 义

卜 林

现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西北部，即今库如奇乡一带有座山叫莫力达瓦山。“莫力达瓦”有人解释为“马鞍状山岭”，也有人解释为产“梅力”山果的山岭。1931年11月中旬，就在这“莫力达瓦”山岭，发生了以达斡尔族为主体，另有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参加的，包括这一带纳文、讷莫尔、讷敏三个乡联合的民族起义。这支起义军在“反军阀、抗苛捐、反压迫、求民主、争平等、反封建、搞革命”的政治口号下，跟当地军阀专制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起 义 的 原 因

1、光绪三十三年，清朝政府在讷莫尔、讷河、嫩江以及西布特哈一带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聚居的草原及山区置设治局，招垦丈量土地。从1905至1911年，在讷莫尔、讷河一带，从达斡尔人占地中垦荒66万余公顷，墨尔根一带垦荒7万6千余公顷，西布特哈西部的甘井子一带垦荒65万余公顷，龙江一带垦荒26万余公顷。在清末光绪三十三年前后，从我省达斡尔地区占荒及熟地总数为127万余公顷。到1914年，在原垦荒占地基础上，又要成倍地占地开荒。历来以牧猎为主的三个少数民族失去了大片赖以生存的土地。德都、讷河一带的东布、特哈地区达

斡尔族人民，放弃博勒克、哈力浅、塔文浅、德都勒、温察尔、忙乃（满都浅）、坤果尔津等二十几个民族村庄，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大批动迁至西布特哈山区，到民国年间在那里已安家立业。

2、黑龙江军阀万福麟和他的前任提高土地税率，使达斡尔地区民族部落放弃大片土地，纷纷转入牧猎生产。之后，省军阀又采取了五抽一的牲畜税，其他马驴羊鸡猪等均加地方税。苛捐杂税使达斡尔族百姓无路可走。

3、兵匪勾结抢劫民财。黑龙江督军万福麟，在拉哈一带部署徐子鹤团，讷河（博尔多）设周作霖团，嫩江（墨尔根）设刘汝明团。这些地方虽然驻扎了大兵，却无力发放军饷，不能确保军队给养，三个团于是就轮流到东西布特哈及墨尔根一带达斡尔族部落"打尖"，白吃并吃光了各屯的口粮，猪羊鸡等全部被宰光。不仅如此，他们还暗中勾结土匪东布特哈的"青龙"绺子，在赵青山带领下，专门抢劫坤果尔津一带的达斡尔族部落，将全屯牛羊马群抢劫一空。他们狼狈为奸，抓人绑票勒索民财。1931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占领齐齐哈尔，这些军阀更加猖獗，这就更加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义愤。

在多难之秋，少数民族认识到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打退兵匪的骚扰，才能保卫家乡。

1929年，取得黑龙江省督军府的批准，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族人民，为了防止土匪的抢劫和确保百姓的生命财产，在莫力达瓦岭一带的山区达斡尔人联合三乡农民，组织起约300名的山区自卫大队，达语称之为"敖里莫音浅"（即山区之意）。

达斡尔族山区自卫大队成立后，军阀团长徐子鹤视为眼中钉。1930年冬，徐子鹤率领千余名陆军向山区各部落发动进攻。有一次诺敏支队被徐子鹤部包围在马日当浅屯阿谱家的院子里，三十几名达斡尔族战士，从拂晓到傍晚一直抵抗着多于自己几十倍的军阀士兵，使他们不敢再发起强攻，最后突围到诺敏河

西岸的西鲁松屯。在刘家土围子屯，敌人又包围了民族自卫队四十余名战士，企图以多制胜，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然而同样遭到自卫队战士顽强抵抗。这部分自卫队人员当晚也安全突围转移到了山区。敌人又以失利告终。

经　　过

这次莫力达瓦山起义，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

早在1930年冬，在郭道甫私下串连下，在北京东交民巷万国饭店开了一次会，专门研究了反对军阀的武装起义对策，会上布置郭兴元（绰罗巴图尔）回布特哈地区筹建达斡尔起义军，选择山区打游击；布置郭文通回呼伦贝尔筹建牧民起义军；又布置李友桐（阿恩根）回哲里木盟筹建蒙古自治军。这次参加的人员有、郭道甫、德古来、郭兴元、郭文通、李友桐等九人，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反军阀、抗苛捐，反压迫、求平等，反封建、争民主，保卫民族利益，争取民族地位。

按照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郭道甫的号召，布特哈地区在外地学习的学生纷纷赶往莫力达瓦一带的库如奇屯，协助郭兴元组建达斡尔起义军，分别担任了起义军的各项职务。参加起义的青年学生有：郭东布（莫德勒图）、敖匡海（孟和巴雅尔）、敖荣寿（阿勇巴图）、敖岳山（胡格金台）、孟耐春（滕合台）、鄂云阶、郭安庆（阿木尔肯）、郭永连（托音保）、德富贵、索和信、敖定升等。参加起义者共283名，主要由农民、学生、猎民等组成，推举郭兴元为起义军统领，下分五个中队：一中队长英登保（原民族自卫大队长）、二中队长郭美朗、三中队长郭东布，四中队长孟富兴、五中队长塔林保。

当地军阀听到达斡尔人在莫力达瓦岭一带起义的消息后，恐慌万状，拉哈军阀团长徐子鹤，从嫩江、讷河调动两千多名官兵，于1931年11月20日向莫力达瓦岭一带的起义军所在地库如奇

屯发起猛烈进攻。起义军与徐部在阿尔拉屯的一仗特别激烈，打了一昼夜，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伤亡极其惨重。敌人依仗其兵力众多，一再调兵遣将补充兵力，企图一举歼灭。起义军见势不妙，安全突围转移到大本营库如奇屯。敌人很快地占领了库如奇屯，在屯里制造了血腥惨案，将居民数百人一杀而光。据目睹者说，只留下几名准备奸污的妇女，并将各家的浮物抢劫一空。骇人听闻的库如奇惨案，更加激起了达斡尔族人民的反抗。

失　败　原　因

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不成比例，这是失败的客观原因。

起义军领导阶层的内讧，这是失败的主观原因。在如何对付军阀兵力的问题上，以英登保为首的决战派与郭兴元为首的学生势力之间，发生了分歧。前者主张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猎民的好枪法，开展阵地战，正面迎击敌人，拼个死活；后者主张牵制敌人打游击，利用山林地区跟敌人周旋，逐步消灭十倍于己的强敌。

在领导内部争吵不休中，敌人又举兵前来围剿，英登保一气之下，拔出手枪指向大家说："我不执行你们的命令，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别后悔，走着瞧吧！那我就带上我的七十三个部下，各走各的路"。然后收起手枪，准备离去。此时，郭东布大声说："对不执行命令，不管是谁，都按战时纪律论处"，不听邪的英登保又拔出手枪对准大家说："你们到底要想干什么"，话未说完，"砰、砰"两声枪响，英登保卧倒在地，这一场内讧就宣告结束了。然而，敌人已经包围并向起义军开始进攻，敌人十次攻均无成效，天黑以后，起义军突围而出，反回来截击分散之进敌，为库如奇屯死难者雪仇，越打越猛，敌人损伤数十人后逃跑了。

1932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布西，起义军一散而光，有的解甲归田，有的到博克图充当了日本鬼子的护路军（后改为伪兴安东分省警备队）。

达斡尔人参加抗日斗争事迹

卜　林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具有保卫祖国爱国主义传统的达斡尔族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抗日救国斗争。有的支援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有的配合苏军搜集情报，有的自发地组织民众抗日活动等，在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一、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郭道甫，又名莫尔色，原黑龙江省呼伦贝尔自治政府索伦旗莫克尔吐屯人。是反对旧军阀斗争的杰出的民族领袖人物。曾任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张学良将军的秘书、还担任过西北军司令冯玉祥将军的秘书。早年与李大钊、吉雅太等共产党人有密切联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拢络他曾到处寻郭找道甫。郭道甫得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后，躲到北京张学良身边，庄严地发誓说：“宁可头断，决不做亡国奴。”在张将军的赞许下，郭道甫返回呼伦贝尔唤起民众抵抗日军北上。一九三二年春夏之交，日本关东军在乌奴耳一带击败抗日牧民队。苏炳文部队连续退却，呼伦贝尔岌岌可危，郭氏由满洲里去苏联，后失踪。

阿拉坦嘎达，又名鄂序元，原黑龙江省讷河县人。组织北京蒙藏学校校友到苏联和蒙古参加抗日活动。于一九三二至三四年

间，接受共产第三国际的派遣，进入莫旗及东蒙各地 搞 情 报数次。一九三六年进入伪蒙疆自治政府德王蒙军任职，专门做搜集日本军事情报工作。日本倒台后，返回蒙古人民共和国任公安部次长。

孟汇元，黑龙江省讷河县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去蒙古，接受共产第三国际的派遣，进入新疆省搞地下工作，后被盛世才发觉，同陈潭秋、毛泽民一起就义。

海瑞，原呼伦贝尔索伦旗莫克尔(吐屯人)，是达斡尔族最早参加革命活动的女性。一九二五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九年受共产第三国际的派遣，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祖国东北大地。在国难当中，义愤填膺、主动请求离开安宁环境，决心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最前线， 为解放祖国东北的正义事 业 而献身。一九三四年， 海瑞的愿望终于获得了批准， 她和她的丈夫以经商为名、潜入开鲁摆小摊做生意，暗中为共产第三国际和延安发送情报。 海瑞为防备日本特务机关破坏， 经常出入叶柏寿、克什克腾旗、北京各地。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做暗探，不断愿踪她， 敌人整整花费了十年功夫才把她捉住。 于一九四四年冬，在越狱逃跑中，被敌人击中牺牲。

色尔古冷，原讷河县人，为抗日斗争逃入苏境，给苏军搜集日军情报工作数次。一九四三年任苏军坦克兵少尉，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在攻克德国柏林的战役中壮烈牺牲。

沃庆×，绰名毛库，原龙江县前虎尔虎拉屯人。一九三二年春，逃入蒙古、苏联，经常潜入东北各地搜集日军情报，于一九三四年返乡一次，发展其弟沃庆祥为地下情报员。一九三五年春，苏军飞机在富拉尔基附近的前水哈拉屯上空撒抗日传单，日本特务机关不断派遣特务侦察前水哈拉屯一带的地下工作人员，有一名

与事件无关连的居民邢金官，在日本敌特恫吓下跳井自杀。敌人咄咄逼人，非要从前水哈拉屯揪出苏军地下情报员，在仇人告密下逮捕了沃庆祥。沃庆祥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死不供认，后来因无证据被释放，前水哈拉事件遂告结束。一九四五年冬，苏军将年迈体弱的沃毛库遣回牙克石定居。

另有郭文通（伪兴安军少将）、奈日勒图（著名美术家）、额尔登泰（留苏学生、著名学者）、布迪扎布、荣茂、鄂廷勋等，为抗日救国的胜利，都为苏军蒙军充当了地下情报员。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国际主义精神值得后人高度敬仰。

二、支援马占山抗日活动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旬、马占山部队阻击日本关东军北犯的江桥战役，正处于激战状态中，嫩江畔的达巴岱、莫老坟、特力莫、四三家子等屯的达斡尔族农民，自愿献猪献羊支援前线，自愿出工帮助挖掘战壕，献出破门窗及其他板材，为战壕蓋盖。献猪羊十几口。马部一位营长特来表示谢意。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午后，马占山的一支部队来到了龙江县敖宝屯，他们是路经此地北上抗日的。他们在敖宝屯广泛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敖宝屯名叫鄂寿喜的农民，加入了抗日义勇军，前后在安达、绥化、海伦各地阻击北犯日军，给敌人造成极大的伤亡。不久，这支部队被敌人打散，鄂寿喜怕被敌特分子发觉，索伦等地整整度过了十几年的隐蔽生活。敖宝屯人大都了解鄂寿喜的底细，然而，全屯人都严格保密无人向敌特分子告密。

三、凌升通苏事件

莫尔登哈勒·凌升，原呼伦贝尔海拉尔市人。

清末民初，原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公署左厅帮办额鲁特旗总管，一九三二年任伪满洲国兴安北省省长。号称“海拉尔安本”

（即海拉尔都统之意），驰名达斡尔地区。

呼伦贝尔高原与蒙古高原毗邻，因以地理环境从历史上与苏蒙来往密切。沙俄势力渗透在此地，十月革命后，苏联在海拉尔设领事代办机构。呼伦贝尔地方在历史上与苏联和外蒙形成了友好往来的传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中东铁路事件后，苏联红军进驻海拉尔市，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凌升任会长。一九三〇年一月，根据中苏停战协定，苏联红军撤离前，苏方城防司令特意接见凌升，在密谈中苏方提出："如果苏联和日本之间发生战争时，你们站在哪一边？"，凌升慷慨地说："当然站在苏联一边。"凌升是支持苏联的人物，名声早已宣扬在外。

早在一九一七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内蒙独立运动，巴布扎布为首的亲日独立运动分子，以武装占领了呼伦贝尔地方，后来凌升组织牧民武装队赶走了亲日的武装匪徒，切断了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向呼伦贝尔地方的政治渗透。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爱国将领苏炳文在海拉尔组织了东北民众救国军，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书，并通电各地。正任兴安北省省长的凌升，对苏炳文的抗日活动给予支持，日本暗探记恨在心。

呼伦贝尔地近苏联，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凌升充当反共的工具，然而，凌升反其道而行顶撞日本官员，很不随日本统治者之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日寇发动喀尔喀庙事件，在苏蒙军反击下一败涂地，逼迫寻求谈判途径，企图把喀尔喀庙地区归日方所有，推举凌升为首席代表，伪满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和海拉尔特务机关长中锐中佐等谋划其后，谈判场合的发言稿以及如何强词夺理反驳苏蒙方等，都有事先周密安排，交凌升演傀儡戏，而凌升对日本人的恶劣手段大发雷霆，在谈判中经常不按日本人的授意行事。谈判破裂后，日本人把谈判失败的责任，全归咎于凌升身上。

综上所述，凌升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不受摆布没有诚意为日本人效力的人，是亲苏通蒙的危险人物，是一颗腹中定时炸弹，非除掉不可。

一九三六年四月，海拉尔特务机关逮捕了一些人，先从动摇变节分子打开缺口，搜集凌升的通苏事实及抗日言行。陷入日本人的调虎离山计的凌升，匆忙地从长春开会归来时，刚下了火车，早已布置好了的日本宪兵队，当场逮捕了凌升和其弟福龄以及葆定等人。

海拉尔日本宪兵队从凌升嘴里一无所得，随后转押至长春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审讯。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九日，以通苏罪名，公布了“凌升通苏事件公报”，在伪满汉奸面前以杀鸡给猴看的手段，将伪满各大臣各省省长以及高级官员率临刑场，观看了在长春南岭刑场枪决凌升的现场，同时被枪决的有福龄、春德、华林泰等。凌升事件震惊东北大地，更加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凌升虽是旧社会上层官僚政客，又身居日伪高职，他不畏强暴敢和日本统治者直接作对，值得后人怀念。

四、支援东北抗日联军

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组织剿共，东北抗联的活动地盘更加缩小，给东北抗联的活动带来了困难。一九三九年来，东北抗联开辟了大兴安岭一带的游击区，给予东北抗联的生存发展和保存革命力量带来了新的转机。

大兴安岭是密林遮盖的人烟稀少的严寒地带，这里有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三个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恨之入骨。然而，由于旧社会造成的民族偏见，他们对于抗联不十分了解，甚至因民族关系处于半信半疑的戒备状态。

一九三九年冬，冯志刚为第六军参谋长王钧为政治部主任的

抗联报导处和十二团指战员，首次来到了莫力达瓦旗中部山区的小库木尔屯，这里是纯达斡尔族部落。抗联进驻部落后，这里百姓感到生疏和陌生，又怕受到“通共”的牵连，因而对战士不够亲热。此屯有个德高望重的老头名叫哈苏，本姓叫莫尔登哈勒。老头劝说达族百姓说：“他们是红军，打日本救中国的，你们不要怕，他们不会祸害百姓家，他们的大官对我起了誓的。天下人谁不遇到困难，既然来了咱们就供吃供喝，此事千万不要宣扬出去，一旦宪兵警察听到了，咱们全屯谁也剩不下。”他一边安排抗联战士的食宿一边挨门挨户做宣传。

孟哈苏老头，又帮助召集全屯群众大会，请王钧同志做了抗日救国的宣传讲话，全屯四百多人到会听讲，大家从他们身上感到了中国的希望。

哈苏老头不怕断头，要求冯志刚、王钧等领导同志食宿在他家，他认准了抗联是革命部队，战士人人讲纪律，对百姓亲如兄弟姊妹，挑水扫院，帮做家务活儿，又学达语，真规矩得很，哈苏老两口赞不绝口。把家里的所有待客的吃喝热情地拿给抗联同志。

哈苏对儿子孟德仁讲，“这些汉人抗联对咱真心实意，孩子你只不过对山路熟，那天他们用的着了，偷偷地进山引个路，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忙，刚才讲的事对外不能泄露，说不一定哪一个嘴讨厌的讲了出去，咱爷们儿都被砍头的。”孟德仁回话说：“要是讲信用守义气生死与共的话，他们得和我结把兄弟。”就在饭桌上，孟德仁提出了结把兄弟的事。冯志刚、王钧、陈雷等同志说：“共产党员不允许搞结帮这些事情的，这怎么办呢？好，我们几个人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几位领导在党内会议上研究了一番，认为这对抗日救国大业有利，表现了少数民族兄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真心实意，怎能拒之门外？就批准了几个同志与孟德仁结成把兄弟的动议，于是王钧、副官王万俊和孟德仁

三人，以“为打日本救中国生死与共”的誓言结为异父异母的兄弟。

就在此后，孟德仁不怕风险经常为抗联进山做向导，暗中为抗联运送给养、战马，并搜集日伪军事情报。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六日在莫力达瓦旗党史座谈会上，原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王钧同志，在他的发言中讲起这一段经历，讲得生动感人，最后说：“我这次没能为孟哈苏老人扫墓，感到非常遗憾。”

此后，莫旗的小库木尔屯乌尔科屯为抗联常来常往的保护点，没有一个村民跑出去给日本鬼子报告的，真够讲义气的了。

一九四〇年，王明贵、王钧二同志，带领抗联部队深入莫力达瓦、阿荣、布特哈三旗境内活动。

莫旗猎民孟松海、孟守海兄弟，就为抗联支援了五匹马三袋小米。

一九四〇年，以郭铁坚为支队长、曹玉奎为参谋长的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经常深入嫩江两岸开展游击战。

抗联来到山区郭尼屯，达族百姓杀肥猪表示慰劳。七月二十九日晌午，讷河的日寇派兵包围了郭尼屯，当夜幕降临之际，达族百姓自动引路突围，抗联部队安然地冲出了包围圈，并把三名重伤员藏在草甸子里。达族百姓每天早晚，偷着给伤员送饭送水，其中敖富林更为突出。第二天，大批日伪军警威协群众，要在限期内交出窝藏的抗联伤员，否则，一旦发现要杀头示众，就在敌人威胁下，无一人吐露实情。在交战现场上，有十一名同志壮烈牺牲的尸体，这屯百姓出工出力，将烈士们掩埋在风景优美的东山坡上，并按以达斡尔人的习俗举行了祭奠仪式。

一九四一年秋，莫旗阿尔拉屯百姓额勒格松、苏加绪二人，在毕拉尔河山林里打猎中，遇见了王明贵队长和王钧参谋长，把所带的粮物全送给三支队。返回屯来又将库存的粮食共两车，支援了抗联部队。他又介绍鄂伦春族头行人盖山相识了三支队的

首长。在盖山提议下，王明贵同志与盖山、额勒格松、苏加结、常书等人，结成把兄弟。此后，额勒格松、盖山等人，常给三支队带路，传递情报、送粮送物等。

一九四一年冬，莫旗东北部山区的郭恩屯和卡布楚屯达斡尔族老乡，眼看严寒季节到来，抗联战士们衣着单薄，好心肠的村民纷纷自愿支援过冬衣物等。

鄂维义老大娘，见一小战士脚裹麻袋片，这一冬怎能熬过，于是，拿出儿子的奇卡密（狍腿皮靰鞡），便送给小战士穿。

村民在鄂大娘的带动下，有的赠送狍皮大衣，又有的送皮帽皮手套等。

敖风兰的妇女，见到抗联同志在深山密林里吃不好穿不暖，把家里唯一的大母鸡宰杀了，叫同志们吃鸡肉汤荞面饸饹，表达对抗联同志们的深情厚谊。

在郭恩，卡布楚面屯，达斡尔族百姓，为抗联解决缺粮少马问题，大家自动地筹集的三十多匹战马以及粮食、衣服，靰鞡、皮帽、旱烟等物资支援抗联。当抗联部队离屯时，全村百姓依依不舍地 送 到 屯外。不久，“讨伐队”来了，要追踪抗联部队讨伐，大家商量好了，对付“讨伐队”的盘问要统一口径，不准任何人指明抗联的去向。

一九四一年冬，三支队在孟德仁带路下，突然袭击博克图一带的日本军官木作驻守的二十六号柜房，缴了日伪军的械，得到了过冬所需的粮、衣等物资。

一九四一年冬，三支队开进了阿荣旗为古奇屯和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第六村，受到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百姓的热情接待。三支队军纪严明帮做家务活儿等，受到了少数民族百姓的称赞。

一九四二年，郭尼屯达族农民敖锁诺，收留保护了抗联受负伤班长胡庆荣。因敌人不断搜索抗联伤病员，敖锁诺将胡庆荣同志转移到阿尔哈浅屯达族农民孟能阳家，一直把胡庆荣掩护到一

九四五年光复为止。他在达族百姓掩护下，整整度过了四个年头。祖国光复了，胡庆荣同志重归抗联部队，在讷河县担任了东北民主联军连长。

一九三四至三六年间，讷河县满那屯达族农民巴嘎布，多次给抗联摆船渡江，帮助抗联脱险多次，并向抗联提供日伪的军事情报，几次给抗联做向导攻打警察署。被捕后。在日本特务严刑拷打下，他只是说："抗联用枪逼我摆船过江，我手无寸铁没有办法。"弄得敌人无可奈何。

解放后，为悼念巴嘎布老人黑龙江省"老抗联"王钧等同志多次为巴嘎布墓前扫墓致哀。

一九三五年秋，讷河县达族农民郭庄海等，为抗联第六师献粮九百斤。是年为抗联做向导，在高家窝棚战役中，缴获二十几袋粮食十四匹战马。又为抗联引路攻打宝格泰屯一带押车运粮的伪军，缴获粮食、子弹、战马若干。

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同志，于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期间，与笔者交谈中语重心长地回忆往事说："在大兴安岭打游击战时期，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给我们帮不少忙，为了抗日大业和两个民族同志的头行人结过把兄弟，什么时候也不会忘掉少数民族同志的厚意。"

原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王明贵同志，也念念不忘达族百姓对抗联的支援。

伪兴安东省纪略

乌力斯·卫戎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1932年3月1日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在长春宣告“满洲国”的成立，被辛亥革命推翻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重新当上了傀儡皇帝。当时，蒙古、达斡尔族的王公贵族、地主官僚们，口唱“日满亲善”“满蒙一家”的滥调，参加了“满洲国”成立和溥仪登基的庆祝盛典。

在日本侵略东北和伪“满洲国”成立前的旧民国统治时期，由于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不仅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同时也影响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们的利益。所以，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和部分知识分子借“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建立初期的国乱时机，经常聚议，积极活动，想搞内蒙古自治，建立蒙古自治军，彻底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个民族矛盾，表面上答应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建立兴安东西南北四省，让蒙古人自己管理自己，但后来的事实是，兴安四省的实权全部落入日本人手里，“民族自治”却成了泡影。

兴安四省建立始末

1932年3月，在伪满洲国国务院设置了兴安局，统辖兴安

东、南、北三个分省，当年八月，兴安局改称兴安总署，不久改为蒙政部。1933年增设了兴安西分省。1934年东北三省划小为十个省份时，兴安各分省一律改为省。兴安各省名称源于东北大兴安岭山脉。初任兴安局局长的是巴林右旗的蒙古王爷、兴安西省的省长扎嘎尔，改蒙政部后任大臣的是前郭尔罗斯王公齐木特、色木贝勒。伪兴安局统辖的兴安北省，省会设在海拉尔市，省长由清末额勒特总管凌升(达族)担任，后来由额尔钦巴图担任；兴安东省省会设在扎兰屯市，省长为清末布特哈八旗筹办处总办额勒春（达族），后来由博彦满都、巴金保担任；兴安南省，省会设在乌兰浩特市，省长初任是业喜海顺（蒙族）王爷担任，后来由寿明阿博彦满都（蒙族）担任；兴安西省，省会设在开鲁，省长由扎嘎尔王爷担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暴发后，战事吃紧，局势紧张，日本帝国主义者便把分散在各省的政权、军权全部收了上来。1943年正式把兴安四省合并为兴安总省，省会设在乌兰浩特市，省长为博彦满都，日本特务白滨出任总省参事官。原来兴安四省建制撤销后分别设置了做为总省派出机关的行政公署，实质上什么也说了不算。在并省设署的同时，把原来各省的警备军也统辖到兴安军第九管区司令部(设在通辽)和兴安军第十军管区（设在海拉尔）之内，后又增设了兴安师团司令部（设在郑家屯）。这样一来，总省的一切军政大权就都由日本人控制了。

兴安东省的建置沿革

在建立兴安东省（亦称兴安东分省）的过程中，有很多曲折。当时，被国民党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统称为“蒙系人”的达斡尔族上层分子表现得最积极，最活跃。他们跻身于日伪统治者圈子里，没法在本民族世居范围内保存和扩充权势，积极主张在嫩江流域西部，大兴安岭南麓的清代西布特哈猎区范围内建立兴安

东省。

兴安东省，同兴安各省一样，是在1932年秋，由德古来等上层知识分子勾通日本帝国主义者及东蒙古王公贵族上层分子酝酿产生的。兴安东省刚成立时，在齐齐哈尔市东城壕东段的天和胡同，民国年间王县长的公寓里设立了临时办事处，同年冬底旧历腊月二十三，才搬到了扎兰屯。

兴安东省的首府设在扎兰屯，省的区域范围是：东面和东南同讷河县、嫩江县隔江相望，北和东北同呼中、塔河、呼玛县相连，西和西南以陈巴尔虎左旗、科右前旗为界，南面紧靠龙江县、甘南县。这个广阔地区，大约有十多万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山区，平原很少。境内只有一条滨洲线铁路穿过，其他边远山区交通很是闭塞。建省当时全省人口約五万多人，达斡尔族约占半数以上。扎兰屯，西沿雅鲁河，东靠白头山，是一个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小镇子，当时人口不足五千。

兴安东省始建时管辖六个旗，即布特哈左旗（旗址在扎兰屯）、布特哈右旗（旗址在博克图）、阿荣旗（设在红花梁子屯后迁至那吉屯）、莫力达瓦旗（设在尼尔基镇）、喜扎嘎尔旗、（设在索伦镇）、巴彦旗（设在和里屯）。这些旗署除莫力达瓦旗、布特哈旗过去有布西和雅鲁设治局的行政机关外，都是新设的。当时为了扩充势力范围，在人烟稀少、交通闭塞、条件很差的山区也设了旗署衙门。新建的喜扎嘎尔旗、巴彦旗、布特哈旗、阿荣旗人数很少，当权者就从龙江县、讷河县、德都县、黑河地区强迁达斡尔族移民，伪满康德初年起，先后迁去约两千多户，一万两千多人。人为的迁民活动，给达斡尔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兴安东省刚成立时，管辖六个旗，后来布特哈右旗撤销，剩

五个旗。省公署内设民政、总务二厅，下面有总务、会计、警务、地方、劝业、文教等六个科和十一个股。武装力量设有省保安司令部。

兴安东省具体的人员安排是：

省长：

德都勒氏，额勒春初任。继任的是，博彦满都、巴金保（又名富礼庭）。

各旗的旗长：

布特哈左旗的旗长有索保、郭亚廷先后担任；

布特哈右旗的旗长有金耀洲（又名额尔登）、志达图（又名孟星三）先后担任；

阿荣旗旗长郭凯章（又名塔日亚图），继任为乔树仁（又名白音诺彦）、杜索臣；

莫力达瓦旗的旗长有富礼庭（又名巴金保）、鄂德宏、苍吉扎布等先后担任；

巴彦旗的旗长由孟蕙川、塔日亚图、绰罗巴图尔等先后担任；

喜扎嘎尔旗的旗长由鄂范五、莫九玉、郭兴元、敖玉祥先后担任。

公署内的厅长、科长：

民政厅长为志达图，金耀洲继任；

总务厅长为巴金保，继任为一位郭布勒氏，姓名不详，原是清末官吏。

总务科长是德古来（又名吉尔嘎朗），现在台湾，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下设总务股长是孟福山（又名霍图日苍），人事股长是敖荣寿（又名阿勇巴图）。

会计科长为敖日兴（又名阿恒太）。下设的储运股长是杨士贤（又名阿木古郎），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建委副主任，已离休。

会计股长姓名不详。

警务科长为鄂腾格（又名宋云涛）。下设的警务股长是郭守昌（又名敖日图那斯），司法股长是卜成林（又名卜达林嘎）此人任命后并未到职。

地方科长为孟宪廷。下设的土木股长是何庆瑞（又名贺什格图），财政股长是乔树仁（又名白音诺彦）。

劝业科长为德树元（又名绰克巴图尔）。下设的工商股长是鄂国章（又名额勒格图）。

文教科长为莫九玉（又名莫尔根巴图）。下设的教育股股是何布台（又名何维忠），文化股股长姓名不详。

以上是刚成立兴安东省时人事安排情况，以后陆续有不少变动。

兴安东省的武装，省设保安司令部，各旗署设保安队。

省保安司令为郭兴元（又名绰罗巴图尔），副司令是鄂腾格（又名宋云涛），军法处长金耀渊（又名额尔登）。

省保安司令部下辖三个团，金永福、郭美朗、敖瑞平、锐继武等先后任团长，有五百名士兵。主要任务是保卫地方治安，肃清土匪。

兴安东省的人事安排，明显的特点就是所有大小官吏几乎都是达斡尔族人担任。兴安东省成立当时，只有一名叫中村的参事官是日本人，后来日本官吏不断增加，逐渐控制了省署的实际权力。

1945年祖国东北光复后，在达斡尔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同意和支持下，在原兴安东省的区域范围内（只是把喜扎嘎尔旗划归兴安盟的科右前旗），于1946年冬建立了归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管辖的纳文慕仁盟，盟公署仍设在扎兰屯市，管辖布特哈旗、莫力达瓦旗、阿荣旗、巴彦旗。盟长为额尔登，此人虽系伪官吏出身，但少数民族中很有威望，1947年土地改革运动后，在内蒙古自治区参事室供职，任乌兰浩特市园艺

研究所所长，并被选为自治区的政协委员，1966年故去。纳文慕仁盟的建置撤销后，其辖地的行政划归呼伦贝尔盟管理。

安兴东省文化教育事业状况

当时在兴安东省当权的达斡尔族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在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方面是有一定建树的。他们把原齐齐哈尔蒙旗师范迁到扎兰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师道学校、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各一所，招收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蒙古族的学生。莫力达瓦旗在尼尔基还建一所布西农业学校。布特哈旗在卧牛河建了一所农业学校，在齐齐哈尔乡努图克又建了私立农业学校。各努图克（乡）所在地，都设立了完全小学校。各旗有比较完善的医院，各乡都有卫生所。在伪满时期，从扎兰屯各中等学校毕业的学生，有不少人升入了当时的各大学继续深造，还有留学日本各大学的。其中的多数人都成了有学识的专门人才，有的今天还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为人民做贡献。兴安东省还成立了教育促进会和蒙旗协助会，省长巴金保亲自任会长，专门集资扶助穷苦学生升学深造。当时规定，协助会的资金为每个职工每月缴纳伪币壹元，股长以上的大小官吏一律缴纳薪金的百分之十，此事由会计科的敖明山会计承办，按月扣款，单立帐户，专款专用。滕和台、敖勤学、钦巴图等人都是享用助学金上大学的。后来上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单从公职人员中集资已不足用，他们就在扎兰屯办了成吉思汗饭店、蒙旗合作社各一处，用企业的盈利供学生读书。

达斡尔族有的上层人士，办民族教育上是有过贡献的。如巴金保先生就任省长前，在讷河县城原布特哈住地，把自家的房子腾出一半，供那些从乡下来县城读书的穷苦学生住宿，他和全家人都挤到一间房里居住。又如当过旗长、厅长的额尔登先生，在伪满时期拿出自己积蓄的一千元伪币，在阿荣旗音河努图克

（乡）的旧三站地方，修建了一所一百八十多平方米的六间砖瓦结构的学校，校名为《额赐兴农学院》，每年招收一百多名学生。额尔登等人振兴民族教育的精神，直到今日还在广大达斡尔族地区传为佳话。

兴安东省是人间地狱

日本帝国主义在兴安东省，同伪满洲国各省一样，全面推行了《暂行保甲法》、《治安维持法》、《国税征收法》、《国民勤劳奉公法》、《国兵法》、《满日拓殖条约》等名目繁多的法令，使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家破人亡，濒于绝境。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强占达斡尔族在嫩江平原上的家园土地，他们以《满日拓殖条约》为借口，强制达斡尔族迁往兴安东省的穷山沟里。在强迁过程中，他们欺骗说："迁到兴安东省，要给房子，给牛马，种地不要出荷粮，到那里可以不当国兵，不当劳工"，说什么"留下不去的将被汉族同化、灭种"。达斡尔族人被迫离开了世居的家园故土在荒僻凄凉的深山里落脚后，日伪许诺的好处一个也没有实现，没有耕种的牛马，住进了用桦木或柞木搭起的"马架子"房。在这里日本侵略者照样要出荷粮，抓劳工，逼着身强力壮的青年当国兵，此时，他们真正感到上当受骗，大失所望了。

齐齐哈尔市郊扎布哈屯的达斡尔人被全部强制迁走后，日本便从国内迁来开拓移民，占领了他们的全部土地，开垦了三千多亩稻田，过起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而原扎布哈屯一百二十八口人，迁到布特哈旗哈勒斯台屯后，却贫病交加，死亡很多。到1945年祖国东北光复后重新搬回来的时候，只剩下六十七口人了，几年中死亡率却高达百分之四十七点二。

在兴安东省深山老林里安家落户的达斡尔族人，常年过着食不饱肚、衣不遮体的贫困生活，更为严重的是没有医疗条件，加

之达斡尔人封建迷信，好多人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当时最为流行的急重病是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早晨得病，不等到晚上人就死了， 有的八九口之家就病死六七口， 妇女得这种病的更多，死亡率也高。如齐市郊区雅尔塞屯孟银海一家，1940年迁到兴安东省时全家十六口人，到第二年解放时全家只剩下 三 口 人了。

兴安东省的山林里长着很多参天大树，出没着很多 飞 禽 走兽。达斡尔族人民有传统的打猎、捕兽、伐木、放排等 生 产 技能，但这一切在日本统治时期，都在被禁之列。私到深山边境说你“通匪”，抓去坐牢，砍伐树木说你破坏森林抓去治罪……。这样一来，达斡尔人的生计全被剥夺了，他们一点生活出路都没有了，所以生活在山里的达斡尔人都愤恨的说：“兴安东省真是人间地狱呀！”

伪兴安军第十军管区官兵哗变事件

何 德 志　　卜 林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向我国东北地区挺进，祖国光复指日可待了。

正当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海拉尔方向推进时，日本关东军仍然想做垂死挣扎，准备在大兴安岭要塞地区搞一次困兽之斗。为此，于八月十日，兴安军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陆军中将接到一份电令："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你军管区全部武装撤至大兴安岭防区绰尔河一带待命，接受大兴安岭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当时苏蒙红军已从黑头山、满洲里、喀尔喀河一带逼近海拉尔，苏军飞机不分昼夜盘旋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空，日军军官家属和地方官员开始向南疏散，日军军营、仓库也放火烧掉，大批政治嫌疑犯被日军在北山沟杀害。面对着这严峻的势态，促使兴安军官兵必须立即作出抉择。

伪兴安军第十军管区司令部设在海拉尔，辖有骑兵第五十团、第五十一团、第十炮兵营、第十辎重队、第十通讯队、第十汽车队、第十宪兵团、警卫连等，驻防在索伦旗南屯。司令官郭文林是当地出生的达斡尔族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过伪第九军管区司令。参谋长正珠尔扎布是东蒙地区蒙古族人，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少将衔。团长中有面名是达斡尔族人，军事顾问、副团长和其他军事要职都是日本军官担任。士兵都是从农

牧区入伍的达斡尔、蒙古、鄂温克等民族的青年，当时统称蒙古族。这些士兵多数受过中、小学教育，很有战斗力，但对日本鬼子欺压百姓、痛打士兵则是心怀不满的。

日本顾问把这份电报交给了郭文林的副官鄂兴泰中尉（达斡尔族，莫力达瓦旗腾克乡人），由他转交给郭。日本顾问还捎来了他的旨意，要求翌日晨（即八月十一日）全部开拔南下，限二日内急赴第一、二防区，阻击苏军南下，死守阵地，直到为皇帝陛下玉碎全歼为止。

势态严重，时间紧急，郭马上找正珠尔扎布参谋长密商。他俩一致认为不能把家乡子弟往火坑里送， 不能和苏军、 蒙军交战,蒙军也是同一民族；马上找红军投诚也风险很大,因为部队里有百余名日本军官督促着，士兵也没有精神准备，可行的出路是先表面顺从，然后寻机铲除军中的日本人，再向苏军投城。

整个密商过程，副官鄂兴泰都在场，因此一切内外串联的事都由他承担了起来。

当晚，司令部便转移到部队驻地的索伦旗南屯，郭文林、正珠尔扎布住进旗公署。这两位大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日本人严密监视之下，所以他们非常小心谨慎。他们连夜召集了面以上军官参加的会议，当着日本人的面布署了南下迎战苏军 的 战 斗计划，由各团再分头作紧急动员。与此同时，副官鄂兴泰则暗中悄悄地向面长等传达了伺隙反戈的计划。

第二天凌晨，全体官兵开始向百余里的锡尼河方向转移，两个骑兵团率先， 炮兵团跟进， 运载后勤给养的四五十辆“勒勒车”尾随，司令和参谋长的两辆小汽车走在最后面，队伍拉了十几里的长度。近中午时开进了锡尼河喇嘛庙一带，这里是个三面环丘的洼地，高处只有一所孤庙，里面有二三十喇嘛在念经，草地上的牛、马、羊和驼群也都是庙上的。队伍在这吃了午饭后就又继续前进。

大约走了不到一小时便到达了锡尼河畔。这块地方叫"呼兰稔日嘎那"，即红柳条之意，遍地长满了柳丛。中午的阳光炙人，传来了就地休息的命令。

休息时，日本军官们面向外围坐成一个大圈，似乎有戒备之心。

郭司令趁休息的机会召集了日蒙团级军官会议，布署"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此时，日本人给郭文林司令、正珠尔扎布参谋长发出难题，要求队伍急速南下，不得违背关东军命令。日蒙军官之间发生严重意见分歧，气氛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场地正组织班长以上的蒙族官兵会议，完全用蒙语讲话，在暗中布署兵变的行动计划。日本军官中有许多人疑惑地赶过来，他们听不懂，但看到郭美朗团长表情非常和语调低沉，开始慌恐了，纷纷跑到他们的人堆里嘀咕起来。

各班的士兵接着也得到了通知："准备动真枪实弹，班长往哪开枪，你们就跟着开枪，听到三声枪响就立即投入战斗。"士兵这时仍以为是要和苏军发生接触呢。

日本军官的神态举动已被发觉，不能再听之任之，时间不能再拖延下去，于是指挥部发出了三枪行动信号。机枪声中七八个日本鬼子倒了下去，有一些冲过来和蒙古士兵搏斗，又被打死十多个，士兵也有数人伤亡，其余的鬼子都藉柳丛掩护在死命地顽抗。经过三次集中火力的扫射，柳丛里再没有活着的鬼子了，两个多小时的决斗结束了。

哗变成功了。郭司令派出几名能说俄语的人赶到西庙（又叫会索木）找苏军联络。午后四点左右，三辆载满苏军的汽车开来并停在距兴安军不远的地方，兴安军士兵们在锡尼河畔列队欢迎了走过来接受投诚的苏军代表。

按照郭司令和参谋长的命令，所有弹药都已装箱加封，高处插上了白旗，准备了小红旗迎接苏军，对部下提出了不准逃跑和

接受苏军指挥的要求。兴安军士兵成队列形式涉过右岸交了枪支。整个过程中，纪律严明，秩序井然，苏军代表很有好感，一再对兴安军官兵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表示称赞。

以后，整个投诚队伍又在苏军带领下返到有喇嘛庙的地方，就地宿营了两天一宿。牧民听到兴安军杀了日本人很是高兴，他们每天都按一个排一只牛、两只羊的份量送给官兵肉食给养。

第二天傍晚苏军告知一个消息，说日本关东军要施行报复，规劝兴安军马上转移。郭司令官、正参谋长、鄂兴泰副官被苏军带走了（后来送到赤塔），全体官兵由郭团长带领，来不及筹措行军给养便匆忙起身了。他们在苏军人员引领下向西南走去，经过诺门罕开到中蒙边界的哈尔哈河。涉过河以后，一位苏军少校问郭团长说："战争还没结束，你们愿意到哪去？"郭表示想回王爷庙去听凭那里的蒙古官员安排，为保卫民族地区安全出一份力。苏军少校说哈伦阿尔山一带山沟里仍有日军，回不去，还是先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地带回避一下为好。因此，兴安军官兵继续进入到蒙境内哈莫尔达瓦要塞区。这里没有人烟，举目尽是荒山秃岭，可是在这却有一个很大的兵力掩蔽山洞。洞的四壁全是柳编涂泥并经过粉刷，显得干干净净，里边有兵舍、食堂和厕所，还有运动场和俱乐部。人们被安顿下来，在这里生活了近两个月，入冬时又集体遣返到海拉尔。

同第十军管区的官兵一样，第九军管区官兵以及王爷庙的兴安军官学校王海山、都嘎尔扎布为首的师生，也在同一日期举旗哗变，纷纷向苏军投诚了，无疑这对日寇是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当时各地苏军却不加区分，把他们一律关押到海拉尔、齐齐哈尔、通辽等地的战俘营里，久久没作妥善处理。

这时候，呼伦贝尔自治政府在中共东北局支持下，已于十月在海拉尔建立起来。当得知当地苏由俄押营里投城人员处境后，就派了郭文通先生出面与苏军联系。郭先生是郭文林的胞弟。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伪满兴安军少将，秘密从事供给苏军的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他率领官兵从关内回到通辽，将所辖军队和武器全数交给了正在筹建的东蒙自治军。郭先生于建国后曾任内蒙蒙古历史语文研究所主任，以后又兼任全国达斡尔语文工作委员会主任。郭先生与海拉尔、齐齐哈尔等苏军城防负责人多次周旋，苏方都强调无权释放，事情因此没有进展。十月份，他又趁呼伦贝尔组团去东北局感谢支持建立自治政府的机会，随同额尔钦巴图团长在哈尔滨作了汇报，请求协助与苏军东北驻军司令部交涉。同年冬，郭又陪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旺丹上校走访了苏联驻哈领事，在领事支持下持信去长春会见了苏联驻军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华西列夫斯基请郭立即到各俘虏营调查，协助弄清情况。春节前，兴安军投城人员问题终于解决，所有在押官兵都领到了衣着和路费并被释放出来。

一九四六年一月，兴安军投城人员陆续从各俘虏营释放后，除了一小部分人返回家乡务农外，大多数都参加了东蒙古自治军。在扎兰屯东蒙自治军二旅、齐齐哈尔的五旅、莫力达瓦旗的八旅、王爷庙武警大队（后改为一师）里，参军的这些原兴安军官兵在歼灭光复军的战斗中，在以后的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战斗中，英勇善战，立功入党者大有人在。有些人后来成为了内蒙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达斡尔族的郭东布、王海山、鄂嫩日图、鄂秀峰、阿勇巴图等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物。

伪满时的三次向索伦移民

鄂 秀 峰

伪满时，齐齐哈尔地区部分达斡尔族农民移居索伦的事，我亲历。后因工作关系，解放前去索伦、莫尔根村两次，亲见亲闻了一些情况，这次组织材料前，又走访了不少老人，写成了这份概略情况。然而，由于事情已经年深日久了，记忆的可能还有什么出入，这是应当先说一下的。

（一）

先介绍一下索伦这块地方。

索伦，现称索伦镇，行政上属兴安盟科右前旗。它位于白阿线中段，距始发站白城子二百一十公里，离终点站阿尔山（实际终点站为伊不施）一百五十公里，并距兴安盟公署所在地乌兰浩特市也只有一百二十公里。

索伦，旧中国时原来属于科尔沁右翼后旗公爷府的领地，原本是一个小山村。因为既无特产，交通不便，只有季节性烧炭工和猎民光顾，在修筑白阿线和建立喜扎嘎尔旗以前，只有数十户人家和一二家小铺，一家车马店（来往人员住宿）。日本侵占东北，伪满洲国成立后修筑了白阿线又建立了喜扎嘎尔旗（1932年建旗）以来，成为旗政府所在地，修建了火本站，并相应的修筑白阿线公路等等，交通方便了，而且行政人员多了，因此一个时期

呈现出繁荣景像。虽然如此，祖国解放前，人口只也有五六千（不包括流动人员），商店十数家，手工作坊（油房、磨房、烧锅等）数家而已。

解放初期，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的同时，恢复了喜扎嘎尔旗，政府所在地仍设在索伦街，该旗属于兴安盟，兴安军区教导团也驻防在索伦街。

1947年5月1日内蒙自治政府成立后，撤消了喜扎嘎尔旗的建制，合并到科尔沁右翼前旗。

（二）

日伪时期，为了加强伪满洲国的边防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沿西北部边境地区，建立了喜扎嘎尔旗（蒙语，即边界旗之意），从属兴安东省（后改称兴安东分省或兴东行署）。当时兴安东省的行政长官，除了日本人参事官以外绝大部分都由达斡尔人（当时称达斡尔蒙古族）担任，为此属于兴安东省管辖的喜扎嘎尔旗的旗长也委任达斡尔族人来担当。当时日本人所以这样做、不外是想分而治之，达到其长期统治的目的（不使各民族内部团结）。

喜扎嘎尔旗的第一任旗长叫郭范五，他是齐齐哈尔市龙江县人，达族，此公出身于富裕家庭，识汉字不多，但交游很广，是当地达斡尔族的绅士。他担任旗长后，听从了日本人充实边境地区的指示，开始执行从齐齐哈尔地区把贫苦的达族农民移居索伦地区的计划。

当时的索伦地区，地广人稀，有山有水，土地肥沃，气候虽比齐齐哈尔地区寒冷一些，然而不影响五谷杂粮的收成，另外烧柴方便，还可以搞烧木炭、采木耳、采榛子等副业，更何况同意移民者，当时就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安置费，这些都对贫苦群众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喜扎嘎尔旗第一任旗长鄂范五，从1933年至1937年任职五年，在他任期内，共移民三次，每次约三四十户，共约一百户。移到索伦后分别安置在索伦街、查岗托海、合尔米扎拉嘎、醉仁扎拉嘎、上局子、金银口等处。在每次移民前，旗政府派人去齐市郊区进行宣传登记和发放经费等工作。发给的移民经费的数量，因年久遗忘等原因说法不一，从二十五元到一百五十元不等，但对到达索伦以后的承诺，如给口粮、籽种、耕畜、农具以及给盖房屋等说法是一致的。在移民安置上，当时没有统一规划，而且准备工作不好，经手人员的贪污与口粮供应不及时等，给移来的群众造成很多的困难，为此也出现过在旗长门前静坐事件。前往索的移民，多数乘火车，只是有牲畜车辆者，从旱路走去的。

鄂范五旗长去职后，第二任旗长叫莫献恩（莫尔根巴图），达族知识分子，此人多年混于官场，很有办法，他总结了前段移民工作，根据日本人的意图继续搞下去，由旗开拓科负责计划，在安置方法上搞集中建村、统一盖房，每户给两头役牛、十只羊，每月发口粮（只管当年），发给种籽、农具等，居民点选在索根台（离索伦二十公里）以北，这样易于统一管理、集中办学，而且对保持民族风俗、习惯、语言都有好处。在莫献恩旗长任期内共移民四次，建立的四个自然屯都间隔不远。屯的名称是以移居时的伪满洲国的年号排列的，如：康德五年度（1938年）、康德六年度（1939年）、康德七年度（1940年）、康德八年度（1941年）。把这四个自然屯划为一个行政村，村名叫莫尔根村（莫旗长蒙名的前三个字），村公所设在索根台，它距康德五年度只有三华里。在索根台建立了一所完全小学，使这四个屯的儿童就读，适令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该小学使用伪满康育康印发的统一课本，以汉、蒙、日三种语言授课，从索根台完全小学毕业以后，投考扎兰屯、乌兰浩特国民高等学校以及各类学校。顺便提一下：当时为了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

伪兴安东省的少数民族职员，自发地组织了教育互助会(名称记不清了)，每人每月交纳一定数量的现金(从工资扣除)，做为少数民族学生的教学基金。

建立莫尔根村的四个自然屯的移民约计300多户。生活上比较安定了。

莫就愚旗长于1942年调离，赴齐齐哈尔市的市公署任了参议。

喜扎嘎尔旗第三任旗长(伪满最后一任)叫郭兴元(绰罗巴图尔)他行伍出身，也是达族。在郭兴元旗长任期内，向伊尔施、杜鲁耳移去五十多户(约三百多人)，专为日伪军种植蔬菜。

总括上述，日伪时期，向索伦地区共移去三百多户，约二千多口人，他们都是从齐齐哈尔郊区移去的。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如：气候的差别，掌握不好农时而造成歉收，发放的口粮不及时和不足，尤其难以担负各种苦役。日寇在诺门汗战斗中失利后，加强了工程(碉堡)和道路的建筑。为此到处抓劳工，而当地群众首当其冲，每家每户都出一至二名强劳力去服役，而且无代价的劳动，吃不饱，穿不暖，更使人难以忍受的是打骂凌辱等。鉴于上述情况，解放前，移去索伦的居民中，就有四十多户人家，遗弃所有，拖儿带女逃回原籍齐齐哈尔郊区，被抓劳工后，单独逃回者也不少。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祖国解放了，成立东蒙自治政府后，恢复了喜扎嘎尔旗的建制，归由兴安盟领导，莫尔根村政府仍予保留。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生产自救，参军支前，当地就有一百多名达斡尔族优秀儿女参加了兴安军区的部队，参加各个时期的战斗，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为推翻三座大山，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然而，由于故土难离，怀念家乡，同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从1945年光复以后，大部分移民陆续返回原籍来了，尚留居于索伦地区者仅百分之二十左右。

伪满移民忆旧

卜 林

有清以来的三百多年间，我们人口不多的达斡尔族经历了七次大搬迁。其中清代有南徙嫩水、进驻呼伦贝尔、耕田额苏里、守防呼兰、进驻伊犁等五起；伪满洲国有东布特哈移往西布特哈及齐齐哈尔一带移往布特哈旗、阿荣旗、喜扎嘎尔旗一起；祖国光复后有齐齐哈尔一带搬迁至呼伦贝尔的牙克石一起。伪满洲国达斡尔族移民的范围和规模，仅次于清初的南徙嫩水，那次东布特哈地区几乎是搬光了，移民人口不下万人。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族农村， 也是成屯或是局部的搬迁， 一百个左右的民族部落，剩下的不足四十个，移民人口也有万人左右。

1932年组建伪兴安东分省以后，东布特哈地区达斡尔族农民自发地不断地流入西布特哈的巴彦、莫力达瓦两旗境内；在同一时期内，齐齐哈尔地区部分达斡尔族农民，因官马场招工或投亲靠友，自发地移至布特哈旗境内。

1935年到1943年的八年间，全是伪兴安东分省五个旗政府的移民开拓股派官员募征移民的。官方对移民都付移民费，这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移民的包藏祸心。

1935—1940年间，各旗派到齐齐哈尔地区招移民户的官员，布旗有张振武、比力格、单宝玉，阿旗有吴化民、金寿仁，喜旗有多上杰，另带警察数名。这一段是官办移民的高峰期。就从这时

候起，五个旗境内新建民族部落星罗棋布的出现在各地，如：巴彦旗境内的满都古格浅、讷莫日浅、库热浅、达日宾、拉皮、德都勒等屯，莫力达瓦旗境内新建民族部落有：哈力浅、奎力浅、阿勒格浅、拉力浅、开阔浅等屯。江东各民族部落有的带进原部落名称，也有的和原旗民混居。江东六十几个民族部落几乎是十中有九搬迁至西布特哈的。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新建大小移民部落二十六处，萨马街新建和混居部落十六处，阿木牛乡四处，一共四十六处。阿荣旗以音河乡为中心，在查拉巴奇等乡新建和混居部落共二十二处。喜扎嘎尔旗境内新建移民部落一处，混居蒙古屯共五处。根据资料，德都，讷河，嫩江等三县达斡尔族移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民族部落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动迁屯数六十余；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移民占人口百分之四十左右，民族部落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许多原民族部落从此搬空，诸如瑞廷、舍根、土房子、玛哈台、西热吐、哈拉坑子、索哈台、克木克、奇克尼、哈拉台、哈拉海阿拉尔、嘎查、三家子、三棵树、文固达、双岗子、小哈拉坑、海格、五家子、五家地房子、翟拉台、八旗哈、散达罕等屯。

民族大动迁意味着什么？背离故土不是动迁者本身的意愿，流离失所更不是他们的选择，乃是统治阶级加在达斡尔族人民身上的灾难。

下边仅把伪满洲国时期达斡尔族移民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一、背离故土寸肠断

1977年，我在齐市见到了一位莫力达瓦旗腾克乡的老人，他原籍在讷莫尔河上游米里特毕喇格一带。

他家从黑龙江上游北岸搬迁到讷莫尔河畔定居已有二百九十多个年头了。他住在德都县米里特格尔屯，那是个沃姓组成的民族部落。附近还有德都勒哈拉组成的德都勒和温察尔等几个德姓

民族部落。他们离五大连池很近。五大连池达语叫做"霍林高如"。他的祖父赶上过五大连池的火山爆发。原先的五大连池一带有起伏不平的山丘，满山遍野都是牛马羊。他们虽然耕一些田，但除了人吃马喂外，根本不出卖一粒粮食。想吃野味就进山打猎，狍、兔、野鸡、飞龙、乌鸡、沙半鸡、野猪肉成年不断；想吃鱼到江边打，一打就是几百斤几千斤，鱼干全年不断，后来现吃现打。他谈起往事，真是心驰神往。

从他的童年清光绪末年起，官方颁布了开荒招垦之令，他也听说过清末东三省巡抚程德全之名。从这时起，八旗地改为府县，设管垦务的设治局，开始方丈土地。德部一带土地越开越多，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的活动地盘越来越小。外来民户成分复杂，有棒子手、胡子。这些人拦路抢劫，无恶不作。达斡尔、鄂温克部落自然成为他们抢劫的目标。抢了牛马不算，还严刑拷打，逼交元宝，逼不出来就绑票。有门路的人家，都逃到博尔多（讷河）租房躲避，没有钱的只好挨折腾。有的时候官兵开小差的也进屯抢东西，打粳米骂白面，害得百姓无法生活。原先是夜不闭户，人们走路见了面，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互相装烟礼让，现在是朝不保夕。1935年满都吉浅全屯搬进巴彦旗，接着一个屯又一个屯往江西搬，他们屯也搬进巴彦旗了。这个地方好歹是自己民族的人当官儿，受气也比江东差一些。

米里特格日屯决定搬进巴彦旗了，全屯男女老少，都舍不得老地方啊！一听到集体搬家，都是垂头丧气，心里苦闷。在离开老地方之前，开了祭祖会，杀猪宰羊烧香，人们领着老婆孩子到祖墓那里，挨着排烧纸磕头。惜别痛哭，整整三天。嘴里咕囔着孩儿要离开故土啦，今后不能到您墓旁孝敬了。当年我已经是三十岁左右的汉子了，这些事情记得还清楚。

从沃热老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移民的概况。

二、“航库毛、航库毛”

1937年春，我十五岁。那年，我来到索伦山沟里求学。在我求学的小学校附近有不少来自江省的达斡尔族移民。有一天，突然遇到了同屯（西勒哈屯）的表姐梅衣格。她家是从万祥洪古如（即小黑岗屯）搬来的。从她结婚以后的多少年间，我们还从未见过面。同乡在外地相遇，亲上加亲，本该格外高兴，但我并未见到久别重逢的喜悦，看到的只是表姐面孔上令人莫解的苦闷。我问："搬进索伦山以后生活怎么样？"她回答是“航库毛”，再问答话仍然是“航库毛”。“航库毛”在达语中是别扭和苦闷的意思。问她的苦闷在哪里，她指向她的丈夫。原来搬进山沟里一事，是她丈夫做主办的。经一再追问，她说："住惯江省平地方，我一进山沟里就觉发闷，一个山又一个山隔着，什么也看不着，心里一点不敞亮。我家借人家马棚子住，夜间一醒全鼻子都是骚乎乎的粪便味，多少天不脱衣裳睡觉，虱子，跳蚤咬得全身是疙疸。口粮不够，挖点野菜吃吧，一到野外就见到野鸡脖子似的长虫。狼也挺厉害，刚当小警察的萨登布库，到河边钓鱼叫狼给掏了，就剩下烂衣服和骷髅。这个地方，我一天也不想呆，航库毛，航库毛……"

我又遇到过不少江省移民户，他们刚到喜扎嘎尔旗，就呆在索伦街头，无住房，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极了。

三、蛇肉充饥的何老头

1937年间，索伦街上的达斡尔族移民，全靠喜扎嘎尔旗发的救济粮糊口。一点点霉高粮米填不饱全家人的肚子。一到了夏季，有个叫何爷爷的老头儿，抓来许多的毒蛇。别人一见毒蛇毛发竖立；这位老头儿却抓住蛇头，用细柳条或铁棍串死，用野火烤蛇肉吃，有时连续吃三四条。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孩子们奇怪地

问道："毒蛇有毒，您老人家被毒死了怎么办？"，何老头答的很干脆，"成天吃不饱肚，过够了，早毒死早痛快。"

四、文盲旗长的苦恼

文盲旗长是指是喜扎嘎尔旗旗长鄂范五。他是龙江县长岗子屯人，江南有名的大地主。他在整个达斡尔族中，也可以是手屈一指独一无二的大粮户。这个人在幼年时，他家还不是什么大粮户，没有力量供他上学读书。民国初年，他家兄弟八人中间，有六个兄弟参加过兴业劳动，劳动积累又加剥削，尤其是民国初年方丈土地后，土地税高昂，许多达族农户廉价出卖土地，几年间在他们手中集中了三、四百垧地，开始雇佣劳金，后来几经发展，成为少有的大地主。日本人是以其家庭产业任命他为旗长的。

有一天，鄂范五拄着文明棍一步一步从他北山公馆走进办公室，呼哧呼哧地喘个不息。这位老旗长还未来得消停，什么总务科长内务科长都提交公文叫旗长签字。旗长一字不识，也不知将手戳印在哪里。为此事，总务科长和内务科长都特意用手指出盖章的地方。公文什么内容，他一律不加过问。一个文盲汉子从未接触过衙门公事，他哪知道这套公文公事程序呢？一天，在旗长办公室房前及走廊排列着的十几个移民，请求旗长排忧解难。

在暂短的几十分钟内，就听到移民代表怨声几起。

住在索伦北山麓傅家大车店的十八户人家早已断粮，迫不得已，偷吃住店喂马的豆饼，经常被人家打骂。

住在大土房的十几户移民，房主要收回住房，寒冬来了，移民到哪儿去住？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手指鄂旗长说："你们招收移民的时候，说的帮助建屯帮助安排耕畜口粮种子，我们来到索伦山快两年了，就在街头游荡，缺吃缺穿，成天挨饿，病死的病死，家底全花光了，衙门怎能向百姓说谎话，衙门不下保证的话，我们能轻易地离开江省好地方吗？"鄂范五听了一直用手揉

头，并下令唤来何股长。

管移民的何股长，走进室内规规矩矩地站在鄂旗长面前。鄂范五批评何股长说："移民的事儿你们不管，往我这里推，政府不是给你们拨了救济粮款吗？另外还有一部分救济金，你们是不办事白吃饭的玩艺儿。"把何股长好一顿训斥。何股长感到委屈，向鄂旗长申辩几句，"我姓何的也是江省达斡尔人，我也不忍看老乡们受苦受难，咱们政府答应帮助建屯，现在已经有两年了，这些移民游荡在索伦街头，政府拨那么几个钱，要养六、七十户人家，实在顾不过来，川岛参事官也不愿拨款救济。他们应该有个着落呀！不然，何时是头呀！如此重大事情，我姓何的怎能定得下啊！我准备辞职，不如回江省种几垧地维持生活，我这话决不是给鄂旗长什么难堪，我实在干不来这件事儿了，我见移民兄弟真感到过意不下去。"

不一会儿，鄂范五也来气了，"我他妈的在江省有房有地，够吃够喝，何必到这个穷山沟里受折腾。这个官儿有什么当头，以前和日本参事官商量得好好的，移民搬进来了，他打𢶍说了不算，三天两头找他请示，他不帮助解决问题，移民兄弟们也叫哭连天，这个官我说什么也不当了，我也请求辞职，回江省闲居，如果走咱们一起走。"果然，这位文盲旗长隔不到两个月，就辞职了。

当年冬，伪黑龙江省公署参事官莫尔根巴图尔（汉名莫就愚）当上第二任喜旗旗长，此人是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生，很有才华。他就任期间，将索伦街上的移民户安插在那仁扎拉格、黄金斗、五义沟等五个蒙古族部落，另一部分移民安排在索伦军马场。不久，开辟了移民新屯，起名为莫尔根屯。

五、甩掉江省拣东省，丢了东省还有"索罗子"

1937年—1944年间，我遇见了许多伪满移民官员，上有金耀

洲、鄂范五，下有吴化民、比力格等。我发现山沟里土质薄，上冻早；从长远说不如江省好，为什么要丢掉江省？我又亲见移民重建家业的艰辛，那又何必搬迁？鄂范五的财产在江省长岗子屯，他为什么还主张移民？带着这些问题向他们打听。鄂范五说："咱们人在江省，早晚得倾家荡产；早离开了能有个家业，免得叫汉人同化了。江省这个地方恰如一块肥肉，容易招苍蝇，早晚守不住，不如把东省做为咱们人聚居的地方。"金耀洲也认为守不住江省就得往东省集中。吴化民说的更直截，"咱们人落后。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咱们是弱者。若不早一点离开江省，有些人连老婆孩子都得输光抽光（指赌博又指伪满初吸阿鸦片风气），只好是甩掉江省拣东省"。我又问："过一个时期以后，外来人口又往山沟里汇集，到那时候再往哪里跑?"吴化民又说："放开山沟里田地，还可以进深山密林打猎求生，也就是将来东省这块田地保不住了，丢了东省还有"索罗子"（索罗子指的是山上猎民居住猎棚子）。

六、苦难的岁月

日本帝国主义连年发动战争，天下百姓负担过重，已经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了。我走了多少移民村落，许多亲友，一谈起苦难生活，都咬牙切齿，大骂日本人。有些老人说："过了多少朝代，还没见过象日本人这样折腾百姓的。"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就说你是思想犯，吃一顿白面就说你是经济犯，大年杀猪吃点肉也扣上抗拒'肉出荷'的大帽子。"达斡尔族百姓对日本统治者深恶痛绝，盼望他们早日垮台。

1. 说"出荷粮"

"出荷"是口语中缴纳公粮的意思，伪满在农村普遍实行交粮交畜交油料作物等出荷任务。

开始时移民新开荒地三年不缴出荷粮，也不交出荷牲畜。后

来，不管开荒到不到三年，公开抢粮食，抢牲畜，实行公开掠夺，人们过着半菜半粮的生活。到1943年，移民生活更艰难了，人人吃不饱，个个面黄肌瘦。

2. 说配给

伪满日常生活用品的配给，分平时配给和出荷粮奖励两种。供应品种有肥皂、香皂、火柴、针线、布匹、豆油、毛巾、白糖、白酒等。每年分两次配给（年中和春节前夕），肥皂人均一块左右，火柴人均四盒左右，豆油人均四两左右，布匹人均四尺左右，糖酒在春节供应。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过着衣不遮体的苦日子，而多地的大粮户，另有兴农合作社出荷粮奖励的布、油等。譬如一石粮奖十尺布，一斤油奖二斤白糖或二斤白酒等，超过无出荷户的几倍。据我所见，穿打补钉衣服的十有八九，衣服褴褛不堪的十有三四，穿更生布的一大片，在个别地区全家无衣穿，公公和儿媳换穿一套衣服。有些老头老太太拍着大腿说："这是什么年头呀！日本人把咱们所有的东西都抢回国去了，踩在咱头上叫咱活活地饿死冻死。"

1941——1942年冬，我在第九村亲眼见到了配给情况。向农民配给以前，屯长和牌长以及屯中头面人物，先偷取豆油斤八两的，再兑米汤，一次配给豆油人均二两，先打的油质清亮，最后打的油底混乎乎的。人均发棉布四尺，全家四五口人，勉强做两件短袍。

3. 说抓国兵

每年还要抓少数民族当兵，因为少数民族勇敢而又纯扑。少数民族只要不是独生子或残疾，到了征兵年龄谁也逃不过去。一旦入伍，天天挨打受气。有一年，第二村村长的长子名叫得宝的，他为了不当兵去前线，在铡草时铡断了右手食指，被日本军官发现了，送到牡丹江军法监狱押了好几年，光复时才跑出来。

七、死人沟与“男寡妇”

移民来到扎兰屯沟里后，1935——1945年的十年间，妇婴年年死亡，死亡过多的屯子起名为死人沟，卧牛河屯，第五村、第三村可能都是属于这一范畴的。失去妻子的男跑腿起名为“男寡妇”。

1941年冬，我姐姐住在卧牛河屯。卧牛河马场屯共五六户，全是由敖宝屯搬来的，在当年冬天去卧牛河马场屯串亲时，未见一人死亡。到1942年冬，我亲姐莫格吉和妯娌鄂依芬，全死去了，鄂贵增鄂贵成兄弟领着一男一女的小孩过日子，不久，十一岁的女儿风瑞又突然死去，只剩下三个男性。卜荣荃的妻子延索勒和她的妯娌鄂小惠，也突然死去了，就剩下其老母和兄弟二人。同年，鄂英寿、鄂英海兄弟的妻子又是突然死亡，东院的乔号诺家兄弟三人的妻子全死了。另有姓吴的家妯娌二人也全死了。

1942年冬，去第五村串亲，沃德寿全家十儿口人，老大、老二、老三的老婆全死了，兄弟五人加上老父没有一个照顾家庭的妇女。据说全屯二十六七户，年轻妇女全死光了。光复时，我的堂姐卜桂荣嫁到第五村不到两个月，连女孩一起死了。

其他各移民屯也没有安宁过，只不过是有轻重区别罢了。

譬如我住过的第二村，在几年间死掉的年轻妇女有：我家的翠芬，张来臣兄弟的妻子，旁卡的妻子，奇干德勒布勒和哈热德勒布勒的妻子，那木斯赉的妻子等十几个年轻妇女。

据齐齐哈尔乡努图克公所估计死亡数字约四百。

1945年8月祖国光复了，战败后日本开拓团移民无处藏身，许多年轻日本妇女主动找达斡尔族男跑腿求婚，用他们的话说：“男寡妇解放了”。翌年春，在第二村西头武希林大车店，我们几个懂日语的学生，一会儿被这位拉去当翻译，又一会儿被那位拉

去当翻译，我见此场面，不象是男女之间平等交谈婚事的样子，好象牲畜交易市场。有些庄稼人还想挑长得漂亮的日本女人。而日本人长者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内忧，他们担心日本开拓团进了扎兰屯，要押到苏联。为此日本长者们说劝自己的女儿要有个藏身之处，要女儿立即答应对方的求婚。此后，在这一带每个移民部落，都有“达日”混血儿在。

一场克山病夺去了数百名达斡尔族妇女的生命，这是移民活动中发生的一场大灾难。

这是我对移民旧事的回忆。

第二村教宝会的前前后后

卜　林

这是关于1945年7月中旬达斡尔族有识之士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局更迭的追忆。这次秘密活动的发起人，是伪兴安东分省教育科长何布台先生。此人当时的政治背景如何，笔者尚不十分清楚。光复后，何布台先生在扎兰屯私宅里，保护了许多革命老干部。他最后受冤丧命。三中全会以后，全靠党中央顾委、原山西省委书记张策同志作证，恢复了名誉。

1945年5月9日，是德国法西斯投降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东南亚及中国战场也节节败退，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灭亡就在眼前。如何迎接和应付即将来临的胜利，达斡尔地区应该怎么办？这些课题摆在达斡尔族有识之士的面前。

何布台先生来长春活动

何布台又名何维忠，原龙江县单宝大岗屯人。读完北京蒙藏学校后，去日本留学，在广岛攻读师范大学。民国年间，为达斡尔族最早出国留学生之一。伪满做中学教员，又任伪兴安东省教育科长等职务。

1944年12月和1945年5月，借口公出来长春活动。他联系的对象主要是伪满建国大学同乡学生。

何布台先生下塌在长春宽城子一处旅馆里，他先约我（当时叫

色尔格楞）和毕力格巴图二人而谈。另一次单独约见色尔格楞。何先生以非凡的政治头脑洞察了当时的国际局势。他认为随着德意法西斯的倒台，美苏两大国必将集中兵力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 抵挡不了盟国的进击，失败是无疑的了。 至于何时战败就取决于苏联红军了。何先生看出苏联正从西欧战场上拔腿，开始往远东调兵，一旦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到截止日期，苏联不会延长这个条约。当年八月九日是条约的截止日期苏联会动手的。在苏联一百万机械化部队面前，在东北不足四十万的关东军，是不堪一击的。

我们该怎么办？准备迎接苏联红军的到来，外蒙军队也很可能打进来。伪兴安军蒙族弟兄要在战场打空枪应付日本上司，待时机成熟主动投降苏蒙军。这件事必须暗中串通军官，决不准声张在外。他又说，苏联对少数民族好，他们不搞民族压迫。苏联赤色活动并不可怕。 当然， 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不少的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控制下，将来的不幸能否又临到知识分子头上，只能到时候再说。我们要吸取九·一八事变教训，需要武装保卫家乡，保卫达斡尔地区，利用兴安军森林讨伐队的武装，迅速武装人民；防备土匪抢劫的同时，又须防备民族矛盾的激化。九·一八事变时，有些人搞投机，出卖灵魂，把地方上的大权独揽在手。现在我们迎接苏军，要给达斡尔人多着想。这件事并非小可，敌人特务机关虽然趋于瘫痪状态， 然而， 临近死亡的敌人猖獗百倍。千万不可疏忽大意。他又吩咐，眼看到放暑假了，回家途中路过王爷庙和军校教官鄂鸣中、鄂秀峰私下沟通一下，在第二村以搞敖宝会名义，召集知己秘密讨论一下。同时，多和国内大学生接触，交流情报。

以上是何先生和我交谈的谈话纪要。

按何先生指示去王爷庙活动

1945年7月初，我便接受何布台的使命，到王爷庙兴安军官学校跟达斡尔族军官联系。

到王爷庙和谁接触对话？何先生曾点出情投意合的知己鄂鸣中、鄂秀峰二人。鄂鸣中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龙江县敖宝屯人，是何布台同乡亲友，任兴安军官学校军事课少校教官，又是我的亲表兄弟。鄂秀峰，兴安军官学校毕业，此人学业成绩优异，曾留校任军事学科教官，后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又重任军校上尉教官。此人大义凛然，有远见卓识，原籍齐齐哈尔市郊的西哈雅屯。

我就住进鄂鸣中家。鄂家大四合院，周围大院墙，离王爷庙不远。邻居有王爷庙教导团少校军官敖文俊，他原是黑龙江省泰来县英老坟屯人。另一家人是兴安军官学校上尉教官沃文治，此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原龙江县前虎尔虎拉屯人，又是我的姐夫。看来此处很太平，警察特务不敢进院挑衅。

王爷庙达族军官最有名的人物，是王爷庙兴安军官学校老师之师上校教官郭东布。他蒙名莫德尔吐，一提起他，蒙古、达斡尔军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留学日本，资格老，能说善讲，富有民族感情，在日本人面前不低三下四，日本下级军官稍有不礼貌，他敢当场训斥日本人，利用他的虎劲儿拢络军校师生的心。郭先生可能过多地得罪了日本人，据说是调到海拉尔一带任团长去了。另有教导团上校团长金永福，原甘南县梅里斯屯人，军校上尉教官王海山，原龙江县莽格吐屯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关东军敢死队上尉连长鄂嫩日图，原龙江县前水哈拉屯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教导团上尉军官多文秀，原龙江县扎布哈屯人，还有几名不相识的达族军官。

在静静的夜晚，和鄂鸣中私下交谈开始了。鄂鸣中听了何先

生的主张赞不绝口，他的态度坚决而又主动。他透露，在额尔古纳河畔的黑山头边防站工作时，隔江相望苏联的城镇与村落，他对苏联社会制度表示羡慕，认为苏联人民生活得有朝气。问他是否苏联军事地下情报人员，他守口如瓶。光复后，他获得扎兰屯苏军司令部的工作通行证，可以任意出出进进。一提到他的蒙名阿拉坦素格，苏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全晓得。关于当时的工作，鄂鸣中私下说："此事非同小可，要小心翼翼，谨慎加谨慎。鄂秀峰这个人非常可靠，通过他再做其他达族军官的工作，到时候他也可以做蒙族军官的工作。应请鄂秀峰到家来，暗中透透气。"还说："鄂荣斌当上了敢死队连长，直接受关东军的指挥，领日本军衔，待遇也高，虽然是知心的亲友，我却不敢接近他。不过，我相信他不会见利而变节，出卖民族灵魂。"

翌日晚，鄂鸣中下班归来，他告诉我说："鄂秀峰今晚要来，同时领来几位军校本科学生。这些人是有满腔热血关心民族存亡的年轻人。这些学生都忠于鄂秀峰，是他的得力之徒，叫他们听一听增长知识，他们听了不会泄密。"

当晚，鄂秀峰果然领来了敖和忠、敖国瑞、莫尔根巴图尔、单义祥、徐兰亭等学生。我头一次经历此事，如何完成这个使命，我心中很有没底。尤其是在年龄比自己大、资历比自己深、经验比自己富的长者面前，显得拘束，不知如何是好。

鄂鸣中向我提议，"我和鄂秀峰下围棋，如果宪兵队特务闯进屋，有个遮掩的玩艺儿，你和学生们聊一聊。"这些学生中间，只有徐兰亭一人是老相识。此人温柔可亲，原是全和台屯小学沃文德先生的门徒，我对他还有一些了解。会上谈及九·一八事变，大家都认为那时因无精神准备，使达斡尔地区被土匪洗劫一空，造成很大损失。谈话自然转到即将到来的时局变革，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了。他们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在民族存亡关头大义凛然，不怕牺牲。鄂鸣中、鄂秀峰都表示争取参加第

二村敖宝会的秘密集会。可是，鄂秀峰是军校毕业班的队长，毕业班学生不放暑假，届时能否与会不敢下保证。他透露消息说：“军校蒙达族军官内部已经通了气，一旦形势巨变，决不允许自相残杀（指对外蒙），不得已情况下，枪口冲天。”只有鄂鸣中把与会一事定了下来。赴王爷庙执行使命一事，出意料之外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王爷庙是兴安总省和兴安南分省省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共反苏的战略要地，又是日本特务机关指挥中心，特务网络密布。但现在所有现役、准备役年龄的日本人全被征入伍，王爷庙街头上几乎是见不到几个日本人了。又有许多预感不妙的日本人，以归国探亲为由，偷偷地溜掉了。日本特务机关最大的特务头子、化名“灭德尔”的也早已不见了。孤零零地十几个日本宪兵守着大门，昔日的愿当亡国奴出卖民族灵魂被金钱收买的汉蒙便衣特务以及警察等，不象往常那样为日本鬼子卖命了，他们正在等待着自己的最后灭亡。

何先生的精心安排

我在执行使命后返回扎兰屯到何公寓汇报。何先生听了很高兴。何先生对我说：“我把第二村敖宝会都布置好了，委托吴泽民、吴化民去组织，定到七月十七号，民政厅长金耀洲、旗长志达图全知道此事，他们一再嘱咐要防备特务，省旗主要官员不准参加，以防宪兵队特务机关加害。可以组织扎兰屯民族干部及其家属与会。”还说：“我秘密地告诉了吴泽民。吴化民这个人心里藏不住话乱放炮，我没有告诉他底细，他不知道内幕。”他又对我说：“这是个全民族大事，不能落掉布特哈地区的达族兄弟，斗兴阿来扎开会了，我和他透露了，他很高兴，他也去参加会议。敖国海也是好样子的，来不及通知了，叫斗兴阿回去暗中串连。私下串连的范围不能任意扩大，就鄂鸣中、斗兴阿、姚风

贤、吴泽民、包德华、鄂廷顺和你，或是再扩大几个大学生。吃完了敖宝会手把肉后，由吴泽民暗中召集在一个地方，私下通通气就可以了。凡是当警察宪兵的人，一律不请不让。他们图日本的赏钱也许会干出出卖民族同胞的事来，这一点务请注意。小心总比鲁莽好，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第二村敖宝盛会

1945年7月17日，在第二村北山屯西侧的高岗上，敖宝堆上插着白色祭旗，在斗兴阿、吴泽民、吴化民主持下，齐齐哈尔乡各村看热闹的群众和扎兰屯来的观众不下千人。敖宝祭祀毕，几个大锅灶在野外冒着浓烟，煮牛羊猪肉的香气散发在祭祀场地，等待肉熟还需二、三小时，此间，人们以“那达慕”取乐，有摔跤的，有拉胡琴说唱的，也有田径比赛的，在北山上密集的人山人海，真是个开心的日子。

不久，吴泽民通知我到胡努图克达家（当时鄂鸣中买下）东屋喝茶，人们心里都明白了。走进东屋，鄂鸣中、斗兴阿、包德华、姚凤贤、吴泽民等，一边喝茶一边闲谈，旧友重逢，谈笑风生，很自然地唠起民族喜怒苦乐的往事，一提起九·一八事变，回想起兵荒马乱时期遭土匪洗劫的窘境，大家都咬牙切齿。眼看日伪摇摇欲坠之际，大家也敢说话了，都认为日本垮台近在眼前，苏联出兵势必结束日伪十四年的万恶统治，地区组织武装联防是对付混乱时局的唯一上策。大家意见一致，会议未敢展开讨论就结束了。

光复后，正因为有第二村秘密会议的准备，1945年8月末，在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第二村，由何布台、鄂鸣中、包德华、吴泽民、吴化民等发起征枪征马运动。从扎兰屯森林警察大队搜集到几十支步枪和几十匹战马，马上组织了齐齐哈尔乡民族自卫队，包德华任队长，阿荣旗章塔尔屯姚凤贤也组织起民族自卫大

队，这很快得到甘南王明贵的支持。之后莫旗阿尔拉乡阿木尔扎布等也组织了民族大队，敖匡海、斗兴阿也开始协助组建大队的工作。齐齐哈尔一带鄂秀峰组织的民族大队，有兴安军校学生当骨干，形成强大的武装力量。一瞬间基本上形成了联防网络。达斡尔地区农村安然无事的度过了荒乱之年。

金耀洲与达斡尔族移民

卜　林

1941年春，我家为了几百元的移民费，也搬迁到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第二村，有许许多多的机会接触这一带的移民。我在1937年在索伦山所见到的移民，有如生活在地狱之中。而在扎兰屯这一带的移民部落，还有生活相当不错的农户，据说这和金旗长有关。

1941年冬，学校放寒假归来。一天中午，我感到非常疲倦，铺下行李就睡大觉。正在这个时候，我家借住的房主二胖表叔进屋报信，说是明天金旗长下屯视察移民过冬准备情况；有个叫哈索(汉名张振武)的打先阵，已经来到第二村做安排了。要求室内外要打扫干净，劳动力要准备越冬的木柴，要积肥，不准游手好闲等等。就在此刻，有一位素不相识的高大男子汉走进我家。这个人手持大藤鞭在“额格埋列”(他妈的)骂声中往我身上打了两鞭子，边打还边说：“白天不干活，睡大觉！”，我打开被子伸出脑袋。这个人发呆了，亲友们介绍说：“这是卜嘉如家少爷，是大学生，刚放假回来。”未等我开口，卜永丰弟弟气忿忿的，教训着“哈索”：“你打骂百姓眼红了吧！不管男女老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哈索一看势头不妙，一下子溜掉了。他走了以后，我心里在想，哈索打人实在不可取，挨家挨户检查卫生，又管束懒汉，这还可取。

金旗长叫金耀洲，是龙江县梅里斯屯人，民国时期由省立师范毕业，当过一段蒙旗师范的训务主任，1933年被伪兴安东分省任为布特哈旗旗长。由一个小书生一跃当上了县太爷，以后又当了伪兴安东省民政厅长。金耀洲虽然职位较高，但他出身农村，对百姓实际生活有所了解，也有点民族感情，确实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下面从五个方面介绍一下。

一、奖勤罚懒，勉励移民要过个象样的日子。

1941年冬季，金旗长来到了第二村，家家户户把屋内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赌棍和游手好闲的男子，都躲到第二村北山的恩海屯或是黑油棒子屯了。金旗长率领旗开拓股的吴泽民和哈索等，歇息在屯中的老关家。屯长、牌长走街串巷地通知着，开"西登"（公众集合点）会了，开"西登会了"，要求每户去一个户主。在努图克公所大办公室集合了四五十人。金旗长除了布置春耕生产外，重点教训了一个不孝敬父母，成天赌博，不务正业的人。金旗长叫道："父养子成人，儿不孝敬，反而打父亲，老天爷不会答应的。听着，你已经三十多岁了，一个男子汉，成天打牌不干活儿，简直不是东西，没有出息的玩艺儿！到现在说不到老婆，你想混到什么时候？你说！"这个人嗑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金旗长一声令下："教训教训他，给我打十个屁股板。你们屯还有六七个成天不干活儿该打屁股的，你们不改，将来一个个轮到你们身上"。打完后又说："今天拿你也是给别人看的，汉人有个谚语，杀鸡给猴看。我们扔掉江省好地方，在这个穷山沟里求生活，成天不干活儿，老天爷能给你下金子吗？还得靠双手干活！"那人被打服了，一边表示懊悔，一边向这位旗长磕头道谢。在场的老头老太太们对金旗长办的这件事赞不绝口。

1942年夏，金旗长领着必力格视察靠山河、九村、后尖山子等三屯，一路上专打听哪些人耍恶霸欺百姓，哪些人好逸恶劳不

干活儿。必力格当时任齐齐哈尔乡农业技术指导员，对各屯的情况非常熟悉，是金旗长的耳目。到哪个屯表扬谁惩罚谁，全靠必力格提供材料。

[illegible]后尖山子屯有个地痞，这个人成天不干活儿，以赌博为业，手脚不老实。他偷光全屯的小鸡，还结伙到大河湾乡汉族村庄偷小鸡，还经常偷开磨坊人家的白面，屯里人敢怒不敢言。

金旗长住在郭安惠家。屯长孟友兰，还有受气的七八户人家，到金旗长住处告了那个地痞。

金旗长听了之后很生气。他认为这样的人是瘟神，不狠狠治服还会污染别人，这个邪气不压，许多老实移民就抬不起头来。

日落西山后，他就在孟友兰屯长门前开了“西登”会。在“西登”会上，揪出那个地痞，金旗长指名道姓地斥责了他。金旗长气得脸发白，说：“你耍钱扎大烟，偷人家东西，不但偷达族的，还偷汉族的，真给达斡尔人丢脸。你三百六十天不干活儿，拍打屁股到处逛，老婆孩子没饭吃没衣裳穿，替你遭罪，你算什么东西！必力格你治一治他！”必力格一气之下，狠狠地把那个人抽了一顿鞭子。

会后群众反映，这个人除了金旗长之外，谁也不敢惹他，这个人真祸害屯子，多治他几回才好。

到了第九村，金旗长又听到有人告发懒汉。此人原是龙江县敖宝屯人，小时候给吴化民家放过牛，后来好逸恶劳，放赌抽红，欺压百姓，是有名的二溜子。必力格在“西登”大会上，用鞭子毫无留情地教训了他一通。

金旗长惩罚屯溜子的同时，上边拨了贷款或救济款，他就用它专门照顾会过日子能吃苦的贫困户。

二、不误农时地深入农村，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1935—1936年间，早期移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

村的移民户反映说：金旗长每逢春播夏锄秋收季节，都要下屯看一看。当时当旗长的也没有马骑，一般乘坐屯民的大轱辘车去视察。一听说金旗长下屯视察，二溜子、赌棍等就溜掉了。

刚一到山沟里，许多移民一贫如洗，没有耕畜，也没有种子，更没有房子住，可困难坏了。金旗长领着吴泽民、吴化民、哈索（汉名张振武）不断地下屯，用贷款方式帮助他们解决耕畜和种子，度过了难关。

移民没有房住没有钱花，大家都挤到有住房的人家。许多移民想盖房子，官方禁止进山砍材，从庙山、乌古气直到毛底店的交通要道，都设了森林警察卡子，一被发现就要坐牢。森林资源归伪满森林总署管，一个旗长无权发放采伐证，甚至于旗日本参事官都没有这个权。怎么办？只好找森林警察。森林警察队除了几名日本人外，全是达斡尔、鄂温克人，求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关照点。这条路终于走通了，接着就组织移民进山砍材。有了木料，不但盖了房子，还组织各屯木匠打了些大轱辘车。1937年秋，呼伦贝尔草原的甘珠尔庙会上，出售了五百多辆，西蒙乌珠穆尔沁一带，抢着买大轱辘车，这车起名为“达呼尔车”，在沼泽地趟泥水轱辘大不易陷车。这一下子打了炮，卖了车换回牛马将近二百，解决了移民们的耕畜问题。

每逢春播、夏锄时节，金旗长都深入各屯检查苗情，秋收时节检查收成。一旦谁家没侍候好庄稼，都要追究责任。譬如，1942年初夏，金旗长到靠山河屯，由屯长马罗和指导员必利格引路，从北山坡到南山坡，共检查了二十户人家的苗情。当年禾苗苗壮十分喜人，唯独姓孟的一家草苗齐长。金旗长为此事找到孟家，开门见山地批评说：“你又到外屯耶给耶给耶（指帮助萨满跳神）去了吧？喝那么几盅酒，吃那么几块肉，耽误了农时。你饱了肚，家里老婆孩子将来没口粮吃咋办？你真不应该，下次再

发现此事，别说我姓金的不留情”。

金旗长每到一屯都挨家挨户地串门。移民们生活虽然很穷，无论马架子厢房，还是朝阳的正房，一走进院内不见一个草棍，一走进屋内白土粉刷的墙雪白，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三、提倡科学耕田，培养农业技术人才。

1940年，在金旗长指示下，把第二村定为科学耕田试验村，专门派日本技术员藤井指导生产，通过兴农合作社定购外地的良种。日本技术员离去后，又派学农业的必力格当技术员。后来，虽然科学耕田成就不够明显，金旗长的出发点还是可取的。

金旗长抱有科学耕田的想法，这也和他多半辈子利用业余时间参加种植果木劳动有关。他经常早晨下地参加果木园劳动，会接枝，会打杈，会用肥料。他提倡达斡尔农村也要科学耕田。1938年，在卧牛河牧场办起了农业学校，必力格、单宝玉、沃铁海等都是从那座学校毕业的。后来官学停办了，金耀洲拿出自家果木园和农场的牧入，于1943年在音河西畔的旧三站附近又办起了私立农业学校。这所学校学制二年，请鄂廷顺、安文禄、安延昌等授课，给齐齐哈尔乡移民子弟传授农业科学技术。

四、兴办民族教育。

齐齐哈尔乡，大小移民自然屯二十五六个，移民人口三千七百多，百分之百是文盲，来往信件要到数里外请人帮忙。在金旗长关怀下，从第一村到第六村都设了民族小学，适令儿童入学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也有年过二十几岁的妇女入初小一年级学习。在第二村还办起完全小学，当时叫做国民优级学校。一到高小阶段，各屯将高小生都送到第二村小学校读书。第二村小学成为唯一的重点小学，包德华任校长。金旗长为了提高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特意由安达县请来师范毕业生朱敬贤、冷贤芝，另外请

朱宝孚代课。从此以后这所学校升入中学的每年都是百分之百。在这座学校毕业生中有呼盟盟长卓日格图、呼盟军区副政委布仁、北京空军总医院科主任（经常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并有著作）、著名医学家那顺等。第二村小学没有学生宿舍，一时也盖不起来，严重影响外屯学生的入学。有一次金旗长来第二村视察，第二村头头脑脑向旗长说些办学难处，金旗长听了以后出了个主意："外地进山偷运山木的不是挺多吗？你们组织人设卡子，没收的木材归学校盖宿舍，人工木工由各屯平摊，旗里拨几百元钱买合页、玻璃，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第二村小学的学生宿舍就这样很快地盖起来了，外屯高小生有了住宿条件学校也就越办越好了。

五、金旗长任职期间移民生活一瞥

我曾走遍了齐齐哈尔乡二十几个大小移民村落。看到原江省赤贫户搬到山沟里后，都有了房子，都有一两头牲畜和几垧土地。他们远比在江省时期富足得多。我又到贫困家庭了解了一番。凡是当日子过的辛勤家庭，在仓房里都存着成袋的榛子和蘑菇，有成包的木耳，满院堆满了劈材。还有个别人家开了粉房磨坊。在靠山河屯，我看到原八旗哈屯雇农克殷·善、卜古勒·米寿、敖拉·吉山等七八户移民，他们在江省时，常给八旗哈屯张家大院扛活，家中一无所有，到靠山河屯后，都有了一间小房和四五头牛，每家都有一辆车，两三垧耕地。多数移民都说到金旗长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抓的很紧，使许多户得以兴家立业。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移民们连口粮都被蛮横征去，生活下降到饥寒交迫边缘，金旗长为了尽可能照看好移民，就常私下嘱咐达族的伪警察下乡征"出荷粮"时别认真，要想法糊弄鬼子，让移民有口粮吃。

1942年金出任伪兴安东省民政厅长，从那以后他就没有再能

过问移民的事。也是从那以后，移民的生产生活每况愈下，食不饱腹衣不遮体，妇婴受克山病摧残大量死去。金在后来回忆这些事时流着泪说过：“我本来是要为在江省的无地无房的本族百姓生活好，叫他们搬到这，想不到后来出现这种惨状，使我心里总是不安和有愧。”

我在1947年同群众工作队到第二村、靠山河、第七村蹲点，移民户一提起金旗长，连过去挨过他惩罚的在内，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那年冬土改运动开始后，盟委书记夏辅仁早早就把金耀洲送到乌兰浩特保护起来，齐齐哈尔乡谁也没有点名揪斗他。在解放后，金还在嫩江省人民政府出任了蒙政厅长，后来又担任了纳文慕仁盟盟长。金耀洲于1975年因病在齐市第一医院去世。

蒙古三家子惨遭洗劫

乌力斯·卫戎

日本帝国主义在它宣布投降溃逃之际，一股溃逃的日军把嫩江边的蒙古三家子洗劫一空，全屯的达斡尔族和汉族人民，惨遭无辜杀害。

在富拉尔基南约八十里的嫩江右岸紧靠雅鲁河西有一处水草丰盛、渔猎方便、能耕能牧的好地方，叫蒙古三家子屯。民国初年，单吉力布、白皮金保、吴哈热三户达斡尔族人在这里定居下来。该地历来属龙江县管辖，但是属于内蒙古区域，所以把这三户达斡尔人组成屯落叫成蒙古三家子。到了伪满时期，蒙古三家子已发展成有巴布库、吴金海、布古吉、普钦、五金、吴哈热、吉力布、普兰、巴腾布库、萨坎、滔勒德、化斯格、吴福、春福、龙库、莫勒朝、金国财十七户达斡尔族和陶永富、阎福、陈小德、张老二和于、王等六户汉族，全屯已经有二十三户八十七口人了。

1945年旧历八月初的一天，有五个溃逃的日本鬼子拿着两条“九九”式枪来到村里，他们在陈小德家吃完饭后，想把两条步枪和三百发子弹卖掉，要两千元伪国币。为了保卫村屯的安全，由陈小德、张老二出面买下这两条枪。但日本人诡计多端，说先把枪留下，子弹待把他们送过江再给，于是就派吴金海、刘老疙瘩用木船相送。在送日本鬼子过江的途中，蒙古三家子的人也留了一个心眼儿。那年的八月，秋水很大，嫩江出槽，一片汪洋，

船到喇嘛湾，他们就停止摆渡，让日本鬼子下船，并告诉下船的鬼子再向前走十多里旱路就到江桥车站了。其实不然，这喇嘛湾四面环水，方圆四十里都是沼泽地，无处可走。不了解地理环境的日本鬼子还不知道上当就走了，但是他们的三百发子弹还没交出来。正在这个时候，后地房子的侯老疙瘩、张老二、陈小德三个人又乘小木船随后赶来，一听说日本鬼子不给子弹，他们就火了，侯老疙瘩把从青岗屯得来的"三八"枪子弹装在"九九"式枪里向五个日本鬼子射击。鬼子一听枪响便拚命逃跑，其中有一个中弹身亡，还有受伤的，只有两个鬼子泅水逃命去了。他们终于把三百发子弹得了回来。

事隔十多天，从王爷庙溃退下来三百多全副武装的日军，逃命的鬼子就带领着到蒙古三家子进行报复。在旧历八月十九日的下午，他们把四挺机枪架在屯子的四周，用枪逼着全屯八十多口人都集中在莫勒朝的院子里。一个留着小胡子的日本官大声吵着要把杀死日军的人交出来，不然就把全屯人统统杀死。面对日本鬼子的刀枪威胁人们一口咬定是后屯人干的，不知道谁杀的。他们明知道汉人侯老疙瘩杀了鬼子，就是不说出来，明知道这会带来全屯人被杀戮的灾难，但是他们不向鬼子乞怜，达汉人民团结对敌，谱写了一曲生死与共的战歌。日本鬼子找不到杀人者，气得暴跳如雷，最后以杀死全屯人进行了报复。敌人采用三个鬼子杀一个中国人的办法，先是两个人把被害者架起来，带到各空房里，然后一律用刺刀捅死。天黑下来时，他们不再往外架人了，一群鬼子就在莫勒朝屋里就地用刺刀乱捅这剩下的七八个人。魔鬼们看到人们都没动静了才扬长而去。蒙古三家子无辜的八十多位中国百姓就这样在祖国已经光复之后竟又惨遭了日军杀害。这些死难者的尸骨，先后由被害者的亲属和附近村落的人们收殓安葬了。被害人中，只有金国财、陶永富和他的内弟、妻妹活了下来。金国财是达斡尔族人，全家七口人，爷爷、叔叔、婶婶、弟弟、媳妇、两岁婴儿都

在这场浩劫中惨遭杀害。四名幸存者在黑夜中没被刺中要害，第二天黎明被追歼日军的苏联红军发现，得到了苏联军医的及时抢救治疗。

仓慌逃窜的日本鬼子在血洗蒙古三家子的当天夜里，威逼江边渔亮子的两条木船，整整摆渡了一宿，这三百多人才渡过江对岸。但是善恶到头终有报， 杀人者要偿命， 血债要用血来还，日本帝国主义者前边逃命，苏联红军随后追击，这群魔鬼没有逃多远，就在江桥、昂昂溪一带全部被歼灭了。

金国财好了伤疤不忘救命人，他为了感谢伟大的苏联红军救命之恩，在一九五〇年 “八一五” 东北光复五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通过黑龙江省报社写信给斯大林倾诉了对活命之恩的感激之情，还按达斡尔族人的礼节送上了亲手栽种的十板蔗烟。金国财现在龙江县华民乡莫平村居住，他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他早已另娶妻室，有了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孙男弟女共八口人，全家生活得幸福美满。

每当人们和这位虎口余生的人谈起这件事时，他总是眼含热泪无限激动地说：“是苏联红军救了我一条命，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嫩江省蒙政厅工作的回忆

郭英海

（一）

我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法学部政治经济学科毕业，于一九四三年秋回国，回国后在日本人把持的伪满洲国协和会扎赉特旗分会（在音得尔）谋职。因看不惯该分会青年部部长（日本人）的贪污行为，不自量力地跑到王爷庙协和会兴安省本部告状。结果是受到了该本部主管日本人的训斥，并立即被调离到扎兰屯协和会分会上班。有理的反而挨整，我尝到了当亡国奴的苦头，也认清了日本人所标榜的“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为了蒙古人的振兴”等等、等等纯系谎言。我的幻想破灭了，因此没去报到上班，称病在家休息起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苏联对日宣战。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日本在东北十四年的统治，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解放。

八月十六日，苏军进入齐齐哈尔市。据原东北抗联将领王明贵同志的回忆：他受周保中、李兆麟二同志的指示，和张瑞麟等十七人从长春乘火车，于八月二十日来到齐齐哈尔市，受到了苏联红军的迎接。后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嫩江省政府和嫩江省军尔区，王明贵同志任司令员。

据我回忆，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齐齐哈市召开了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省参议会。乌尔吉朗、沃尔根和我

三个人以蒙古族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该会，从而也使我荣幸地认识了刘锡伍、于毅夫、王盛荣、王光伟、马识途、张瑞林、王明贵、朱光、厉男等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他们都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官架子，和日本人以及伪满官吏大不相同。他们给讲的句句在理，尤其是讲到了共产党对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一律平等、优先照顾和发展等等，使我深受感动。在这次会议上，形成决议并组建了嫩江省政府，省会定在齐市，于毅夫任省主席，马识途任秘书长，张瑞麟任财政厅长，厉男任公安处长，其他人员现在想不起来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决议要组建齐齐哈尔市以及下属各县、区的行政机构和公安大队、公安队等武装。在这次会议上，乌尔吉朗、沃尔根二人提出议案，要求成立蒙政厅，管理省区划内的蒙古人的事务。这一提案很受重视，表示研究后答复。会后，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兼齐市城防司令部政委王盛荣同志邀我谈话，除了了解我出身、成份、年令、民族等等以外，还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对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不同之处讲的很多；也讲了武装起来的必要性，而且把蒙古人善骑射，有光荣的传统等等说了不少，最后希望我们能组织建立蒙古骑兵来保卫家乡。后来我就把鄂秀峰同志介绍给了王盛荣同志，不久就建立了齐齐哈尔地区蒙古自卫大队（以后扩编为蒙古自卫军五旅）。

（二）

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于毅夫主席召见了乌尔吉朗、沃尔根和我，通知同意建立蒙政厅，要我们三人提个机构设置以及人选名单。这次于主席又详细讲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不歧视、不压迫，遵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学，帮助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帮助发展生产，必要时优先照顾等等。对蒙政厅的职责范围以及如何开展工作等也都作了明确指示。他要我们：首先恢复省区划内的蒙古旗政权的工作，旗长可由蒙政厅推荐，然后由省

主席任命；其次要搞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第三是组织起来反霸反土匪，动员参军，等等。接见后，乌、沃二人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政策好，得人心，只是不正统，不正规，武器装备太老，远不如国民党，何况还有美国的帮助，于主席他们恐怕站不住脚。对自己的政权表露了担心的心情。

建 立 蒙 政 厅

经过短时间酝酿、协商，经省政府批准，蒙政厅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组建设完毕，地址在省政府西侧约五百米处一所四合院的平房内。厅内设了五个科室，人员情况如下：

蒙政厅厅长：乌尔吉朗（吴蔚帮）

秘书室主任：沃尔根（沃振东）

工 作 人 员：鄂景福、何福全等

计划研究室主任：福色黎

工 作 人 员：陶洁心、鄂静娴、鄂静海等人

总务科科长：鄂英海

工 作 人 员：乌力吉、吴文福、陶金录等人

行政科科长：阿木古郎（杨士贤）

工 作 人 员：单宝玉、陶文兴、德光启等人

文教科科长：沃文德

工 作 人 员：阿金、杨士义、胡和、莫英瑞等人

自卫科科长：鄂秀峰

工 作 人 员：敖和忠、莫尔根巴图等人

自卫科实际上是虚设，无人上班，因为该科人员组织了武装部队并在各处参加剿匪斗争。

蒙政厅组建后，要求参加工作的人员很多，根据省政府的意见，尽量吸收。因此撤出齐市前，人员达到八十多名。

在待遇上实行供给制，分厅、科、工作人员三个级别，按实

物折价的补贴标准，每月发给红军票（货币）。

建立蒙政厅后的工作概况

据我回忆，工作可分成从建厅至撤出齐市、撤出齐市以后工作、齐市再度解放以后等三个阶段。各阶段的工作，下面再做些梗概介绍。

第一阶段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翌年一月初）

1. 按省政府指示，恢复了依克明安旗、杜尔伯特旗的行政机构，任命了旗长。

2. 根据当地蒙古人（达斡尔族人）的迫切愿望，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向省政府提出了龙江县改称纳文旗和选蒙古人为旗长的建议。我厅这一建议，很受重视，而且基本上同意了建旗的主张。为了慎重，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要我厅派人再深入了解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群众的意见。后来由于国民党即将进驻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已着手准备撤退，依照于主席指示而暂缓办理。

3. 被苏联红军俘虏的伪满兴安军（蒙古部队）从乌兰浩特运到齐市关押。蒙政厅了解后，由我去找王盛荣同志，希望他帮助做苏军的工作，争取早日释放。王政委答应要办的同时要我准备接收安置，并做好动员他们参军的工作。为此蒙政厅组织了接待组，有何福全、胡和、陶文兴等同志参加。任务是：（1）随时收容伪兴安军中的游散人员，其中大多数是从俘虏营逃出来的，（2）动员他们参军或遣返回乡。路途遥远，暂不能回乡的，动员其到郊区、到农村生产生活。（3）因伤病而被陆陆续续释放出来的人员，送到齐市北关德盛车店养伤治病，由蒙政厅向上申请批准拨给主食。伤病员康复后，或动员他们参军或遣返回乡。德盛店店主李隆德是达族人，是位很有正义感和民族感情的开明人士，他除细心照料伤病员外，有时还自己拿出钱来给伤病员治疗，而且还一直无偿地供应蔬菜和柴草，不收住宿费，给死亡人

员买棺木盛殓，并帮助埋葬，很受群众的称赞。

4．着手筹备重建蒙古师范的工作，虽然因撤出齐市而没开课，但是却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5．向蒙古群众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由于讲解宣传得好，在国民党占据齐市期间，大多数蒙古族群众没有动摇，很少有参加光复军和国民党的。

6．请示省主席同意派代表团参加东蒙自治政府成立大会。筹组代表团的工作做得很细致，我厅还组织了两个工作组，一个由胡和负责去城东和富裕，一个由帕格达、莫英保负责去江西和富拉尔基，发动群众选出了阿木古郎、帕格达、德文斌等五人，加上依克明安旗、杜尔伯特旗，组成了二十多人的代表团，由阿木古朗任团长。代表团在蒙古大队一个排武装的护送下，于1946年1月8日动身，从旱路经富拉尔基、景星、音得尔、乌兰浩特去葛根庙参加了大会。

第二阶段工作（四六年一月到四月下旬）

根据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签约规定，苏军需将齐市交给国民党政府。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战，撤江省人民政府、省年区以及其他机关，也暂时撤往甘南。

蒙政厅长乌尔吉朗、秘书主任沃尔根，还有个别人员，这时候就自动离职了。

撤出前，蒙政厅根据于主席的指示对科室人员做了安排和调整：

1．总务科长鄂英海，受命留在市内继续秘密工作，并且被介绍给苏军城防司令以便于有事直接联系。同时把胡和、鄂景福、单保玉等几个人留下来暗中看管房产和一些备品，后来他们也成了我地下工作的得力助手。

2．由行政科长阿木古郎、计划研究室主任福色黎带领一批工作人员随省政府迁到甘南。阿木古郎在撤离时没在厅里，是后

赶到甘南的。

3. 文教科长沃文德留在齐市郊区，带领部分工作人员、组织和恢复学校工作，协助做减租减息，开展生产工作。

4. 送阿金、德光启、莫英瑞等二十多名青年入军政干校学习；部分青年参军到蒙古大队，还有部分人参加了吴文华的队伍并暂时替苏联红军看管日本军用仓库，其余剩余人员疏散回乡，等待重新分配。

在这段时间里，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经常把市内国民党光复军的动态、变动情况汇报给于主席，有时通过联络员通报嫩江军区和蒙古自卫军五旅。我记得金殿华同志常化装来我处了解情况。

（2）根据苏军的要求，经领导批准，从蒙古大队要来四十二名战士（其中有两名嫩江军区工作人员由苏军发给了步枪）给苏军看管日军的军用库房。我们藉这个极好的机会，为我们的部队暗地运出了五万多发步枪子弹、几百棵手榴弹和许多枪支，另外，由于我们佩有苏军下发的证明符号，所以也就能够在齐市自由出入和走动，随时侦察光复军的布防、驻扎等情况，后为齐市解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看管任务的增加，人员由原来的四十二人扩充到九十五名，在攻打齐市时，我们就是从他们中间派出了向导和侦察人员为攻城部队带路或指示目标。

（3）杜尔伯特旗暗中派干部额尔敦仓和图布仓来要武器，好建立旗武装大队。我派人和蒙古自卫军联系，由鄂秀峰同志支援了十多条步枪。他又写信给在泰康地区活动的郭维城同志（鄂秀峰和他很熟），请他予以协助，从而使该旗的公安大队建立起来了。

（4）掩护和帮助从市郊进城购买药品和物资的干部战士，并护送他们出城归队，其中蒙古自卫军的比较多。每次都担很大风险。

（5）对于思想上不大坚定，想投靠国民党和光复军的蒙古

人，利用种种办法进行劝阻，极个别的要警告，从而阻止和挽救了不少人。

（6）继续暗中收容伪兴安军的伤病员并安置和遣返他们回乡，有的动员他们参军。

第三阶段工作（从一九四六年四月末到四七年六月）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夜，我解放军开始攻城，到二十四日，齐齐哈尔市又完全获得解放了。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公园召开了庆祝大会。在会上于主席、倪志亮司令员都讲了话，宣称解放军再也不走了， 和全城人民共同努力， 把人民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人民政府进入齐市的当时，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社会情况比较复杂， 为了保卫市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安全， 经省政府批准，市长朱新阳同志从蒙政厅调二十多人做保卫工作，其中就有陶洁心同志。他们担任了二十多天保卫工作，以后交与齐市公安局，人员全部撤回原单位。

根据于主席的指示，省内各厅都做精减调整。蒙政厅的定员是七名，对编余人员都做了安排。把不少年轻力壮、有培养前途的送北军大学习，其中就有胡和、鄂静海等同志。

调整后的蒙政厅人员是：

蒙政厅厅长：额尔登（金耀洲）

秘书室主任：鄂英海

工作人员：鄂景福、永鲁格

行政科科长：阿木古郎（杨士贤）

工作人员：单宝玉、乔立本

厅长额尔登于同年七月调往兴安省任纳温慕仁盟盟长后，由图们和什格图（杨宪文）接任。

据我回忆，齐齐哈尔市再度解放后，蒙政厅做了以下工作：

1. 在齐齐哈尔市成立了蒙古师范学校，任命沃文德为该校第一任校长，沃秀林为教导主任。同时下文要建立民族小学。

2.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富拉尔基成立了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文支会，调蒙政厅行政科长阿木古郎任该支会主席。配备的若干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军大毕业生。我记得工作人员有鄂月英、木腾、德贵华、沃佩莲、那萨等同志。联合会纳文支会由东蒙总分会委托嫩江省委领导。他们在当地党政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以后协助进行了土地改革工作。联合会支会的土改工作队还派人到牙克石协助移民，并搞了土改工作。

蒙政厅行政科自从阿木古朗科长调离后，由单宝玉负责该科工作。

3. 一九四六年六月，在蒙政厅的主持下，召开了蒙古人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了龙江县的副县长。鄂嫩同志当选为第一任民选副县长。

原来设想把龙江县改为纳文旗，这一初议由于人口比例相差悬殊，从而做罢，只选出了一名蒙古人为龙江县副县长。

4. 蒙政厅派出部分人员，协助做向牙克石地区移民的工作。最初由鄂嫩、莫英保、阿木古朗等人发起，我也参加了发起人的会议，由我把兴安省、纳文慕仁盟来的移民工作人员介绍给了省府于主席。在这项工作中，蒙政厅受省政府指示，派出两人参加了在富拉尔基和宁年的移民登记小组，每组都由嫩江省、兴安省、联合会纳文支会各一人组成。

5. 吴广仁案件的处理：

齐齐哈尔市郊区富裕县塔哈区差哈来村，有一户恶霸地主叫吴广仁，有响窑，有枪支，平时抢男霸女，有民愤和血债。一九四六年八月，该村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减租减息反霸斗争中，把恶霸地主吴广仁抓起来，送到塔哈区公安局监押。然而吴的家属

却前来齐市，到蒙政厅诬告该村村长（民选的）吴海山，说他是公报私仇，抓了吴广仁，而且说吴海山是地痞流氓，等等。蒙政厅图厅长亲自出面接待，偏听偏信了一面之辞后去向于主席请示，得到调查处理的指示。

后来这件事未进行研究，图厅长就亲自带领单宝玉，并以保护安全为由从富拉尔基教导队要来二十名武装战士，同去了塔哈区。首先释放了吴广仁，然后来到差哈来村。到村后，也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村长吴海山和农会主任（名子忘了）抓起来押到郊外，枪毙了村长吴海山，农会主任当了陪绑后被放回，随后，这一拨人马就直接返回了齐市。图厅长回来后，向于主席汇报说是根据群众意见处理的。实际上并未开会听取群众意见，也未经区或县的批准，是擅自处理的。后来吴海山的父亲多次上访、申诉、控告，事情一拖再拖，到一九四七年五月才得到审理，图厅长受到停职检查的处分。

恶霸地主吴广仁后来逃跑，直到土改时才抓到。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6. 图厅长停职反省后，任阿木古郎为厅长，他因在乡下搞运动，并未到任就职。

（鄂秀峰整理）

光复后亲历的四件事

包德华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统治的垮台，东北大地返回祖国的大局已定，然而，当时扎兰屯和全国一样，政局还动荡不定，苏联红军进驻内蒙的期间，以国共两党为代表，开始了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斗争。达斡尔族、蒙古族、鄂温克族向何处去，事关民族发展，当时的各族青年也在焦急地思考着。那时，我所在的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中心学校也在停课放假，所以我这个校长就常在扎兰屯和大家一起关心、议论着这些大事情。

我虽然是蒙古族出身，从小由内蒙古扎鲁特旗到龙江县霍如都台屯定居，后来又移居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第二村，妻子又是达斡尔族，我也是在达斡尔地区成长，所以和达斡尔族同志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

我记得那年光复后，我们达斡尔、蒙古、鄂温克族的一些有志青年，曾经携手在保卫家乡、恢复民族政权以及主动争取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做了一些事情，现在写出来，给后人们留个纪念。

一、组建齐齐哈尔乡达斡尔自卫大队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扎兰屯一带同其他各地一样，马上出现了混乱局面和社会大动荡。

1945年8月11日，何布台、鄂鸣中和我在何布台家召集了二十几个人的秘密集会。那时想到，日本即将垮台了，民族地区将会出现土匪骚扰等不安宁局面，如何迅速建立武装保卫民族地区，是这次集会的主要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武装保卫家乡很重要，都表示愿为这件事出力。

1945年8月16日，何布台，吴泽民来到第二村鄂鸣中家，他们三人又找了我和吴化民等人，具体商量搜集武器弹药以及组建齐齐哈尔乡民族自卫大队的事。大家一致认为，发动森林警察大队献出人枪马匹是有可能的，还应该到日本开拓团收缴武器，必要时还可以从博克图沟里收集一些。

1945年8月19日，鄂鸣中和我去了扎兰屯街已经瘫痪的森林警察大队。这个大队全由达斡尔人组成，由于同民族的关系，给说服工作带来极大方便，只是大队长何某胆小怕担责任，为此，我们就逐一去接触二十二位小警士，他们都愿意交出武器和马匹支援本民族。就这样，我们一下子获得步枪二十二支，子弹二千多发还有一些马匹。

1945年8月下旬，经何布台、鄂鸣中、吴化民等具体磋商，推举我为民族自卫大队长，鄂鸣中为军事顾问，还在齐齐哈尔乡努图克公所旧址举行了成立自卫大队的仪式。最初，自卫队员食宿在努图克公所，后来因为财经困难以及苏军搜查流散在民间的武器，就决定有仗则战、无仗则农的原则，平时分散在家，用时应召集中。

为了组建民族自卫大队，吴化民、必力格、卜林等青年都为筹集武器的事做过有益贡献。

民族自卫大队规模不大但小有名声，那年9月，梁有才等政治土匪知道有个民族自卫大队，他们就绕道过去了。当时大河湾乡的地主冯玉田，领取了光复军师长衔，养兵数百，但一直没敢触及齐齐哈尔乡。这支为数不多的民族自卫大队，为民族地区的安

全，为保卫家乡贡献了一份力量，它在后来也为解放阿荣旗和参加蒙军二旅的剿匪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和扎兰屯苏联红军来往

1945年8月25日，苏军一个师进驻到扎兰屯原日本守备队兵营里。该师师长为马塔耶夫少将，政委叫贝约特赤，下设扎兰屯城防司令部，司令为哈尔钦克夫中校，宪兵司令为尤金中尉。

苏军一进城，就发布了三条安民告示：

扎兰屯原有各机关，即日起照常上班办公；

各工商业，即日起照常营业和生产；

任何武装队伍，不准在苏军占领区及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公里内活动，若有必要，须报请占领军允许。

其中的第三条对我们是个很大的约束。

那年的9月初，一些达斡尔族、蒙古族、鄂温克族的时事关心者，陆续汇聚在扎兰屯，讨论了少数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何布台是这些活动的领头人物。讨论中，大家认为扎兰屯地方维持会亲蒋势力正积极鼓噪废除蒙旗制，取消布特哈旗改建雅鲁县，搞的是排挤少数民族活动，并且正在设法遏制少数民族武装力量，寻找苏军出面加以取缔。如何摆脱扎兰屯地方维持会制造的一个又一个困境，使之向有利于少数民族方向发展，大家一致认为，除自身团结对敌外，争取苏联红军的支持和谅解是必不可少的，争取工作成功与否，将决定兴东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这确实是非同小可的一件大事。

1945年9月，在兴东地区及齐齐哈尔地区工作联系会议上，推举了鄂鸣中和我承担这个任务。

我们和苏军的联络内容，一是保持和发展民族地区的武装自卫能力，二是力争恢复少数民族政权。从当年9月到年底，我们二人和苏军司令部之间来往是比较频繁的，苏军哈尔钦克夫中校

常负责接待我们，偶而由秘书接待。苏军给了两张工作通行证，所以进出也很方便。

我们向苏军所谈的问题，开初时，他们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说与国民党政府有签约，他们把扎兰屯地方维持会看做是国民党正式接管前的过渡性政权。又加上当时在扎兰屯地方维持会里，有几个汉俄混血的人，他们既把持政权又当俄语翻译，我们同苏军交谈的问题通过他们就全被传送到对方那里，所以苏军那时与我们说话也总是小心翼翼，使我们的联络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和苏军疏通思想和使工作保密，何布台和我们几个人两晨决定寻找达斡尔人当翻译。经多方努力，终于找到了住在布特哈旗萨马街的高勒津克老人，他原籍是龙江县音钦屯人，从小给俄人当长工，俄语很流利。换了翻译后，我们放心地向苏军介绍了少数民族人民面临的外来土匪威协以及地方维持会侵犯少数民族历史行政区域等问题，初步得到了他们的理解。接着我们便组织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和阿荣旗音河乡少数民族农民慰问苏军，送给他们牛羊和猪，这也加深了苏军对苦难的少数民族人民的情感。再加上嫩江省党政军主要领导王明贵、朱光、王盛荣等来扎兰屯活动，了解少数民族情况，通过他们与苏军的来往，这些都给我们以后的联络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以下两项大事都有了突破性进展。

第一个是关于民族地区的武装自卫问题。

扎兰屯地方维持会公安局，想通过苏联驻军取缔齐齐哈尔乡民族武装。我和鄂鸣中几次去找苏军司令部，苏军都按占领区治安条例回答，说在苏军占领区附近不宜另建其他任何武装，只承认扎兰屯地方维持会保安大队的合法活动权利。我们换了翻译之后又去了几次，终于使他们默许了民族武装的存在，但不准在占领区内自由出入，更不准进驻扎兰屯。

这期间，我们几次向苏军举发了地方维持会想用暗杀威胁少数民族首领人物的事，后来苏军怕城防区域内出现流血事件的责任问题，改变了态度，给何布台和鄂鸣中发了手枪，让我自行解决，由苏军司令部统一发放持枪执照。

从那以后，苏联驻军给了我们很多方便和暗地支持。下面的几件事就是例子。

当年10月上旬，光复军梁有才部入侵齐齐哈尔乡高地营子屯，必力格和卜林去找苏军，苏军立即出城讨伐，很快地赶走了这股政治匪徒。

当年11月，我们为了兴东地区代表大会期间的保卫工作，私下派进扎兰屯二十名民族武装人员，后被地方维持会公安局发现举发，在雅鲁河畔额勒春公馆里被苏军缴了械并拘留起来。经我方交涉后，便连人带枪全部还给了我们。

1946年1月，在地方维持会公安局告发下，苏军出动三卡车炮兵到卧牛河山谷，阻击了我们的蒙军第二旅。由于苏军事先了解是蒙军，便有意地放了一阵炮，然后离去。我们没有任何损失。

那年2月，扎兰屯地方维持会企图利用苏军打击正在大河湾乡白家窝棚包围光复军梁有才部的民主联军和蒙军。苏军和蒙军领导交谈后，三卡车炮兵瞄着空山头轰了一阵敷衍过去。

第二个是民族政权问题。

扎兰屯亲蒋势力否定少数民族历史上延续的蒙旗制的合法行政区域，他们鼓吹取消布特哈旗改建为雅鲁县。从这时候起，在扎兰屯地方维持会和少数民族的主张自治力量之间发生严重对抗，在扎兰屯召开的双十座谈会谈“崩”了，那天街面上存在着流血冲突的危险。

就在此刻，我们又走访了苏军司令部。头几次，哈尔钦克夫中校都表示说不干涉，后来他看到事态发展确实很严重，这才邀请了两方代表再谈判，规劝避免发生冲突。在苏军斡旋下，我们

方面有条件地向地方维持会妥协，同意设雅鲁县，对方也允诺县长席位留给少数民族，县府中层人员双方各占一半，并承担兴安东署日常办公经费。

三、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

1945年9月中旬，在扎兰屯召集了兴东地区四旗代表并邀请齐齐哈尔地区龙江、富裕两县代表，就当前形势、实现内蒙自治以及恢复兴安东署等问题，做了广泛性讨论，并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派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事，也是在这次会 议 确 定的。

当时祖国光复已经一个多月了，内蒙究竟归哪一政党接管，毫无音息，真有“国无君民不宁”的空虚感。

各地代表讨论形势中，流露的思想认识大体如下：

一致的愿望是，认为内蒙古各族人民一致要求民族自治，现在，不管哪一个政党也不管它们接受与否，按照自己的希望先搭起地方自治组织的架子再说。所以一致决定成立纳文慕仁地区自治委员会，选出了十几名委员，推举鄂范五为主任，何布台为副主任。

一种忧虑是，国民党力量强大，很可能接管内蒙，这就意味着重演军阀统治时期民族压迫的历史悲剧。光复后，蒋介石就把东蒙划为兴安省，派了王宗洲当省长。代表们对蒋介石这种不承认国内民族自治的大汉族主义是非常气愤的。

与会者当时感情倾向让共产党来接管政权，可是当时国共两党力量对比悬殊，谁也不相信共产党能够接管地方。为此，大家说：“不欢迎的硬着头皮上，受欢迎的又没条件来”。

早在列宁时期，在达斡尔族中就有郭道甫等知识分子接触了苏联，对那里的民族平等很是向往，所以我们那时对共产党也就不感到很生疏。光复后那些日子，何布台、鄂鸣中、敖匡海、阿木古

朗、斗兴阿、姚凤贤、吴泽民等，包括我在内，无所顾忌、公开喊着要和国民党顶到底，大不了去兴安岭打游击，实在不行就往苏联、外蒙跑。大家也听说彭真、林枫快来东北了，所以当时也议论过派人去见面摸底的事。

还有一种幻想是：由于和外蒙同属一种民族（当时达斡尔也称蒙古族），起初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苏蒙军正在驻东北和内蒙，能否将内蒙划归外蒙实行内外合并呢?能合并就好了。围绕这一问题私下开展过讨论，最后得出了结论：是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然而，却有相当多的人主张通过外蒙向苏联斯大林反映内蒙人民要求自治愿望，请他向蒋介石转达内蒙人民的心愿，通过苏联红军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他许诺内蒙的自治。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事，在那次会上定下派人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

我们访问的目的最后明确为：一是，要求外蒙支持内蒙自治运动，通过外蒙说劝在东北的苏联驻军全力支持内蒙自治，并影响中共，共同支持内蒙自治。二是，请求外蒙给予内蒙地域性自卫用的物资援助等。

在兴东地区四旗代表会议上，协商选举了访问团的成员，由何布台任团长（曾任伪满兴东地区教育科长，主要代表布、阿两旗），敖匡海为副团长（曾任伪满巴彦旗科长，主要代表莫、巴两旗），团员有白凤岐（主要代表龙江、富裕两县）、包德华（兼蒙语翻译）。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当年九月，我们已经听到王爷庙的博彦满都、哈丰阿等人要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在该国领导人乔巴山面前造声势，他们也同意我们去蒙访问。

出发前，访问团与扎兰屯苏联红军通了气，在苏军协助下，不但帮助联系海拉尔驻军军代表，而且帮助安排乘火车北上。

我们一行四人于9月30日由扎兰屯站起程，翌日抵达了海拉

尔，逗留了十几天。这期间我们寻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军办事机构，见了蒙军代表达瓦扎布中尉，他对我们去蒙访问表示热情欢迎，出国时间以及交通工具全是由达瓦扎布负责安排的。我们又去当地苏军办事机构会见了伊万诺夫上尉，他听取了我们出访意图介绍，得到了允许出境的签证。

我们得到了乌兰巴托官方许可入境的回音后，在十月中旬便在中尉达瓦扎布陪同下，乘坐军用汽车西行，由哈拉哈河入境，经车臣汗、赛音诺彦地区直向乌兰巴托方向驰去。经过约一周时间的旱路跋涉，于十月二十日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被当成贵宾下榻于乌兰巴托宾馆，在那里遇到了东蒙代表团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一行九人，后来合成为一个访问团，听从博彦满都、哈丰阿的指挥。

我们在乌兰巴托期间，蒙方外交部负责人几次前来交谈，对我们提出的几项求援意见，表示要一一转达给乔巴山元帅。我们等候和乔巴山元帅见面，等了有半个月。

就在此刻，哈丰阿等对乔巴山迟迟没出来会见，感到忧虑和不安，为了引起人家重视，他通知家乡搞了个表示民意的签名运动。那次在乌兰浩特、扎兰屯和布、阿两旗征集到东蒙农牧民两万多人签名，而且很快送到了代表团手里。

直到11月中旬，乔巴山才会见了大家。会见时，他一一问了大家的姓名、职业和家乡情况，气氛很自然。在谈到我们提出的内蒙自治和希望得到武器援助时，他说内蒙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能干涉，援助武器的事也是不能办的，要我们谅解。最后，他向访问团成员说："你们回国后立即找中国共产党，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信仰马列主义，对民族自治和自卫用武器的事，他们一定能帮助你们，你们可以信赖他们"。

在我们离开之前，外交部、文化部赠送给我们二十多种新蒙文版革命书籍几百册，回国后就全转送给了扎兰屯东蒙古革命青

年同盟会。返回之前，我们还接受了对方赠送的列宁式的全套冬装。访问期间，大家还高兴地参加了一些文娱活动，对他们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欢乐，身受感染，很是羡慕。

我们在达瓦扎布中尉和另一位军官向导下，于十二月初返回了海拉尔。稍作休息后，就把我们一行四人介绍到苏军东北情报总局长尼克来维奇少将和中共东北局工作组成员苏林同志那里，目的是请求苏军和中共东北局对于内蒙问题多加关怀和支持。

12月4日晚，大家乘火车回到了扎兰屯。达瓦扎布等二人被安排住在金耀洲公馆的鄂鸣中家里，第二天，他们俩人为了扎兰屯民族问题，又专门去苏军司令部拜访了哈尔钦克夫中校。从此以后，少数民族人士和苏军之间就更加亲密了。

通过这次访问，在青年以及一部分民族上层分子中排除了一切不符实际的政治幻想，从感情上就更向共产党一边倾斜了。

四、参加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

1946年1月初，接到召开东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知，兴东地区各旗和齐齐哈尔市一带的龙江县及各蒙旗，都派出了代表或列席人员。扎兰屯派何布台、吴化民、张振武、卓日格图和我为代表。当月11日启程去乌兰浩特时，还派有七名武装战士护送。

1月15日，会议正式召开，1月20日闭幕。

这次会议选举了博彦满都为东蒙自治政府主席，副主席为哈丰阿，选出43名政府常委，其中有何布台和我。会议还选举了寿明阿为参议长；选举阿思根为自治军司令，胡秉权（共产党员）为政委。会议还通过了政府组织法大纲及施政纲要，会议要求各地立即按盟、旗、努图克三级体制，着手组建地方三级政府；要求组建东蒙古自治军武装组织，维护地方治安；要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

这次会议所产生的东蒙古自治政府，表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

所为在少数民族中不得人心。它虽然是东蒙上层分子发起组织的，客观上却是增加了革命的同盟军，在抵制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东蒙，乃至使广大农牧民及革命青年倾向共产党等方面，确实是起了积极作用。也是为东蒙立了个自治的基础。

1月25日，我们一行十几人，返回途中，在布特哈旗萨玛街停留时，被盘踞在蘑菇气的光复军第七旅发现，他们派出二连连长郭洪升带领两个排人马，企图把我们全部干掉。当地居民通知给我们这个消息以后，我们便埋伏起来，由我带三个人把守村东公路，吴化民带了四个人潜伏在河套草丛里。在我们迎击下活捉了张排长以下十七名。那次收缴的长短枪和马匹都送给了萨玛街居民，组建了二十几人的民族自卫大队，由多贞祥出任大队长。1月28日，我们取道阿木牛、哈拉苏返回了扎兰屯。

光复后的一段经历

卜　林

一九四五年祖国光复时，我闲居在扎兰屯附近的农村。那年八月十六日午后，苏联红军在人民群众欢呼声中进驻了扎兰屯。

扎兰屯是伪满兴安东分省所在地，末期改为该省下属的兴安东署，管辖着巴彦、莫力达瓦、阿荣、布特哈、喜扎嘎尔等五旗，也是布特哈旗址所在地。这块地方，从清朝以来，一直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三个民族聚居的行政区域和游猎地方。

光复后，伪满官员如莫旗旗长苍吉托布、巴旗旗长绰罗巴图尔、阿旗旗长乔树人、布旗旗长志达图、兴安东署主任巴金保、民政厅长金耀洲等人，都各奔家乡闲居去了。被压迫的民族群众和大家一样，都盼望有个民族平等的好日子到来。可是事实呢？从八月起，巴、莫、阿、布四个旗纷纷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地方解放委员会等机构。

九月，莫旗改为布西县政府，十月成立了以宿祖辰、齐国治为首的国民党县筹委会，十一月正式建立县党部，何家年任书记长。继而勾结讷河尚其悦的光复军，组建了县第一保安大队，不久改成挺进军。

十月，布旗改为雅鲁县政府，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马树东为书记长，吴宪茂任代书记长。

阿荣旗虽然没改成县，但政治和行政上都由国民党扶植的人马盘踞着。巴彦旗虽然没有国民党组织插手，但仍然有地方维持会。

这些强执地方政权的人公开杨言说“蒋委员长不久就派中央军来接管，你们老达子要放老实点。”虽然在日伪时期，这些地方的蒙古、达斡尔族主要官吏是敌伪统治的代理人，但是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群众仍然是受压迫受剥削的，那种对一个民族的无辜辱骂和歧视，激起了少数民族青年的义愤，看清了这样政治政权绝不会给少数民族带来什么好处。

为了寻求民旗平等的出路，通过观察和比较，终于找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的斗争。这一段历史情况也是我的一段历史经历，现在把它记在下面。

组织起来保卫自己

光复后的扎兰屯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又由于苏联红军驻扎，，所以他们还不敢向少数民族下什么手。而许多少数民族青年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也就利用了这个环境，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搞起了活动。算一算，大概先后能有百来人，其中按文化程度看有六成是留学生或大学生；按民族分有达斡尔族，有蒙古族，也有鄂温克族；按所来的地区看，几个旗的都有。那时候，伪满的那几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官吏公馆都空着，于是就成了大家常来聚会的场所。

我记得当年九月末，莫、巴、阿、布四个旗的有关头行人在扎兰屯开了一次会，专门讨论了达斡尔族居住地区的联防问题。

在旧中国时，达斡尔族居住的地方遭受过军阀吴俊升兵马的疯狂掠夺和蹂躏，骂这些少数民族是“哑叭牲口”。“九·一八”事变时又屡次挨土匪的洗劫，而今那些个维持会又在叫嚷

"老达子放老实点"，在这种时候就只能靠自己来自卫了。

先是布特哈旗第二村设法弄到枪支组织了近百人的自卫队，接着阿荣旗章塔尔屯由鄂温克族的姚凤贤组织了五十多人，莫旗阿尔纳乡也组织了一百多人，何布台、鄂鸣中、包德华、我和吴化民（当过伪股长，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也去齐齐哈尔乡二屯，帮助从扎兰屯森林警察队和日本开拓团那里弄到几十支枪，搭起自卫队的架子。

记得参加这次会的有阿荣旗姚凤贤、吴松寿、戴永祥，巴旗的敖匡海、鄂世英，布旗的包德华、吴泽民、吴化民、必利格，齐齐哈尔地区的鄂秀峰、多文秀。莫旗孟希舜、头兴阿、阿木尔扎布还带了五十多武装自卫队员，把他们安顿在齐齐哈尔乡阿拉坦华屯以后，也赶到扎兰屯来了。

这次会是在吴化民家里开的，由何布台、鄂鸣中主持。何布台当过伪教育科长，对付那些地方维持会的态度坚定，主意也多。鄂鸣中是伪军的中下级军官，长期在北部边防驻守，对苏联红军有印象，听说他给苏军送过情报，但本人没有谈。这次会上商定，莫、巴、布、阿，齐齐哈尔等地区今后应互相配合互相支援，搞好自卫。会上，姚凤贤提议攻打阿荣旗，说那里只有八十多人的武装，大家联合起来就可以解决。经过研究，决定联合行动。为了这件事，我和必利格、郭安惠等六七个人还去过齐齐哈尔乡的各屯子，组织了八十多人参加战斗。

当年十月，姚凤贤的自卫队争取到了王明贵部队的武器支援，于是在吴化民、必利格、多国瑞率领的齐齐哈尔乡的人力配合下，一举打开了阿荣旗县城，解散了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维持会，撤换了旗保安大队的头头，按那次会议的决定派何庆瑞去当了旗长。

事隔不久，莫旗方面也请到了讷河金殿武的民主联军，帮助解放了莫力达瓦旗，请当地德高望重的达斡尔族老人孟希舜担任

了旗长。这位老旗长后来还随观礼团去过北京，在观礼台上参加了国庆观礼。

布特哈旗因为有苏联红军驻扎，也不准许有其他武装组织，所以就没去触动扎兰屯那个国民党的维持会。

争取苏联理解和支持

光复后的九到十月间，在金耀洲的空公馆里常聚集好多人，议论着形势也议论着少数民族该怎么办。

记得当时吴化民拿着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一本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说："蒋介石说我们是大汉族宗下的分支，光天化日底下卖的是民族同化论。他死不承认内蒙自治，硬把东蒙划入兴安省，派汉人李宗洲当省主席，哪有咱们少数民族的份！毛泽东这本书倒是说了要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

大家又分析了形势，感到光靠自己这点少数民族的自卫队，怎么也抵挡不了国民党光复军，要是中央军过来就更不是对手了。当然，那时候也有一些人担心共产党将来能不能收拾伪满时当过差的知识分子，大家认为这些没影子的事想也没用，到时候再说吧。再说，国民党的维持会那方面，既使不把我们看成共产党，也早认为是和共产党"搭了边"，所以只能往共产党方面投靠，没有他们保护，八成一天也活不成。当时议论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在苏联驻军眼皮底下活动，应当想办法取得他们的理解和同情，不然，今后也是一步一个"坎儿"。

想找找苏联红军，确实是逼得非找不可。当时扎兰屯国民党警察局长梁桂馥，是个混血儿，俄语很流利，时常在苏军耳朵边出坏点子，说齐齐哈尔乡有许多武器，说吴化民、必利格要带那些"蒙古"打扎兰屯。结果便在九月中下旬的时候，苏军出动三辆汽车的兵力挨家搜查了那些屯子。好在事先我知道了消息，连夜

通知下去，人和枪都转移了，只从锅台里查出一支包德华的手枪。那天，我在二屯的家里被苏军碰到了，他们要带去审问，我见士兵长的象亚洲人，就用蒙语说我是蒙古人，结果出现了转机，他带我见到了属于布力亚特蒙古族的军官道尔基中尉。我们用蒙语谈了很长时间，介绍了国民党地方维持会压迫歧视少数民族的情况，劝他不要管也别听他们的。谈过之后不久，苏军就都返回了。

梁桂馥还常鼓励苏军各部去齐齐哈尔乡各屯征猪、牛和饲草，过量的征用负担使当地的民族百姓都很犯愁了。所以当时想办法找苏军确实是事在必行。那年十月初，由大家推举何布台、鄂鸣中去见苏军司令哈尔钦克夫。

本来有许多话要对苏军讲，但因为姓李的翻译是梁桂馥的人，所以交谈的双方都很留神。哈尔钦克夫司令只是简短的答复说苏联和国民党中央政府有签约，东北这块土地和地方政权必须归还给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内政的事不参与不干涉，说在苏军卫戍区内，除了雅鲁县一百多人的保安大队，不承认任何武装。何布台听了以后很丧气，大家知道以后也很失望。

何先生坚持再找苏军去谈，还请了萨马街屯达族浩里金克老头给当翻译，老头从小给俄国人吃劳金，俄语讲的好。几天后，何、鄂二人带着自己的翻译又去见哈尔钦克夫，谈了有两个小时。回来就告诉大家说苏军是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因为国际关系不能插手政治问题，但是已经答应可以发几张和他们联络用的通行证，答应拨几支手枪给我们头行人用以自卫，表示如果发生暗杀或流血事件时苏军一定严加过问，还说民族武装只要不进扎兰屯街内就不加过问。这次会见结果很令人高兴。最后决定鄂鸣中、包德华为联络员，苏军给发了工作通行证。

选代表去外蒙访问

扎兰屯达斡尔族的何布台、鄂鸣中等头头脑脑，那时候很注意王爷庙哈丰阿、阿思根、博彦满都等人物的动向，因为他们都主张内蒙自治，甚至抱有内、外蒙合并的幻想，不欢迎国民党去接管。这也是当时在我们少数民族里的一种思想动态。

记得那年九月底十月初，这些人士常到金旗长或那警佐空着的公馆去，有事谈事，没事就下围棋。一次，吴化民讲了他得到的消息：“王爷庙的哈丰阿见到了中共东北局负责人彭真，据说是对蒙区问题的态度很明朗，支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他又说：“博彦满都、哈丰阿准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听一听外蒙对内蒙的态度，看看能否得到必要的帮助，据说是几天后就要动身了。”于是，何布台等人也谈起了扎兰屯地方有无必要组织代表团访问外蒙的事，大家的意向是同意访问，还主张组织人员开辟与嫩江省联络的渠道。为此，又在扎兰屯召开了四旗一地的代表会议，有四、五十人参加，开了两天。

那次开会商议了外访的组成，在布特哈地区和齐齐哈尔地区民族人士中各选出两名，由何布台任团长、敖匡海为副团长，白凤岐、包德华为代表团成员。包德华虽不是达斡尔族，但他是齐齐哈尔一带人，又会译外蒙的语言，大家都同意他占齐齐哈尔地区的一个名额。代表团在当年九月末动身取道海拉尔去外蒙，十二月初才返回了扎兰屯。这次去外蒙的访问成果可以归纳为三条。第一条，外蒙领袖人物一再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殷切地嘱咐他们说“中共是你们的真正可靠的靠山，必须取得中共的领导和支持”。从此以后，有些人不切合实际的政治幻想开始破灭了，转而专心致志地向中共靠拢了。第二条，外蒙赠送了几百册新蒙文马列主义书籍，这批革命书籍转送给当时北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会，以后做为青年的读物传播了马列主义。第三条，外蒙专

派两名军官护送到扎兰屯，他们去扎兰屯苏军司令部为我方说了许多的好话，要苏军暗中支持少数民族人士，从此以后，苏军司令部对民族人士的态度更有好转了。

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了

同嫩江省的中共渠道怎么疏通，那次会上议定疏通的办法一是通过老同学关系由吴化民去找历男和朱新阳，他们俩是旧民国时期齐齐哈尔市长庚小学（即第一部）学生，又是同班生；二是王明贵和鄂秀峰、阿木古郎有来往；三是派鄂嫩日图为全权代表直接联系嫩江省。吴化民、鄂嫩日图前后来齐齐哈尔市两次。不久，历男来扎兰屯回访，就住在吴化民家。这是和中共主动接触的开头，后来就更加亲密了。苏林来扎兰屯长期住在何布台家，其后朱光来扎兰屯住在乔老三家，有专人昼夜加以保护。王盛荣、王明贵等随其后也来过，主要做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大量宣传了党的统战政策和民族政策。

那年的十二月间，鄂嫩日图又从甘南归来时向我转达说，甘南的中共军政干部学校要我们派青年去学习深造。让我负责去办。当时我和索岳尔图（是巴金保的长子，刚从外蒙留学归来）都是东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会的负责人，他当副秘书长、我当宣传部长，许多民族青年都围绕着我们二人团团转。当时的社会局势还很动荡，对于投身革命的事，许多青年缺少思想准备，不敢担风险，家长也不会放心，因此，我们就到乡村去挨家挨户耐心地做工作。我们俩带头报名，先由索岳尔图领着色德布、布肯奇、乌力吉、官布、卓日格吐等入校，我继续动员一批然后再去。我收下旺吉勒、图们巴雅尔、何福盛、阿古等五名青年后就启程去甘南，可是刚走到阿荣旗三道沟一带就遇上了大帮胡子，不得已返回了第二村，未去成。后来，我们又动员几名民族青年去了甘南教导团，几名去了讷河军干校。

形势发展很快，那年十二月，鄂嫩日图、姚凤贤、吴泽民、郭安惠去甘南，王明贵同志和他们商量了筹建纳文军分区和东蒙自治军问题，拨给了一部分枪支。第二年初成立了军分区并在原有自卫队基础上组建了东蒙自治军纳文慕仁军分区（后改称自卫军），鄂嫩日图任司令员，派来的夏辅仁为政委，吴泽民为副政委。它的第二旅建于齐齐哈尔乡的九村，五旅建于奈门浅屯，莫力达瓦旗建成第八旅。

由于和党的军政领导接触多了，就更觉得他们都很平易近人，办事牢靠爽直，看得起少数民族，所以大家都从感情上进一步向党靠拢了。闲扯的时候有人说："咱们现在可真沾上共产党、八路军边儿了，中央军过来绝不能轻饶我们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不用怕，共产党有十六字游击战术"，"咱们还有兴安岭大山，实在打不过了还有苏联和外蒙当基地"。鄂嫩日图、吴化民、必利格和我们这些青年人，此时此刻的心情和以前相比，真是轻松愉快多了。

建立兴安东署

光复不久，在海拉尔就成立了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也听到了王爷庙方面张罗成立东蒙自治政府的消息，所以，恢复兴安东署的事在何布台等去外蒙访问前就议论过了，后来又在那次四旗一地的代表会上议定下来。决定成立筹委会，何布台任主任，各旗出两名筹委；派人去王爷庙和博彦满都、哈丰阿联系，和扎兰屯苏军司令部打招呼，条件成熟后召集四旗一地代表会议。还议定各旗除扎兰屯、齐齐哈尔地区外，正式代表为四名，与会总人数在五十左右，食宿自理，会上将选举兴安东署主任及总务、民政、实业、内防四处的人选，等等。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下旬在扎兰屯召开了这次代表会，会期两天，会场仍设在金公馆。额省长公馆接待了莫、巴二旗代表，

沃庆海、吴化民家接待了齐齐哈尔地区代表。到会的人员是：

莫力达瓦旗代表孟希舜、斗兴阿、索岳尔图、阿木尔扎布，另有民族自卫队干部列席；

巴彦旗代表敖匡海、鄂世英、敖定升、敖凤山，都嘎尔扎布列席；

阿荣旗代表姚凤贤、戴永祥、吴松寿、白音达利；

布特哈旗代表吴泽民、包德华、吴化民、必利格，郭惠安、卜林、恩和扎布、乔盛忠、岗格尔等列席；

扎兰屯代表何布台、鄂鸣中、鄂嫩日图、鄂廷顺、滕合台、恩和巴雅尔、敖勤学、朝吉嘎瓦、沙格德尔扎布、那顺乌尔图、郭义、何庆瑞，还有一位当过科长的苏某；

齐齐哈尔地区代表有阿木古郎、鄂英海、沃文德、鄂朗海、德文斌、鄂嫩、帕格达、鄂秀峰，还有多文秀、金振玉、沃秀林、阿金、胡和等列席。

这次会议中，关于兴安东署工作人选的协商安排是比较细的。最后提交大会的人选情况是：

兴安东署主任为布特哈旗人士志达图，总务处长为齐齐哈尔地区的阿木古郎，内防处长鄂鸣中（下设三科人选为鄂嫩日图、包德华、多文秀），民政处长为布旗的敖匡海；实业处长为布旗的鄂世英；汉族人士林壑溪为参议长，还提出了雅鲁县长人选何布台。以上提名人选得到了大会的通过（后来总务处长民政处长有变动），从此，兴安东署在苏军不干涉的情况下在扎兰屯宣告建立，从国民党控制下夺回的莫、巴、阿三个旗的民族地方政权归属它的管辖之下，设在扎兰屯的国民党的雅鲁县政权，也无奈何而承认何布台为县长并接受了兴安东署的行政领导。

同国民党争夺雅鲁县政权

扎兰屯国民党的一派人物，从光复那年九月就叫嚷改布旗为

雅鲁县，但是始终遭到当地达斡尔等少数民族人士的有力抵制，直到十月末才在双方谈判并接受了少数民族提出的条件下建立起来。

为了这件事，鄂鸣中带浩里金克翻译去过扎兰屯苏军司令部，苏军秘书表示不干涉不过问。接着就接到了对方的通牒，说赞不赞成也要改县，于是我们在相隔两天之后又二次去苏军司令部，我也随同去了。这一次，哈尔钦克夫也对鄂说："阿拉坦素格先生，我们管国民党的事，手就伸得太长了，不应该我们管的事就不能去管"，鄂鸣中无词可答了。我听了很焦急，就对他说："在雅鲁问题上他们不过问不行。国民党派接管人员接管扎兰屯可以算完成接交任务。要问司令官：现在能算是移交了吗？这些土国民党尽是些伪满的绅商，能当作国民党吗？如果不是，就该在国民党正式接管以前，苏军有责任协助尊重历史遗留的旗制传统，不得任意更改。这块地方原属我们民族行政区，文献有记载。再说，这帮人马想要武力威胁我们，苏军对我们的安全如何考虑？"鄂听后告诉翻译照样翻译过去。哈尔钦克夫听后沉默了半天，接着就向鄂打听我是什么人，鄂告诉说是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他于是口里说着"了不起的青年"，手也向我伸了过来，从此我们结识了。最后，他问鄂鸣中："你们最终的态度是什么？"鄂答："我们商量好了，死也不承认这个雅鲁县，如果他们强行搞县，苏军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分手时，苏军司令官表示要再考虑考虑。

从九月下旬以来，扎兰屯的维持会有几次邀我们参加改县问题的讨论，都拒绝了。接着他们便改换方式，一方面到志达图或吴泽民家拜访游说，同时又由商工会宴请某某位，几乎天天拉桌设席。结果确实使有些人动摇并反而当了说客。

进入十月，苏军来人找鄂鸣中，规劝我方去参加双十节恳谈会，当时何布台去外蒙还没回来，鄂就是头领人物了。这次，我

们组织了代表团，吴泽民任团长，朝吉嘎瓦、斗兴阿为副团长，团员有滕和台、恩和巴雅尔、吴化民、必利格、苏才阳、那顺、卜林、乔盛忠等。恳谈会场设在伪日本开拓团二楼。恳谈些什么，当时我们并不太清楚，但是也探听到对方要搞游行示威，要逼我方答应雅鲁县问题。

事实未出所料。当我们与会人员刚到蒲根大街的岔路口时，工商会的几百人游行队伍过来了，他们敲锣打鼓，挥动手中的小三角旗喊着："要求建立雅鲁县""还我雅鲁""谁不答应就砸谁的狗头"等等，队伍两旁走着五六十拿着木棒的，整个队伍都瞪视着我们。我看情势紧张，又不见苏军维持秩序，怕吃大亏，便派乔盛忠回金公馆报信，请鄂鸣中马上找苏军要求保护。不久，苏军司令便派出了人马，岗哨布满了会场周围。乔盛忠告诉这个消息以后，大家心才安定下来。不过，会场外那种威胁性的口号声还是喊得很起劲。

恳谈会会场的台上挂着青天白日旗，中间是孙中山先生遗像，右侧挂着他的楷书遗嘱。我方坐于长桌的东侧，对侧居中入坐的是商界吴宪茂，高度近视的六国饭店经理梁普安、一贯向我们挑衅的警察局长梁桂馥、商工会的胡品三及魏某次之，还有张国良、梁有清、威某等人在座。

这次会是由对方推举的律师马某主持。先是向国民党旗，向孙总理遗像行礼，我们按吴化民的布署只给总理遗像行了礼。接着，恳谈开始了，哪里是"恳谈"？而是一场舌战。

对方张国良先开了头，讲了民国时期建雅鲁县的经过，以此作为重建雅鲁县的理由，他发言期间，旁边有助威的一些青年喊口号，要我方表态，若不同意就不准走出会场。之后，吴泽民发言，他说："你们今天开的是恳谈会还是威胁会？请诸位往外瞧一瞧，站岗的苏军不会允许动武的吧？你们想用这种办法达到目的只能使你们失望。"吴化民接着就气愤地发言说："扎兰屯是

清代布特哈部的狩猎区，历史上有明文记载。说到民国改县，你们军阀不顾历史，任意侵占少数民族地方占荒建县，置少数民族于不顾，现在还要那样，我们绝不承认……”话说到这时会场就乱了套，对方要动手打吴化民，于是站岗的苏军马上过来驱散了大家，这场恳谈会就这样收了场。

以后对方把伪满时的老商工会长胡品三举到前台当调解人，他和吴泽民关系密切，和蒙方相识的朋友也多。吴泽民是我方的联络员，主张继续谈，后来经过集体讨论，认为只要苏军没撤走，就一时也难下手解散对方，只要中央军不来，这块地方早晚也是我们的，不妨提几个先决条件，对方如果接受，我们就允许建立雅鲁县。当时提出：第一，雅鲁县要接受兴安东署领导；第二，要承担兴安东署的日常办公经费；第三，正县长必须由达斡尔族（当时统称蒙族）人出任，县的总务、民政、实业、警察四个部门中，总务、警察的主管人选由少数民族士担任（谈判后，内防改由对方人选出任）；第四条，博克图林业署的森林资源要归兴安东署调用。

经过第二次谈判，在商工会达成了协议，十月十九日晚商工会为此组织了大型宴会，十月二十四日在伪日本开拓团大楼的一楼挂出了雅鲁县的牌子。这个县政权承认何布台为县长，吴泽民为总务科长，必利格为实业科长，沙格德尔扎布为警察副局长，另有仓都楞等几名青年到警察局工作。对方吴宪茂任副县长，张国良任民政科长，梁桂馥任警察局长。

半个月后，兴安东署也建立起来了。

后　记

达斡尔——我国这个北方少数民族，由于历史上遭受过大汉族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岐视与蹂躏，在祖国光复后，便一面设法自卫，一面寻求一个民族平等的社会制度，至于能否如愿，则由不

得人口很少的达斡尔人，而是取决于哪一个政党有这样的政策。

从光复到那年年底的短短四个月，达斡尔族的一些代表人物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激荡着的政治、军事形势下经历了战斗的洗礼，民族觉悟发生了一次飞跃。他们终于从封闭和狭隘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带领本民族全身心地投靠到中国共产党怀抱，从此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繁荣振兴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在结束本文时应当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没有达斡尔族人的今天。

对纳文慕仁盟的回忆

卜　林

一

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召开的承德会议上，决定内蒙一律实行盟、旗政权体制，设在扎兰屯的兴安东署要改建为盟政府。因此，当月底就由兴安省政府派了克力更、敖匡海、敖勤学、鄂朗海等人组成的建盟工作组来开展工作。五月初组建了十九人的筹委会，志达图为主任，夏辅仁、鄂嫩日图为副主任。

成立筹委会以后，对于盟的名称、盟政府的组成等都广泛地听取了意见。经过各地区讨论，基本上同意了齐齐哈尔地区代表阿木古郎和巴彦旗代表达赖乌苏起用"纳文慕仁"为盟称的提议。"纳文慕仁"是嫩江，即将建立的这个盟是嫩江流域达斡尔族人民世代聚居之地，他们对嫩江的感情是无比深厚的。这个盟称以后在代表大会上被正式认定了。

由于达斡尔族内部历史上又分成布特哈（莫旗及巴旗一带）和齐齐哈尔（阿、布二旗及龙江一带）两大地区，所以，盟政权的组成人员也要兼顾安排。当时提出人选提名方案是：盟长由齐齐哈尔地区人士中产生，金耀洲（额尔登）和何布台（何维忠）为候选人；盟参议长由布特哈地区人士中产生，人选为志达图；副盟长由盟党代表担任，人选为夏辅仁盟副参议长由当地汉族

人士中产生，人选为林望溪。盟政府下设秘书、民政、实业、公安四处，其负责人也由两地提名并对等安排。

盟参议室由正副议长、正副盟长和十三名政府委员组成。

筹委会当时设在伪协和会旧址，前后共开过五六次会，各项准备在近五月中旬时基本就绪后，便派人专程去东蒙工委做了汇报。当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盟长候选人金耀洲已被嫩江省人民政府任命为蒙政厅长，夏辅仁、鄂嫩日图为此专程找过于毅夫主席和西满分局领导，他们表示如果金耀洲当选，嫩江省可以让他回来工作。

五月十八日，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到扎兰屯报到了，总计有一百二十多人，各旅馆和车店都住满了。莫力达瓦旗由孟希爵率领，巴彦旗是敖布迪带队，阿荣旗是何什格图，布特哈旗是巴音诺彦，第五师由吴泽民带队，龙江县由阿木古郎带队。莫旗和龙江县的代表团最大。

那次大会是在街南头的小学校开的。记得来宾中有兴安省特木尔巴根省主席、达瓦敖斯尔秘书长和巴西门仓厅长，有嫩江省派出的沃尔根带队的蒙政厅代表团。

我当时被第五师派出担任筹委会秘书组负责人。记得在伪女高学校召开的盟长人选推举会上，推举金耀洲和何布台的两方竞争很激烈，为避免在大会时出乱子，拒绝了增加候选人事迹介绍的议程，还做了只准正式代表入场和禁止携带枪支的规定。

五月二十日是纳文慕仁盟正式成立的日子，选举出金耀洲、夏辅仁为正副盟长，还选举志达图、林望溪为正副参议长。

盟政府建立了，下设秘书、民政、实业、公安等四个处。秘书处长是敖玉祥，副处长为斗兴阿，处内设秘书、财务两科，我是秘书科副科长，科长是敖瑞明，财务科长是索德尔扎布。民政处长为敖匡海，副处长是杜拉尔托布，内设民政、文教两科。实业处由达来乌苏、吴化民任正副处长，设有产业、农林、交通三

个科。公安处长为阿勇巴图，设有三个科，包德华等任科长。

盟参议室下设政府委员，由志达图、林望溪、额尔登、夏辅仁、鄂嫩日图、朱子修、吴泽民、孟希舜、敖布庶、何什格图、巴音诺彦、吴化民、敖玉祥、斗兴阿、杜拉尔托布、达来乌苏、敖勤学、鄂朗海、朝吉嘎瓦、滕合合等人组成。最初叫政府委员，每年召开会议四次，后来第五师司令部要求军人代表参加议政，派出姚凤贤、沃文治、单福祥、多文秀、比利格、乌兰巴图等参加政府委员会议，无形中改称为军政联席会，每两周举行一次。

金耀洲被选为盟长以后，嫩江省还是舍不得放他回来，东蒙工委组织部和嫩江省委交涉了半个多月，后来又找李富春、黄克诚等领导裁决，也花费了半个多月时间。以后嫩江省领导开始撤口了，鄂嫩日图、比利格马上就用第五师的卡车和于毅夫主席的吉普将金和他的家属接回到扎兰屯。为了办理这件事，夏辅仁、克力更、鄂嫩日图等人没少花费力气。

二

纳文慕仁盟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和呼伦贝尔盟合并，改名为呼纳盟，后来又改称呼伦贝尔盟。纳盟虽然仅存在两年多，而它的存在本身就应当记下一笔，何况它又为当时的民主革命斗争做了许多工作、经历了许多风雨呢。下面把我记忆的一些工作和事情写下来。

一九四六年的事

建盟后，重新任命了四个旗的领导干部，是经参议室政府委员会议讨论决定后，由盟长名义发文任命的。被任命的四位旗长是：莫旗为孟希舜，巴彦旗为敖布迪，阿荣旗为何什格图，布旗为巴音诺彦。

我对布特哈旗比较熟悉，当过股长，还接任当过一段文教科长。记得苏军在当年四月撤出扎兰屯回国后，那月底就摘掉了雅鲁县政府的牌子，五月十七日挂出布特哈旗的牌子，月底任命了旗长、科长，秘书科长是吴化民，旗长秘书为安延昌，民政科长是许受天，实业科长是鄂朗海，文教科长为沙格德尔扎布，公安局长是乔克巴彦。

纳盟继而组织建立了实业公司，在盟实业处领导下负责全盟的对外贸易和森林、矿产及农产品资源的经营管理，公司经理是敖勃学。

六月末，根据中共西满分局的指示，开始了遣送日本侨民归国的工作。这项工作由盟的夏政委主持，民政和公安处、旗民政科和公安局组织了工作组，具体事务全委托我去完成，因为我当行政股长期间就管理过日本人集中营，情况很熟。这些日本人来自日本九洲、大坂、长野、爱知等地方，是阿荣旗境内旧三站、千家户、格尼一带开拓团的移民，也有个别的日军逃兵，一共约四百八十来人。其中有八十几名妇女虽然已和中国人结婚，这次也提出了回国请求。

本来这项工作只需登记造册后按时护送到齐齐哈尔，再办个移交手续就算完事了，可是政委夏辅仁同志一再嘱咐要做好宣传工作，工作要做到深入人心，让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增强对党的了解，对中国人民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了解。这下我就感到担子太重了，开初都不知道怎么着手为好。我曾请夏政委给侨民讲话，他不但没应允反而叫我动脑子动嘴去讲，而且要讲好，领导的信任更增强了我的责任感，我只好努力去办了。

当时在扎兰屯的日侨集中营里，没有被褥，有时连高粱米和白菜土豆汤都保不住，我怕他们借回国机会发牢骚。有个老太太卧病很久了却无钱治疗。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先组织渡边等几个姑娘到站前饭店当服务员，又组织他们搞起了土法酿酒等作坊，

用赚的钱改善生活条件。我向他们讲了政府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有时还送去药品，他们也对我们丝毫没有虐待之举有切身感受，所以日本开拓团长岩本、阿部等都表示理解。有一天，他们邀我向大家讲话，我便用日语讲了起来。我说的大意是开拓移民是日本普通人民，离乡背井来到严寒的大兴安岭一带落户，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彼此都是日本法西斯分子战争扩张政策的受害者，中国人民体谅他们的苦难，决定遣送回国。我还表示对他们照料不周的欠意。这些话可能打动了他们的心，在场的全都哭了，有的相互拥抱起来，接着呼喊起感谢共产党八路军的口号来。

他们启程前，岩本、阿部特意到盟和布旗民政部门邀请我方领导参加他们的告别晚会，说准备炒些苞米花共进一餐，请当地政府首脑分享他们归国的喜悦心情。我们参加了这个告别前的联欢晚会，还由盟、旗筹款买了几口白条猪、几袋粉条、一箱二锅头送过去款待了一番，好多日本侨民连连鞠躬表示感激的心情。

九月初，由我负责领队，在旗公安局派人保护下将这些日本移民送到了齐齐哈尔集中地点（即现在和平机床厂址），完成了组织遣送任务。

组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文慕仁盟分会和各旗支会。

这年的承德“四、三”会议以后，根据当时东蒙工委指示，于五月撤销东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乌兰夫、博彦满都分任正副主席，为将来统一东、西蒙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做准备。七月末，纳文慕仁盟也组建了自治运动分会，志达图为主任，设秘书、宣传两个科，有吴玉信等几名干事参加日常工作。盟分会成立后便取消了盟参议机构，其职能由盟分会代替行使，当时的各界联合会以及群众工作队等也全归它领导了。

十一月，各旗普遍建立了自治运动支会。记得布特哈旗支会

主任是鄂朗海，后为金增显，莫力达瓦旗支会主任是希岳尔图，阿荣旗是白音达利，巴彦旗是谁已记不起来了。我还记得龙江县也在这一时期建立了县支会，下有蒙民联合会等社会团体，阿木古郎为主任，他们是间接地归王爷庙总会领导。

布特哈旗支会成立后，我任组织干事，立即组建了扎兰屯各界联合会，推举林望溪为会长，我兼组织干事，那木吉勒为宣传干事，安延昌为群众工作队长，还有一位金同志搞女工工作。在反霸斗争时，开过几次群众大会，揪斗了伪工商会长胡品三、魏某和伪道德会长王某，事后戴高帽游了街。以后，为了学习经验，我陪着林望溪等共五人到齐齐哈尔参观，受到市各界联合会主任王盛荣和朱光、张瑞麟等领导的亲切接待。在齐市我们参加了省市各界联合会组织的经验交流座谈会，工会负责人陈有义、常一彬，妇联负责人杜贵绂，青联负责人霍希扬等都做了经验介绍。我们还参观了联合中学、感化院等地方，收益不小。

不久，根据当时的情况又组织了博克图群众工作队，深入博克图开展反霸清算斗争。这个工作队由内蒙青年团派德广岐负责，归旗支会领导。

安排了兴安省政府迁址扎兰屯的事情。

为适应当时"国共谈判"达成的双十协定，在五月二十八日的东蒙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将国民党不承认的东蒙自治政权撤销并成立了兴安省政府，特木尔巴根任主席。到七、八月时，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通辽、郑家屯后继续北进，兴安省政府转移到海拉尔，十一月，又迁来扎兰屯。为此，腾出了伪满日本开拓团的楼做为省府办公地点，把雅鲁河东岸一些旧居宅重新维修一遍供随迁的官员居住。实际上，兴安省主要蒙古官员仍然住在王爷庙，日常工作全由副秘书长达瓦敖斯尔主持。

十一月中旬，由兴安省和纳文慕仁盟共同组织了上百人的参观团到齐齐哈尔访问。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负责接待，住

在龙江饭店。嫩江省领导同志于毅夫、顾卓新、邵式平等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我们一行。在齐市，参观了感化院，听取了法院王敏求院长关于对犯人思想感化教育的情况介绍，还听了在押国民党人员王涛和董某的坦白悔过发言。大家还参观了东北军政大学，受到何长工副校长等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在那里我们还参加了蒙族学员的理论讨论会，这些学员中就有我们的家乡子弟。在这里稍带说一下，从八月份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初止，纳盟曾先后三次发动蒙古、达斡尔、鄂温克三个民族的青年报考东北军政大学，共输送了六十来名；莫力达瓦旗送去了三十余名。那次大家在齐市还参观了蒙古师范学校。

十二月初，为支援齐齐哈尔一带达斡尔族移民搬迁呼伦贝尔地区，纳盟组成了移民委员会，额尔登为主任，志达图、鄂嫩日图为副主任，下设若干工作人员。关于移民这件事值得一写，将另作专题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这一年，在教育工作方面，复办了扎兰屯中学，改名纳文中学，滕合台为首任校长；复办了扎兰屯葛根达斡尔族小学，乌尔根达赉任校长；年底筹建扎兰屯工业学校，达斡尔族留日学生才喜雅勒图担任校长。

入冬以后，兴安省为兑换苏军解放东北时发行的“红军票”纸币，经过与西满分局协商，决定发行在东蒙区域内使用的流通券，这些纸币就是在扎兰屯设计和印刷的。纳文慕仁盟政府特地邀请了达斡尔族美术家奈日拉图参加图案设计。记得他和参加印刷工作的人都被保护起来，在蒙币印刷完毕和编号登记之前，谁也不准回家或和任何人接触。

一 九 四 七 年 的 事

我在这年八月末离开了扎兰屯，所以只能把这年八月以前的事记上一笔。

年初，盟政府邀请博彦满都作报告，传达了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同志对蒙古地区工作的指示精神。一九四六年十月，博彦满都曾与李富春同志会谈过，形成了谈判纪要。在此之前，西满分局也有过对蒙区工作的政策性指示，都是很符合实际、很正确的。

这次传达的主要精神是团结蒙区开明王公喇嘛等上层人士，形成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蒙汉团结，共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在改善蒙古农牧民的生活方面，不能照搬汉族地区反满和清算斗争做法，要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互助。

二月末，兴安省决定在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努图克开展互助运动试点工作。为此省和盟政府及盟分会和布旗支会联合组成了工作队，额尔登领衔，省政府的科长额尔登巴图、胡和吉夫和我为副带队做具体工作。二月至五月，在该乡第二村、七村和靠山河搞试点。重点是搞好经济调查，内部掌握阶级成份情况，发动贫苦农牧民组织农会掌握政权，使地主自愿让出多余土地。我们在这三个村按照贫雇中农的意愿，选举产生了农民协会。记得第二村的协会会长是一位姓佟的蒙满人，靠山村是由索伦山迁居来的一位农民。

五月份，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兴安省迁回王爷庙，这个试点工作也就有头无尾地结束了。哪知这年冬，在全东北地区发动土地改革运动时，那三个村的民选农会会长被指责为“阻碍群众斗争”，受到了不应有的揪斗和伤害。

四月份，开始了搞“正义党”的斗争，在扎兰屯铁路俱乐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揪斗了被捕的郭蕊五等十五人，听了苏景阳的“坦白”。这件事，当时许多知情者早已发觉是个假案，然而限于当时的情况，没人敢提出来。从这件事又波及到移民问题，又有五十多人被牵扯进去，有部分人被判了徒刑，土改时有的因此被斗致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案件才于一九

八五年得到彻底平反。

也就在这年的四至五月间，由盟委和军党委联合组织领导了坦白交待政治历史问题的活动。这次活动没搞人人过关，号召自卸包袱轻装上阵，活动发展是健康的。那一次，盟旗汉族干部交待加入国民党问题的有两起。

四月二十三日在王爷庙召开了内蒙人民代表大会，内蒙自治区政府建立，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撤销。纳文慕仁盟组织了志达图为团长，额尔登、夏辅仁、鄂嫩日图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大会， 总人数有四十余人。 纳文慕仁盟的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分会、各旗及龙江县支会在九月份撤销。龙江县支会的阿木古郎、沃秀林、杜茂廷、单成文、沃殿宣、沃文涛等人都分配到内蒙各地工作了。

七月份，在扎兰屯建立了内蒙古革命青年团盟委，萨义尔同志为负责人。

八月初，内蒙军政大学派达赉（汉名金海如）同志到纳盟招考学员，于是开展了发动和考试等项工作。这次报考的人较多，都在扎兰屯工业学校参加了笔试，及格的都被录取了，有近四十人分配到设在齐市的第二分院，我是其中之一，少数被分配去了乌兰浩特的第一分院。那次招生，龙江县木腾等几名同志也来报考并被录取。

这里，我顺便说说于当年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那个月底，齐齐哈尔第二分院的扎兰屯学员，在“三查”运动中受偏激情绪影响，有人硬是编造了个所谓国民党——内人党暗杀团反革命组织，说它旨在加害乌兰夫同志。因为这件无中生有的事，那顺、鄂文举、安国梁和我等四名伪满大学生被当成首要分子，来自扎兰屯的达斡尔族青年中，约有三十人被株连，无故背上反革命帽子，许多人失去了恢复工作岗位的机会，有的被折磨了几十年，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才彻底平了反。这是一九四七年继“正

义党”问题之后的第二次大的冤假错案。

这年土改之前，纳文慕仁盟的军政人员基本上都被调到乌兰浩特，在内蒙军大一分院参加学习和想思改造。

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旗支会

杨　海　桥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旗支会，民间通称“蒙古自治联合会”是解放后在龙江县内的实体组织机构，并且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我们在编写《龙江县革命根据地简史》一书时，老县委书记刘淇生同志，看过初稿，修改稿后，多次向我们提出：“要增加少数民族的内容，要写联合会，要访问阿木古郎同志。”1985年末，我和刘世荣同志，奔赴呼和浩特，访问了阿木古郎同志，又访问了白音、木、滕鄂月英、鄂静海、色音达赖、王海山同志等十几位出生在龙江县的达斡尔族中高级干部，不但弄清了这连续的几个机构的沿革及所做的贡献，而且了解到达斡尔族的很多光荣历史和英雄人物。

这里根据口碑资料和查阅的档案资料，归纳出几个问题，记载如下。

机　构　沿　革

“纳温”，达斡尔族语，即“嫩江”。

据史料记载，早在1651年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时，受到集居于桂伊古达尔城一带的达斡族的英勇反抗，达斡尔族用弓箭刀矛，抵据沙俄强盗的火枪火炮，他们不屈不挠，誓与城寨共存亡。沙俄的哈巴罗夫率侵略者，妄图用惨绝人寰的杀戮胁迫中国

达斡尔族屈服，在桂伊古达尔一带，他们就残酷杀害大人和小孩六百六十人，甚至“用孩子的父母做炙架来烧烤儿童”，这种暴行也吓不倒英雄的达斡尔族人民，更激起他们对沙俄强盗的仇恨，奋起反击沙俄侵略者，涌现出托尔加等民族英雄，一度使哈巴罗夫处于绝境，乃至要“殉难。”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正忙于夺取全国政权，无暇顾及东北边陲地区，无兵力增援，并下令达斡尔族迁入嫩江流域。臣服于清朝的达斡尔族，只得奉令南迁，到嫩江两岸定居。因此，达斡尔族成为龙江版图上最早集中定居的民族，较汉族集中定居要早二百多年。到光复时，龙江县还有很多达斡尔族集居的村屯，还保留着很多达斡尔族的村屯名。如克木克、色力克、莫呼、全和太、文圃达、嘎查、莽格吐、卧牛吐、富拉尔基、库勒、水哈拉、罕伯岱、哈拉台、奇克奈、罕头、索伯坎、索伯台、沙合台、达呼店、嘎气哈、海格、哈雅、岗阿等等。就以富拉尔基来说，当时有五千多口人，达斡尔族就占一半。

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后，我党、政、军进入嫩江省府府在地齐齐哈尔市，建立起党、府、军领导机关，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发布了“告全省同胞书”，受尽日本十四年法西斯民族压迫的达斡尔族儿女，感到有了救星，纷纷投身革命斗争。省政府内设了蒙政厅，主要是抓蒙古族达斡尔族的民族工作。鄂秀峰、鄂嫩等与王明贵司令员取得联系，得到大力支持，组织起蒙古自卫大队，投入与官匪的斗争。这支队伍由二百五十人，最后发展到七百多人（后编入嫩江军区第五旅四十二团，1947年都开上解放东北战争的前线，为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蒙成立革命青年同盟会后，达木仁、白音、沃天海、乌力吉、木滕等在全和太、富拉尔基一带，也成立了东蒙古革命青年同盟会纳温旗支会，其成员都加入了蒙古自卫女队，积极投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5年末，当嫩江省党、政、军被迫撤出齐齐哈尔后，在富拉尔基建立了纳温旗。1946年5月，在扎兰屯召开了纳温地区人民代表会议，省工委和省政府派蒙政厅民政科长阿木古郎等参加会议，我们党的干部苏林、夏辅仁参加这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建立了纳温燕仁盟政权。4月下旬，根据承德“四·三”会议决议，在乌兰浩特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阿木古郎等同志去参加了会议。会上选举云泽（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总会主任。按照会议决定，在富拉尔基建立了纳温支会并委托由嫩江省工委领导。纳温支会主任是阿木古郎，副主任为帕格达，秘书股长为白音，副股长为鄂月英，总务股长为乌力吉（沃秀林），青年股长为徐兰亭。参加纳温支会工作的还有木脐、鄂长林等二十多人。省工委和省政府又决定将龙江县政府所在地迁到富拉尔基。阿木古郎同志和省工委、省政府研究，在一个地区，既要建立纳温旗，又要建立龙江县，两个领导机构，不好办。取消已有三十四年历史的龙江县（以往都是省内首县），说不下去，而党的民族政策又不允许忽视达斡尔族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因此，决定将纳温分会改称为蒙古自治联合会，作少数民族的群众工作；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在省工委、省政府领导下，于5月16日召开了代表会议，成立了龙江县民族民主联合政府，选举张培凯为县长，鄂嫩为副县长，阿木古郎同志任联合会主任。联合会重点从事达斡尔族的民族工作。不久，省工委把由何长工同志在洮南办的一个学院培养出的学员色音、吴国训、风鸣嘎、朝禄等分到联合会工作，成为阿木古郎同志的得力助手。1947年初，东北军政大学培养出来的学员包音达来、杜人、色音包力格等也被分配到联合会工作。联合会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领导达斡尔族人民的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斗争，动员参军支前，兴办民族教育，安排达斡尔族人民生活等，作了大量工作。内蒙自治政府成立后，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各级组织自1947年7月开始

撤销，在龙江县，于1948年3月完成土地改革后，多数达斡尔族干部被内蒙古自治政府调走或随军南下，公开建党和民主建政全面展开，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也在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撤销了。

诸 多 贡 献

“纳温族”虽然建立了，但没开展实际工作。“纳温分会”成立后，省工委就把这批干部集中到齐齐哈尔市，办了十五天训练班。由省政府主席于毅夫、秘书长王光伟主办，省工委书记刘锡五和于毅夫、顾卓新等同志亲自给讲课，讲社会发展史和党史，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讲建立东北革命根据地任务等，大大提高了这批民族干部的思想觉悟。学习后，他们下到各达斡尔族集居的村屯搞宣传，讲日本法西斯十四年残酷统治的痛苦，讲共产党抗日斗争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传阶级压迫和穷人翻身求解放等等，大大启发了达斡尔族人民的阶级觉悟，为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

联合会成立后，在贯彻落实“五四指示”时，联合会干部组成减租减息工作队，分成两个组，由洮南来的几个干部担任指导员。一组到七棵树，由色音负责，队内有十多名女同志，吴国训同志给县长赵飞克当秘书。一组由阿木古郎直接领导，以富拉尔基为中心，把干部分开，从哈雅屯到文固达一线，搞减租减息、反霸清算。工作队在知情的张和尚带领下，在王家油房起出很多枪支，武装了自己。同时，工作队在蒙古自卫大队配合下，还与土匪展开斗争，土匪一听有蒙古队在，就吓得不敢接近了。

1947年春，联合会的干部又组成春耕工作队，到各村屯去工作，都很有成效。春耕之后，又把一部分干部，如白音、鄂淑英、风鸣嘎等，送到齐齐哈尔市省行政干校学习，在齐齐哈尔成内立蒙军政大学后，又送木滕等人去学习，训练了一批达斡尔族

干部。

1947年11月，土改进入高潮，开始了砍挖斗争。达斡尔族集居的村屯，由联合会的达斡尔族干部去搞。当时在龙江县出名的达斡尔族大地主，主要有全和太的沃来宝。他在修中东铁路时，给沙俄买粮食，从中渔利发了横财，继而大放高利贷，盘剥穷人。除占有全和太附近村屯大部分土地外，还在富拉尔基开烧锅和买卖（商店），独占一条街。达斡尔族还有三大家族，一个是长岗子的鄂范五，他本不识字，伪满时，他鼓动移民，把不少达斡尔族粮去索伦山，贪污了九火车粮食和马匹，成为暴发户，又当过伪区长，1946年又鼓动移民。另一个是安子匠的库西德，占有几百垧地，粮占妇女，残酷剥削达斡尔族和汉族人民。但他家长子粮文彬参加抗日斗争，解放后又参加蒙古自卫大队任参谋长，后到内蒙五旅（后改五部）四十二团当团长。还有一个大地主是三大户屯的鄂巨庆，但他弟弟参加了联合会。沃来宝由富拉尔基农会直接斗争，后死在狱中。联合会派三个土改工作组集中力量斗争三大家族。一组由阿木古郎直粮领导，进驻长岗子，斗争鄂范五；一组由白音、杜茂廷带领，进驻安子匠屯，斗争库西德；另一组德桂范等进驻三大户屯，斗争地主鄂巨庆。

然而，开展砍挖斗争并不顺利，出现不少波折，主要有三次。一次是从扎兰屯来的何维忠到龙江说："达斡尔族本来就无地种，你们不该和汉人一起闹腾"。于是，有的干部回家不干了，培养起来的干部多文英也被接回家去了，影响很大。虽然阿木古郎和风鸣嘎同志与之争论后，用马车把他拉走了，可是，谣言四起，出现蒙汉对立情绪，给开展工作带来极大困难。阿木古郎带风鸣粮、木滕、鄂月英、乔国英等先到长岗子，可是开会无人去。他们到各家去访问，吃饭的群众见到工作队员便放下筷子就走。因为工作队员安全都无保障，所以调了蒙古自卫队连长范景阳、指导员吴自新带队伍来保护。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

开成了妇女会、穷人会。在会上，木藤等先唱歌颂达斡尔族英雄少兰代夫的歌曲，与群众沟通感情，再唱达斡尔族民歌“穷人为什么穷，打下的粮食归地东”等，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进而讲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讲共产党的政策，终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打破了民族间界限，穷困人团结起来了，在农会领导下，斗争大地主鄂范五的群众运动取得了胜利。另一次是，进驻安子匠的工作组，提出“苦水吐出来，财宝挖出来，反动地主关起来”的口号，先分了库西德家的浮财，斗争本来很顺利。但是从四十二团来了一个军官质问工作组和农会：“你们为什么分德团长家的东西？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工作组立刻回答：“德文彬是我军的团长，可他爹是残酷剥削穷人的大地主！”群众立刻敲锣集会，一个背猎枪的老人控诉说：“老地主把我唯一的女儿卖到北大荒，我要跟他算帐！”群众纷纷控诉老地主罪行。有的群众反问那个军官：“你们是什么四十二团，帮助地主说话？”群众要打那个军官，工作组制止了群众，告诉那个军官：“回去告诉德团长，跟他老子划清界限！”那个军官枪被缴了，吓得灰溜溜地回去了。在搞土改斗争时，联合会内部由于也不纯，开始时也有过斗争。有人与阿木古郎对立，提出什么“江西没地主，到城东(指齐齐哈尔城)去搞去！”阿木古郎同志反对这种观点，因为现实就有三大家族。在长岗子发生的这场争论很激烈，几天内阿木古郎同志脸都没洗。后来县长赵飞克同志去了，开了三天会议，决定在本地搞土改，斗三大家族以平达斡尔族民愤。尽管联合会内部不纯，对开展土改斗争有争论，但下去的工作组还是很讲政策的，就是砍挖斗争，也是搞得很稳。可是到后期，当蒙古军大学生下来后，就把运动搞的“左”得要命，影响也深。一是把四十二团团长德文彬同志从扎兰屯抓回来，活活打死了。二是受这种“左”的风潮影响，在万祥岗子打死了达斡尔族教育家、达斡尔族文字创始人之一的沃文德。此外，也打

死一些不应该打死的人，特别是一些地主的家属和子弟。

联合会从成立起，就办起了一个合作社，由吴文德（已故）、沃铁海（现住全和太）、单成文等负责经营，用一台大车到外地去采食盐，回来卖，解决达斡尔族及汉人吃盐难的问题，使人民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好！这个合作社在1947年由杜人负责时，搬到齐齐哈尔市去了。

联合会作的另一项工作，是办民族教育。1946年联合会成立不久，在齐齐哈尔市建起了蒙古师范，派沃文德去当校长，鄂月英、风鸣嘎都去帮助组建。这所学校一直办下来了。还派杨士义同志到齐齐哈屯办起了民族小学，对发展达斡尔族教育，作出了贡献。

总之，蒙古自治联合会，在建立龙江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完成了龙江县委、县政府难以完成的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各方面工作任务，贡献是卓著的。

移　民　斗　争

在记述联合会的诸多贡献后，有必要记述一下移民斗争。

1946年，随着"减租减息"和"反霸清算"斗争在汉族集居的地区如李三店、七棵树等地全面展开，汉奸、地王耕久和武二阎王等伏法，使得达斡尔族集居村屯的大地主也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蒙古自卫大队编入扎兰屯五旅后，大地主鄂范五等一方面煽动民族分裂情绪，鼓动移民，一方面跑到兴安省去找有亲属关系的上层人物，要求移民，并组织了以他和鄂郎海为首的移民委员会。兴安省成立了一个移民事务局，并到龙江县来联系。龙江县委、县政府请示省委、省政府，省委、省政府本不赞成移民，但是为了贯彻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迁移自由，决定派联合会主任阿木古郎同志抓这项工作。阿木古郎同志是不赞成移民的，联合会内大多数贫苦出身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都反对移

民，因为过去达斡尔族人民上过鄂范五的当，加之土地改革没有彻底搞完，穷人没有彻底翻身，不少干部提出要严格控制。县委尊重联合会多数干部的正确意见，对阿木古郎同志作了具体指示。1947年4月11日，以“蒙古自治联合会主任阿木古郎”和“兴安省移民事务负责人格热勒泰”名义，联名签署了一份“关于达斡尔族移民的通知”。这个作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的通知，是联合会与兴安省移民事务局经过反复讨论和据理力争而形成的。现抄录如下：

关于达斡尔族移民的通知

按县政府通知，关于蒙古人移民事，托本会、兴安省移民事务局会同办理，并规定办法，通知如下，希各农会将本屯移民者之手续一同办理，由移民者出一名或二名代表，将农会之证明，携带到所管区政府迁移登记，并受允许后，速来本会、局送交证明文件，以便转送县政府，办理手续，此致。

一、凡上次登记自愿迁移各户，可以迁移，以前未登记，现在自愿迁移者亦可。但不管过去、现在要迁移的移民，一定是自愿的，而且不影响春耕，否则不准迁移。

二、上述自愿迁移而不影响春耕的移民，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和手续：

1、要把债务清理清楚，并持有当地农会及区政府的证明，凡债务未清者，不得迁移。

2、移民携带的财产，必须经过当地农会及区政府的证明，开列清单，送本会、局，否则不准带走。如合乎迁移条件的人，自愿将其财产交与当地农会或政

府处理亦可。

三、移民的时间，到本月末截止（阴历四月末），过期不受理。

四、凡合乎移民条件者，必须携带上述手续，经本会、局审查后，始得转送县政府发给移民护照。

附告：

此次主要办理上次登记的移民手续，不准下乡宣传发动移民，如有此项事件，应即停止，并请报告本会、局为要。

蒙古自治联合会主任　阿木古郎（印）
兴安省移民事务局负责人　格热勒泰（印）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一日

这个通知，控制住了贫富两头，也控制住了煽动移民的一些地主和上层人物的活动。对想要迁移的地主是一个打击：想迁，财产啥不得；不迁又怕挨斗。而对贫苦的达斡尔族人民则是救援，使他们在土地改革中，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这次移民，确实走了少数中小地主、中农和少部分觉悟低的贫民。联合会坚定地站在贫苦的达斡尔族人民立场上，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我们所访问的出生在龙江县的达斡尔族革命老同志，都十分珍视那段难忘的斗争岁月，盛赞党的政策好；也十分眷念出生的故乡，关心现在居住于龙江县和齐齐哈尔郊区的达斡尔族人民。他们虽然多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高级干部了，但都痛恨1947年的移民。他们对自己被调出和要求调出也抱有遗憾，他们说，很集中定居的达斡尔族，却四分五散了，这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对民族史的挖掘和整理，特别是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个难以弥补的损

失。

我们在访问中，从受到的热情接送和款待，到听他们对历史的回顾，深深感到达斡尔族是一个有着顽强斗争历史的英雄民族；他们的性格直爽、豪放，不隐瞒自己观点；他们的感情溢于言表，毫不掩饰；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都在各自岗位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从他们填写的个人简历表上还发现，原籍都在龙江县各个村屯，虽然很多村屯早已划归齐齐哈尔市了。他们热爱龙江、热爱家乡的感情，可见一斑了！他们有的已多次故地重游，有的希望故地重游，有的乃至要回归故土，"落叶归根"！

光复后的一次移民风波

卜 林

从1946年5月起，齐齐哈尔一带达斡尔族中以鄂范五为首，正在酝酿着往呼伦贝尔移民一事，同年8到11月，龙江县、纳文慕仁盟、兴安省相继成立了移民委员会，声援和支持鄂范五主张的移民活动。与此同时，以龙江县自治运动联合会（当时简称蒙古联合会）进步民族青年为一方，大张旗鼓地反对移民活动。嫩江省、西满分局以及中共东北局对这件事是了解的，由于考虑到党的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当时，对上层分子刮起的移民风持有谨慎态度。后来齐齐哈尔一带鄂范五等与当时兴安省呼、纳盟上层分子形成一股强大的移民势力，在1947年3月份，终于组织了195户江省达斡尔移民北上牙克石定居，这就是当时移民问题的梗概。1947年4月份，扎兰屯达斡尔族军政界人士纷纷集会，严厉痛斥了阻挠移民工作的龙江县蒙古联合会，以致后来竟制造出无中生有的“正义党”事件，相当一部分人被定为“反革命”，成为一桩历史冤案。

下边仅就我所了解的，介绍一下移民活动情况及“正义党”事件。

移 民 问 题

当时的移民动机与背景 1946年夏秋，齐齐哈尔一带的移民

活动范围相当广，波及到嫩江省到兴安省各盟旗，这一带刮起的移民风，中共东北局和西满分局通过中共嫩江省委的汇报，已经早有了解和掌握，对这一事情很为重视并作出了蒙区工作的指示。

中共西满分局关于东蒙古工作的指示中提到："蒙古人民由于长期受着反动统治者大汉族主义之各种压迫，及敌伪十四年之蹂躏，具有强烈之民族意识及民族偏见，加上过去敌伪之挑拨，蒙汉民族间，蒙汉杂居地区之蒙汉人民间现尚存有严重的隔阂，……而嫩江数十万蒙人因为惧怕被汉人同化，酝酿搬往海拉尔，凡派往蒙区工作之干部，特别是党在决定有关蒙人政策时，必须严格注意这种民族特点……"。

中共东北局关于蒙区工作的指示中同样提到上述观点："对于过去由大汉族主义的统治者剥削者的罪恶行为及日寇的挑拨离间所造成的蒙汉民族间的隔阂与成见以及目前蒙古人民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与要求，必须充分的注意；对于蒙汉杂居地区的地主上层分子甚至部分基本群众向兴安省内部之迁移（据闻嫩江数万蒙人因怕被汉人同化，亦酝酿西迁），以及因某些政策上的过左，而引起之波动，必须严重的警惕，目前主要的是纠正和防止左的偏向，不然将造成我们在蒙区工作之严重困难和损失，……应该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包括反对国民党的王公、贵族、喇嘛）结成广泛的、强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详见中共西满分局文史资料转载）。

1946年冬，在李富春与博彦满都谈判纪要中，对蒙区工作又重申了党的稳健工作的方针。

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共东北局、中共西满分局以及李富春同志本人对于蒙汉杂居地区的现状了解的准确透彻，各项指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回想起1946年5至11月间，我曾有三次走访过齐齐哈尔北关

鄂家胡同一号鄂范五家。我每次走访鄂范五家，都遇到与外来客人谈论移民的场面，其中有齐市城内的，有依克明安旗的，也有龙江县的，又有扎兰屯和莫力达瓦旗的，听说海拉尔也有来的，可见，鄂公馆是无形中成为议论移民的中心场所。

我先后和鄂范五、鄂朗海、鄂嫩、单宝玉等人交谈过，从中得知他们提倡移民的原因有如下几条：第一是对旧民国军阀政府占地开荒缩小牧养地盘，匪患不断抢掠达族牛马牲畜，以及奸商盘剥、赌博敲诈等给达斡尔族百姓带来的倾家荡产一事，深恶痛绝，认为是再守故土，迟早是流离失所；第二是外来人口有增无减，早晚被外族同化而尽；第三是蒙区有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不久将来还要成立内蒙自治政府，对少数民族带来许多政策实惠，达斡尔人生产经验总比草原蒙古强一些，可以农牧业齐发展，也可搞远途运输、入山伐木等，生活会远比江省要好，再说内蒙对待地主牧主及上层分子所采取的政策比较平稳，对汉族地区开展的清算斗争有些害怕。

有些富有者盼望脱离江省杂居区，准备流入草原地区过个平稳生活，当时他们的家产多底子厚，不宜轻易迁居，先叫贫困百姓趟个路，摸准政治气候后才搬进蒙区，正如鄂范五所说的那样，“先叫他们搬去，以后我家也准备搬去。”当时就有消息说内蒙牧区不划阶级成分，而1947年初，在内蒙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开展的互助运动，就是和平分田过渡的试点。这些都吸引了富有阶层想流入内蒙，在裙带关系中富有阶层一呼，其裙带贫困阶层则一应而动。这些都构成了当时移民的复杂背景。

移民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1946年8月，在富拉尔基召开了移民工作会议，与会人员有阿木古朗、鄂嫩、莫英宝等人。会议讨论了移民活动计划，安排鄂嫩、鄂月英去呼伦贝尔自治政府拜见额尔钦巴图主席，探听对方对移民问题的态度。8月末他们去会见了额尔钦巴图主席、德力格尔副主席和哈达秘书长等人。

呼伦贝尔自治政府表示了愿意接受齐齐哈尔一带达斡尔族移民的意向，认为是农民开荒耕田，有利于自治政府开辟粮食来源，然而，也提出了牧区草原不得开垦为田，移民吃粮自行解决等两条先决条件。事后，由索伦旗旗长恩克巴图和索岳尔、毕力格等陪同，特意考察了牙克石、扎罗木得一带的可开垦地区，最后确定牙克石镇郊为移民点。富拉尔基的那次会议还决定派鄂英海去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希望通过苏联领事规劝呼伦贝尔自治政府设法收容江省移民。

1946年9月，在富拉尔基召开了齐齐哈尔地区移民工作委员会成立会议，推举鄂嫩日图为主任委员，莫英宝为常务副主任委员，德文斌、鄂嫩、鄂英海、鄂秀峰（本人未与会）等为委员。会议推举鄂嫩日图、德文斌二人到扎兰屯活动，争取纳文慕仁盟领导层的大力支持。在纳盟小会议室，盟的领导听取了鄂嫩日图、德文斌二人关于移民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对移民安置阶段的吃粮，表示全由纳盟政府承担下来，还许诺组织移民工作委员会，尽力争取做到从财力物力方面给予支援。以后，德文斌协同鄂朗海又到设在扎兰屯的兴安省政府，见到了兴安省政府秘书长达瓦敖斯尔和参议员郭兴元（又名韩罗巴图尔），同样得到了兴安省政府的有力支持。这次会议还推举阿木古朗（当时是龙江县自治运动联合支会主任）和鄂嫩（当时是龙江县副县长）二人前去嫩江省人民政府，向于毅夫主席请示和汇报移民工作情况。据悉于主席一再指示移民以自愿为原则，表示许多悬挂问题待请示中共西满分局以后另做回答。后来又传来消息说，移民总数不超二百户为原则，西满军区力争帮助解决北上移民的车皮问题等。

1946年10月，纳文慕仁盟成立移民工作委员会，盟长额尔登（汉名金耀洲）为主任，第五师长鄂嫩日图为副主任，敖玉祥、德文斌、鄂嫩为委员。会后召开四旗会议，落实了移民口粮支援

等问题。

1946年11月，在扎兰屯成立了兴安省移民工作委员会，兴安省参议长博彦满都为主任，额尔登和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等为副主任，达瓦敖斯尔、绰罗巴图尔、志达图、敖匡海、敖玉祥、杜拉尔托布、鄂嫩、德文斌、吴化民、鄂朗海等为委员。会后，绰罗巴图尔与扎赉特旗联系了移民的口粮和种子等问题。

齐齐哈尔地区移民工作委员会从成立到当年11月，工作进展较为顺利，后来，有人说起伪满时移民的遭遇，使许多人重新冷静了下来，随着而来的是嫩江省人民政府对当时的移民工作，明确表示了不阻拦也不支持的态度。1946年10月末，于毅夫主席特意召见了移民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阿木朗同志，正式表达了嫩江省政府不同意组建齐齐哈尔地区移民工作委员会。按照于毅夫主席的指示，在齐齐哈尔召开的达斡尔族各界人士集会上，由阿木古朗同志正式宣布了省政府取消移民工作委员会的决定。从此以后，在齐齐哈尔一带主张移民人士中间产生了爆炸性反感，然而，多数人则认为政府不参预不干预移民活动，取消龙江县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的移委会，正是说明了官方不参与不拒绝的移居自由的原则，省政府的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移民和反移民之争 主要发生在以鄂范五为首的移民势力和龙江县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之间，后来扩及到内蒙扎兰屯一带，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达到高峰。

下边例举几个例子：

1946年10月至12月间，移委会派遣莫英宝、单宝玉等周游龙江、富裕、泰来三县达斡尔族部落，大力宣传移民有利兴家立业等事，凡莫英宝、单宝玉等所到达的民族部落，跟其后就有蒙民联合会的群众工作队到来，规劝群众吸取伪满那次移民的教训，别上地主及上层分子鼓吹移民宣传的当，有些人干脆就说：“地

主富人煽动移民就是要逃避清算斗争”，这就更气恼了主张移民的势力。

1946年11月，兴安省、纳文慕仁盟联合组织参观团，特意参观了嫩江省齐齐哈尔市。在参观期间，由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同志主持，在龙江饭店召开了达斡尔族各界人民的座谈会，移民问题成了座谈会的热门议题，而且围绕着移民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我在座谈会上看到，原来支持移民的阿木古朗同志，反而站在反移民方面去了，在座谈会露头的只有鄂嫩一人，在其身旁虽有鄂朗海、莫英宝、单宝玉等人，但少言寡语。附和鄂嫩的发言者还有郭兴元、敖玉祥、吴化民等。蒙民联合会一方，阿木古朗为领队，下有洮南军干校、北安军大、甘南军干校毕业的一部分小青年，如范景阳、敖景奎、阿金、风明嘎、吴国训、那木吉拉等，都出席了座谈会。在座谈会发言中看得出鄂嫩的发言是毫无准备的，阿木古朗的发言是提前准备好了的手稿，表达的有条有理。

我听了双方不同见解的发言，对旧社会本民族苦难的遭遇，无论是哪一派都有同感，为民族的明日而担心的心情，都是共同的。然而反移民派人士强调时代变了，对民族关系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他们的见解是：祖国光复后，共产党来了，在党的民族政策灿烂光辉下，坚决抵制那些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后果，主张民族平等，决不允许出现民族压迫制度，更不允许采取同化政策，党接管政权后，又帮助建立蒙政厅，又恢复了旗制，相应地组织了蒙民自己的团体等，这决不可以与旧社会的大汉族主义者相提并论。阿木古朗等同志以上述内容大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全面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不宜照搬旧黄历、旧的民族关系，要人们注意吸取过去的地失人亡走向贫困的历史教训，这个历史悲痛教训不能重演等等。阿木古朗的发言是有一定分量

的，给予一意孤行者提出了劝告。不过，在这次发言之后，从齐齐哈尔到扎兰屯，人们头脑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人背地议论着："阿木古朗变了，可能是入了党，又唱出老八路的腔调"，也有的说："阿木古朗是投机分子、民族叛徒"等等。阿木古朗是地主家庭出身，又是伪满莫旗的总务科长，然而，他在那种环境里能认清形势舍旧图新不容易，也是难能可贵的。

1946年底，鄂朗海辞去了布特哈旗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主任的职务，他往来于齐齐哈尔和扎兰屯的兴安省及讷文嫩仁盟呼伦贝尔盟自治政府之间，齐齐哈尔一带的移民动态，全由鄂朗海提供情况。

1947年初，鄂朗海来扎兰屯活动，说西满军区帮助出火车皮一事，已经自食诺言，不准备出车皮支援了；说了嫩江省于毅夫主席取消移民委员会和阿木古朗领着一帮激进青年在他们背后搞反宣传扯后腿等。为这件事在扎兰屯军政界中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纷纷集会议论此事。齐齐哈尔地区移民势力通过鄂朗海说劝兴安省、纳盟、呼盟政府领导和一些上层人士给以支援。兴安省首脑博彦满都、达瓦敖斯尔、郭兴元很为积极，纳盟盟长额尔登以及志达图二人则是小心翼翼，鄂嫩日图开始设法回避，唯独军政界齐齐哈尔一带出身的中下级干部以及莫旗个别干部表示全力支持移民的事。

移民北上 齐齐哈尔一带移民头行人莫英宝在移民北上前，曾来扎兰屯通知移民北上的日期。得到通知后，扎兰屯军政界临时组织了移民接待事宜的班子，在大家一致推举下，鄂嫩日图勉强挂了接待主任的名。师部、盟府、布旗各做了分工，对准备移民的早餐、组织人力到扎兰屯车站为移民服务等问题，都做了详尽安排。

记得是1947年3月中旬，扎兰屯军政和学校、团体组织数百名队伍去车站迎送北上牙克石的移民，省、盟、军、旗的头目人

在火车站接见了移民代表，莫英宝等数人下车接受了献花。

在扎兰屯火车站上，停留着长长一排的专列，头四、五节客车厢坐满了人群，后边挂有十几辆的货车厢，载满了牛马和车辆。我们前去移民车厢接见时，我了解到移民们来自鞍子匠、嘎查、后罕伯岱、大黑岗子、敖宝、齐齐哈、长岗子、阿拉尔等二十几个村屯，而其中地主户仅仅一二户，多数是江省的赤贫户或破产户，而且都是初次移民户。时间虽然短暂，我却对北上移民有了初步的印象，也为他们将来面临的种种困难而担忧。

专列停留两个多小时后便徐徐向北方驶去。

牙克石移民陷入困境 1946年3月，移民到达牙克石后，一无房屋二无耕地，全部移民聚堆在各大车店屋。春暖花开季节，选择牙克石郊近处开辟了两三个移民部落。因为新安家立业，口粮耕畜种子住房等具体问题上，都遇到了极大困难。口粮断了，跑到扎赉特旗运粮，七拼八凑盖起了住房，又赶上当年龙江县自治运动联合会支会（即当时称蒙民联合会）派群众工作队来开展土改斗争。当时，移民中间没有几户地主，贫雇农没有什么土地可分，也没有牲畜及浮物可得。那里的土地土层薄，无霜期短，上冻早，种下的大田在新荒地里颗粒没收。第二年开始，195户中间重新搬回江省的就占三分之二，剩下五十几户也全搬进牙克街，建立了前进队，不过几时，其中又有二十几户搬回江省，留下的不足三十户，也陆陆续续地落叶归根重返了江省。

从这次移民中可以看出，这是伪满移民悲痛教训的重复，是一次不得人心的盲动，最后是以劳民伤财和失败而告终。

“正义党”冤案的始末

1947年4月，在扎兰屯逮捕了“正义党反革命组织”，这是个由于移民问题而引起的一桩假案。

1947年初，鄂朗海、莫英宝等二人来扎兰屯活动，在雅鲁河

畔的扎兰屯，刮起了激烈的移民风，有些感情冲动的军政界及知识界人士，大骂龙江县蒙民联合会的阿木古朗是“民族叛徒”，又指责进步民族青年的“扯腿行为”，骂他们是“汉人的走卒”。对龙江县蒙民联合会火头很大。

就在此刻，吴化民、比力格、金振昌、陶士义等授意同情者，用大会、小会形式发动人们全力声援齐齐哈尔地区的移民，并为移民早日北迁扫除障碍。为呼应鄂朗海来扎兰屯活动，有二十几名移民同情者在扎兰屯的伪女子国民高等学校的校舍里聚会议论过。据与会者吴化民、纲嘎尔等人的透露，会上对龙江县蒙民联合会扯后腿行为很是不满意，尤其是对龙江县蒙民联合会借以民意去西满军区和嫩江省政府要求官方撤回支援移民的许诺，以及他们出口就扣上“逃避阶级斗争”的伤人言论表示了极大地不满。这次集会很快地传到扎兰屯各界，在扎兰屯军政界引起了震动。

1947年3月末或4月初，我到鄂嫩日图师长家串门，他住的是日伪遗留的日本式住房，我进屋脱鞋上了“塔塔米”炕。鄂的老母亲迎面走过来相告说：“他姑夫，今天有重要事，小客厅正在开会，师政委和八路军老干部也来了，崇斌一再嘱咐不叫任何人进屋，这可对不起了，你改日再来吧”。当时我就有些见怪，边穿鞋边往外走，鄂的老母也送到门前。这位老嫂子偷偷地在我耳边说：“他们准备抓一帮人。”要抓谁？为了什么事抓人？我真是一时摸不着头脑了。

1947年4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第四十二团的两名小战士到我家串门，无意之中漏出这么一句话：“昨夜里从齐齐哈尔抓来了四五个人，据说是鄂范五和他弟弟鄂英海、鄂朗海，还有他女婿单宝玉和鄂嫩，是齐齐哈尔公安局押送到这里的。”他们一再要求我，这是四十二团的秘密，上边一再嘱咐不准向外泄露，要我守口如瓶。

一两天以后，吴化民告诉我说，敖勤学、包德华、莫英宝、

比力格、金振昌、金振玉、苏景阳、索岳尔图，还有海拉尔的索岳尔毕力格、陶士义、莫尔根巴图尔等全关进了四十二团的小牢房。不久吴化民也被捕关了进去。为什么抓这么多的人，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摸不透其究竟。

几天之后，听到了要揪斗“反革命分子”的消息，发动各机关在划清界限的基础上搞揭发，还听到盟里成立了镇反领导小组和坦白运动委员会，成员有克力更、鄂嫩日图、叶华、于明、萨义尔、萨裕民等，还有沙舵、鄂文林等几名青年。

1947年4月初旬，在扎兰屯铁路俱乐部大礼堂里，召开了揪斗“反革命”的群众大会，克力更主持了会议。在台上被揪斗的有鄂范五、鄂英海、鄂朗海、 索岳尔图等四人， 陪斗的有不少人，最后有人上台假坦白交代，说是有个“正义党”组织准备时机成熟时，率第四十二团士兵武装暴动，又说扎兰屯还有“内人党”、“竹林七贤党”、“前进党”等，这完全是逼供信而无中生有， 由这个假坦白所引起的政治后果是， 外地说成扎兰屯是“反动窝巢”，给扎兰屯的少数民族人士身上糊上了说不清道不白的阴影。

事后，被关被斗的人有的判五年、三年劳改，送进牙克石山沟里，有的未追究刑事责任，仍然照常上班工作。

自从揪斗“正义党”以后，许多好动脑筋的人，特意向被株连者探听过事情的真象。纲嘎尔说：“根本不存在此事，纯属胡乱编造”，吴化民说在伪女高校舍的聚会上，比力格放过这样一炮：“人家有共产党有国民党,我们虽然不叫什么党,可是我们是为民族正义事业和为真理而奋斗”，这可能就是“正义党”的由来。金振昌说“我也给自己抹上大黑脸，但没有此事，是有人胡说乱编的。”即使是当时，也有许多人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个假案，可谁敢冒风险说出来呢！这个1947年的大冤案，给被株连的五十八名同志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这件长达三十八年的历史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在全国达斡尔族人中间激起了极大的良好反响。该案中被处死的何布台、胡龙海、德文斌、比力格、郭兴元、吴化民，还有在服刑中因伐木砸死的鄂嫩，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实事求是”太重要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有错必纠的气魄，太令人钦佩了。

达斡尔族部分群众移居牙克石经过

鄂 秀 峰

一、移居牙克石的历史原因和现实背景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俗言："故土难离""叶落归根"，"亲不亲故乡的人""明不明故乡的月"。这都说明人们对生息过的故乡有着多么深厚的情感和留恋之心。

达斡尔族人很早以来就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林、牧、渔、猎业生产。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在经营生产上各有侧重。据历史记载，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在清代总称索伦，原来分布在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上游、中游及其支流精奇里江，今结雅河流域一带，后来由于受到沙俄的不断侵略，陆续迁徙到黑龙江南岸嫩江流域，至今已有数百年了。嫩江流域地处平原，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并有水利之便，因此，很早以来我们达斡尔族就定居于此。然而，清朝政府为了其政治需要和巩固边防，于1732年和1763年把部分达斡尔族人移往呼伦贝尔和新疆伊犁地区。但绝大多数人民较长时期定居于嫩江流域，是开辟嫩江流域的原居民之一，这点是毫无异议的了。

（一）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生产生活概况

以往由于嫩江流域地处边远，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清王朝对东北地区的封锁政策，因而人烟稀少，只有满、蒙、达、鄂温

克等几个北方少数民族居住于该地区，而且彼此都单独建立村屯居住点，过着定居生活。

达斡尔族，当时还保持着半原始的氏族社会，据查单期的村屯都是以一个姓氏或数个姓氏建立的，氏族长（即莫昆达）管理行政以及氏族内部各项事务。多氏族联合的村屯，共选村长（即嘎辛达）。由于过着半原始社会生活，私有观念薄弱，至1930年初，还是过着那种生产生活方式：一家杀宰牲畜，邀请全族老幼去吃肉，守猎到一只小兔也要分食，每次打鱼男女老幼一起出动，不论收获多少人人平均有份，红白喜事或盖房筑宅全氏族都全力以赴。

由于和先进民族接触少，处地闭塞、落后，生产生活上因循守旧，很少改进，满足于现状，这种状态也与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在农业生产上，广种薄收，只满足于自给自足，在耕作物上也仅限于习惯的几种农作物，如种稷子、燕麦、荞麦（去皮吃米，也喜欢吃而）、豌豆、胡麻之类，后来也种一些谷子、玉米等，而这些基本上都属于低产作物。在耕作上多是漫撒种，不铲、不趟；使用的农具和运输工具更是落后，使用套四头牛的大抬犁，用爬犁往复拖，并用大鞅子车和大轮车；在守猎上用火枪以及棍棒、鹰犬等；打鱼用片网或叉、钓钩等工具，总而言之是靠天吃饭。

达斡尔族人民在清王朝执政时期被编入八旗。都披甲为兵，必要时应征参战。他们富于智慧，具有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些在历史上都有很高的评价。

达斡尔族在清代地位问题，输尻登（日）在其所著《达斡尔族》(奥登桂译)一书中写道：“达斡尔族从属于清朝以后，平定过三藩之乱，参加过攻克尼布楚之战（可能是雅克萨之误），驻防巴尔虎地方，远征准噶尔，驻防呼兰、伊犁塔尔巴台……出入于千军万马之中。他们的足迹，北从兴安岭开始，南到台湾，西

至伊犁并且屡建伟绩，为清廷尽忠效劳，因而蒙受历代皇帝的器重，享受特殊待遇。由于他们在政治和行政方面具备天生单纯的民族性格，曾经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参赞大臣、库伦办大臣、黑龙江将军、齐齐哈尔将军、吉林副都院或侍卫大臣、江宁将军等职务的多人……”。所列达斡尔族的伟绩皆属事实。在《黑龙江人物志稿》中，明确写出达斡尔族的杰出人物就有九十四名，这些人都分别参加过抗御沙俄入侵、平定三藩、准噶尔、大小金川叛乱，收复台湾和中日甲午之战，亦有多人参加过对缅甸的远征。为犒赏这种丰功伟绩，清朝政府制定了对达斡尔族优待的政策，其待遇和地位仅次于满族，除了准大小官员一律世袭之外，对全族人发放土地、草场和牧场。当然，劳苦大众还是受到当权者的苛刻的盘剥、压榨，甚至达斡尔族的上层分子与清朝统治集团之间也存在着利害冲突。这在历史上也不乏记载。但是当时毕竟是得到了许多的优待。发放的土地分为三种：

其一，生计地。分给各户用于农耕，是种植粮食和各种蔬菜生产用地。这种土地归个人所有，发放执照，各户人口增加或减少，已经发放不予变动，允许个人自由买卖或典当。

其二、牧羊地。是分给各村屯的放牧用的共有土地。这种土地不许开垦耕种，不允许个人典当买卖，属于原居民共有。迁出本村或迁入其他村屯不予变动，仍有放牧权，而且免征税捐。

其三，草甸子。这种土地一般离居住区较远，而且不宜开垦耕种。多是盐碱地，生长营草，牲畜爱吃，长膘。这种土地分配各氏族共有，平时不许在草场放牧，只有在夏末秋初，全氏族出动去草场打草，蓄备冬春圈养牲畜，以后由于管理等问题，各氏族把草甸子平均分配给各户， 并允许自由买卖。 当时因不宜耕种，所以地价不高。

上述情况虽经辛亥革命，建立了民国，仍保留未变。溥义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凡是在清政权任过官职

的蒙古王公和劳苦功高的八旗兵在一定时期内都要享受原俸禄的三分之一待遇”。为此，清朝末期驻黑龙江省将军朱子桥在交权的同时从国库银两中拨出十四万两白银（数字不准确），分给讷河布特哈八旗筹办处和卜奎（即齐齐哈尔）旗务处（都属新建机构），其用意不外是照顾达族清朝时期的官吏、八旗兵以及功勋人员的后代，以便在一定时期内生活上得到保障，其次是兴办教育和福利事业。然而齐齐哈尔市旗务处总办庆同普（原世袭统领）年已古稀，而且吸鸦片，利用旧商人杜汇川为其筹划，据莫金瑞、鄂英海等人回忆，除了每年二、八月对清朝遗老发放三分之一的俸禄外，为了“生财有道”，把其它的银两用来修筑齐齐哈尔至昂昂溪之间四十华里的窄轨铁路搞运输（每天往复一次只有两节车厢，一台小火车头），另外投资于广信公司，并开了汇川五金洋行，未闻其搞什么兴办教育和福利事业。对此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庆同普实际上是傀儡，由旧军阀操纵他，而且使余下的经费和收入均被军阀吞掉了，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无从考证。

与上述情况相反，讷河的布特哈八旗筹办处总办额勒春，把所得的银两除规定发放给清朝的遗老外，其余部分都用来兴办民族的教育和福利事业，把青年派往全国各处求学，对在外地学习的学生，每月发给助学金，寒暑假发给旅费等等，从而培养出不少有文化知识、有思想觉悟、为民族事业奋斗的人才，很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在嫩江流域生活着的各民族，一般都不杂居，单一民族建立的村屯较多，尤其达族更是如此。因此，村屯的干部（村长之类），都由本民族或本氏族的人员来担当，为此虽建立了民国，但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变动不大。

为什么要费很大的篇幅追述过去的人民生活呢？因为我们的老一辈人将以后的生活变化和从前自己经历过的相比较，总是有

一种和社会发展相违背的误解，他们认为还是“过去好”。这样就自然而然影响后代，不但不改进生产方式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反而采取逃避的方法，数次向地广人稀之处迁徙（单独外迁者至今不断），这不能不说是历次移民的原因吧！

（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变迁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的中央统治崩溃了。从而对东北地区的封锁政策也被打破了，加之连年军阀间混战、割据，同时水、旱、蝗灾不断发生，使人民流离失所，大批难民来到东北，其中不少人来到了嫩江流域，原来地广人稀之处，人口突增，而且民族成份的比例也大大起了变化。从关内移民来的群众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知识和生产技术，并且绝大多数群众生活俭仆，能吃苦耐劳，生产生活上兢兢业业，当地居民是无法比拟的。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草场牧场被开垦而逐渐缩小，最后达到无法散放牲畜的地步。由于民族成份的变化，当地的地方政权逐渐由外来居民代替。当时当权的地方军阀派驻各地的官员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对原居民实行不平等的待遇，而且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奸商、高利贷者无止境的盘剥，再加上到处土匪蜂起，匪、兵合流，到处奸淫烧杀等原因，在短短十数年内，原居民中的达斡尔族人民的绝大部分生活一落千丈。加之难以容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例如大小诉讼和民间纠纷一到官府，达斡尔人是永远无理！因此当时很多人深感没有民权之苦，尤其老人怀念前清政府。在建立民国后，为了达到朝中有人的目的，当地达斡尔族人民群众自动捐款购选票，把当时的达族人金寿有选进黑龙江省议会驻会议员。这些，足以说明人民群众的愿望。为此曾出现过许多冤案，也出现了很多反抗压迫的好汉。如少郎代夫等人，其事迹至今流传于民间。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达斡尔族的先进分子，曾奔走呼号，但终属徒劳。所以为了长远利益，曾积极采取措施，如办学校学习

汉语，往各地派送私费学生等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进行各种民族分裂活动，以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当时的民族上层分子和日本人勾结，建立以达斡尔族人为主体的伪满的一个省，即兴安东分省。为巩固统治地位，改变当地的民族比例成分，动员各地特别是齐齐哈尔市郊区各县、区的达斡尔族人民群众向兴安东分省境内迁徙。地点分三处：一是阿荣旗境内；二是布旗境内；三是喜扎嘎尔旗（科右前旗索伦镇）境内。这当然是日本人的阴谋，一则为日本人向东北各地进驻开拓团挤出领地，如向齐齐哈尔附近开来的开拓团就直接占据了移走的达斡尔族人民的田园。另外是为了充实边防（向阿尔山移民就是如此）。同时也迎合了达斡尔族人民企望到不受压迫歧视的自己人掌权的地方生产生活的心理愿望。而且地广人稀、资源丰富这一点也确实具有诱惑力。当权者还许诺对移民发给生产资料和一部分费用。这样从1933年到1941年间，向阿荣旗境内移进二百多户，向布特哈旗境内移进四百多户，向索伦地区移去四百五十多户。这些移民群众得到了耕畜和部分生产生活费用，建立了纯达族人的村落，也建立了学校。但同时，灾难也随之降临，由于水土不服、气候寒冷，移居布旗和阿荣旗的群众多数患上了克山病，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迷信鬼神，不用医药，死亡人数很多，其中尤以妇女居多，个别村屯十室九空，下场甚为悲惨！迁移到索伦、阿尔山、伊尔施、杜勒尔去的达族人，在“八·一五”解放当初绝大部分又迁回原籍去了。

以上简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嫩江流域的达斡尔族人民在解放前的生活变迁。

（三）关于移居牙克石的由来。

1、亦如上述历史的回顾，民族矛盾是历史遗留的问题，虽然东北即将解放（齐市于1946年4月末解放），但民族之间的不

信任并未随之消除，被大民族歧视过的烙印以及恐惧心理依然存在。

2、至解放前夕，达族人民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趋向枯竭以至生活窘迫，如土地减少，草场破坏，鱼猎争夺，苛捐杂税相逼等，生计每况愈下。

3、解放后人民群众有自治的愿望，渴望有自己兴办的教育，延续本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

4、原发起的人们，想学苏联，搞集体农庄，走自己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

5、部分知识分子，对原嫩江省许诺成立纳文旗后被撤销而不满（撤销的理由是人口比例相差悬殊），因为不能满足自治愿望，从而产生发起移民的动机。

二、移居牙克石的经过

（一）第一阶段

据有关尚健在的人们回忆，最初酝酿和行动是由原龙江县副县长鄂嫩，原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地区支会主任阿木古郎，原兴安军区第五师驻富拉尔基教育队队长莫英保三人在富拉尔基商讨发起的。移民地点选择为呼伦贝尔地区，从以往移民点来看，布特哈旗和阿荣旗有地方病流行（即克山病），不易克服，而索伦地区交通又不便。只有呼伦贝尔地区地广人稀适宜于农、牧、渔、猎业生产，更适合大面积机械化生产，便于搞集体农庄。这三位同志商讨后，议定先派鄂嫩、鄂月英（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地区支会干部）二人前往海拉尔市，向该地区首脑探讨，也就是了解一下是否同意移民。他们二人从海拉尔返回富拉尔基后，于1946年9月初召开了一次研究移民问题的会议，参加人员如下：

原兴安军区第五师师长鄂嫩日图。

原嫩江省蒙政厅秘书主任鄂英海。

原嫩江省龙江县副县长鄂嫩。

原第五师四十二团政委德文斌。

原第五师驻富拉尔基教育队队长莫英保。

原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地区支会主任阿木古郎。

会上首先由鄂嫩汇报前往海拉尔联系移民问题的结果，据说呼盟盟长额尔钦巴图已同意了，地点指定在三河地区及免渡河、牙克石、莫克尔图等地进行选择。经与会人员议论，一致认为移民很有必要，因为移民后易于搞集体农庄（群众的不动产已不存在了）走全民共同富裕的道路；移民后达族群众集中居住易于保持本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各种特点，以便永续下去；由于居住集中，兴办民族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有入学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自己人掌权下生活，不受民族歧视和压迫。与会人员一致感到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大不相同，实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建立了蒙政厅，选出达族的副县长，成立了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地区支会等等，但民族成份的比例数字悬殊，无法做到成立达斡尔族的自治机构（撤销纳温旗就是如此），也不可能和内蒙合并，长期和多数民族杂居，易于被同化，更何况原住地区除农业以外不能再从事其他渔、牧、猎业生产，所以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移民并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富拉尔基成立移民委员会，其组织情况如下：

主 任 委 员：原五师师长鄂嫩日图。

副主任委员：原五师驻富拉尔基教育队长莫英保。

委　　　员：原嫩江省蒙政厅秘书主任鄂英海。

原五师四十二团政委德文斌。

原龙江县副县长鄂嫩。

原兴安军区参谋处处长鄂秀峰。

鄂秀峰并未到会，但因其有名望，因此选他当委员而本人并

不知道。

最后确定由鄂嫩日图、德文斌向纳温慕仁盟请示，取得了盟政府同意。而阿木古郎、鄂嫩向嫩江省于毅夫主席请示时却未取得同意。

（二）第二阶段

1、向纳温慕仁盟请示的结果，得到积极支持，而且在盟政府内成立了移民委员会，盟长额尔登为主任委员，鄂嫩日图为副主任委员，敖玉祥、德文斌、鄂嫩为委员。从而于1946年10月在齐齐哈尔屯召开群众大会，阿木古郎同志宣布撤销富拉尔基移民委员会（以后再未开过会）。

2、向嫩江省请示的结果是不同意移民，并贴出布告，宣布今后不许搞任何移民活动，否则对策划人进行处理。

3、于1946年10月呼盟和纳盟联合派郭文通、敖玉祥、巴达荣嘎（俄语翻译）去哈尔滨找苏联领事，取得一封给中共西满分局李富春同志的信，使嫩江省允许达斡尔族人向呼盟移居。

4、根据西满分局的意见，嫩江省又贴出一张告示，同意达斡尔族人民群众在不强迫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居住点。

（三）第三阶段

1、194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兴安省政府在扎兰屯成立了兴安省移民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博彦满都，当时是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副主任。

副主任：额尔登，纳温慕仁盟盟长；

　　　　额尔钦巴图，呼盟盟长。

委　员：达瓦敖斯尔（兴安省秘书长）、绰克巴图尔、志达图、敖国海、敖玉祥（纳盟秘书长）、杜拉尔托布、鄂嫩（龙江县副县长）、德文斌(四十二团政委)、吴化民（布特哈旗旗长）、格热勒泰（兴安省科长）等。

在这次会议上确定成立兴安省政府移民事务局。

2、于1947年1月，在扎兰屯正式成立了移民事务局，组成人员是：

局　　长：绰克巴图尔。

行政科长：杜拉尔托布。

调查科长：格热勒泰。

另外配备了若干工作人员。

3、移民事务局成立后工作开展情况：

（1）首先选派有经验的人员，往呼盟踏勘移民地点。被派去的有：德文斌（带队）、鄂范五、鄂英福、徐永玉、单明宣等十八人。他们到达海拉尔市后由当时索伦旗长恩克巴图带领，去免渡河、牙克石、库都尔、乌尔其汉等处，最后确定移民点为牙克石八公里，根据呼盟盟长兼移民委员会副主任额尔钦巴图的指示，恩克巴图同志向代表许下了下述诺言：

甲、移民工作可以陆续进行，先成立索木公所；人口达到五万时可建立旗政府。

乙、移民人员夏季生产粮食，供应牧区，冬季进山采伐，供中长路使用，今后牙林线的护林任务由移民人员担任。

丙、取得白俄侨民沃伦错夫的同意，无代价的调拨给移民建筑房屋的木材（在八公里卸车），无代价的把日本开拓团遗留下的农机具交付给移民。

丁、由新巴尔虎右旗（无代价）调拨出一千头役牛给移民使用。

戊、由三河地区（无代价）调拨籽种。

巳、在牙克石街先拨给一所带院套的办公室，派两名技术员兼俄语翻译协助和指导工作。

（2）由兴安省政府秘书长达瓦敖斯尔，移民事务局局长绰克巴图尔带德文斌、格热勒泰去齐齐哈尔市与嫩江省政府联系，由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副主席杨英杰等领导干部接待商谈，

并达成如下协议：

其一、达斡尔族（当时通称蒙族）群众在自愿条件下同意移民。

其二、嫩江省、兴安省联合组成调查登记小组两个，每组三人，即嫩江省、兴安省、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温地区文会各一人组成。

其三、两个调查登记组分别在宁年、富拉尔基成立调查登记站，第一批决定先移民二百户，登记到够数就截止。

4、于1947年3月，在齐齐哈尔市龙江饭店由移民事务局局长绰克巴图尔、调查科长格热勒泰向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和东蒙总分会主任哈丰阿汇报移民工作进行情况，当时乌兰夫主席指示继续进行。后经哈丰阿同志与嫩江省政府联系后带格热勒泰一同回乌兰浩特继续商谈研究有关事项。

5、在乌兰浩特市特木尔巴根同志家召开了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了有关移民事项。主持人是哈丰阿，参加人员有特木尔巴根、敖玉祥、敖匡海、吴化民、阿木古朗、包音、鄂嫩、莫英保、格热勒泰等人。确定了第一批移民户数为二百户，经费由兴安省筹办，交通运输请示西满铁路局无偿支援，粮食由乌兰浩特购买。会后由哈丰阿同志给嫩江省写信，请求大力支持与合作。

6、于1947年4月中旬派先遣人员，由莫英保、德文斌带队共计二十多人，前来牙克石建点。

（1）在牙克石街内（东二道街路北）购买一所房屋，成立移民办事处，由莫英保、德文斌负责，配备了十几名工作人员。

（2）在牙克石街内准备数所保管粮食的库房（地点是西四道街现百货公司后院）。

（3）在八公里盖简易的临时性的住房（地窨子）以备移民春耕时居住。

（4）在牙克石街内为移民准备住房（多数是租用，或占用日伪遗留的公房，少数是购买的）。

（5）从扎兰屯雇用三十名木工，为移民在八公里建五十栋民房（每栋三大间）。

（6）组织购粮和押运粮食队，赴乌兰浩特买粮食并运往牙克石。

据了解，工作人员中有沃殿元、鄂振达、吴明阳、卜精海等人。

7、于1947年4月末，有一百九十五户达斡尔族群众，在宁年站和富拉尔基两地集中起来，把生活用品、牲畜、家俱等携带登上两列火车来到了牙克石地区，（也有个别人员在扎兰屯上车私费前来的）；移民的搬迁出境证明是由嫩江专署批发办理的。

8、关于经费来源，由当时的兴安省政府予以拨给。据后来了解是从纳温慕仁盟的林矿筹备资金中拨出来的。原计划给移民准备三年食粮和种籽，以预防灾年欠收，另外给移民盖住房、买牧畜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同时也考虑了教育经费等等，具体数字不清楚，后来因土改开始，经费停拨了。

9、移民使用的车皮经西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同志批准，按部队标准只收取了半费。

三、移居后的生产、生活、建村等情况

于1947年4月末5月初移来的一百九十五户群众陆续到达牙克石。

1、关于建立村屯和基层政权

移民到来的同时，移民办事处向索伦旗请示，经准许成立了扎敦索木，直接归旗政府领导，不属于牙克石街管辖。索木达（满洲名叫扎兰）姓苏名叫贵廷，年约五十多岁，由民主选举产生。工作人员有吴明阳（共青团员），做秘书工作。另外有

鄂振达、卜精海等同志，他们和移民办事处密切合作，着手建立村屯，组织群众生产，安置群众居住。发放口粮，调解群众纠纷等工作。土改后1948年的第二任索木达是张跃先同志。

2、在牙克石五道桥以东、以北建立三个自然屯，形成三角形。

其一，以八公里原日本开拓团的旧址为中心，建立八公里屯，位在原公路东南侧，紧靠公路的南坡。

其二，在原公路北侧建立恩勒屯，背靠海拉尔河，离八公里屯相距约八华里。

其三，在恩勒的西南靠河沿建立布鲁崑木屯，离恩勒屯约十华里。

凡是移民均自由选择住址，在编制生产组时也是以自愿为原则，人合心，马配套。

3、把盖房的木匠工活包给了从扎兰屯来的吴奇民木匠（他带来三十名木匠承包的），承包了一百五十间房。据承包者吴奇民回忆，原计划第一批每村先盖十所一明两暗的土木结构的房子。房屋的样式是平顶，有西窗，烟筒在屋顶，用草皮子垒墙，里外抹泥，室内两暗间都有南北大炕，东西山墙下各有一条一洞的窄炕，两暗间与明间之中有隔扇；明间有四个大锅台，是烧草柴式的。窗户只有一层，上玻璃或糊纸。从其结构和内外布置来看，完全是东北地区流行的建筑样式，根本不适于牙克石的严寒气候，冬季只能用茅柴烧炕取暖，防寒设备很差。

第一年计划住进六十户，即每栋房屋住两户。将来计划每栋房子住一户，单门独院，前后都留有种菜的园田地，予计三年完成房屋建筑。据木匠吴奇民同志回忆，一百五十间，木工活原计划于该年9月全部竣工，只是土瓦工活跟不上去，群众忙于耕种，截至该年年终实际建成的能住人的八号屯有八所，恩勒屯有三所，布鲁崑木屯有五所。由于事先未做地质探测，除了八号屯

以外，其他两屯挖的土井都不出水，只好用水车从河里拉水或饮用附近的泉水。

4、关于生产情况

以行政屯为中心，在自愿的情况下编成若干小组，开荒种小麦、燕麦、荞麦以及土豆、蔬菜等，在组织农业生产小组时，有牲畜和生产工具者和无牲畜、无生产工具者联合起来共同开荒耕种。关于秋收分配问题，原则上定为按人口平均分配，只是饲料和饲草确定以牲畜头数分配，不考虑劳动力多少和牲畜多少及有无。当时把这种方式誉之为集体农庄的第一步。

该年由于播种不及时（较晚），而且方法上仍沿用宽垄条播，盖土太厚以及不了解牙克石地区无霜期短的特点，更因秋季下了一场大冰雹，结果秋季棵粒未收。

1948年，从三河地区买来麦种，播种适时，尤其是土改后的第一年群众干劲很大，因此麦子长势喜人。正在丰收在望之实，秋季连日大雾弥漫，数日后麦子都得了黄丹病，秋后又弄得棵粒未收。

1948年，即土改后的第一年，土改工作队尚未撤离前，组织移民大搞生产。除了积极投入春耕播种外，还组织移民去东旗盐池捞盐，并组织部分人员前往牙林线八十九公里、九十一公里、九十七公里等处为沃伦错夫采伐桦木（烧柴），并在新组织的林业工会（取消把头制）领导下，前往原林用牛马套子集材，生产自救，增加收入。但由于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人不善于采伐和集材作业，收入不多。

5、关于生活情况

为了给移民准备粮食，从乌兰浩特购买了三十万斤玉米、小米。发放的标准是大小人口一律每人每天二斤（净粮）对暂时有吃的富裕群众不发，因为谁家有粮食谁家无粮群众都了解，因而未出现过冒领口粮的现象。本来以此标准发放储备的粮食，足可

食用三百天（每人每天二斤），但后来因兴安省移民事务局拨款不及时,所以,移民办事处人员擅自决定把十二万斤小米和玉米运到海拉尔市卖掉换了钱。为了弥补这一漏洞，和扎来特旗联系订购了一百石稷子米（六万斤）但前往运粮人员从旱路赶车到达该地区时，该旗土改工作已开始，不准粮食出境，结果空车返回。据说只运来三大桶豆油，由于这种情况，加之是秋农业受灾，棵粒未收，原定量从二斤减到了一斤半，后又减到一斤。该年十二月份从齐市买来一千块豆饼，并从乌兰浩特买来六万斤玉米，将玉米和豆饼混合磨成面，发放给群众，这样才维持到1948年春饼结束（6月末）。其后，群众自己搞生产自救，购买粮食维持了生活。

关于副食问题：移民当局从未考虑过群众的副食。有积蓄的人家（地富及富裕中农）自己维持生计，贫雇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的靠借贷，有的搞副业（编土篮编筐、割柳条出卖，打鱼等等）。个别人家不得不出卖口粮买副食（实际每人每天二斤口粮吃不了）有了青菜后，有所缓解。这是移民工作上的最大漏洞。

住房问题：最初都安置在牙克石街内，有钱人家买房住了，而且近亲也都暂时同住。其他有租房住的，也有的住在日伪公房内。劳动力在播种期间都到田里，造临时地窨子居住。于1947年秋，部分移民搬进自己盖的房子（住进三个屯子）。每所住了两户，个别的住了三户。但是，因为建筑结构不适于牙克石地区的寒冷条件，保温极差，移民群众受了不少苦，伤风感冒处处流行，加上缺医少药，给群众造成很大痛苦。到1949年，恩勒屯荒废了。1950年底布鲁凰木屯也没人住了。只有八号屯一直住到1955年。从1945年起苏联侨民回国，人民政府把苏侨的奶牛和马匹收买为国有，在八号建立了国营牧场。为此，把在八号屯居住的群众的房屋收为国有，政府又在牙克石街内为群众拨了房屋。

至此，移民们所建的村落和房屋都已不存在了。1956年合作化期间，成立了以移民来的达族为主体的前进生产大队。

6、建立民族小学

（1）于1947年6月，由原嫩江省蒙政厅教育科长兼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第一任校长（达斡尔族，齐齐哈尔地区的老教育家）沃文德先生，亲自来牙克石为移民群众组织了民族小学，地点是在牙克石东二道街借原苏侨仓库，组织移民中的适令儿童入学，课本选用了嫩江省教育厅暂编教材。另外，沃老先生还向达斡尔学生开展达语注音识字教育。这次开学一直坚持到该年十一月末，以后由于土改而停课了。

（2）于1948年在九道街恢复了民族小学，名为《扎敦小学》。以后由于移民陆续迁居八公里，该校也搬去了，学校名称未变，直接受索伦旗教育科领导。校址在八公里，日本开拓团挖的地窨子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在牙克石街内居住的学生，每日走读。当时沃佩莲同志担任学校主任而且兼课。经费虽由索伦旗付给，但条件非常艰苦。

于1949年3月，由索伦旗直接派来两名教员和一名校长，即索兵勒（女）、色克图喜，校长叫吴宝。

于1949年10月，由内蒙军大分配来两名教师，即比德玛（女）、阿木古朗。

（3）1950年建立喜桂图旗人民政府后，由索伦旗派来的教师全部撤回，只留下色克图喜一人任教师工作。这次学校有了变动，高年级学生全部合并到牙克石三道街小学，只留下小班仍在八公里，由斡福林任校长，沃佩莲、色克图喜任教师。

于1950年4月，正式撤销扎敦民族小学，全部合并到牙克石三道街小学。至此，移民建立的学校完成了它的全部历史使命。

四、几个具体事情

1、移民来牙克石的达斡尔族当中的部分群众陆续迁回原籍。

其一，1947年至1948年春土地改革工作在东北解放区内全面开始。属于地富家庭者，有的被原籍群众接走，有的被当地土改工作队遣返回原籍（包括少数为地富藏挪浮财的人）。

其二，由于两年连续农业欠收，失去了在当地生活的信心，加之不习惯于林业生产和严寒的气候并缺乏御寒设备等等原因，从1948年冬起陆续回返原籍的，不下二、三十户。

2、据有关人员其中包括土改时期的第二任贫农主席吴奇民的提供，移民来牙克石的达斡尔族当中的地富分子（包括地富家庭出身者）约有二十二户，约占移民总数10.8%。

3、达斡尔族人口少，互相结亲频繁，细究起来，同族人彼此之间多是亲戚关系。同一地区的彼此不属亲戚者不存在。由于人口少，地富家庭必得和贫雇农结亲，因此根本不存在地富必得和地富结亲之说，这是达斡尔族社会现实。

4、迁移到牙克石的达斡尔族群众当中，有几名伪官吏和伪军警，但数量极少。

5、关于地富分子为逃避土改而迁来牙克石的问题。

据我所知，酝酿移民是在1946年9月开始的，而实际搬来的时间是在1947年5月，我记得在这期间，嫩江在农村搞民主改革、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工作，土地改革根本没有开展。东北地区，尤其嫩江省的土地改革工作全面铺开是在1947年11月份，是在东北军大土改干部学习结束并分派到各地后同时开展起来的。在此之前，一般群众包括地富在内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搞土改。当时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当中，只知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不允许搞雇工剥削等等。鉴于上述情况，移来

的地富包括中农把房屋、土地都原封遗留在原籍。为此，从时间上来说，土改是在移民迁来半年后才开始的，因此逃避土改之说是没有根据的。

6、移民是“正义党”搞的，为了“成立达斡尔独立王国”之说是荒谬的。过去达斡尔族通称为蒙古族，尚未承认其为单一的民族，向牙克石移民时期也是如此。

在当时移民的发起人都是知识分子，毋用讳言，他们实有永续达斡尔人的语言、风俗习惯等等的意图，然多次移民，从来没有过搞独立王国之说。况且从人口、地域、政治、经济等等来看，要想搞独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结束语

以上据个人的了解以及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如实的汇集写出，当然很不全面，一定会有出入。目的是为了要抛砖引玉，分清历史是非，启迪今人，教育后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果要笔者不自量力，妄加评论的话，我以为往牙克石移民是少数人妄想模仿外部经验(搞集体农庄)而发起的，虽然是兴安省领导和内蒙领导点头同意并积极帮助下有计划进行的，为了民族的发展，搞移民，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未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加之准备工作不足，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受到了自然的惩罚。这次移民同其他时期的移民一样，给达斡尔族群众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困难，这一教训的代价是昂贵的，应当深刻吸取。

达斡尔族移民的经过

鄂英海

1946年，我在嫩江省蒙政厅担任过总务科长、秘书主任等职，1947年亲历了从齐市向牙克石迁移达族群众的事，现在回忆记载如下。

蒙古移民活动（当时达族还未定为单一民族，统称蒙族）这是第三次了。“九·三”前曾搞过两次移民：第一次是往扎兰屯一带移民，第二次是往阿尔山和乌兰浩特之间的索伦山移民。这一次是往牙克石一带移民。

这次移民的发起人是鄂嫩，阿木古朗也曾和我商量过。1946年初，鄂嫩、阿木古朗、鄂月英到海拉尔找当时的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要求他批准齐齐哈尔一带的达斡尔族，往呼伦贝尔移民。额尔钦巴图答复：“呼伦贝尔这地方是蒙古人的地方，如要往这里移民，应得到苏联红军的准许，我这个主席不能完全说了算”。结果鄂嫩等人回到富拉尔基，给我打电话说：“中午你来一下，有重要的事情和你商量”。于是我从齐市坐火车到富拉尔基，见到鄂嫩、阿木古朗，鄂嫩是当时的龙江县副县长，阿木古朗是蒙政厅的行政科长，后又担任移民联合会主任，曾任内蒙粮食厅厅长。见面后他们说：“找你来研究移民问题，额尔钦巴图说移民必须苏联红军批准，你和苏联红军怎么样？移民的车皮也不好要，你能要来吗”？我答复：“你们要移

民我向苏联红军要许可，车皮我也可给要”。因为我会俄语，曾担任苏军情报员，又因为我认识当时的齐齐哈尔铁路局局长、滨洲西线护路军总司令郭维城同志，所以我答应给他们要车皮。鄂嫩和阿木古朗说：“你把许可和车皮要下来，别的事不用你管，由我们联系”。

这次会面之后，成立了移民委员会，委员长是当时的内蒙自卫军第五师师长鄂嫩日图，副委员长莫英保，委员五名：阿木古朗、鄂嫩、鄂英海、格日勒泰（我弟弟鄂朗海）、鄂秀峰。我负责联系许可证和车皮；阿木古朗负责组织富拉尔基一带的移民；德尔斌负责组织齐齐哈尔一带的移民；鄂秀峰负责从乌兰浩特买粮食供移民迁移后的食用。移民委员会成立之后，即开始组织了移民的工作。

移民的目的是这样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八一五”以后就进驻了齐齐哈尔，在齐市成立了嫩江省政府，省政府内设立了蒙政厅，厅长乌勒吉朗，省主席是于毅夫。齐齐哈尔四周居住很多达斡尔族人民，满清政权为了管理这些达斡尔族人民，曾设立了八大处，八大处的官员都由达族人担任。辛亥革命成功，清政权垮台，八大处也随之撤销，没有一个管理达斡尔族的行政机构，达族形成一盘散沙，既没有自己的旗、县、也没有本民族的代表人物，谁来统治就得听谁的，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嫩江省政府成立后，我们就向于毅夫主席提出要求：虽然设立了蒙政厅，但仍处于无权地位，应当给我们达族成立个以达族为主的纳温旗。使我们有当家作主的权力，能够保护牧场便于生存。于毅夫主席于1945年11月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并任命杨宪文为齐齐哈尔纳温旗的旗长，鄂嫩为总务科长。这个旗成立不久，到月末苏联红军根据国民党政府订立的《中苏友好条约》规定，责令东北民主联军和嫩江省政府撤出齐齐哈尔市，允许在距齐市百公里之外的地区建立政权。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后，国

民党的接收大员彭济群就进入了齐齐哈尔市，成立了黑龙江省政府，1946年4月下旬，苏联红军撤兵回国，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在鄂秀峰所率领的齐齐哈尔蒙古自卫大队的配合下，赶走了彭济群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收复了齐齐哈尔，嫩江省政府迁回，蒙政厅又恢复了办公，我任蒙政厅秘书主任。这时，原来准许建立的齐齐哈尔纳温旗也撤销了，省政府参议会员少数民族代表才七名，选举时七个人都选我们的人，也是极少数，是选不上的；再加上齐市四处可放牧的土地越来越少，达族都不会种地，现在不搬家，将来生活就很难维持。基于这种原因，鄂嫩等人又筹划移民工作。但这时的嫩江政府、龙江县、富拉尔基的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文地区支会都反对搞移民，连过去支持搞移民的阿古木朗明里不反对，暗中也反对搞移民了。这时搞移民发生了困难，我也没有办法了。在这之前我曾给苏军驻哈尔滨的少将吉那杰（苏军388部队长）写信，告诉他移民工作发生了困难。后来不知是吉那杰将军和彭真同志联系的，还是郭文通和彭真同志联系的，郭文通拿着彭真同志写的信，到西满分局找李富春同志。这封信我看到过，是用毛笔写的，很简单。信上写着：齐齐哈尔附近达斡尔族移民可以帮助，不可阻挡。李富春同志看过信后给嫩江省政府主席于毅夫通话，传达了彭真同志信的内容。据此，于毅夫主席发出了关于准许移民的布告，并由嫩江省政府和纳文慕仁盟各出一半人，在扎兰屯组成了移民事务委员会，下设移民事务局，任命朝克巴图为局长，达瓦斯尔为秘书长。牙克石的移民办事处组长是德文斌。动员愿意迁移的达族，迁住牙克石的八公里（即八号），既可放牧又可以种些蔬菜，冬季可以进林区搞副业以维持生存。这样，又开始了移民的组织工作。

这时原兴安省副主席博彦满都（主席为特木尔巴根）去齐齐哈尔，他让鄂嫩把我找去见他。见面后博彦满都见我问：“现在移民问题怎么样了？经费如何？”我说：“移民还要搞，经费没

解决，齐齐哈尔的达斡尔人都很穷，主席你给研究解决吧。”他回乌兰浩特后，就给移民批了一万元。这笔移民费是鄂嫩、莫勒根巴图、莫英保取出来的，给移民买了粮食和用品。

移民需要在牙克石盖房子，但没有木材。我又找苏联吉那杰将军，他给牙克石中长林场写的信，我到林场经过联系，苏联的两个军代表批了盖一百个三间房的木料，用火车给运到牙克石，也没要钱。移民就是用这些木料盖起来的住房。

迁移之前，于毅夫主席把我介绍给郭维诚同志，经他联系由西满军区张平化同志批准按半价拨给48节车皮，20几节客车。就是用这些车皮于1947年 5月12日、13日，先后将194户， 近三百人的达斡尔族移民迁到牙克石的，迁来的移民大多数都是穷苦人民，有钱的地主、富农很少。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移民经过，有记忆错的地方，请知情者同志补充纠正。

蒙古移民土改运动经过

图 木 日

蒙古（达斡尔）移民的原因，近因及经过我不清楚。1947年5月从齐齐哈尔、龙江县一带迁来194户近五百名达斡尔族移民，分别居住牙克石和当时的八公里的三个自然屯。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从而推动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据此嫩江省龙江县委和呼盟工委分别派人组成了移民土改工作队，在移民中开展土地改革运动。龙江县派出吴国勋、鄂银荣、吴国勋的警卫员那萨、还有一位姓单的农民和姓金的女同志。呼盟工委派了六个人：孟和那苏、巴达玛、德力格尔、毕力格图、吴明阳、图木日。以吴国勋为队长，孟和那苏为副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就这样组成并开始了工作。工作队虽然组成了，但不久毕力格图、德力格尔以及龙江县来的两位农民，没做几天工作都先后撤回原地了。留下的工作队员分工是：吴国勋和孟和那苏正副队长负责土改斗争的大事和全面工作，巴达玛负责党团、妇女等组织工作，吴明阳负责民兵、生产、生活工作，鄂银荣负责秘书，图木日担任后勤管理员工作。

（一）移民来到牙克石之后分四处住着：一处住牙克石街里，龙江县的人居多，八公里（即现在的八号农场处），建立了三个自然屯，八号旧址龙江的达族多，还有富裕县的，八号北建两个屯，一个叫恩勤屯，虽然混着住，但都以一个县为主。管

理移民的当时有移民办事处，主任德文斌，工作人员有吴明阳（经盟工委批准参加土改工队）。布景海任秘书，管理财粮的鄂振达。当时牙克石在行政上是属于索伦旗的，由东海拉尔一直管到伊列克得，兴安，土改工作队进驻后做了如下工作：首先把移民办事处的牌子砸了，解散了这个机构，主任德文斌因是恶霸地主被原地抓回镇压了，布景海到工作队管了一段行政工作之后回齐市效区老家。鄂振达被审他所管理的财粮工作。

（二）组建了管理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组织，以吴明阳为首和几位移民负责此项工作。因为移民来之前听说房子已盖好，地也种好了，结果都没落实，一些移民的组织者，因47年扎兰屯发生了所谓“正义党”案件都被抓起来，吃住问题发生了困难，就由吴明阳等人率领移民盖房子，搞生产，分配救济粮，解决吃住的问题。

（三）开展声势浩大深入细致的土地法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宣传地主阶级不种田、吃好粮，不盖房住好房，这些都是穷人的血和汗。特别是宣传移民的组织者移民中的地富用剥削来的钱在牙克石买了白俄侨民的房子，住的暖，吃得饱的事实，同移民吃不饱，住不好的现状对比，激发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提高了对共产党的热爱，加深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根，贫下中农迫切要求打倒地主富农翻身得解放；强烈要求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总后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四）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开展诉苦运动。诉阶级苦，忆民族恨，用被压迫剥削的血泪史，控诉剥削阶级和日伪对少数民族压迫的罪恶。在诉苦的同时批判穷富命里注定的宿命论观点，初步树立起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

（五）在宣传诉苦的同时，进行了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的工作。由于移民来自四面八方，阶级状况不清，所

以工作队员挨家串户地访贫问苦。通过访问摸清了哪些是必须依靠的贫农、雇农和下中农，哪些是可以团结的中农，哪些是应该打击的地主富农，并摸清了他们的财产状况。在摸清阶级阵线的基础上，把所有的积极分子分别组织到下列组织中来：

1、贫民农会：当时是把所有的贫下中农都组织到农会里来，方法是自己申请，由贫下中农审查，工作队批准。在此基础上划阶级定成份，阶级阵线更清楚了，依靠、团结、打击的对象更明确了。农会主任是张耀先、鄂有海。

2、民兵自卫队：在农会会员中凡是四十五岁以下的男性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组成民兵自卫队。队长鄂有海，副队长是鄂忠海。民兵有鄂福才，单学忠、杜百小等几十名。在工作队的领导下，把移民中地富所有的步枪三十来支，手枪三支全部收缴。这些枪一半武装了自卫队，以保卫土改，防止阶级敌人反扑，维持社会治安；一半上缴给王化一旅长，支援了自己的军队。

3、妇女会：妇女会长是李黑三同志的妈妈，副会长是杜文福的爱人，妇女会主要是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积极动员妇女投身到火热的土改斗争中去，做好拥军优属、支援前线的工作。

4、儿童团：第一任团长是何文秀的侄子，以后由鄂国祥、李黑三、吴桂芳、吴凤兰等人担任。

（六）开展清算斗争。首先把地主富农分子全部集中关押在牙克石东六道街的一座民房里，由民兵看守，不许自由行动。然后把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牛马等动产集中圈在牙克石十一道街的一个大院里，由农会派人饲养看管，地富分子大部分都净身出户。并开展挖浮财活动。对民愤大的地富和土匪则召开群众会进行斗争。斗争会场一是五道街原侨民会俱乐部（即现牙克石经管会楼上），一是东五道街浴池，小型的斗争会则在工作队的办公室进行。斗争的方法是先由被斗者坦白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交待不义之财的数量和去向，然后由被压迫的贫雇农揭发

诉苦，对民愤大而不老实者也曾实行体罚性的斗争。在清算斗争中，有九名地富分子和土匪被贫下中农斗死和枪毙，有五名被解回原籍镇压了。清算斗争是轰轰烈烈的，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威风，彻底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势力，贫下中农在政治上彻底地获得了解放，在经济上也得到了翻身。在清算斗争中，确实出现过扩大化的错误，斗了一些根本不该斗的人，搞了一些过火的斗争。特别是为了追查所谓的"正义党"和移民的政治目的问题上，先后由外地揪回斗争了十二名"嫌疑者"，对其中几个人确实进行了"左"倾过火的残酷批斗，并投入劳改，使一些同志长期地蒙受了不白之冤，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随着清算斗争的深入发展，封建迷信活动也被革命的洪流所揭露和摧毁，萨满教的大神也退避三舍，再不敢"显灵"了，使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

（七）分配胜利果实，实现耕者有其田。1948年春节前后，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集中在现在百货公司的大院，按划定的成分和生活状况，把衣物、被褥、牛马猪以及生产工具分配给贫下中农，对土地进行丈量后也按人口平均分配下去。贫下中农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的翻身解放。一些贵重的金银首饰由农会变卖之后给翻身的农民解决缺粮和种籽等春播的急需物资，为春播生产创造了条件。

（八）积极地建党建团。根据斗争中的表现，在移民中第一批发展了张耀先、吴文祥、鄂忠海、鄂福财、杜百小为中共党员，成立了第一个移民中的党支部。在建党的同时还发展了第一批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员，他们当中有：吴桂芳、吴桂兰、祁成瑞、鄂云祥等人。为了培养民族干部，除把鄂忠海、鄂福财送到齐市军大学习深造外，还安排了一些同志参加革命的具体工作，培养了很多的优秀干部，象单学忠、吴文祥、李黑三、鄂振达、鄂福林等人在党的培养下，进步很快，有些人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建党建团的同时，还搞了政权建设，在八号整顿了扎敦

苏木政府，任命张耀先为索木达、祁成瑞为秘书。工作队还重视移民子女的教育，经批准在八号成立了扎敦索木小学校。校长由索伦旗派的，教师有沃佩莲、毕德玛、鄂福林等。工作队撤走之后，这个小学和牙克石三道街小学合并了。

（九）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支援前线。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移民的生产积极性，彻底解放了生产力，土改结束后立即开展了春耕准备工作。用胜利果实解决了春耕的种籽、农具、资金等问题，开展了春播大生产运动。播下的小麦长势喜人，后来小麦得了赤锈病，仅二三天全部死掉，颗粒未收。为渡过天灾造成的难关，组织群众到牧区挖碱，冬季又组织马套子到牙林线新帐房给沃伦错夫拉套子。后来由于牙克石属于高寒地区，生活不习惯，加之生产遭天灾，有些抱着到这里试试看而全家没搬来的移民，大约有百分之三十之多，又迁回原籍或到鄂温克、陈旗一带投亲靠友谋生去了。

（十）工作队撤销。土改结束后，工作分别交给了扎敦索木政府和牙克石区委。工作队长吴国勋于1948年11月入内蒙党校学习，副队长孟和那苏调到索伦旗任旗长，巴达玛调到牙克石工委任秘书，吴明阳调到满洲里市公安局工作，鄂银荣调到牙克石小学当教师，图木日调到牙克石工委参加开辟林区的工作队。到此，移民土改工作队的任务就结束了。

三、参加移民土改工作队时，我年仅十七岁，又是一个当管理员的一般工作队员，三十八年后的今天写当时的情况，难免在记忆上有所差异，希望当时参加土改老同志看了这个回忆后能批评指正。

当年的移民活动，土改斗争，由于左倾扩大化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的历史误会，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落实，历史上遗留下一些实际问题已得到澄清和解决，但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有当时的错误结论的遗迹。本着安定团结，

实事求是向前看的原则，对当时几个主要历史误会简述一下自己的看法，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一、根据现在的调查，移民当时的组织发起时间是1946年开始，1947年5月迁移完毕。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施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当时东北没有提出土地改革问题，而是施行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的斗争。移民是经过嫩江省、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以及西满分局同意的，并成立了移民事务局，解决了移民的地点、经费、火车皮、口粮、房屋等问题，才顺利地完成了移民任务，根本不是地主富农逃避土改的集体逃亡。

第二，移民中194户，经反复调查核实，属于地主富农成份的22户（地主16户，富农6户，占移民总户数的11.3%，根本不是传说中的45%到46%）。

第三，关于所谓“正义党”和成立独立共和国的问题，经过组织多方调查，由内蒙公安厅授权呼盟公安处复查，经中共呼盟委讨论批准了呼盟公安处的报告，以呼政字（84）1号文件，《关于“正义党”案件平反的批复》，结论认定“正义党”根本不存在，应予平反。根据这个决定，受所谓“正义党”株连的同志都得到了平反，沉冤近40年冤案得以昭雪，并给受害的同志们以公正的评价，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结果，是肃清左的流毒所取得的又一个胜利。今后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一历史教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而奋斗。

回忆牙克石蒙古移民土改运动

吴 国 勋

我是1946年10月份从西满分局民族学院毕业分配到嫩江省龙江县富拉尔基工作的。1947年下半年在龙江县搞土改，10月末受龙江县委派遣来到牙克石和呼盟工委派来的干部共同组成蒙古移民土改工作队。我和孟和那苏同志任土改工作队的正副队长。我们的任务是在呼盟工委领导下处理蒙古移民中的土地改革问题。

蒙古移民（实际是达斡尔族移民，因当时还未定为单一民族故统称蒙族）是1946年8、9月份，在龙江县（富拉尔基）、龙东县（昂昂溪）、齐齐哈尔一带发起的，计划向兴安岭以北迁移。发起人是鄂嫩，他是当时龙江县的副县长，我党对他很重用，很信任。他发动达斡尔族向岭北移民的活动，当时受到设在富拉尔基的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纳文地区支会里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反对。对这个问题，当时的西满军区、嫩江省委，龙江县委很重视。要求移民和反对移民的斗争很激烈、很尖锐。后来据说1947年，要求移民的首脑人物到内蒙自治运动联合会东部分会哈丰阿那里去请示，经哈丰阿点头同意移民，但不要大量的移，要一步一步的移，之后又经过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主席额尔钦巴图的同意，原呼伦贝尔地方自卫军司令员登登泰的积极支持，才允许达斡尔族移民到牙克石。

1947年5月初，齐齐哈尔、龙江、龙东、甘南、讷河、富裕

等地的一部分达斡尔族共194户，近500人乘车来到了牙克石。移民到牙克石后分四处居住：嫩江以西、龙江县的达族多住在牙克石街里，在现在八号农场建立的三个自然屯，住八号的龙东县的达族多，八号北的两个自然屯则是各地达族混着住。移民来后遇到了很大困难，现种地、现盖房子，房子没等干透就封冻了，数九寒天冻得十分可怜，刚来没有足够的粮食，就到地里捡苏侨扔掉的土豆、大头菜，后来由政府实行分配供给，每人每天分一斤玉米面，在困苦中熬过了1947年的冬天。

1947年东北地区随着土改的不断深入，快到分土地的时候，当地的贫雇农提出要求：应把搬到牙克石的地主，富农统统抓回来进行斗争。这个要求提到龙江县委，反映到嫩江省委，要求解决。当时的省委书记刘锡伍同志表示：这事得同云泽（乌兰夫）同志请示。县委派我们几个人到王爷庙（乌兰浩特）联系，之后又让到呼盟联系。当时党的呼伦贝尔工作委员会已成立，吉雅泰是工委书记，还有高锦明、苏林等领导同志。经过研究，答复是：可以往回拿人，不能拿财产，如把财产拿回去，移民老百姓怎么生活。后来几经商量，最后决定：对于人和财产就地处理。

就地处理移民中的土改问题，就需要派人，但当时派不出人来。经过商量，决定嫩江省委和呼盟工委共同派人组成土改工作队。龙江县委按嫩江省委的指示，派了五个人（三个干部，两个农民积极分子），呼盟工委派了六个人，共十一人组成了工作队。土改工作队成员是：队长吴国勋，副队长孟和那苏、队员有鄂银荣，那萨、巴达玛、德力格尔、毕力格图、吴明阳、图木日，还有两位农民积极分子。工作队于1947年10月末到达牙克石。

当时牙克石人口不多，可敌社情非常复杂，好多机构都是双套的。除党的组织是一个——中国共产党牙克石工作委员会外，政府是双的，有工委领导下的公安大队，有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

府自卫军的一个团，实际只有五十多人，团长德海源，政委图门巴雅尔；工作队是双的，有地方工作队，有蒙古移民土改工作队，蒙工队直接隶属呼盟工委领导；学校是双的，有中国小学，有苏联学校；还有一个独立的苏联侨民会，外加一个沃伦错夫林场。这就是1947、1948年牙克石地方组织的情况。

开展移民的土改工作是很困难的。开始时牙克石移民办事处不让我们插手，后来德文斌被抓走，我们就把移民办事处的牌子给砸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移民是为了聚居方便谋求生活出路而迁来牙克石，但也有些地富分子为了逃避当时土改，把这里当成“防空洞”和移民一起来到这里的。因为这里边都沾亲带故，开始又没有划成份，而且来到牙克石以后，有些人惧怕土改，又跑到海拉尔、满洲里、红花尔基、三河、东新巴旗等地不少，除八公里北的两个自然屯的移民没跑外，居住在其它地方的几乎都有走的，做这些人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移民中的问题相当复杂。经过宣传发动，组织基本群众队伍，开展诉苦斗争，群众发动起来了。在清算斗争中我们杀掉了九个人。多数是被拿回本县杀掉的。杀人不多是因为岭北靠近牧区，吉雅泰同志指示：“不要多杀人，杀多了草地有反映”。虽然处决的不多，但土改高潮时，出现了扩大化，确实有不该杀的杀掉了，这是左的教训，龙江县那边尤为严重。1948年2月土改在东北全部结束。东北局指示，不许再杀人了，才制止了左倾扩大化的恶果的发展。

清算斗争结束后，分胜利果实，组织互助组。从三河买来麦种，种了许多小麦，长势非常喜人，但一场自然灾害，小麦都得了赤锈病，二、三天之内全部都死了，给刚刚翻身的农民很大打击。在这种困难面前，许多移民又都回龙江原籍了。剩下的人开展了建政工作。在八公里成立扎东苏木政府，张耀先任苏木达，祁成瑞任秘书。

在移民土改运动中发展张耀先、杜百小、吴文祥、鄂忠海、鄂福才为第一批党员，成立了移民中的第一个党支部。还发展了吴佳芳等一批团员。在移民中起出了几十支步枪，一半给移民民兵自卫队用，一半上缴给王化一旅长，还做了几百双军鞋，支援前线。

1948年初，中共牙克石区委成立，韩长生同志任书记，吴国勋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白云任组织委员。这时两个工作队撤销，党的领导统一了，扎东苏木政府归牙克石街政府领导。移民土地改革全部结束，建党建政也已完成。彭炳寒书记来牙克石不久，我于1948年11月初入内蒙党校学习，离开了牙克石。

光复后大兴安岭南麓一支少数民族部队

卜　林

一、齐齐哈尔乡民族自卫大队

布特哈旗东界音河西岸是齐齐哈尔乡努图克公所所辖的地盘。这里居民是伪满年间由齐齐哈尔迁移民来的，因此取名为齐齐哈尔乡。这里达斡尔族居民有四千左右，占整个乡居民的90%以上。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垮台，伪满残余势力打起青天白日旗，天天盼望蒋介石的“中央军”到来。他们先后成立了“扎兰屯地方治安维持会”和“国民党雅鲁县党部”，企图将布特哈旗改为雅鲁县。他们组建了雅鲁县警察局和保安大队，公开辱骂说：“老达子要放老实一点，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满洲帝国。”再加上四面八方的土匪和光复军，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组建一支保卫家乡的民族自卫大队，成了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当年七月，达斡尔族的有识之士，以何布台、鄂鸣中、鄂秀峰为先驱，联合达斡尔族、蒙古、鄂温克三族志同道合者，借齐齐哈尔乡第二村放宝会的机会秘密集会，研究了如何迎接时局更迭，如何迎接苏军、武装保卫家乡等问题。正因为事先有精神准备，苏军刚进驻扎兰屯的八月，何布台、鄂鸣中、包德华、吴泽民、吴化民等，就在齐齐哈尔乡第二村鄂鸣中私宅，研究了组

建齐齐哈尔乡民族大队一事。

会后开展了紧张的征枪征马活动。不到十日，征来原扎兰屯森林警察大队人马枪械数十，并征来阿荣旗日本开拓团一些武器弹药。看来，组建民族自卫大队的条件已经成熟。

八月末，在齐齐哈尔乡所在地的第二村，宣布成立齐齐哈尔乡自卫大队，大队长由蒙古族包德华担任，鄂鸣中为军事顾问。

这支民族自卫大队的形成和壮大，成了扎兰屯国民党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要拔掉这根钉子。雅鲁县警察局长梁桂馥（汉俄混血儿），利用自己操一口流利俄语的方便条件，向扎兰屯苏军司令部诬告齐齐哈尔乡吴化民和比利格等，他们捏造谣言，说自卫队要占领扎兰屯，要撵走苏联红军。十月初，梁桂馥和几名混血儿率领两卡车苏军武装，开赴齐齐哈尔乡第九村（吴化民居住的部落）、第四村（比利格居住的部落）和第二村等地，挨家挨户的搜查武器弹药。

在这种情况下， 齐齐哈尔乡自卫大队曾一度解散， 转入地下，到1945年10月，又恢复了齐齐哈尔乡大队。为了加强民族团结， 大队长由鄂温克族戴巴海担任， 副大队长由汉族庞长志担任，采取了战时集中平时归乡务农的方针。

这支民族武装，不但担负了保卫家乡的任务，而且参加了驱逐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战斗。

1945年10月，扎兰屯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共同商议，认为阿荣旗姚风贤领导的民族自卫大队和齐齐哈尔乡民族自卫大队这两支武装，有甘南王明贵部队的有力支持，武装夺取阿荣旗完全有可能。于是1945年10月初，齐齐哈尔乡自卫大队百余人马，在吴化民、比利格、多国瑞等人的指挥下，配合姚风贤的民族自卫大队，一举解放了阿荣旗，解散了原地方治安维持会，整编了保安大队，改组了亲国民党政府，委派何什格图（汉名何庆瑞）担任旗长。

齐齐哈尔乡的南邻大河湾乡，有个叫冯玉田的大地主，暗中接受黑龙江省光复军副军长马川越的副师长委任状，在冯家窝棚豢养着百八十人马的反动武装。他们勾结黑六旅梁有才，纵容其北上骚扰齐齐哈尔乡和阿荣旗音河乡。这些人抢劫烧杀，无恶不作，气焰十分嚣张。

1945年10月中旬，梁有才闯进了齐齐哈尔乡高地营子，齐齐哈尔自卫大队立即予以反击。从此，梁有才的部队再也不敢闯进齐齐哈尔乡了，其他土匪也都望风而逃。

在这期间中共东北局、西满军区和嫩江省党政军领导，对少数民族人民非常关心，王明贵、朱光、王盛荣、励男、夏辅仁、张策、苏林等同志，先后来扎兰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统一战线主张，并为保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帮助少数民族武装自卫，协助少数民族培养干部做出了贡献。扎兰屯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也为保卫来扎工作的老干部的人身安全尽了最大的努力。

二、东蒙古自治军第二旅

东蒙古自治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民族革命武装，他是反对国民党、保卫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组织。

下分若干军分区，达斡尔族居住地区划归纳文军分区领导。“纳文”一词是嫩水地区之意，当时达斡尔族的名称未定、统称为蒙古族。纳文军分区下设第二旅（指扎兰屯一带武装）、第五旅（指齐齐哈尔一带武装）、第八旅（指莫旗一带武装）。当时，国民党对“自治”二字有反感，一再向我党交涉；为争取国民党，后改为“自卫军”。东蒙古自治军归西满军区领导，而战时指挥方便，又将纳文军分区三个旅，统一移交给嫩江省军区暂时代管。纳文军分区司令鄂嫩日图、政委夏辅仁、副政委吴泽民；第二旅旅长鄂嫩日图、政委夏辅仁、副政委吴泽民；第五旅旅长鄂秀峰，政委鄂嫩；第八旅旅长阿勇巴图，政委敖匡海。

这三个旅也有明确的分工，第二旅负责布特哈旗、阿荣旗地方治安，第五旅负责龙江、富裕二县民族地区的地方治安，第八旅负责莫力达瓦、巴彦二旗地方治安。

东蒙古自治军第二旅是1946年1月在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民族自卫大队和阿荣旗章塔尔乡民族自卫大队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经过鄂嫩日图、吴泽民、郭安惠等多次去甘南交涉，在嫩江省军区的支持下，在布特哈旗齐齐哈尔乡第九村宣告成立。其组成人员如下：

旅　　长：鄂嫩日图

代 政 委：吴泽民（到甘南后夏辅仁接任）

参 谋 长：姚风贤（鄂温克族）

政治部主任：比利格

参谋处长：郭安惠

军法处长：张振武

军械处长：恩和扎布

后勤处长：卜林（当时叫卜水郅）

东蒙古自治军第二旅下设骑兵第一团、骑兵第二团，另有鄂伦春族猎民组成的独立团，全旅战士约三百人。

第二旅组建的五个月间，不断地迎接了光复军反动武装的严重挑战，在布特哈旗、阿荣旗、甘南县、龙江县境内，与敌人激战七八次，为解放这块土地，做出了贡献。

1. 旗开得胜

1946年1月初，布特哈旗大河湾乡大地主冯玉田，率数十人马闯进齐齐哈尔乡，企图北上迎接光复军武器运输队。但在我旅迎击下，如鸟兽散。从被生擒的冯玉田秘书的供词中得知，翌日是光复军黑六旅武器运输队到达齐齐哈尔乡龙山屯的日子。据说是由博克图沟里关东军火药库中取出了一大批重轻机关枪，还有其它武器弹药，这实在是雪中送炭。

二旅战士趁着夜晚离开第九村北上。寒冬腊月，夜长风寒，午夜时分，过索门梁子和第五村，在第一遍鸡叫后不久，全旅开进了龙山屯，为防备走漏风声，封锁了各交通要口。接着连夜研究了阻截光复军武器运输队的行动方案。按侦察人员所提供的情报，龙山屯以北有哈拉苏、巴林、博克图主干线路一条，另有西去卧牛河的大道一条，屯北的高坡长满了榛子林，路东旁还有无人居住的破马架房子。鄂旅长认为用兵过多，容易被敌人发觉，只需要十几个人，埋伏在榛子林及破马架房里，大军应安排在各道口的高坡上。

黎明前的天气，格外寒冷，皮帽前挂着厚厚的白霜；手脚冻僵了，象针扎般地痛疼，战士们一动不动地坚守着岗位。

日头快出来了。在隔山的大北方，传来了马蹄声和车轱辘声，逐渐的连咳嗽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刹那间马队和车队扬尘而来，枪声响了，鄂旅长发出“站住！”“举手投降”的喊叫声。敌人吓呆了，只好举起双手投降。

七辆四轱辘马车载满了武器弹药，“九九式”步枪一百二十多支，子弹四十几箱，手榴弹十几箱，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二挺，掷弹筒好几个，乘马三十几匹，俘虏十九人。这些战利品满可以武装一个旅。旗开得胜，提高了蒙军的士气，增强了克敌制胜的信心。但在这次战斗胜利后，由于听信敌人的假供词，在开往卧牛河屯途中，受到苏联红军攻击，蒙军因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2．在甘南会师

1946年1日21日，嫩江省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同志调遣蒙军二旅全体人马赴甘南暂时住在甘南西北约十里处的一个村落。

翌日，二旅旅长鄂嫩日图率旅部工作人员，进甘南镇会见了省军区领导，他们是政委刘锡五、司令员王明贵、组织部长冯纪新、宣传部长夏辅仁，另有西满军区领导兼东蒙古工委书记张策等。二旅前去的有鄂嫩日图、吴泽民、姚风贤、比利格、郭安

惠、张振武、恩和扎布、那存巴图尔、额尔很巴雅尔、卜林等。

这几日陆续前来甘南会师的有：民主联军第一旅、第二旅约二千人，蒙军第二旅、蒙军第五旅约九百人。这次会师的背景是：甘南境内的黑龙江省光复军第六旅和第七旅企图以优势兵力，攻占甘南，消灭民主联军，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蒙汉军队必须加强合作。甘南会议决定的内容如下：

组织战时蒙汉联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对敌作战；前线司令员王明贵、副司令员鄂嫩日图，前线政委朱光、参谋长励男。

蒙汉军军事作战分工由蒙军直捣黑六旅匪窝野猪窝村，先发制人，乘敌人不备组织进攻，切断黑六、七旅的联络线。

3、与黑六旅的决战

1946年1月末，作战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了，蒙军二旅向集贤、中兴等村进发。敌人望风而逃。

除夕那天，是我军联合发动进攻的日子。蒙军二旅开往陶家窝棚打间。当晚十一点许，鄂旅长率领一个团人马，夜袭了一个叫什么窝棚的屯子，当时敌人有的在包饺子，有的在推牌九，还有的在掷骰子，“五六、三五”的叫声，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看来事先毫无防备，这样就不费力地活抓了“光复军”几十人。

由这屯往南五六十里处就是黑六旅兵力密集的野猪窝屯了。鸡叫第二遍的时候，蒙军二旅包围了野猪窝屯。野猪窝屯石头垒起来的炮台十分难攻，鄂旅长就特意布置鄂伦春族神枪手，专打敌人的炮台眼。

天色发亮了，敌人发现了我军。在屯子里叫喧着，“八路来了，赶紧集合”，子弹从东炮台射出。不久，我军鄂伦春射手打死了炮手。接着蒙军二旅由北推进，蒙军五旅由西推进，敌人吓得恐慌万状，仓皇逃逃。战斗结果活捉敌人百余人，马匹上百，还有许多武器弹药。敌人残部不要命地往齐齐哈尔城逃去。

这一场漂亮仗，大煞了光复军的威风，大大地提高了我军的士气。这一场关键性战斗的胜利，确保了甘南的安全。

4. 消灭宿敌梁有才部

梁有才是齐市郊区人，伪满地痞出身，光复后接受黑六旅团长的委任状，以大河湾乡冯家窝棚为据点，经常骚扰布特哈旗阿荣旗的少数民族村落。他们抢劫牲畜，强奸妇女，曾拐走少数民族的妇女三人。在长发屯战斗中，打死蒙军二旅重机关枪射手一人，在吉木伦等地和姚凤贤率领的阿荣旗民族自卫大队交战四五次。梁有才还纠合伪满胡子头八十余人，他本人枪法又准，对于民族地区威胁极大，若不及早消灭梁匪，布、阿两旗民族地区永远不得安宁。

甘南战役胜利后，蒙军二、五旅邀请民主联军一旅共商剿匪事宜。他们组织了约二千人的优势兵力，于1946年2月初即正月初四，包围了布特哈旗大河湾乡冯家窝棚。从天亮打到午后三、四点，曾两次派人前去劝降，负隅顽抗的敌人死不投降，并乘机打死蒙二旅战士一名，打伤一名。当地地主冯玉田（光复军副师长、土改时已枪毙）窜进扎兰屯向国民党部报信并蒙骗通报在扎兰屯驻扎的苏联红军。苏军派了三卡车机械化部队开赴作战现场，但明白了情况后收兵返回。蒙军用迫击炮猛轰敌人阵地。梁有才臂骨被炸伤，在其部下逼迫下，举手投降。战斗结果，生擒匪部下88人，还缴获许多武器弹药马匹。

5. 击溃蘑菇气黑七旅

歼灭梁有才匪部后，1946年2月中旬，蒙军二、五旅配合民主联军又攻打李三店，李三店黑七旅很快溃散。蒙军二、五旅接着攻打布特哈旗蘑菇气镇黑七旅宋同山部。敌人发觉了我军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空城计”。我军当晚摸进蘑菇气镇，在匪窝里未发现一敌。敌人究竟逃向何方，无一人透露，两大车店和油坊老板格外殷勤。准备了白酒、粉条、炖肉。我军领导先后两次派

人去侦察这才明了真相，原来敌人占着高地，重机关炮轻机关枪对准着蒙军，发现敌人阴谋后，赶紧组织了突围。

这次战斗之后，敌人更加敌视少数民族。1946年3月16日，宋同山黑七旅窜进萨马街屯，向手无寸铁的达斡尔、鄂温克、蒙古等民族百姓肆虐，杀死沃永寿等十几人，刺伤多人。

1946年4月初，蒙军二、五旅的鄂嫩日图、鄂秀峰旅长，向扎赉特旗驻军包启文旅求援，用重炮袭击宋同山部。宋同山见势不妙，率部逃往长春。

6. 整编降军，组建独立团

阿荣旗格尼河一带有几百人组成的地主武装，其中多数人是原阿荣旗地方治安维持会和国民党领导下的保安队成员。1945年11月初，这支武装在甘南民主联军协助下，被蒙军二旅收编为一个团，团长孙某和部下180余人，接受蒙军二旅后方司令部的领导，1946年5月改编为第四十一团。此团原有亲国民党的政治背景，将来可能为腹中之患，为此，1946年5月末在扎兰屯全部缴了械，从此以后第四十一团编号被取消，另立教导团。

宋同山黑七旅以及黑一旅四旅等光复军逃跑后，残余部分投降我军。于是在蘑菇气镇设独立团，全由汉族组成，张振武为政委。1947年初，又下令解散了独立团。

7. 取消纳文军分区，另建内蒙古自治军骑兵第五师

1946年4月末，蒙军二、五旅解放扎兰屯，驱逐了扎兰屯所谓的雅鲁县政府以及国民党授意下组建的地方治安维持会。接着按照上级命令，取消了东蒙古自治军纳文军分区及其下属第二、五、八旅编号。根据当年承德四月三日会议的精神，取消东蒙古自治政府，改建为兴安省政府，省会在海拉尔，后移至扎兰屯。军区为兴安军区。扎兰屯一带的达斡尔族为主的蒙军，改为兴安军区骑兵第五师，下设第四十一团，第四十二团、第四十三团等三个团。第四十一团以阿荣旗格尼河降军为基础，上文已交待，不

再赘述，第四十二团以齐齐哈尔一带的第五旅为基础，第四十三团以莫巴两旗一带的原第八旅为基础。

蒙军当时没有俸饷，有的战士还自带武器、乘马。许多人参加几次战斗后，为家庭生活牵挂，自动退伍者甚多。原蒙军第二旅约三百人马，继续留部队者不足百人；原蒙军第五旅五六百人马，继续留部队者不足三百人。根据当时减员情况，原二旅达斡尔族战士并入新编的第四十二团，后来从四十二团挑选一部分年青有文化者，编为教导团，为蒙军培养班一级干部。

第五师司令部主要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师　长：鄂嫩日图（汉名鄂荣斌）

师政委：第一任朱子修（汉族）

第二任克力更（蒙古族）

第三任叶华（汉族）

师副政委：吴泽民

师参谋长：第一任鄂秀峰（未上任）

第二任姚凤贤（鄂温克族）

师政治部主任：第一任沃文治

第二任乌兰巴图代（蒙古族）

师政治部副主任：乌兰巴图

师参谋处长：第一任多祯祥（任职不长）

第二任不详

师军法处长：胡龙海

师军需处长：敖××

师军械处长：张振武

其他组织、人事、事务等干事若干人，其中：金振昌负责人事，卜林负责事务，还有比利格、恩和扎布、苏景阳、额尔很巴雅尔、特古斯巴雅尔等。后来组织纠察队，苏景阳担任队长。

以上是扎兰屯一带达斡尔族人民从组织齐齐哈尔乡自卫大队起，直到组建第五师为止的建军剿匪活动的始末。这支部队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为反对国民党并铲除光复军，为保卫民族地区的安居乐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光复后参加革命战争的回忆

鄂秀峰　鄂景海

蒙古自卫大队建立和发展

建　立　部　队　经　过

“八·一五”解放后，我来到齐市。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在齐市建立了政权，组织了部队，而当地的达族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正和嫩江省政府筹备组建蒙政厅工作。

经鄂英海介绍我认识了中共嫩江省委书记王盛荣，省主席于毅夫和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同志。通过交谈他们知道了我是军人出身而且受过专业知识教育，因此动员我留下来，在家乡组织少数民族的部队。反复强调搞革命，没有武装不行的道理。而且向我详细讲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因此我同意组织少数民族的武装部队，以后经数次讨论，把组织部队的办法、武器来源、领导关系、经费、服装等等确定下来。

王明贵、王盛荣等同志多次向我交待要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工作方法。

于1945年10月中旬在齐市郊区奈门浅屯，召开了达斡尔人的村民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五十多人，都是达斡尔族各村的

代表。另外还有近十名进步的青年男女同志参加，其中有木藤、鄂月英及其侄女鄂××和乔淑兰等，他们积极要求参加工作。我和鄂嫩、德文斌三人主持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我们着重讲解了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国民党执行的大汉族主义的不同之处，从而肯定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搞革命才能求得民族的自由平等解放。再次讲解了成立武装部队，维持地方治安，坚决打退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必要性。在这次会上做出了以下决定：

（1）建立齐齐哈尔蒙古自卫大队；

（2）为了建立武装部队，动员全体达斡尔族人民，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马的出马、有人的出人；

（3）动员青壮年，积极前来参军；

（4）大队的队旗是一面红旗上绣白字（队名）；

（5）参军地点为奈门浅屯；

（6）确定我为大队长，鄂嫩为政委、德文斌为后勤主任、金玉宸为参谋长。会后报请嫩江军区审批。以后派积极分子，深入各村宣传、登记在群众手中散在的武器，动员交给大队使用，保障他们的安全。

从群众大会至十月下旬，仅仅十数日，前来报名参军者一百八十多名，约三分之一携带武器和马匹。另外也把群众手中散在的武器动员出来，献与大队。嫩江军区付给我们二十支马步枪以及弹药手榴弹，并派来三名干部，即金殿华、白万起、扎拉嘎三同志。那些天，奈门浅屯乔福生家不仅常供给我们人吃马喂，还冒着风险在齐市的光复军眼皮底下，用草车把苏联红军同意给嫩江军区的这些枪支弹药运了回来。我们把近两百名战士编为三个连，第一连连长敖和忠， 指导员白万起， 第二连连长莫尔根巴图，指导员扎拉嘎，第三连连长徐兰廷，副连长敖景奎。

部队组建完成时将近半数有了枪支，其他人员发给了手榴弹。

关于给养，嫩江军区拨给小米和高粮米，另外也拨给了马料。我们还发动各村的群众用各种车辆从齐市运到了长岗子、道卜台、奈门沁三个村中保管起来了。嫩江军区后勤部每半月还根据实有人数发给菜金，每人每日五分钱，并且约定行军作战吃了群众的粮食按每人每顿半斤粮食，写给欠条，群众以此顶交公粮。

服装问题，暂时不能全部解决，采取了缺什么补什么的办法，以后逐步解决。

1945年10月30日，我们大队组建完毕。正午十二时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排列整齐的队伍高举本大队的队旗，从奈门沁屯出发，浩浩荡荡行军三十多里，到达长岗子村。

我们在长岗子进行部队训练，特别是武器的使用射击乘马等等。好在有不少人有过训练，他们担任了班排长，从而很省力。另外还进行纪律教育，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在长岗子驻军整训两周，在此期间又有四十多人前来参军，大队总员已达到二百五十多名。

蒙古大队经历的几个主要战斗

“八·一五”后齐齐哈尔市获得解放，王明贵同志率部队进驻齐市，中共中央又派王盛荣、于毅夫、朱光、马识途、励男、郭维城、张瑞林、吴富善等同志来到齐市。着手组建了嫩江省政府、嫩江军区，并建立各区的民主政府和公安大队小队，初步建立了民主秩序，安定了民心，为改善人民生活，又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

进入11月份以来，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例如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援助，有飞机大炮，往东北已运兵几十万，已打过松花江，就要打到齐齐哈尔市，又说国民党是正统，不久八路军就交出齐市，共产党不可靠，长不了等等。与此同时，以国民党的光复军、先

遗军等番号的土匪四起。为此嫩江军区给各部队下达指示，加强剿匪安民保卫群众的安全。

1. 初试锋芒

于1945年11月中旬，由嫩江县公安局转来情况，说光复军叶永林等人带百十名前往西南乡景星一带，搜集日伪遗留的武器，可能近几日返回龙江县回子房区进行扩编，建议我队前往截击。同时也接到了嫩江军区要我队速前往的命令。

我队连夜向富拉尔基以南的虎拉虎尔站出发。于次日午后，前卫连进入到富拉尔基东北二十多里的哈拉村东屯时，突然传来了密集枪声，前面传来报告，前卫连和敌人遭遇，人数不详。当我来到前方时，前卫连已抓到八名敌人，一辆大车，大车上满载着手榴弹和子弹。村中的敌人被迅速包围了，西屯却被敌人占领着。由于突然遭遇，彼此都不了解情况，于是我对俘虏进行了审问。抓到的是光复军团长叶永林和回子房区长黄廷宣，其他六人是他二人的警卫兵。后边指挥的是光复军营长王文起（伪满警察）。我一方面布置进攻，一方面要求叶、黄给王文起写信，要其交械投降，保证生命安全。信写好后放了一名警卫兵带走。以后王文起仍叫该兵回来传话，要我队派一名负责干部前往联系。我当时就派了三连连长徐兰廷同志前去，可是王文起把徐兰廷扣起来，而要和叶、黄二人交换。我们知道敌人不会投降，为此我们利用黄昏时机，突然向哈拉中屯发起进攻，同时叫二连进攻西屯。我队一连突入并占领了中屯。王文起只带领少数人逃入西屯顽抗，而徐兰廷同志则乘敌人混乱时突出来了。西屯是土围子，四角有高大炮楼围墙，不易攀登，因而二连进攻不利，伤亡很大，为此暂停攻击，整顿队伍，同时调三连形成合围圈。正在我队布置时，敌人徒步突围向西北逃跑。因为天黑，我队追击了一段，抓到二十名敌人。这次战斗中，我们打死敌人十名，活捉叶永林、黄廷宣以下三十多人（包括伤员在内），后来听说逃走的

敌人中有二十人是带伤逃命的。战利品有一门八二追击炮，十二支掷弹筒，两挺轻机枪，从战车上卸下来的机枪两挺，马步枪三十多支，手枪两支，子弹和手榴弹四大车，还缴获五十多匹马（打死打伤三十多匹在外），鞍具八十多具。

我方也阵亡七名战士，轻重伤二十多名，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了。我方乘马损失五匹。

次日我们对阵亡的战士，进行了安葬，把重伤员送到全和台屯我队建立的医疗站。战俘被送往齐市嫩江军区发落。我们经请示同意，把光复军团长叶永林留下了，罚军服（棉服）五百套，限期交纳后释放了。

我们建队后的第一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首先我队武器充足了，士气高涨了。经过这一战斗，蒙古大队的声威大振，群众拍手称快，土匪和光复军闻名远逃，尤其龙江县境内再也未发现过大的光复军和土匪的足迹。

经过这一战斗，附近的群众纷纷前来参军，到十一月底我队已发展到350多人。我们这次战斗，在当时的龙江县报和嫩江军区报上都做了详细报导。

2．活抓匪首“快马神枪”刘四海以下全部匪帮

1945年12月中旬，我们得到情报：刘四海匪徒约四十多人已进霍多台屯进行抢劫。该屯离我驻地近五十多里，我们派敖和忠连长带领全连乘马远途奔袭。全连一百二十多人，分兵两路前进到离该屯有数里时，土匪闻讯出逃，于是在平川上开展了追击战，追出三十多里后除极个别的逃脱外，匪首以下全部活捉（其中轻重伤十多人），共抓到四十多人，缴获三十多支枪和一些匹马。

3．杨家窑攻坚战

到1945年12月末，我队已发展到五百多人。

据保安一旅反映和嫩江军区的指示，我队前往卧牛吐以东剿

匪（据说是蒙匪）。前进到卧牛吐西屯，据前卫连报告，东屯杨家窑村的土匪打伤我战士三人，其中重伤一名，他们凭土围子顽抗，不让我队通过和靠近。根据周围群众反映，在土围子内有三十多名持枪分子，他们自称是光复军。我们前往视察了一遍，土围子很高而且有炮楼，围墙上下遍布枪眼，在没有炸药和重火器的情况下确实难攻。我们又派人喊话，说明我们是蒙古大队，叫他们开门，否则就不会有好下场，然而他们大骂老蒙古，并声称不开门。此时已天晚，我派三连包围起来，决不许放出一人，也不许进入。然后把所有的掷弹筒调来（共十二支）放在四面，把一个迫击炮也调到了近处。凌晨一时，同时从四面射击，只用了一个小时，土围子里乱成一团，大喊投降，开门要求停止射击，摇晃白旗。我方喊话，叫他们把武器全部扔出土围子，然后在围子外排成两行等待开大门。我们派了一个排进内清理一下，抓到土匪三十多人，有两人重伤，十多人轻伤，缴获长短枪三十多支，子弹多发，马三十多匹。我方战死一名，重伤一名，轻伤四名。

后来了解到土匪在院内铺了很厚的柴草，以防掷弹筒爆炸，可是掷弹筒弹同样爆炸，有的空中爆炸。因此他们不知是什么武器，所以很震惊，只好投降。

经过这次战斗，对江北一带震动很大，匪首红毛子携二子和十多支枪，自动前来投降，各村的达斡尔族青壮年纷纷前来参军，仅仅不到一周我队就扩兵150多名，从而使全队总人数已达700多名了。武器马匹也比较齐全了。因此全大队编成四个连。

蒙古自卫军五旅参加解放齐齐哈尔市战役的前后

蒙古自卫军五旅，是由原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自卫大队扩编

后组建的。该大队是由东北民主联军嫩江军区组织的部队。达斡尔自卫军五旅下属两个团，六个连（骑兵五个连，步兵一个连），人数约一千名左右。

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主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顾全大局取得国共两党全面合作，将已恢复安定实现民主生活的齐齐哈尔市毫无条件的、和平的、完整的交给了国民党政府。1945年12月18日国民党委派的嫩江省政府主席彭济群率领一批大员来齐市接收。他们到达后，立即着手建立他们的政府，在省政府内根本不设蒙政厅，不予考虑少数民族的愿望。

我们部队撤出齐齐哈尔后，于1945年12月下旬，通过内部关系，得知苏联红军雇用一批人员，看守日军遗留的仓库，并且指定要蒙古自卫大队的战士去当看守。于毅夫主席把原蒙政厅秘书处主任鄂英海介绍给苏联驻齐齐哈尔市代表都如克上校，光复军占领齐市后苏军找鄂英海联系，后经鄂英海派人专程来我部队驻地联络，我们当时请示了嫩江军区励男同志（撤出齐市后他兼军区参谋长）他指示可以派，将来以此为据点侦察光复军。为此我们派出四十名干部战士，队长是吴文华同志，副队长是多国祥，还派了张英海、特格喜巴雅尔、吴自新、鄂景芳等骨干人员。这四十名人员徒手去的，武器弹药由苏军发给，并每月发工资（伙食费和零用钱）。看守的地点有两处：一是南仓库，方圆二十多华里有专用铁路线，仓库内有草席、食盐、大米、高粮米、药品、军用慰问袋等（绝大部分被苏军已运走）；另一处，是市内军用仓库，装的都是汽车零件和其他机械零件。根据龙江县公安局长肖磊同志提供的线索，在南仓库的废机井内发现日军的枪支和弹药。我们派英尔根巴图连长利用夜间从机井内掏出枪支弹药，前后共得子弹六万发，手榴弹和掷弹筒用弹五千多枚。

1946年2月上旬，嫩江军区下达一份紧急通知，内容大意是

苏军应国民党政府彭济群的邀请出城剿匪，为此要我们的部队在两天内撤出甘南以北阿荣旗境内，并且要避开公路线。

倪志亮同志率领部队于三月来到昂昂溪后，召开军事会议，由倪志亮、刘锡五、王明贵、朱光等同志主持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倪志亮任总指挥、王明贵任副总指挥。我被召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确定解放齐齐哈尔的时间在苏军撤退后。据了解苏军可能在四月末撤出齐市。这时，齐市人民在国民党光复军压迫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派人来请求民主政府和民主联军解放齐市。于是各部队加紧准备，并下达了各部队的任务。我们蒙古自卫军五旗的任务是"从梅里斯以东沿嫩江流域到卧牛吐布防，首先要断绝与市内的交通，防止敌人突围。其次派出警戒部队向李三店、蘑菇气方向警戒，及时了解光复军第七旅的动向。另一任务是把在齐市看守仓库人员交总指挥部侦察参谋指挥，以两个仓库为据点侦察市内国民党光复军的布防和动态。根据上述决定我们进行了布署：其一，由于嫩江已经解冻，到处可以摆渡和涉渡，为防止光复军偷渡，以村屯为据点修防御工事布置监视哨和游动哨，昼夜进行监视，断绝交通；其二、派莫尔根巴图为联络员前往昂昂溪负责司令部和我旅的联系；其三、派人前往李三店方向侦察警戒；其四、通知给苏军看守仓库的吴文华、多国祥两队长，前往昂昂溪总指挥部领取指示，并令其受侦察参谋直接指挥。据了解齐市国民党光复军对出入城盘查很紧，对苏军汽车也要查通行证。城内主要街道和重要机关都用沙袋垒工事，巡察队络绎不绝，摆出一付在市内决战的阵容。齐市内的国民党光复军的武装力量约七至八千人，比较有战斗力的除了彭济群带来的卫队外，光复军第五旅、第六旅、其他各县的武装组成二十四个大队都是受降的土匪和警察等，这些乌七八糟的队伍绝大部份都驻在市内各牛马车店及小旅店，没有统一服装，只带袖标，武器用的是日军遗留下来的骑步枪、手榴弹，很少有机枪，更没有重武

器。据说光复军有十辆日军的战车（八至十五吨的小、中型），两辆装甲车。

1946年4月21日，我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决定于22日攻打齐齐哈尔，命令我部（蒙古自卫军五旅）于21日晚进入阵地，坚决阻击一切企图突围之敌并和右邻部队加强联系，互相支援。由于国民党政府彭济群首先闻风逃跑，其他光复军认识到守城无望，为此改变了计划，从22日午夜起，全面撤退，这实际上就是各自逃跑，多数向榆树屯、炮台屯方面突围。他们遭到围城部队的堵截，大部份被俘或被杀伤，少数逃跑了，十辆坦克车和两辆装甲车全部被缴获。由于大江的阻隔，在我们防守的地段没有大批光复军前来突围，右邻五团亦是如此，因此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我们只截获零星逃跑的散匪和光复军约五十多名，其中抓到一名自称撤退总指挥的光复军上校李某（名字忘了），他腹部负伤，和其他俘虏一样送交嫩江军区司令部。

解放齐齐哈尔的战斗只进行一天便全部结束。4月25日召开了庆祝齐齐哈尔市重新解放大会。

齐齐哈尔解放后，我们达斡尔自卫军五旅受嫩江军区的命令留下一个教导队约一百八十多名（实际上只有一个加强连），在富拉尔基由莫英宝和徐兰亭负责进行扩兵和训练以补充部队，另一方面受嫩江军区保安二旅指挥维持地方治安。原守卫仓库的吴文华和多国祥把任务交给城防司令部，领队回归了部队。其它由我率领沿滨洲线从齐齐哈尔经朱家坎、成吉思汗、扎兰屯向海拉尔方向挺进，配合保安一旅王化一部（他们乘火车）收复沿途城镇。我们于五月初到达扎兰屯时，得知王化一同志率领部队已到满洲里市。我们部队到扎兰屯的第三天，夏辅仁和克力更同志找我，转达嫩江军区和兴安军区的联合通知，从此把我们旅由嫩江军区转属兴安军区和鄂嫩日图同志的部队合并并改编为兴安军区第五师。

兴安军区第五师概况

兴安军区第五师从它组建到撤销不足二年。这在历史的长河，可是暂短一瞬之间，并从全国来看，活动地域狭小，参与人员有限，然而这必竟是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实，值得记载。

五师的建立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一、组建前的概况

“八·一五”解放，受日寇奴役十四年的内蒙古人民，积极开展民族自治运动。于1946年1月葛根庙召开了内蒙古东部区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全东部区划分六个盟、即卓斯图、昭乌达、哲里木、兴安、纳温慕仁、呼伦贝尔盟，同时决定建立自治军，主动争取中国共产党领导。

于1946年4月3日，在乌兰夫同志主持下，在承德召开了由内蒙古东西部区代表参加的“四·三”会议，在该会上通过决议，撤销东蒙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选举乌兰夫同志为该会主席。设立东西部两个总分会，东蒙总分会选哈丰阿为主席，设在乌兰浩特，西蒙区尚未解放，故暂缺。同年五月，沿用国民党政府省区规划，建立了兴安省，其省会定于海拉尔，后迁到扎兰屯，区域包括兴、纳、呼三盟，省主席是特木尔巴根和方志达同志。同时决定成立兴安军区，建立武装部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解放战争。但是在建立兴安军区以前，内蒙很多地区已自动建立了地方武装以维持地方治安；不少地区直接受邻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指示和领导，组建部队，配合主力并肩战斗。兴安军区的建立只是把这些武装部队统一组织起来。兴安军区不仅限于兴安省，而且领导已解放的全内蒙的武装部队。它

有六个师，一师驻防兴安盟，二师驻防哲里木盟，三师驻防卓斯图盟，四师驻防昭乌达盟，五师驻防纳温慕仁盟，六师驻防呼伦贝尔盟。另外建立了卓盟总队、兴安支队（后改六支队）、教导团、警卫团、独立团等武装部队，当时张策同志任政委，阿思根任司令员。军区只设一个司令部，内分五处，即政治处（主任胡昭衡）、参谋处（处长鄂秀峰）、后勤处（处长色音吉儒合）、卫生处（处长额尔敦高勒）、通信处（处长鄂秀峰）。

二、五师的建立

兴安军区第五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乌兰夫同志指示下，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扎兰屯组建。该师是以达斡尔族为主体（在当时统称为蒙古族），由蒙、汉、满、鄂温克等民族组成的。该师的干部战士由拥护内蒙古自治运动，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者，自愿前来报名参军。这是战争年代特殊情况的需要。

五师建立后，对干部有计划的进行轮训，把有培养前途的青壮年送军大短期学习，把被分配来的干部充实中下层，重点是连排级干部。把政治干部进行更新，如董华、于民、沙托等同志都先后担任了团政委。四十二团南下时期基本上调配完毕，从而使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组建后的第五师领导干部如下：师长鄂嫩日图，政委朱子修后由克力根同志担任，参谋长鄂秀峰（不到一个月调离）后由姚风贤接任。

组建第五师初期，建立四十一团、四十二团、四十三团、教导团、独立团，计五个团。后因四十一团人员过少而撤编。独立团是收降的土匪，因其恶习不改，缴械撤编。第五师实际上是四十二、四十三、教导团三个团组成的。团的领导是：四十二团团长原由鄂秀峰兼任，后由多文秀担任，团政委是德文斌，后由孟继光接任，四十三团团长敖英桂，副团长阿木尔扎布，政委于明，

政治部主任白拉西，教导团团长是单福祥，政委叶华，后由沙托接任。

第五师总员约两千名。组建后，在党的领导下为保卫和建设巩固的大后方积极支援解放战争，积极投入了剿匪安民战斗，保卫了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

三、五师的组成单位

兴安军区五师是在中共嫩江省军区指导下，由三个方面的地方部队合并组成的。

蒙古自卫军五旅 这支部队是组建第五师的主力和骨干，原有两个团，合编五师后改称四十二团和教导团，也就是说五师三个团中占两个，总员约一千名，是以达斡尔族为主体的部队。装备比较好，除轻武器外有两门八二迫击炮，两挺重机枪，而且各连队都有轻机枪和掷弹筒。这支部队建立以来多次参加战斗，而且参加了解放齐齐哈尔，是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五旅主要领导有旅长鄂秀峰，政委鄂嫩，后勤主任德文斌，参谋长金富甲，一团团长金玉振，二团团长鄂贵芳。连级干部有金殿华、白万起、扎尔嘎拉、敖和忠、徐兰亭、莫尔根巴吐、何大保、郭文廷等。

达斡尔大队 达斡尔大队建立于1945年12月。“八·一五”解放后，莫力达瓦、巴彦旗一带，也和其他区一样，土匪四起，打着各种旗号的国民党光复军到处乱窜。为了维护地方治安，保护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由阿木扎布、涂长庄、鄂对祥等人发起，经与讷河县共产党二分区任团长联系后组织起来的。该队是以达斡尔族为主体，最初只有四十多人，扩军发展到一百多人。以后嫩江军区二分区补充他们一些武器并选派干部直接指挥和领导，从而扩大编成一个大队，下辖四个连，人员五百多名。

1946年5月改属兴安军区，和其他部队合并改编为兴安军区

第五师四十三团，驻防莫力达瓦旗。该团主要领导人员是：团长敖英贵，副团长阿木尔扎布和涂长庆，政委于明，政治部主任白拉西。

这支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多次战斗，其主要有：

（1）于1946年1月11日同嫩江军区二分区的部队并肩战斗解放了尼尔吉镇，俘虏光复军四十多名。

（2）当年2月在二分区统一指挥下参加解放讷河、嫩江的战斗。

（3）1947年冬到1948年春，在二分区保安队配合下完全消灭了地主联军陈子华一百多人，保卫了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

英雄的四十三团，剿灭了当地反动武装，值得记载的是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为以后党政军提供了干部人材。

布特哈大队　建立于1946年1月，是受嫩江军区指示建立起来的。也是以达斡尔族为主体的部队，当中其主要领导有：鄂嫩日图、吴泽民、多祯祥、姚风贤等人。他们主要是以扎兰屯和阿荣旗为基地剿匪打光复军，保卫民主改革，后来扩充到三百名左右。组建五师时这支武装改称五师四十一团，由姚风贤同志任团长。后来由于人员过少而撤销，把干部战士都补充到四十二团、教导团去了。据我了解改编四十一团以前他们参加的主要战斗有：

（1）于1946年1月末在嫩江军区统一指挥下参加了攻打朱家坎、李三店、碾子山等处光复军六旅的战斗。

（2）于1946年2月参加了攻打莫古气光复军第七旅，由于侦察工作失误指挥不当而失利，撤出了战斗，退却到扎兰屯以东地区进行休整。

（3）于1946年4月末，攻打和收复了扎兰屯镇，同时肃清了布旗境内的光复军。

四十一团虽建立不长和其他团队合并，然而在共产党 领 导

下，维护了地方治安，保卫了民主改革，培养了一批干部，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独立团 郭嫩日图主持五师工作期间受降了一股土匪，约二百多人，改编为独立团，由张振武任政委，驻扎在莫古气附近，1947年6月跟随四十二团南下到乌兰浩特附近被宣布缴械遣散。

四、第五师的撤销

1946年5月五师组建完毕，抽调部分干部送齐齐哈尔和北安军政大学学习，同时分配来了一批共产党培养的干部，补充到各团担任了连排级干部，部队的素质大大提高。

1946年秋大力开展剿匪工作，以团或连为单位多次出征，到1947年5月基本上肃清了土匪，为土改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基础。

1947年6月，奉命派四十二团配属第一师南下，赴解放战争第一线参加战斗。派出的四十二团，虽属骑兵编制，但是个加强团，有四个连的编制，而且机炮连有重机枪四挺、炮四门，总员六百名左右，而且都是从各团调来的比较年轻的战士，干部也是调整好的。据说到达战场后战斗勇敢顽强，受到了好评。该团于1948年初调回整训，以后拆散了该团，充实到其他团去了。

1947年5月，把四十三团调来扎兰屯、阿荣旗驻防，于1947年末和教导团合并改编为独立步兵团，下设三个营，驻防成吉思汗镇。第五师番号予以撤销，到此第五师已完成了它的使命。

参 加 解 放 战 争

一、骑兵四十二团南征前的整编

1946年12月末，从东北军大派来干部十五名到职工作，担任

了我团各连队的指导员、副连长、排长和副排长等职务，原来的连排干部都送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去了。

1947年5月接受了兴安军区的命令，要五师组建一个骑兵团南下作战，骑兵四十二团接受了南征的任务。五师从教导团、四十三团和独立团各调一个骑兵连队来加强我团的战斗力。后来四十三团因为只给二挺重机枪，乘马四十匹，该团的连队没来。

我团南下时，连排班干部百分之八十是东北军大、甘南、乌兰浩特军干校毕业的干部担任连队的主要工作，所以自身革命化建设上大有进步。

我团的共青团员较多，少数连干部已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47年9月从东北军大来五个同学都是党员，担任组织干事和连排干部。

四十二团南征前，骑兵五师命令四十三团团长孟林元同志任四十二团团长，但没到职。尔后，四十二团团长多文秀同志又担任团长，孟继先同志任团政治委员，何维城同志任团参谋长，沃××任政治处主任。作战参谋是苏××，组织干事是特苏勒图同志，宣传干事是何希格同志，民运干事是白彦巴图，卫生队长是郭安惠同志。机炮连连长是郭智勇，指导员有鄂景海、苏热，副连长有拉喜尼玛；一连连长莫日根巴图，指导员吴文端、图布新、莫英瑞、那顺巴图，副连长郭文廷；二连连长多文升，指导员布肯齐，索音达来同志代理指导员工作。

四十二团总人员约六百余人，1947年6月5日四十二团整队出发时，五师政委克力更同志讲话，师首长和纳文慕仁盟领导等人来送行，分头向连干敬酒，群众在大街上欢送子弟兵上前线英勇奋战。优秀的达斡尔族指战员，乘马向西满战场方向挺进了。

二、到达乌兰浩特

从扎兰屯出发，经蘑菇气、音德尔等地到达乌兰浩特市。先头

部队到乌兰浩特市东方桥时，早已迎候的骑兵第一师师长王海山等同志亲切接见了我团领导同志，听取了行军情况的报告。在市广场上开了欢迎大会后，由骑兵一师举行欢迎四十二团的连以上干部酒宴，表示慰问。

第二天，兴安军区阿思根司令员等人，前往部队驻地，慰问部队全体指战员，同时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主要说明内蒙组建部队和前方友军作战情况。阿司令员讲话中问到我团做群众工作一事，我们报告首长说，利用两个半天给群众锄地了，经常帮助群众打扫院子，挑水，做好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听后很高兴，鼓励我们到前方就这样，做好群众工作。到乌兰浩特不久，扎兰屯发生事件：四十二团从扎兰屯出发不久，教导团的两个班长带头闹事，鄂云章班长是达斡尔人，宝音何什格班长是鄂伦春人，他们酒后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没买票，不让进去，互相发生口角。尔后，他们四连自行组织一部人，跟着四十二团南下打国民党的军队，自已乘马持枪就开始行动，徐兰廷连长得知后立即乘马追赶。两个班长认识了这一行动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为此，向徐连长提出要求回连队不给处分，而且要有师首长给予保证的亲笔信件才能回连。徐回扎兰屯请示师首长，师领导满口答应，写了书面保证，他们才跟徐连长回到连队。然而回去不久便逮捕了郭云章、宝音贺什格、徐兰廷等人，对其他人员也进行了审讯。鄂云章不承认叛变罪和反动组织活动罪，就被枪毙了，宝音贺什格判了有期徒刑五年，其他人员也受到不同的处理。

此事件后五师首长仍认为是叛变行为，而且必定有反动组织，要找出后台人物，搞清反动组织。为此，前来乌兰浩特市把原教导团来的一连连长莫日根巴图、指导员吴文瑞、涂布新等人叫回扎兰屯五师，交代问题。最后逼死了莫日根巴图，开除了吴文瑞同志的军籍，遣回农村务农。吴文瑞那时刚从东北军大出来，工作才六个月。

与此同时，师首长还认为，从独立团来的二连开小差的多和有受降人员，决定解除全连人员的武装，回扎兰屯遣散。

我团南下途中遭遭了上述事件后，五百余人的达斡尔族的子弟兵继续南征，一心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决心没有动摇。

三、参加东北解放战役

骑兵四十二团自1947年6月到1948年3月，参加过东北解放战役和夏秋攻势、冬春攻势、突袭北宁路、攻打大虎山、通江口、法库等战斗。

一次遭遇战 骑兵四十二团在彰武县额莫勒图西山战斗，是一个遭遇战。我团进村中发现敌人往西整队行军，在约六华里山谷中活动。多团长命令骑兵一、二连左右迂回，机炮连从正面进攻，我连四挺重机枪，进入阵地开始进攻，敌人先反抗射击，尔后退却。因为青纱帐太高，对面不见人，敌人利用高粱地，乘机狼狈逃窜。打了二个小时，天黑了，又因为离敌人居点较近，多团长下命令收兵，转移方向，准备宿营地。

参加大虎山战斗 1947年秋季攻势开始。知道解放战争历史的同志都知道，在东北战场上，有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相互配合的著名战役。敌人“重点防御大虎山”，敌强我弱局面开始转折之前，我黄河部队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虎山攻城战。由主力部队三面进攻敌人，我团在大虎山南侧约五华里之处，准备打外援部队。在行军中打了一、二次小战斗。早晨五时到达进攻的地点，一连进村俘虏敌人二十余人，少数敌人逃窜进大虎山了。我团多团长命令部队进入阵地，待命了解敌人动向，一连在东边，二连在西村，机炮连和团部在正面。我团第一次参加攻城战，积极准备打一次硬仗，紧张地修筑工事，观察敌情。因为主力部队进攻失利，下午一时敌军向我团阵地猛攻而来，我团便开始了防御战斗。机炮连二排胡振山排长率领战士攻出约

华里远，一排给予火力掩护，杀伤了许多敌人。此刻敌人炮弹乱丢，空中有敌人飞机扫射，地面枪炮声震天，激战二个多小时后把二排撤回到防御阵地。后来因敌人用火车运来援兵较多，主力部队开始撤退，我团又担负起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

四十二团在前线作战二次失利：

（1）主力部队战略转移，由黄河部队给予掩护，我团的一、二连轮流派一个排哨，在离团部约十华里的贾吉沟村执行任务。第一天和第二天没发现敌情，第三天是由一连二排十九个人执行任务，由于代理排长金明阳同志战斗指挥不当，麻痹大意，防御不严，敌人骑兵百余人突然乘马包围贾吉沟，六个人突围出来，十三个人被敌人全歼。根据枪声，派情报参谋莫兴海前去了解敌情，他也被敌人抓走了。当我团出动时敌人已走，去向不明。

（2）三道沟战斗。1947年12月，部队参加冬季攻势，大虎山、新立屯战斗后，来到彰武附近。当时认为后方较为安全，到三道沟村宿营时，黄河部队首长指示休息三天，可以洗衣服。前二天休息很好，第三天我团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主要总结前段作战工作，举行评功会。到下午二时左右，听到鸣枪告警，不久敌军开炮，我团各连各自都跑回连队组织战斗，敌人进村后互相激战开始了。因为仓促应战，各连各自为战，配合有失误，战斗很困难，三团增援又因迷路没捕到战机，致使敌人在天黑时摆脱走掉。这次战斗，我方伤亡六人，丢失重机枪两挺。在三道沟战斗后，机炮连变动很大，郭智勇连长和郭文廷连长调团部工作鄂景海同志到二连任指导员，机炮连一排到一连二排，苏热同志率领二排跟团部作战。

法库战斗　1948年5月初，我团来到法库县城外部地区，退到法库敌人暂编六师万余人夜间突围，经我团防区通过大批人马车辆。约晚上十时我团二连北山哨兵发现敌军的活动，当时分不

清友军和敌军，便向团里报告，以便准备战斗。全团人员待命等候并派了侦察分队进行侦察。包殿臣同志，回来报告已与友军侦察分队相遇，分析敌情，确实是法库敌军突围，当时不能交火作战，怕敌人回法库，尽量都放出来，在法库外边组织力量全歼敌人。等待天明作战之际，我团的多团长、何参谋长决定抢救后方郝关村工作人员，先去郝关村。当时我团的二连战斗力较强，指挥员得力，命令二连为尖兵连，二连派一排敖立山排长为尖兵排，行军五华里进村时和友军侦察分队相遇，得知敌人刚过去。现在敌人在先，我团在中间活动，情况非常紧张。又前进二华里，发现敌人二路大批人员行军。敖排长报告敌军进村太多，满街都是。这时我团正在南街待命，为此，我团从村南街往东行驰。在离村二华里山谷地带，敖排长又报告说三面受敌，东头、西面、北山上都是敌军，不能前进了，多团长下令，向南突进。我团开始行动时，敌军就开火了，我团仅三、五分钟便上了南山高地，多文升连长和鄂景海指导员在南山上下都布置了兵力防御敌人进攻。敌军打了一阵往前走了，不久便与东边友军激烈交火了。我团趁机从西村开始进攻敌人车队，一举打下来四、五十辆大车和后勤人员。我团第一次打了一个胜仗。接着团长接受友军的指示，率领部队参加了追击和全歼敌人的战斗。

五、骑兵四十二团整编的前后

到1948年初，东北地区南满、北满大块解放区联成一片，东北根据地已经空前扩大巩固了。骑兵四十二团，经通辽北上，到乌兰浩特市，在那里被编入三团的各连队。原骑兵四十二团许多人担任了新职：参谋长何维成任三团的副团长，郭智勇任机炮连连长，鄂荣升任三连指导员，鄂景海任团部机关政治指导员，多文升任团部通讯参谋，特苏勒图任团政治处组织干事，苏热同志任青年干事，白音巴图任民运干事，排级干部到各连任职，仁亲

扎布等班长提升副排级。

骑兵四十二团团长多文秀同志任一师留守处主任工作，后来入内蒙粮食学校学习。何希格同志任一师司令部管理科科长，拉喜尼玛同志任师部侦察连连长，布肯齐同志任师政治部管理员，黄昆太任师后勤给养工作，多国瑞同志去师运输队当排长。其余干部都参加了编外大队政治集训队学习，尔后复员、转业、入学，一部分同志回到了农村务农。

莫力达瓦旗达斡尔大队

杜青海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9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军迅速推进东北，解放了大片土地。这时，蒋介石为了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在其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协下，集中优势兵力，向东北大举进攻。并且派遣大批“军事特派员”和特工人员，到各地搜罗、收编伪满军警人员、土匪和地主武装，成立所谓的“国军”和光复军，到处抢占地盘建立据点。

莫力达瓦旗（简称莫旗）是达斡尔族聚居的一个自治旗。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榨，达斡尔族人民一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八、一五”当时莫旗的局面很混乱。旗所在地尼尔基镇，一些汉奸和上层人物，相互勾结，筹建了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他们不顾达斡尔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宣布成立“布西县”和国民党“布西县党部”。宋环任书记长，重要成员有穆北梁、杨惠卿等人。同时，组建了光复军一个团，团长是地主杨家德，其成员大部分是伪满的军警、宪兵、特务。莫旗的军政大权操纵在国民党县党部和光复军的手里。在乡下，日伪的残余、恶霸，各种社会渣子，纷纷拉起土匪武装，报号“四季好”、“考红”、“访友”等数十个绺子。这些土匪，后来大部被国民党收编为“光复军”或“挺进军”，三五十人就是一个团，百八十人就是一个旅，二三百人就封为××司令。他们

掠夺群众财物，索取达斡尔人的枪支弹药，抢走好马和鞍具，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追打进城的达斡尔族老乡。边打边骂："现在是我们的天下，老达子放老实点。"地主国民党员杨岐山，还恶狠狠地说："中央军来了，杀老达子，鸡犬不留。"1945年10月，嫩江边上一个达斡尔人居住的屯子——郭尼屯，被光复军包围搜查，抢劫一空。达斡尔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了严重危胁。这引起了达斡尔人极大的愤怒，纷纷要求组织自己的武装。大家愤慨地议论着："不能伸着脖子等别人来砍头，拉起队伍同他们干！"阿木尔扎布、孟鄂讷布、涂长庆、鄂对祥等人，受众人的委托，筹办建立队伍之事。他们和阿拉努图克（区）有声望人士，在阿多拉召开了各屯爱里达（屯长）会议。经过协商，决定成立自卫武装。要求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马出马，兄弟多的轮流服役，每期三个月或半年。爱里达回到各自的屯子传达会议决定，得到了达斡尔群众的热烈拥护。农民和猎民们的积极性很高，自带枪马报到的30多人。1945年11月初，莫旗达斡尔大队，在阿尔拉屯正式成立。十几天后，西瓦尔图努图克的达斡尔人，也建立起自卫武装，来参加大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六七十人。全大队编为三个中队，大队长阿木尔扎布，副大队长涂长庆、孟鄂讷布、鄂对祥。第一中队长孟满山，第二中队长郭新吉拉，第三中队长巴音贵。

这支队伍诞生后，就担负起剿匪，保卫家乡的任务。大队刚成立不久，都拉日屯的爱里达来报告，他们那里来了十几个土匪，说是打前站的，后边还有大队人马。达斡尔大队马上出发，到达都拉日屯时，土匪二百余人已进村。敌人见达斡尔大队来攻打，连插在大门上的青天白日旗，都顾不上取下来，慌忙逃走。在追击中俘敌七名，缴步枪七支，手枪一支。第一仗旗开得胜，对士气是一个很大的鼓舞。1945年11月末，莫旗音哈里屯，一姓王的地主，拉起一支三十多人的土匪武装，扬言要搞什么"光复

军”。达斡尔大队得到消息，立即赶到加以包围，土匪被迫缴械，人员被遣散回家。1945年12月，大队在小杜尔本屯和光复军打了一仗，赶走了敌人，并打死打伤敌人数名，战斗中战士敖玉山英勇牺牲。不久，大队在大都尔本屯，同土匪“四季好”发生激战，打死打伤敌人30多人，活捉了土匪头子“四季好”和二头子“带五”，6个人逃跑了。正在这支民族武装艰苦奋战的时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温暖的手，支援了他们的正义行动。

1945年12月底，我军退出齐齐哈尔市后，嫩江省党政军领导机关，进驻甘南县。1946年1月8日，嫩江军区第九支队（嫩江省第二军分区即讷河军分区）司令员金忠、政委王文率部去解放讷河，路经查哈阳镇，发现了莫旗有一支和国民党对立的少数民族武装。认为争取这支队伍，对开辟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非常有利，也有利于临近地区的开辟工作和巩固根据地。金司令员和王政委当即写信，派新参军的达斡尔族青年苏荣扎布去联络，建议双方会师，共商解放尼尔基镇的问题。九日，苏荣扎布贝志持信来到莫族的哈雅都尔布屯，会见了大队领导，说明来意，他们看了金司令员和王政委的亲笔信，连夜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同八路军会合。1946年1月11日凌晨，达斡尔大队与九支队在莫旗的大田社屯会师。金司令员、王政委诚恳的表示愿团结起来，共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耐心地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大队领导很受感动，决心跟八路军站在一起，共同奋斗。这是达斡尔大队在成长的道路上，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从此以后，这支部队基本上在我军的领导之下了。当时共同研究了解放尼尔基镇的作战方案。两支队伍在金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分头向尼尔基镇包围前进。拂晓时摸进镇里，四十多名“光复军”，刚刚从睡梦中惊醒就成了俘虏。其团长杨家德等七名校官，当夜到东门外嫖赌去了，遂乘机逃往外地。尼尔基镇解放后，立即解散了国民党县党部。我

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达斡尔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和风俗习惯并深入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我们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罪行，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建立新中国。长期受欺压的达斡尔族人民，一听到民族平等，民族解放，都非常高兴，非常拥护，很快就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几天以后，莫旗的防卫任务就全部交给了达斡尔大队，九支队则出发去解放讷河开辟根据地，留下了老干部陈力新和陆有良二位同志，负责开辟莫旗的工作。

骑 兵 第 八 旅 第 一 团

1946年1月，东蒙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决定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各部队统一称为东蒙人民自治军。根据这一精神，达斡尔地区的各部队领导人，在嫩江军区的领导支持下，聚会于甘南县城，讨论整编部队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纳文军区，管辖三个骑兵旅：扎兰屯地区的达斡尔大队为骑兵第二旅，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大队为骑兵第五旅，莫旗和巴彦旗的达斡尔大队为骑兵第八旅。参加会议的敖匡海和阿勇巴图二人回到莫旗后，与有关方面协商，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先招兵扩充了达斡尔大队，而后进行了整编。1946年2月5日于尼尔基镇，骑兵第八旅宣告成立。旅长阿勇巴图、政委敖匡海，副旅长阿木尔扎布（原达斡尔大队的大队长）。莫旗达斡尔大队编为骑兵第八旅一团，团长涂长庆，副团长孟鄂讷布。巴彦旗组建了骑兵第八旅二团，团长郭明元、政委德富贵。骑兵第八旅的组建工作，是在嫩江军区指导下进行的，同我军关系更加密切了，指挥和供应都由讷河军分区负责。1946年2月中旬，“光复军”在占领嫩江县后，又以优势兵力进犯讷河。八旅一团，奉讷河军分区金司令员命令，去参加保卫讷河的战斗。仗打得很激烈，讷河县城的东、南、北三个门

曾一度失守，只剩下西门，打了一天一夜，经过反复争夺，才粉碎了敌人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保卫讷河的任务。在这次战斗中，八旅一团表现得很勇敢，牺牲一人，负伤三人。俘虏敌人四十多名，缴获不少武器弹药和其它物资。战后稍加休整，又配合分区的部队，乘胜解放了嫩江县城。战斗中八旅一团负伤二人。战斗结束后，又奉命搜索逃散到乡下的“光复军”零散人员，在阿音浅一带收缴敌人一百多支枪。

这支部队，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大汉主义，枪口始终对着国民党“光复军”。尼尔基解放后，又参加了清剿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和保护我党干部开辟莫旗和巴彦旗的工作。但是，这支部队中没有党的组织，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在政治上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部队成员中还混进了少数的无业游民、兵痞等不良分子，个别的违犯群众纪律。部队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的旧思想、旧作风。这些都影响着部队的进步，妨碍着部队的建设。

骑 兵 第 四 十 三 团

1946年4月3日，在承德召开了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会议，即“四三会议”，决定内蒙古各地的部队统一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1946年9月，中共纳文慕仁盟工作委员会，根据“四三会议精神，决定撤消纳文军区的建制，建立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五师。原骑兵第二、第五、第八旅，分别编为骑兵第五师的第四十一团，第四十二团，第四十三团。这次整编，是这支部队从只有单纯的民族觉悟，走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起点。为了解决部队的领导问题，纳盟工委派骑兵第五师副政委于明，带领经我党培养的民族干部三十余名，去四十三团工作。同年七月，工委书记夏辅仁同志到莫旗，在骑兵四十三团宣布了任免干部命令，对团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团长敖英贵，

政委于明，副团长孟鄂讷布，副政委萨永明，参谋长礼宪，政治处主任萨义尔。团辖三个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共四百多人。一连连长白嘎里，政治指导员贺其业乐图。二连连长色仍道尔吉，政治指导员苏荣扎布。三连连长孟和巴图，政治指导员塔斯。机炮连连长孟林元，政治指导员乌尼满都。部队整编后，遵照我军的宗旨深入地开展了以革命化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在思想教育和实际斗争中，还大力培养了积极分子，党组织经过考察了解，吸收他们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扩大了党的队伍，各连相继成立了党支部，党的领导健全了。

整编后四十三团的主要任务，是彻底肃清莫旗和纳文地区的土匪和反动武装，保卫土改和民主建政，巩固后方根据地。当时，莫旗及临近的县，土匪较多，有惯匪，也有政治性的土匪。其中有股报号"文武"的匪帮，头子刘祖武，是国民党"光复军"的旅长，讷河解放后，他率领残部窜到莫旗，招兵买马，收编了"占九州"、"访友"、"逼累"等多股土匪，人数猛增到六百多人。这股土匪非常狡猾，行动诡密，来去突然，时而集中，时而分散，避免和我军接触，企图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迎接国民党。1946年8月，这股土匪窜到了甘南县亚东镇，团长与甘南县大队商量好，从东西两面夹攻。政委于明带领一个骑兵连，走到亚东镇东面，就陷入了土匪六百多人的包围。我们赶快抢占了一个山头进行射击，地形对我军比较有利。这时友军甘南县大队，在亚东镇的西面中了敌人埋伏，牺牲了十八人，被击退了。土匪得意忘形，狂叫："活抓八路"，"活抓老达子"。由于我们依托有利地形，充分发挥了轻重机枪火力上的优势，打退了土匪多次进攻，直到夜间才冲出了包围圈。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一人，负伤四人，打死土匪七人。

这股土匪经过我们多次围剿打击，到了11月份，剩下了三百

来人，匪首刘祖武，耍了个缓兵之计，派人要求投降，被我们收编为“莫旗保安大队”，规定他们在万发屯驻防，不准坑害百姓。并派去何玉书同志担任大队指导员，做争取教育工作。但是，这伙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土匪，根本没有改恶从善的意思，他们严密控制和监视派去的指导员，还利用“摆香堂”和搞“家理会”的封建帮会办法巩固内部，暗地里和外地的土匪联系。因此，经讷河军分区批准，决定消灭这股假投降的土匪。全团于春节后的一天，向其驻地万发屯攻击前进，匪徒们闻风逃窜，我们穷追猛打，在毕台屯彻底将其击溃后，以连为单位继续围剿分散的小股土匪，很快就消灭了他们。从此莫旗境内的土匪绝迹，使全旗的土地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47年6月，骑兵四十二团开赴前线，中共纳盟工委决定，骑兵四十三团进驻扎兰屯，担起全纳文地区清剿土匪和保卫土改和建政的任务。

独立第三团

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决定撤销骑兵第五师的建制。骑兵第四十三团与教导团合并，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团，辖三个营，十二个连，共一千三百多人。团长兼政委于明，八月由李文精担任政委，副团长兼参谋长孟林元，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沙坨，副主任起云，供给处主任陶兴然，生产处主任敖兴然。一营营长郭义德，政治教导员贺其业乐图；二营营长易国礼，政治教导员刘焕章；三营营长白嘎里，政治教导员吴自新，副教导员巴图贺希格。

1947年末，发生了满都呼浅事件。满都呼浅，是巴彦旗（合并莫旗）的一个努图克所在地。一天夜里，进驻该努图克的土改工作团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六十多支枪被缴械，工作团干部孟和巴图、匡德明等三位同志被土匪杀害。

这股土匪是“光复军”残部，由反动头子国民党上校杨华全率领。他们原来活动在嫩江县一带，经常袭击土改工作团，残杀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组织地主反扑，做恶多端。这一次他们乘骑兵四十三团调扎兰屯之机，窜进巴彦旗，与当地恶霸地主陈子华勾结在一起，组织了三百多人的反革命武装——地主联军。他们在袭击满都呼浅土改工作团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叫嚣要“踏平巴彦旗”，“攻下嫩江县城”。他们攻击包围了巴彦旗政府，准备打进去，放出在押犯人，进一步扩充其反动武装，再去夺取嫩江县城。巴彦旗公安队在嫩江县大队的支援下，击退敌人，守住了旗政府。

中共纳盟工委决定，调独立三团一个骑兵加强连和两个步兵连，由副团长孟林元指挥，在嫩江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消灭这股政治土匪。确定的剿匪方针是“军事打击，政治争取，经济封锁”。从扎兰屯用火车把部队急运到嫩江县，孟林元到县委领任务后，率部急速赶到巴彦旗，他了解了一些情况，稍加准备后部队就出发了。打了几仗，土匪就躲进大兴安岭深处。1948年1月，我们侦察得知这些土匪在嫩江上游嘎如奇一带活动。骑兵连立即出发，第二天越过封冻的嫩江，进入高山密林。那里积雪有一尺多深，人马行走都很困难。走到一座大山的半山腰时，遭到埋伏这里的土匪的突然袭击。尖兵班长包木桑和战士孟海山两位同志当场牺牲，一民兵负伤，五匹战马被打死。走在前面的尖兵排，立即抢占了有利地形，英勇还击敌人，连队快速从两翼包抄上去。敌人一看情况不妙，慌忙丢弃爬犁和粮食，逃进了密林。连队回来后，认真总结了这次战斗的教训，采取了有效措施，以两个步兵连分头把守各要道，把土匪封锁在山里，断绝了土匪的粮食来源。骑兵连经常出动，发现匪迹就猛追猛打。打了几仗，毙敌20余。1948年2月9日（年三十），饿急眼的土匪，为了弄到粮食，趁老乡过春节的机会搞绕道奔袭，突然冲进莫旗北部的库如

奇屯。他们毒打农会干部，把全屯的粮食、肉食及其他物品，都抢光了。骑兵连接到报告后，连夜从二克浅出动，急行军120多里，2月10日（大年初一）早上，赶到库如奇南展开进攻，土匪慌忙溃走。骑兵连进行追击，因一夜远距离奔袭，马匹体力消耗太大，未能全歼敌人。毙匪一人，活捉一名土匪小头目和一名匪徒，打死马七匹，缴获步枪11支，粮食5千余斤，大轱辘车8辆，牛马20多匹（头）。战斗中我一名战士负伤。缴获的牛、马、车和粮食等物，全部退回原主，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春节过后，经过详细侦察，了解到土匪据点在小杨气，决定端他们的老窝。部队做了充分准备，于1948年2月末，骑兵连从达尔滨屯出发。在300多里的行军途中，山高林密，雪深路滑，每天只能走七八十里路。夜晚露宿雪地里，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战士们只能靠篝火取暖。第三天夜晚，到了朝阳店，拔掉一座土匪开的黑店，救出两名被土匪抢来的女孩子。第四天中午到达小杨气，连队马上进行三面包围。土匪遭到意外的袭击，一下子炸了窝，乱逃乱窜，我们分头搜索追击，打死打伤敌人40余名，俘虏90多人。还有家属，小孩七八十口人，被我们救出来，送回家乡。这一仗，我军牺牲战士一名。狡猾的反动头子杨华全，乘混乱时机，把皮袄和手抢都放在河床冰窟窿边上，制造跳河自杀的假象，钻进枯树洞内隐藏起来，躲过我们搜索逃掉，以后被鄂伦春人逮捕归案，在嫩江县公审枪决。至此，这股反动的政治土匪全部被消灭，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剿匪任务。

1948年4月，内蒙古军区指示独立三团抽调一个营去加强主力。独立三团抽出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第一营（原四十三团的三个连），编入骑兵第一师，受到了内蒙古军区的嘉奖。这营的全体指战员，编入骑兵第一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内蒙古锡盟一带的剿匪战斗。

1945年11月，在当时敌我斗争形势极为严峻的时候，莫力达

瓦旗的达斡尔族人民，为了保卫家乡和民族利益，组织起一支自己的武装——达斡尔大队，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支少数民族部队，根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先后整编为东蒙人民自治军第八旅一团、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五师四十三团、内蒙古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团。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忠实地执行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经历了光辉的战斗历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49年4月，与内蒙古军区警卫团、炮兵团合并，整编为内蒙古军区警卫团，标志着这支部队踏上了新的征途。

与光复军六、七旅的决战

郭秀峰

1945年，重庆谈判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了双十协定，向全国人民发起了进攻。为顾全大局，避免内战，嫩江省人民政府于1945年12月下旬主动撤离齐齐哈尔，省人民政府迁至讷河，省军区迁至甘南。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主席彭济群，带着一部人马进了齐齐哈尔。他们收编土匪、地主武装以及伪军警宪特，竭力发展"光复军"和"挺进军"、"先遣军"等反动武装，企图一口吞掉省内的革命势力，气焰十分嚣张。

一、甘南军事会议

碾子山附近的张家大沟、野猪窝村一带，盘踞着尹彬甫的"光复军"第六旅；李三店、蘑菇气村一带盘踞着宋同山的"光复军"第七旅。两个旅的兵力超过有五千，全是骑兵，武器装备也比较齐全，重要火器全由收拢的日本兵和伪军警操纵，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而镇守甘南的民主联军，全部兵力不足二千，武器设备残缺不全，以步兵为主，也有骑兵。力量比较悬殊。

"光复军"对民主联军恨之入骨，他们围困甘南，企图一举消灭民主联军。在得知了敌人的军事计划之后，省委书记刘锡五同志召开省军区会议，做出了制敌的紧急军事行动计划。

1946年1月20日前后，齐齐哈尔蒙古自卫大队，在连续剿匪之

后，聚集在西哈雅至尔门浅一带休整。22日凌晨，突然有民主联军的一位参谋和扎兰屯蒙军二旅的比利格同志，前来向我传达省军区的紧急命令。大意是：

有紧急军事要事需议，见函后，立即动身前来甘南开会。在雅尔塞屯备有汽车等候，切勿误时。并令你队当日晚出发，沿雅尔赛——达胡店——阿拉尔八里岗子——甘南方向线路挺进，务于三日内抵达甘南报到。王明贵司令员，朱光副政委、励男参谋长等三位同志签字盖章。

接到命令，我向部下做了简单布置即率后勤处长德文斌和数名勤务员，疾赴雅尔赛屯。

在雅尔赛屯，果然有汽车在等候。这是日伪遗留下来的以木拌子为燃料的卡车，破旧不堪，时速不超过二十公里。途中时有地主武装冷枪袭击。不足三百华里的路程，整整用了十个小时。

嫩江省军区设在甘南中央大街北段路东的一个大四合院里，省军区主要领导在这里办公。

到甘南的第二天，是1月23日，省军区司令部召开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和研究了甘南一带黑六、七旅的动态以及嫩江军区剿匪方案，会议由省军区司令员王明贵、副政委朱光主持。参加会议人员有：励男、鄂嫩日图、夏辅仁、鄂秀峰等。会议根据已获得的敌人情报，对敌我军事形势做了充分地分析和估计，并做了行动部署。会议一致同意，抢在敌人发动攻势之前，先发制人，乘敌人不备来个突然袭击。为了在兵戎相见的疆场上战胜敌人，对民主联军一、二旅，相应地增大骑兵比例，对于战场上的后勤供应，也做了相应的部署。

根据战时统一指挥的需要，临时组成汉蒙联军指挥部，王明贵任总指挥，朱光任前线政委，鄂嫩日图任副指挥，励男任参谋长。

汉蒙联军指挥部辖民主联军一、二旅及蒙军二、五旅的分工

如下：

民主联军警备第一旅，旅长王化一，负责歼灭和牵制锅底坑、碾子山、李三店一带“光复军”第七旅的兵力。

民主联军警备第二旅，旅长张汉丞，负责歼灭朱家坎之敌。

蒙古人民自治（卫）军第二旅，旅长鄂嫩日图，第五旅旅长鄂秀峰（当时齐齐哈尔蒙古自卫大队，刚改为蒙军第五旅），配合民主联军由北面进攻野猪窝和张家大沟之敌。

二、与黑龙江“光复军”第六旅第七旅的决战

蒙军二、五旅承担了直捣光复军第六旅老窝——野猪窝的重任。当时蒙军两个旅有九百人马，“光复军”第六旅有两千人马。是否能歼灭敌人还是一个谜。蒙军人数虽少，但有能骑善战的勇士，并有经军校学习的青年连排长指挥，面对无训练的乌合之众，只要指挥得当完全可能迅速制胜。

1946年1月25日，正是农历腊月26日，蒙二、五旅同时开出甘南，在集贤、中兴村一带待命。那里百姓在祖国光复的喜悦中，正在准备欢度春节，蒙汉联军的战士们却在临阵磨刀，准备一场大的战斗。

战士们在除夕夜出发，黎明前同睡梦中惊醒的敌人交火了。谁知，这帮色厉内荏的家伙在我骑兵突袭下，饱尝了枪弹、马刀以至马鞭的滋味，死、伤、投降者布满了附近原野，侥幸者逃奔了齐齐哈尔方向。虽然野猪窝三面环山，又设有坚固工事，可是敌人并没有凭借利用，说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不过份。

蒙军二、五旅完成了直捣光复军六旅老窝的任务。敌人企图占领甘南的美梦破灭了。

龙江县卧牛吐
达斡尔族自治区建立概况

乌力斯·卫戎

祖国北疆黑龙江省龙江县境内居住着一万五千余达斡尔族人。龙江县卧牛吐是齐齐哈尔达斡尔族的主要聚居地。1952年8月18日，当时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同志，亲自主持指导，在这里建立了龙江县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这是达斡尔族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1954年9月，自治区划归齐齐哈尔市管辖。1956年9月齐齐哈尔市决定，将原龙江县划过来的虎尔虎拉区、达呼店区、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加上原来齐市管辖的榆树屯区，四个农村区合并，成立了县一级的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人民政府。

一、卧牛吐区的自然概貌

卧牛吐，达斡尔语为尔斡诺尔吐。"斡诺"，达语是小沟壑的意思。开始建屯时，有两个小屯落，两屯之间有一条小沟壑，由此取名斡诺尔吐。它位于齐齐哈尔东北四十五里的嫩江右岸。大约在1649年至1651年（清顺治六年至九年）达斡尔族由黑龙江上游大批向南迁徙到嫩江流域，由库尔堪莫品和乌力斯哈拉二氏族建立起这个村落。

卧牛吐区在清朝时期，归清政府设在齐齐哈屯的齐齐哈尔达斡尔总管府衙门管辖。从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编入八旗后，

归所在佐领（官职相当于乡长）管理。旧中国时期，归龙江县卧龙乡管辖。伪满洲国时期，归龙江县达呼店村公所管辖。其户籍事宜，由卧牛吐警察分驻所管理。1945年8月15日祖国东北光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建立了龙江县卧牛吐区人民政府。

卧牛吐区，据1953年的调查统计，全区有2,436户，12,163人。其中达族1,202户，5,916人，占全区人口的48.6%；汉族912户，5,082人，占全区人口的41.7%；满族265户，986人占全区人口的8.1%；朝鲜族50户，154人，占全区人口的1.3%。此外，还有柯尔克孜族2户，9人；鄂温克族4户，15人；回族1户，1人。莽格吐村，额尔门沁村，奈门沁村为纯达斡尔族村，其余为达斡尔、汉族的杂居村。满族主要分布在西卧牛吐和岗子两个村，同达斡尔族杂居。朝鲜族都居住在扎布哈屯，他们是解放后迁来的，引阿荣河水种稻田。

卧牛吐区辖十二个行政村，十八个自然屯，都是紧靠嫩江右岸，区政府所在地为西卧牛吐村。由北向南，沿着嫩江从上到下，顺序为：（一）莽格吐村（利民村），辖敖乃屯一个自然屯。（二）大拉台村（建设村），辖小拉台一个自然屯。（三）东五家子村（建筑村），辖三间房、东岗子、西地方、六间房四个自然屯。（四）额尔门沁村（新华村），辖扎布哈、布拉金两个自然屯。（五）岗子村，辖李地房子、河西、三道罕、四间房四个自然屯。（六）东卧牛吐村（山林村）。（七）西卧牛吐村（建国村）。（八）音钦村。（九）雅尔塞村（新民村），辖哈拉、哈雅、王会屯三个自然屯。（十）齐齐哈村，辖西哈雅、东哈雅、小五家子三个自然屯。上述十二个村，五〇年按照县政府的指示改成了括号中的新名，但实行不到一年后，因新村名叫不起来，又不得不恢复老村名。

卧牛吐区，东西长约130华里，南北宽约40华里，象一长条

带子。全区总面积约为一千一百一十六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272,833亩，草原382,519亩。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气候适宜，水源充足，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莽格吐的东西两面有一片大草原，生长着牧畜爱吃的背草；三道罕的北面有齐腰深的“小叶樟”（苫房草）；大拉台的东面有大碱泡子生长着赤芍、大黄、龙胆草等名贵药材；嫩江岸上生长着茂密的柳条通；嫩江、音河、阿荣河盛产鲫鱼、鲤鱼、鳌花鱼、草根鱼，还有各种杂鱼。卧牛吐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可以全面发展的好地方。达斡尔族人民从黑龙江南徙嫩江以来，在这里繁衍生息，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卧牛吐北有一条漫岗，作自治区天然屏障，好似不让它受西北风的侵扰。东有阿荣河、西有音河，这两条河就象绿色的绸带，从左右两侧把自治区打扮得更加美丽可爱。

卧牛吐区东和东北面与甘南县的东阳镇、聚宝乡为邻；西和西北与龙江县的达呼店区（第八区）、保安屯区（第七区）毗连；南和西南面以嫩江为界，与富裕县、齐齐哈尔市隔江相望。

二、达斡尔族的族源及名称的确定

历史文献中，对于“达斡尔”这一名称，有各种各样的记载。诸如达斡尔、达呼尔、达右尔、达瑚尔、达库尔、达虎里、达乌里、达鬼力、打虎力、打狐狸等数十种。此外，还有“爱们人”，“老毂子”，“达库莫尼亚”等带有污辱性的称呼。

达斡尔族族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是契丹后裔论和蒙古同源论两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各朝代的统治者，都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特别是居住在深山河谷的祖国边疆的弱小民族，更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达斡尔族在历史上虽然被称为东方勇武民族，但它却受尽了民族压迫的苦楚。在清朝统治时期，把达斡尔族编入八旗，实行充军披甲制度，当国内异民族暴乱或外部帝国入侵

时，朝廷即派遣达斡尔人为其守边卡或保边疆。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达斡尔族人向统治的军阀政府纳军粮，献牛马。官员们不让达斡尔族人讲本民族语言。在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在“汉满蒙回藏五族协和”的骗人招牌下，达斡尔族更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伪满大同元年国事调查（户籍调查）填报民族成份时，当局公开剥夺了少数民族的权利。达斡尔人不得不申报“蒙系人”或“蒙旗人”，依附在蒙古民族名称之下，借异民族的名义才求得了生存。在此情况下，蒙古民族的个别人还凌辱达斡尔人是“九·一八蒙古”，意思是说：“九·一八满洲事变后降服的达呼尔蒙古”。但是，广大的达斡尔族人民，尤其是达斡尔族的知识分子，连作梦都在想，达斡尔族终有一天能以平等民族的身分出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行列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宣布取消民族压迫制度，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遣过的、当时起到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象金色的太阳照亮了达斡尔人的心。受尽民族压迫的达斡尔人最关心的是民族成份的确认。

1945年祖国光复当时，在民族成分问题上仍有很多混乱。有的说达斡尔是一个民族，也有的说，是蒙古民族的一支。如1945年末，在齐齐哈地区成立的以鄂秀峰为大队长的达斡尔自治军，其领导和士兵全是达斡尔人却被说成是“蒙古”自治军；又如1946年，达斡尔人民集资成立的齐齐哈尔市达斡尔族供销合作社，也被说成是蒙古合作社。为了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达斡尔人民一致呼吁，请求中央人民政府承认达斡尔是一个独立的民族。1952年元月结束的中央民族事务委

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达斡尔族代表吴维荣同志，在大会发言中，郑重地提出了确认达斡尔民族成分，实行区域自治，培养民族干部等三个问题。

关于达斡尔族的民族成分问题，中共黑龙江省委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尊重本民族人民意愿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历史形成的事实，按照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斯大林说的构成一个民族，必须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理环境、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四个特征，经过充分研究，深入讨论，于1952年8月，确认了达斡尔族是单一民族。从此达斡尔族人民站起来了，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长期依附于别的民族的达斡尔人，正式成了独立民族。他们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成了祖国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民族名称统一定为“达斡尔”。

三、筹建达斡尔族自治区

为了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按照中央政府政务院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有关规定，1952年7月，中共黑龙江省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在龙江县达斡尔族聚居的卧牛吐建立达斡尔族自治区。为此，组建了以省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为团长，省政协秘书长赵明为副团长的，包括省、县、区三级政府四十余名干部的民族工作团。达斡尔族著名的知识分子、当时的齐市民族中学教导主任卜林同志趁暑假机会带领十余名学生也参加了工作团的活动。省民族工作团下设民族政策宣传组、社会历史调查组、经济文化指导组，都于1952年7月20日到卧牛吐区开展工作。工作团召开干部会、座谈会，同时深入到各村屯居民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成立自治区的重大意义，使各族人民受到了很大鼓舞。工作团在广泛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向省行政干部学校选送民族干部、农业生产要改变旧的耕作方法、在哈拉

屯成立达斡尔族完小、在区所在地兴建一处卫生所等建议。这些建议逐条得到了落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自治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省民族工作团的帮助指导下，原卧牛吐区委、区政府于1952年8月2日，召开了全区达斡尔、汉、满、朝鲜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建立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的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于毅夫主席作了有关民族政策的重要报告。代表们详尽地讨论了这个报告。通过讨论代表们更加明确了建立民族自治区的重大意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省委建立自治区的决定。会议还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对自治区政府的人选，自治区的名称，自治区建立的日期等，广泛征求了意见。与此同时，中共龙江县委，从县直机关和各区政府抽调了得力的民族干部，充实了自治区的干部力量，使建立自治区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因为事先听到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即将来访，所以，会议通过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以早日建成自治区的实际行动，热烈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决定。在自治区即将成立，中央民族访问团来临的前夕，1952年8月14日于毅夫主席亲自撰文，在《黑龙江日报》上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达呼尔民族》的文章，报道达族人民迎接中央民族访问团向毛主席献礼的活动。

1952年8月18日，是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人民终生难忘和值得永远纪念的光辉日子。就是这天，以彭泽民为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卧牛吐达斡尔族地区慰问来了，达斡尔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也就在这一天光荣诞生了。

8月18日上午，在新建的区政府会议室里，召开了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上，于毅夫主席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他说：“筹备自治区的工作胜利结束，现在我宣布：龙江县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了”。达斡尔族自治区的成立是全区各族人民，首先是达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

件大事。代表们热泪盈眶，他们祖祖辈辈作梦也没想到少数民族还能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干部代表，感到身上的担子重了，他们默默在想，如何开创自治区工作的新局面。在这次会议上，52名参加会议的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选举达斡尔族的优秀青年、共产党员茫哈同志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区长。又选出十一名同志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由他们组成自治区人民政府。在这次民主选举中，从小当过童养媳的莽格吐村的妇女主任多芝同志得了满票。会议最后通过了搞好挂锄工作、搞好秋收准备、搞好防洪排涝、搞好民兵训练、搞好爱国卫生等五项工作决议。

8月18日下午，在卧牛吐完小的操场上临时搭起了舞台，当空悬挂"热烈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巨幅标语。会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飞舞，歌声嘹亮，沉睡的卧牛吐大地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全区各族人民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大会。这在卧牛吐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嫩江涨水出槽，莽格吐村的五十多名群众硬是趟着六十多里齐腰深的水赶来参加大会。欢迎大会上，首先由自治区新任区长茫哈同志讲了话。他说："今天我们成立了达斡尔族自治区，毛主席又派来了访问团看望我们，我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党中央、向毛主席表示最衷心地感谢。"他表示今后要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团结全区各族人民，一定把自治区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接着省人民政府于毅夫主席讲了话，他说："今天我们要把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宝贵礼物——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成立的辉煌果实献给毛主席。"这时，会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最后中央访问团的彭泽民团长讲了话。他感谢各族人民对访问团的热烈欢迎，同时又转达了毛主席对各族人民的问候，并表示热烈祝贺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的成立。彭泽民团长着重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来，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伟大民族政策，所以民族工作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当彭泽

民团长代表毛主席赠送给自治区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锦旗和其它礼物时，自治区各族人民深受感动，他们又把“感谢毛主席对各族人民的深切关怀”的一面锦旗献给毛主席。

在这大喜大庆的日子里，人们送走了中央访问团后，举行了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哈拉屯、奈门沁、齐齐哈、莽格吐村的达斡尔族人聚集一起，唱“扎恩达勒”歌，跳“罕肯伯”舞，充分表达了达族儿女对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的感情。

四、加强自治区的政权建设

自治区建立后，区委、区政府在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上，都十分注意培养提拔达斡尔族干部，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适当地增加了达斡尔族的人数。他们处处遵照党的政策，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当时区委机关和基层政权中各民族的比例关系如下：

区　委　机　关

书记：杨永春，男，26岁，汉族，中共党员，雇农成份，初小文化，1946年参加工作。现任梅里斯区人大副主任。

副书记：高瓦，女，21岁，达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高中文化、1948年参加工作。现任齐市妇联副主任。

组织委员：石凤海，男，32岁，汉族，中共党员，雇农成份，初小文化，1947年参加工作。已故。

宣传委员：寇贵，男，24岁，汉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现任嫩水农场书记。

文书：孟德海，男，25岁，达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初中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现任梅里斯区街道办副主任。

团委书记：何玉，男，24岁，达族，中共党员、雇农成份，

六年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现在鄂温克旗工作。

干事：多瑞宝，男，20岁，达族，共青团员，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51年参加工作。现任卧牛吐乡党委书记。

妇联主任：多芝，女，23岁，达族，贫农成份，1952年参加工作。现在沈阳某工厂工作。

干事：王希珍，女，22岁，汉族，共青团员，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52年参加工作。

从以上情况看，在自治区区委机关的9名组成人员中，达族5名，占区委机关总数的56%

区　政　府　机　关

区长：茫哈，男，22岁，达族，中共党员，中农成份，高中文化，1948年参加工作。后任齐市民委副主任。81年病故。

副区长：吴维荣，男，20岁，达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高中文化，1949年参加工作。现任富区人大副主任。

秘书：吴文盛，男，28岁，达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46年参加工作。现已离休。

民政助理：沃振亚，男，28岁，达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48年参加工作，现在省农机公司任科长。

农林助理：马金龙，男，31岁，蒙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初中文化，1951年参加工作。现已离休。

文教助理：德玉海，男，23岁，达族，富农，高中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现任齐市民族中学副校长。

卫生助理：陶茵，女，24岁，达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初中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现已离休。

公安助理：吴占林，男，28岁，汉族，中共党员，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49年参加工作。现已离休。

财粮助理：梁寿绵，男，28岁，汉族，中农成份，初中文化，

1948年参加工作。现已离休。

畜牧助理：李修志，男，25岁，汉族，贫农成份，六年文化，1950年参加工作。

从以上情况看，自治区政府的10名组成人员达族有7名，占区政府机关总数的70%。

此外，在区政府的领导下，还设有很多事业单位，这些单位也注意配备了少数民族干部。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四名干部中有两名汉族、两名达族。站长崔立山是汉族、副站长郭长清是达族，技术推广员郭占海是汉族，王祥是达族。区畜牧技术指导站四名干部中汉族3名，达族1名。站长李修志和站员孙焕君、杨明九是汉族，吴金德是达族。区文化站两名干部全是达族，站长胡和、干事色热。区银行营业所两名干部也都是达族，主任金盛林、营业员卜金海。区供销社两名干部全都是达族，主任杨福全，业务员何奎元。区的五个事业单位共有14人，其中达族有9人，占事业干部总数的64%。

如果把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加在一起，全区干部总数为33名，其中达族为21名，占干部总数的64%。这足以说明，在卧牛吐自治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达斡尔族干部已占大多数。

自治区十二个村的党支书、村长的配备情况是：

莽格吐村支部书记，安瑞森（达族）；村长，何文庆（达族）。

大拉台村支部书记，王春祥（汉族）；村长张国志（汉族）。

东五家子村支部书记，多茳海（达族）；村长赵文昌（汉族）。

额尔门沁村支部书记，敖莫和（达族）；村长多文海（达族）。

岗子村支部书记，赵海廷（汉族）；村长，关振祥（满族）。

东卧牛吐村支部书记，吴占一（达族）；村长王年一（汉族）。

西卧牛吐村支部书记，陶春林（满族）；村长徐九喜（达族）。

音钦村支部书记，乔玉坤（达族）；村长苏义（汉族）。

雅尔塞村支部书记，吴世成（汉族）；村长德成财（达族）。

奈门沁村支部书记，德志山（达族）；村长吴德海（达族）。

大五家子村支部书记，管帅（汉族）；村长葛永福（满族）。

齐齐哈尔村支部书记，杨录（汉族）；村长，吴文瑞（达族）。

全村十二个村的24名支部书记、村长中达族12名，汉族9名，满族3名。其中达族占50%，这就更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权建设。

自治区在组建人民政府和安排代表比例上，也充分考虑到达斡尔族，请看下面的情况：

卧牛吐达斡尔自治区区长，莊哈（达族）；副区长，吴维荣（达族）；委员，王银海（汉族）、杨永春（汉族）、王忠（汉族）、苏义（汉族）、何玉（达族）、高瓦（女、达族）、多芝（女、达族）、陶春林(满族)、元太希（朝鲜族）等。委员中达族5人，汉族4人，满族1人，朝鲜族1人。这充分说明自治区政府人员的组成，尤其是领导成员达斡尔族占多数。

自治区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有55人组成，他们都是各族各界人民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先进人物，他们的名单如下：

元太希（朝鲜族）、乔玉坤（达族）、乔玉叶（女、达

族）、王银海（汉族）、王华一（汉族）、王志（汉族）、王洪斌（汉族）、王月孔（汉族）、多文海（达族）、多瑞祥（达族）、多瑞保（达族）、多芝（女、达族）、吴维荣（达族）、吴占一（达族）、吴景瑞（达族）、吴文盛（达族）、吴世成（汉族）、吴文端（达族）、鄂文宽（达族）、鄂桂珍（女、达族）、鄂和宝（达族）、鄂福山（达族）、敖英和（达族）、敖金才（达族）、德玉海（达族）、德成财（达族）、杨永春（汉族）、杨录(汉族)、沃振亚（达族）、沃国章（达族）、陶满贵（满族）、陶凤英（女、达族）、赵海廷（汉族）、赵文昌（汉族）、徐久喜（达族）、徐宝华（汉族）、何文庆（达族）、何玉（达族）、张泽祥（汉族）、张福林（汉族）、张国志（汉族）、张玉（汉族）、关茫福（满族）、李昌吉（朝鲜族），黄淑燕（女、汉族）、高瓦（女、达族）、卢秀荣（女、汉族）、茫哈（达族）、郭亚君（女、达族）、刘金荣（女、达族）、蔡浩清（柯尔克孜族）、庞桂琴（女、汉族）、苏义（汉族）、管仲（汉族）、崔国栋（汉族）。

以上55名代表中，达族29名，汉族21名、满族２名，朝鲜族２名，柯尔克孜族１名，其中达族代表占52.7%。

自治区党委很重视党的建设，不断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尤其注意培养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党。1952年末全区有15个党支部。每个行政村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有105名党员，其中达族党员45名，占全区党员的42.8%。全区有共青团员403名，其中达族团员215名，占全区团员的53%。这些党员和团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团结进步，争作贡献

自治区建立后，区委、区政府首先组织干部深入学习并向各

族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要求干部群众自觉地执行民族政策，主动地搞好各民族间的团结。区委书记杨永春带头搞好民族团结，他经常向汉族干部讲，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汉族帮助少数民族进步，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他还积极主动学习达斡尔族语言，并要求在自治区工作的汉族干部都要学会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区长茫哈同志，更是处处注意民族团结，他要求达族干部不要以自治的主体民族自居，不要搞特殊化，一定要尊重汉族干部，并虚心向人家学习。茫哈同志认为自治区搞不好团结，责任首先在达斡尔族干部身上。由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之间搞好了团结，所以各族人民间的团结就更加强了。雅尔塞村的段志民（汉族）和哈拉村的德成财（达族）两个人都是一个行政村的干部，过去经常因为自然屯的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经过民族政策的学习和区委领导的帮助，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评，后来两人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又如齐齐哈村的庞殿生（汉族）在江南种的45亩谷子，收割后放在那里。由于涨大水，有被冲走的危险，村长吴文瑞（达族）发现后，亲自划船去，一次又一次地把谷子全部抢运到江这边来了。1953年春天四间房屯的吴那木色（达族）从山里搬回来，生产生活都有很多困难，眼看有种不上地的危险。岗子村的支部书记赵海廷（汉族）亲自到家里帮助安排，并派人送来口粮、衣服和种子等，又动员几名青年给打柴草，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汉族还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帮助达斡尔族改革旧的落后的耕作方法，对这一点达斡尔族是永远不能忘掉的。当时的自治区在各族人民间出现了平等相处、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密切配合、亲如兄弟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952年10月1日，区长茫哈同志代表达斡尔人民到北京参加了国庆三周年的观礼，并光荣地见到了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茫哈同志回来向全区人民传达这一喜讯时，他们一致表示

的加强民族团结、积极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无比关怀。

当了国家主人的达斡尔族人民，从内心里热爱我们这个国家。达斡尔族在历史上为反抗外国侵略、保卫祖国边疆是立过功的，曾被誉为东方勇武民族。在今天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十分英勇的。有人在战场上洒过热血，有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全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志愿军的161人，其中达斡尔族95人。这些人中立战功的28人，革命残废军人10人，革命烈士5人。奈门沁村的吴维臣在解放彰武的战斗中，孤身一人，手拿炸药包，炸掉了敌人的碉堡，为后续部队的进攻打开了通道，立了特等功。岗子村的白玉海在战争中一只眼睛被炸失明，变成了终身残废。安滔音、安扬颂叔侄二人把热血洒在战场上，光荣牺牲。达斡尔族人民保卫家乡，解放祖国的英雄事迹已载入中国人民的光荣史册。

在建设祖国、争作贡献上，达斡尔族人也从不落后。1951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全区捐献六千万元东北流通券购买飞机大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挑选上等好粮交纳爱国公粮，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1952年末达斡尔族聚居的奈门沁村、莽格吐村、东五家子村、额尔门沁村被评选为全县的送公粮模范村。在向国家卖余粮上也是非常积极的。1953年县里给区的购粮任务是2,500吨，而实际卖粮3,500吨，超额完成1,000吨任务。其中，奈门沁村在交纳征购粮上更为突出。全村64户，328人，1953年缴纳公粮12万斤，卖余粮75万斤，征购粮合计为87万斤，每人平均向国家交售2,650斤粮食，在全区是一个贡献最大的村。自治区各项任务完成得好，为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经常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扬。

六、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

齐齐哈尔地区的达斡尔人早年以农业、牧业（种地、放牧）为主，兼搞狩猎、捕鱼的副业。布特哈的达斡尔人以狩猎、畜牧（打牲、养畜）为主，兼搞放排、捕鱼的副业生产。达斡尔人是定点放牧，这和蒙族的游牧是有着严格区别的。达斡尔族从事农业生产，已有悠久的历史了。在十六世纪末定居在黑龙江上游的东西伯利亚的时候，就有了相当可观的农业经济。据苏联《东侵史》1643年透露，居住在雅克萨、阿萨津、多金、铎辰、鱼鲁苏、乌库尔、戈搏尔、德都尔的达呼尔土人种过燕麦、荞麦、稷子、黑豆、苏子，还种过白菜、瓜果。

几百年来，农业始终是达斡尔人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那时，经营农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卖谷物或搞物资交换，而主要是为了解决口粮、种子和饲料。达斡尔人盛行远耕近牧的方法，同时实行土地间休轮耕方法。在漫长的年代里达斡尔人经营的是落后的粗放农业。过去开荒种地时，用四条犍牛的大抬犁，先用犁杖把地翻好后，将种子撒在翻地上，再用木架柳编耙或扫帚形树枝复土盖子，以后就不管了，收多收少全交给"老天爷"。种地时不施肥料，禾苗出土后也不锄草不蹚地。干等着秋天穗子成熟就收割，这就是俗称"漫撒子"的耕作方法。

现在达斡尔族经营的农业和过去相比，有天渊之别了。旧的生产方式一去不复返了。达斡尔族在汉族的影响帮助下，逐渐学会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把过去压老沟（一犁挤）的耕作方法改为浅破茬、深掏墒的两犁扣种法，过去种地没有施肥习惯，现在很重视施肥。有的作物不仅施底肥，还要施把粪（埯粪），过去普遍采用的轮歇游耕法，现已被以大豆为中心的扣穰茬作物轮作制代替了。当然在达斡尔族中历史遗留的旧的耕作方法，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

达斡尔族贫富悬殊，阶级分化明显地表现在清朝末年。从前土地是公有的，谁种都可以，那时担心耕种的人少。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达斡尔族编入八旗，男人服兵役领俸饷，没有为生活担忧发愁的。几家人合伙种少部分地，够自己食用消费即可，所以用土地进行剥削的情况很少。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黑龙江封禁的土地实行了开放，并从关内迁来大批移民，特别是1914年（民国三年）实行土地发照，确定地权后，少数人抢占了大片土地成了地主、富农。而无地少地的贫农、雇农就出卖劳动力当长工了。1952年据卧牛吐区634户达斡尔族的调查，其阶级变化情况是：在伪满，贫农283户，占44.6%，雇农207户，占32.6%，中农106户，占16.7%，富农21户，占3.3%，地主17户，占2.6%。而调查时在634户中，已有464户过着中等生活，占79.2%，贫农156户，占24.6%，雇农14户，占2.2%。从牲畜占有的情况看，在上述634户中，伪满没有牲畜的有367户，占38.2%，到调查时没有牲畜的只有50户，占7.8%；在有牲畜的户中，有1—4头（匹）的395户，5—10头的176户，15头以上的13户。在党的领导下，卧牛吐的达斡尔族人民，经过土地改革和五年多互助合作的大生产运动，都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家家都有新花被，人人都有新衣服。那种夏天吃柳蒿菜，冬天围火盆转的日子，无踪无影了。达斡尔族人都喜欢饲养牲畜，卧牛吐村前面临江，江这边有一人多高的大片柳条通，江那边是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当旭日东升时可以望见七八百头牛马泅水过江去吃草，甚至刚下生十余天的牛犊也随母牛身后，那种六畜兴旺的景色真是美好极了。

新中国成立后，达斡尔族人民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号召，1952年全区组织各类互助组469个，其中有常年组68个，季节组213个，临时组188个。1953年末酝酿以省劳模吴春山组为基础，试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

年全区耕种142,500亩地，当时的粮食单产只有120斤左右，总产1,707万余斤。但自治区建立后，他们办了一冬的互助组长技术训练班，又先后组织二百多人到肇源县学习“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施肥”的先进经验。通过选派有经验的汉族技术员到达斡尔族聚居村讲课和省劳模的示范带头作用，1953年农业生产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这一年全区耕种177,495亩，粮食单产为150斤，总产2,664万余斤，比前一年增加近一千万斤。这一年全区出现了齐齐哈、奈门沁、西卧牛吐、东五家子四个县的“丰产村”和一个省的“丰产村”岗子屯。被选为省劳动模范的有六名，其中达斡尔族三名。他们是雅尔塞村的吴世成（汉族）、岗子村的吴春山（满族），东卧牛吐村的郭长青（达族），西卧牛吐村的李泰（达族），东五家子村安龙海（达族），大拉台村的王春祥（汉族）。被选为县劳模的41个，其中达族22个。这在达斡尔族人的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

在生产运动中，靠着嫩江岸边的大片天然牧场，畜牧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53年全区大牲畜为10,246头，比1952年的5,080头增加了一倍，其中牛7,090头，马2,650匹，驴445匹，骡61匹。全区建立了三处配种站，新调进三匹苏联优良种马，三头荷兰种牛，不少人学习了人工配种，当时的准驹率为89.5%。区畜牧技术指导站，在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加强了牲畜疾病的防治工作。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区六个供销社有5,300万元资金。据1953年末统计，购销额达27,100多万元，比1952年增长一倍。这一年全区人民购买大车830台（其中气包车39台），使役马190匹，新式马拉农具20套，铲蹚机43台，新耢耙15个，大犁60张。同时还添置了不少新衣服和新家具。据统计，1953年人均约一床被褥和两套新衣服。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代替了吃糠咽菜的贫困日子。

七、文化教育大飞跃

达斡尔族有完整的独立语言，而没有文字。达斡尔族素有能歌善舞的美称，他们从生产生活的实践出发，有反映种地、打猎、放牧、驯鹰、捕鱼、采野菜、放排木等劳动生活的歌舞，还有的歌曲规劝人们戒烟、禁赌、少饮酒、邻里和睦、朋友团结、出外注意安全的唱词。尤其是同大自然和反动派勇敢斗争的英雄人物，到处被人们歌颂。如旧民国年间少郎·代夫反抗官军、杀富济贫的英雄事迹，人们编成乌春（长诗）到处演唱。但是，长期受反动派统治和民族压迫达斡尔族，文化教育相当落后。新中国成立当时，达斡尔聚居的莽格吐、额尔门沁、东五家子村会算公粮帐和能写简单书信的，千百人中找不到一个。从汉族村中选派到区政府当文书兼会计的人，就算是“圣人”了。1952年自治区成立后，这种情形很快得到了改变，达斡尔族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

教育情况。旧社会对教育不重视，卧牛吐区清朝时期是没有官学的。1923年（民国十一年）经吴维邦、杨献文等人的活动，把齐齐哈尔市省立第三部完全小学搬到卧牛吐区的齐 齐 哈 屯开办，这是有史以来齐齐哈尔达斡尔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官学。到伪满时期，全区十二个村开办了五处小学。据调查那时只有88名达斡尔族小学生。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1952年全区十二个村建立了十五处小学，其中达斡尔族学校有五处。全区小学生为1724名，其中这族学生为650名，占37.7%，儿童入学率为72%。全区有教员56名，其中达族教员30名，占53.3%。全区对社会教育、扫盲工作抓得也很紧。当时农民参加识字班后能识600字以上的有85人，能识1000字以上的有58人，经过考试有130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得到了识字班毕业证书。他们都能读报、会写简单书信。为了加强民族教育，在哈拉屯单独设一处达斡尔完

全小学校，由县委派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贺奇（蒙古族）同志任校长，其余的几位达斡尔族老师如木仁、依特、色热、色音图、乔巨友等也都是民族师范学校毕业的出类拔萃的优秀生，他们为达斡尔族人民培养了很多人才。请看奈门沁村民族教育情况的典型调查：

奈门沁是由64户、328人组成的达斡尔族村落。这里从前没有学校，土地改革后，1948年春，政府派民族师范毕业的贺奇同志到这里，办了初级小学，95％以上的学龄儿童入了学。贺奇是这里的启蒙老师，开垦了多年沉睡的文化处女地。1951年贺奇同志被派到离奈门沁八里远的哈拉达斡尔完小任校长，奈门沁小学毕业的孩子又都到哈拉民族完小读书。1953年奈门沁有14名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后来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考上了大学，在各自的不同岗位上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现把他们的名单记述如下：

吴维富，男，1963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现在某医院任主治医。

吴绿叶，女，1962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现任北京医学院校医。

鄂桂舍，女，1965年毕业于兰州工学院，现任哈尔滨锅炉厂工程师。

吴德茂，男，1964年毕业于哈尔滨体育学院，现任大兴安岭地区大杨树林业局工会副主席。

鄂贵林，男，1963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学任教员。

鄂彩英，女，1962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医学院，现在吉林市第三医院任主治医。

鄂文生，男，1964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现任石家庄某航校教员。

德志祥，男，1963年毕业于东北农学院，现任泰来县县直机

关党委书记。

巴　根，男，1963年中师毕业后又到教育学院进修，现在梅里斯区人民检察院任检察员（科长）。

此外还有乌力吉、鄂福明、吴文秀、鄂明德、乔志成等五名中专生（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大中专生没计算在内）。

上述九名大学生、五名中专生都是贺奇老师的好学生。一个六十多户的达斡尔族小村落，五十年代培养，六十年代成材，竟出现这么多优秀人才，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呀！它为达斡尔族教育史谱写了新篇章。

卫生事业。旧社会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住在偏僻农村的达斡尔族人民，经济萧条，文化落后，有病只能求“萨满”跳神，结果不少人无故丧生。那时常见的疾病有梅毒、克山病、甲状腺肿、肺结核、伤寒、季节性流行痢疾、天花、麻疹、妇女产褥热等。尤其是克山病这一病魔，不知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天花、麻疹也很猖獗，这一对恶魔不知吞噬了多少幼儿。伪满时期，儿童得这两种病，死亡率高达40%以上。由于封建迷信盛行，巫医神汉害人，达斡尔人口发展很慢。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自治区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卧牛吐设了区中心卫生所。雅尔塞、齐齐哈、三间房又新设了三处卫生所。区里还设了一处保健站，下面有八个保健室。配备了十名中西医、三名助产士，其中有一名医专毕业的达族医生德文志。有两名卫校培养的达族助产士单淑芳、沃秀峰。现在单淑芳已成了远近闻名的妇科主治医生。由于医务人员的积极努力工作，少数民族人民的疾病得到了及时治疗，这样，过去跳神弄鬼的亦都罕（萨满）就没有事干了。为了搞好妇幼保健工作，普遍推行了新法接生，对巴热钦（旧产婆）进行了训练改造，其中有17名经过训练得到了接生员许可证，从而保证了母子双健康。

1953年春，全区普遍流行麻疹，因为抢救治疗及时，大部分患儿转危为安。在防麻疹的日日夜夜，医务人员们作出了很大贡献。达斡尔族在旧社会患性病（梅毒）的人很多，据1953年调查，患性病人占33%，以后党和国家拨出专款和派医疗队进行了防治，到1958年这种疾病基本上不见了。

文艺活动。自治区的各族人民经常举行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新生活的文艺活动，尤其是年节，这种活动更为活跃。区里每年冬季还举办文艺汇演，评选出各种优秀节目，向县和省里推荐。在每年的“敖宝会”上除举行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外，还要进行歌舞表演。哈拉屯的达斡尔族业余剧团最为活跃，它实际上是自治区的文艺轻骑队，经常到省里参加调演和深入到各村巡回演出。这个剧团是以达斡尔族著名歌手何德志为团长、那音太为副团长，以喜荣、阿荣、那荣、何荣、彩凤等女演员为骨干，以老艺人胡瑞宝为顾问，文艺活动开展得很好。何德志同志经常到省和全国参加文艺汇演。他演唱的《毛主席啊！达族人民天天把您歌唱》得到优秀节目奖和表演奖。达斡尔族人民最为喜欢的罕伯舞（路日格勒）在保持本民族原有的刚健奔放、热情粗犷特征的基础上，从手臂轻柔、脚步踏动的舞姿上作了很大改进和提高，这丰富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宝库。

时代的车轮把人们从五十年代推向了八十年代。在这漫长的三十年中，原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迅猛发展，出现了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大好景象。

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深得人心，达斡尔人民永远感谢共产党，也将永远怀念忠实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原黑龙江人民政府主席于毅夫同志以及各级领导干部。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市人民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认真纠正了民族工作上“左”的错误，彻底纠正了民族干部中的冤、假、错案，

积极进行了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工作。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我们的伟大祖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愿把共产党天天歌唱

——记达族歌手何德志

何 晓 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但童年的经历又不尽相同。达族歌手何德志的童年充满了辛酸和苦难。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他出生在齐齐哈尔市郊区哈拉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生活的贫困使他不满十岁就不得不去给有钱人家放牛。酷夏，蚊虻叮咬，痛痒难忍，暴雨倾泻，猝不及防打得他喘不过气来。最难熬的是可怕的冬天，千疮百孔的棉衣难以御寒，加之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真是饥寒交迫。寒风刺骨无法忍耐，只有靠在牛身上取暖。就这样夏去冬来，风里雨里，在嫩江北岸的草原上，不知留下了多少他的脚印。

苦难的童年并没有泯灭他唱歌的天赋。他从小就喜欢唱歌。他有一副好嗓子，听到别人唱歌，只要他喜欢，听上两遍就能唱下来。村里的男女老少，大人小孩都喜欢听他的歌。谁要让他唱，他就唱，唱得那样优美、那样豪放，充满了草原的气息。

告别了辛酸而又充满稚趣的童年，他又拿起鞭子，赶起牛车，干起了拉粮运草的活。车到哪里，歌就唱到哪里，歌声总是陪伴着他，他用歌声驱散饥饿和忧愁。夏季，江边草原上开满了达紫香，鸟儿在草丛中鸣叫，在蓝天上飞翔，江面上碧波荡漾，江帆点点。置身于画一般的景色之中，他情不自禁地站到了车上，晃着鞭子唱起歌来。摇船的人向他挥着手，同行的车老板和

着他的歌。他完全沉浸在自己歌声的动人旋律之中了。

有一次，他赶着牛车进卜奎城卖草，车行一路，歌撒一路。车到北门口时，一个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拉下车来打了几棍子，口里不住地骂着："瞎嚎什么！"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棍子打得蒙头转向。他握着拳头真想揍过去，但是最后还是忍住了。回去的路上，他百思不得其解："唱歌有什么不对？唱歌犯了什么王法？这是什么世道！"他想着想着，又哼起歌来，歌声越来越大。歌声里带着忧愁、带着泪水、带着愤恨在江面上回荡着。

解放了，翻身了，太阳出来了！何德志的家乡哈拉屯沸腾了。达斡尔人欢天喜地，唱"挑恩达勒"、跳"罕伯"，他象孩子似地尽情地唱，唱不完的欢乐、唱不完的喜悦。为了活跃全屯达斡尔人的文化生活，他积极串联，建立文化室，自己当主任，建立村剧团，自己当团长。没有乐器凑钱买；没有服装，大家动手裁制；没有剧本、曲子，自编自导自演。父亲不理解，说他这是不务正业。但他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是共产党给了我们达斡尔人民的今天，是共产党给了我当家做主人的权力，我们就是要把共产党天天来歌唱"。这个信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这个信念化做一团熊熊烈火，使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投身于群众文艺工作之中，投身于繁荣本民族文化的平凡而伟大的事业当中。他的辛勤劳动感动着乡亲们，他的歌唱天赋被人们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了。一九五五年他做为齐齐哈尔市文艺代表队的一员第一次登上了省城哈尔滨的舞台，荣幸地参加了黑龙江省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演唱了达族民歌《心上人》，获得"优秀创作表演奖"，歌曲被灌制成唱片发行。使他终生难忘的是：一九五六年，他带着全省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到首都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绛红色的帷幕徐徐拉开，他稳步登上首都舞台，面对几千名首都观众，怀着对共产党的质朴的热爱感激之情，纵情高歌。一曲《心上人》

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他的演唱获得了优秀节目奖。音乐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晚上，他辗转反侧，思绪万千，旧社会受压迫之苦，新社会做主人之甜，一幕幕，一件件在他脑海里转过，他失眠了。

从此，他的歌唱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没有念过书，更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不懂简谱、不懂乐理，要提高演唱水平，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凭着天资、凭着韧劲、凭着对艺术的酷爱和执著的追求，反复听、反复练、反复琢磨。坚韧不拔的毅力，好学上进的风尚，使他的演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演出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达族群众喜欢他的歌，不同阶层的观众格外青睐他的歌，文艺界的人士也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是的，他的歌音质纯美、曲调委婉，尤其富于民族特色：既高亢豪放，宽阔粗犷，又细腻柔润，宛转动人。高音区尤为明亮动听。他的台风自然洒脱，毫不做作，绝无雕琢之嫌。党和人民为使这颗璞玉更加熠熠闪光，为他创造和提供了涉足艺术殿堂的众多机遇，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他多次参加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的演出活动。市群众艺术馆的老师、市文化局的领导和省文化局、省音乐家协会、省民委的领导同志，或登门探望，问长问短，或谆谆教导、传授技艺。他们把党对达斡尔人民的无限关怀送到了每个达斡尔人的心田。党的关怀和哺育犹如温馨的春风，甘甜的雨露一样温暖和滋润着他的心，激励着他为党为人民歌唱。

一九五七年，他第二次参加黑龙江省群众业余艺术演出会，演唱达族民歌《嫩江畔上的花》，荣获优秀表演奖。一九五八年雅尔赛农场成立了剧团，他成为该团的第一批团员，边劳动、边排练、边演出，田间地头、茅屋草舍都留下了他为群众演唱的足迹，他的演唱更深地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因而也更加受到广大农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

一九六四年，他接到了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同其他五十几个少数民族歌手一起在北京献艺。他演唱的《永远在毛主席身边》、《放排人》赢得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掌声。《光明日报》撰文对他演唱中浓厚的草原气息、纯正的民歌味进行了评议赞扬。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刘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民族文艺工作者合影留念。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亲切地和他握了手。当他握住总理的手、凝视着总理期待和鼓励的目光时，不禁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从北京回来的第二年，他参加了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一曲悠扬高亢的《愿把毛主席天天歌唱》在音乐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曲唱完又一曲，一连几次谢幕，观众仍掌声不息。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拨动一个歌手为党歌唱为艺术献身的心弦呢？不久，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唱的部分歌曲被灌制了唱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首歌，这首歌还做为北京对外英语广播的入选节目传给了国外的听众。

一九六六年，何德志第二次光临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会后，又随同黑龙江省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国庆演出，为七十多个国家的来宾和友人演唱。这次赴京演出正值国庆节，他荣幸地做为观礼代表，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当他在观礼台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人潮流动、红旗招展、一派壮观景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的农民、普通的民歌手能享此殊荣，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泪水又模糊了双眼。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人的恶梦过去了。何德志又迎来了文艺百花园中的明媚春天，压抑十年的歌喉又开始引吭高歌了。十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间，然而，对一个民族，对一个人却是多么宝贵。在这十年中他失去了很多，对他来说，艺术上的损失尤其令人痛惜。从他爬满

眼角的皱纹中，从他那满头银发中，可以看出，他的确老了。告别了浑沌的十年，他也曾为民族、为国家、也为自己失去的一切深深地叹息过，但是，他很快又和祖国一道投身到新的生活中去了。他的歌声还是那样清澈明亮，还是那样粗犷豪放，当人们从广播里、舞台上又听到他那亲切优美的歌声时都欣慰地笑了。

何德志的优良品德，在艺术上的颇深造诣，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一九七九年，他光荣地被推举为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代表和来自全国各地文艺界精英们共议文学艺术发展之大计，做中国文艺改革，推动艺术进步的生力军。这次会议，他好象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思想认识和艺术修养都有了新的提高和从未有过的体验。

一九八〇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大会上，年近六旬的何德志以淳朴的风格、欢畅的曲调演唱了《幸福美景亲手造》等歌曲。台下观众为这位老艺人的成功表演称赞不已，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紧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老何，宝刀不老啊！”并兴致极高地和他合影留念。这次大会中他又一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改革形势越来越好。他看到家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心潮起伏，演唱激情油然而生。他用饱满的感情，真实的语言，在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连续两年的《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会上，演唱了《承包户我喜洋洋》、《嫩江我心爱的家乡》等歌曲，热情歌颂了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抒发了达族人民对共产党的无限热爱之情。

一九八五年，他做为达族亲人访问团的一员赴新疆参观访问，用歌声向远在新疆的达族同胞和各族人民表达了亲切的问候。

一九八六年，年过六旬的何德志抖擞精神，应邀参加了齐齐哈尔市龙沙音乐会，一曲《春到达乡来》荣获大会特别奖。

几十年来，他不倦地在歌唱的园地里耕耘，从家乡唱到省城，从省城唱到首都北京，他的歌声象甘泉一样流入了达斡尔族父老乡亲的心田，他的歌唱也给他带来了荣耀和愉悦。一九七九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党和人民时时都在牵挂着他，他曾做为市人民代表参与国家大事。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到文革前他都历任市政协委员，一九七七年又开始做省政协委员工作。他还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理事。他唱的不少民歌被收入杨士清编的《达斡尔族民歌选》和何今声编的《达斡尔族传统民歌选》，并灌制了唱片和录音磁带，特别使他感动不已的是，为了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一九八八年，黑龙江省文化厅、省音协和省、市政协、民委等多方努力，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给这位老艺人以退休待遇，按月发给工资。党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更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老牛自知近黄昏，不用加鞭自奋蹄。他虽然老了，但他不服老，他还要唱，要一辈子歌唱共产党，歌唱新生活。

达斡尔族的“哈勒”和“莫昆”

卜　林

汉族讲姓氏，蒙古族讲“恩布格”和“爱满格”，达斡尔族讲“哈勒”和“莫昆”，各个民族对于祖姓和祖氏的称呼上虽有不同，无论哪一个民族的祖姓祖氏，都是表示远古祖先的共同地域和共同血缘的两重性，并具有其世世代代的继承性和稳定性，它对于研究早古的氏族社会及其祖源，具有十分重要的考古价值。

达斡尔族的姓氏可分为哈勒、莫昆、毕喇格等三种，比其它兄弟民族的姓氏复杂得多。譬如说姓“沃”的达斡尔人要完整的表达其祖姓的话，应该是沃白“哈勒”、霍提“莫昆”米里特格“毕喇格”。可以看出，达斡尔人的姓氏包括祖先居住的地域、祖先居住的部落、祖先居住的河畔等三个层次。

一、哈勒、莫昆、毕喇格名称的起因

“哈勒”又记“哈拉”，“莫昆”又记“谋昆”、“谋克”，“毕喇格”又记“比尔吉”“毕喇”等，三者是完整地表达祖姓的全称。这些名称是通古斯森林部落诸民族统一的叫法，它来源于女真语。这是因为世居黑龙江上中游的通古斯森林部落，自金至清代，接受女真统治的反映。

“哈勒”一词含意和来历如何？相当一部分民族学者认为，“哈勒”来源于“哈力”，“哈力”原意为“河谷”或“山沟”（满、蒙、达语都是如此）。一个“哈勒”的地盘占居一个“哈

力”或几个“哈力”的幅员，从这个意义来讲，“哈勒”来源于“哈力”的说法，值得考虑。

“莫昆”原为女真语的行政组织，辖一千户居民的行政组织叫做“猛安”，即达蒙语的“米扬格”（“千”之意），辖五十至三百户居民行政组织叫做“课昆”或“谋克”；辖五十户以下的居民行政组织叫做“噶珊”，即达语的“嘎辛”。千户之长叫做“猛安达”、几百户之长叫做“谋昆达”、小部落之长叫做“噶珊达”。

“毕喇格”，原意为女真语“小河”，汉译为“毕喇”，是表示河川的女真语词干，格是达语语法变格的附属词，用它表示所居“毕喇”（河川）的定格。

古代的达斡尔人，大氏族部落曾用过“爱门”一词，后用“哈勒”所代替。明史记载中曾发现“爱门”的称呼，民国年间的黑龙江志稿也记为“爱门”人；汉族也称呼为“爱门”。可见，有过“爱玛格”制。达斡尔人内部流行“霍恩楚格”的说法，如鄂嫩哈勒嗣裔说为齐帕“霍恩楚格”，即齐之嗣裔之意。

二、“哈勒”和“莫昆”的职能

“哈勒”多以其祖先世居的山川取名，一个“哈勒”占有一定的活动地盘，多以山川为界。大“哈勒”氏族集团占据地方圆可达百余里；小“哈勒”氏族集团占据地方圆也有几十里。他们各自划分自己“哈勒”的合法管辖区域，形成一个小范围内的割据局面。“哈勒”居住区域比较稳定，其他“哈勒”不得任意侵犯。“哈勒”管辖区外，另有无主占领的公有牧猎场及森林等自然资源，这部分公有土地，谁都可以利用。然而，一个“哈勒”不得任意为已有。

“哈勒”是古代氏族社会血缘裙带和共同地域的社会组织形式。“哈勒”是区别不同氏族集团的代号。每一个“哈勒”氏

族，都按照民主推举的原则，选举自己“哈勒”首领，这个族长达语叫做“哈里达”。

在古代的氏族社会时期，“哈里达”（姓长）的统治氏族的时间更为长久，“哈里达”的基本职能如下：

1、组织氏族成员发展生产及生产分配；

2、组织氏族的祭祀及婚丧；

3、惩处违纪成员；

4、代办国家征税纳贡任务；

5、处理成员间的民事纠纷；

6、处理与外“哈勒”的交往事宜。

“莫昆”是后世“哈勒”子孙繁衍到人口众多时，早期血缘分离后，在一个“哈勒”地盘内发展为若干部落，便形成为一个先祖的几个嗣裔部落，到了金朝以后，由于地方行政组织以部落长名字命名者甚多，因此“莫昆”组织比起“哈勒”要晚，“莫昆”血缘关系要比“哈勒”近得多。

在一个“哈勒”的地盘内，将原统一地盘瓜分为几个“莫昆”的小地盘，这样，大割据中又出现小割据，各“莫昆”都有自已分界限。

“莫昆”是古代国家的基层政权之一，它已不同于“哈勒”组织盛行时期的涣散，他直接代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职权。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同样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莫昆”长，达语叫做“莫昆达”，相当于汉族地区乡长。“莫昆达”的职权如下：

1、按国家法令：征丁、纳贡、组织服劳役；

2、组织莫昆日常生产生活，调剂和分配自然资源的利用开发；

3、祭祖神，定期组织莫昆家族会；

4、组织集体围猎及集体捕鱼；

5、处理民间纠纷，惩处违纪分子；

6、设立莫昆墓地；

7、管理莫昆公有土地、草场、牧场、猎场等；

8、禁止莫昆内部通婚，处理逃婚离婚等事宜；

9、批准接纳养子入莫昆籍；

10、处理莫昆婚丧事宜。

氏族首领的“哈思达”制，到了金朝已被“莫昆达”制所代替，当时几成虚名，只不过干预一些“哈勒”氏族的内部事务，此后逐渐消失。

“莫昆达”自金代以来形成为国家基层政权组织的首领，以其宗缘延续到清乾隆年间（十八世纪初），随着乾隆年间推行的混合编佐的制度，打破了以往同一血缘为部落的惯例，各莫昆组织开始瘫痪瓦解逐渐形成各莫昆杂居的部落，“莫 昆 达”干预“莫昆”内部的祭祖神撰修家谱等事务，逐渐由“噶珊达”代替。

三、达斡尔人的哈勒、莫昆及借汉姓的来由

达斡尔族的哈勒，借黑龙江北岸的山川为号的“哈勒”共十九个，南徙后有的放弃“哈勒”，由其“莫昆”改称“哈勒”的有二例，如索都尔、色布克等。南下定居后，由外族改为达斡尔族“哈勒”的共三例，如扎拉日（张），祁布祁白（祁）、瓜尔察（关）、失传的“哈勒”一例，如达呼尔实有“哈勒”二十五种。另外，没有“哈勒”的汉姓达斡尔族有赵、李、张、王、刘、白、卢、陈、马等十几个姓。

达斡尔族的“哈勒”、“莫昆”附表于后，在这里不详细介绍。

“哈勒”、“莫昆”与汉族姓氏有何关连，达斡尔人以“哈勒莫昆”表达姓氏，自古以来由于达斡尔人的姓氏非常复杂，不便用文字填写，1914年（民国三年）和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

的两次户口登记造册中，负责登记的警务人员对达族百姓进行辱骂威胁，达斡尔族百姓无奈借用汉姓填写，如敖拉改敖或单，莫尔登改为孟、盛、莫、苍等。

迄今，从全国达斡尔族来看，以“汉姓”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较普遍，把“哈勒”当做祖姓的为多。对于“莫昆”的保持，唯独齐齐哈尔一带达斡尔部落较为普遍，都保留着居住在黑龙江北岸时期的祖传“莫昆”。而在布特哈地区只有少数人能够通晓祖传的“莫昆”，绝大多数人不懂得祖先的“莫昆”；有些人把南徙后定居的最早部落，当做“莫昆”使用着。今日齐齐哈尔地区和布特哈地区所使用的“莫昆”概念有所不同，前者是以祖先居住的部落为“莫昆”，后者是以嫩水一带近祖居住部落为“莫昆”。譬如敖拉哈勒的莫昆，齐齐哈尔地区分为敖拉、雅尔赛、多金、索都尔、克尔哲等五个“莫昆”，而布特哈地区分为奎力浅、库热浅、拉力浅、登特科、巴衣格日等五个“莫昆”。

“毕喇格”早已失传，唯独讷莫尔一带的讷莫尔达斡尔保留至今。

哈勒·莫昆名称表

哈勒(hal)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MoKon)	莫昆起因	借汉姓
敖拉(Aol)	“敖拉”本意为山，以山名为号。 敖拉哈勒分布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一带的山区。史籍为敖拉氏或鄂拉氏。雅克萨位于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汇合口处，离爱辉城西北一千三百余里处。	敖 单	敖拉(Aol)	远离江畔近山居住者，为敖拉莫昆。	敖
			雅尔赛(yaras)	守雅克萨城遗民，为雅尔赛莫昆	阎 杨
			多金(Dogin)	居住多金城者，为多金莫昆	多
			索都尔(Sodor)	起因不详，齐齐哈尔一带划归敖拉哈勒的一个莫昆，布特哈一带已改单一哈勒。	索
			克尔哲(Kerje)	起因不详，本意为园田	单
阿勒丹(Aldan)	以阿勒丹河名为号。阿勒丹哈勒分布在达呼尔山（雅布诺维山）东侧。 阿勒丹河发源于达呼尔山的北岭阿尔坦山，往北流入勒拿河，史籍为阿尔丹氏。	安	德日根(Dergen)	起因不详	德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额斯日 (eseer)	以额苏里河名为号。史记为“额苏里”。额苏里河是黑龙江中游左岸一个支流，位于爱辉城西北九十里。	鄂	何斯日 (Hesur)	居住在额苏里河畔额苏里屯者，取为何斯尔莫昆。“额苏里”本为满语之称，个别地区因以方言音转为额斯日或何斯日。	何
			甘查 (Ganqa)	居住在额苏里河一带，部落起因不详。	鄂
			巴卡日 (BaKaar)	同上，起因不详。	邵 鄂
			斡林库日 (Olinkoor)	斡林库日本为捞鱼工具的名称，打鱼部落以之为号。	鄂
			达尔塔勒 (Dartaal)	同上，起因不详。	鄂
毕日杨 (Biriyan)	以毕日杨河名为号，毕日杨河是黑龙江中游左岸一支小川，位于瑷璋城西北五百余里外。	杨	毕日扬 (Biriyan)	以毕日扬河畔的毕日扬部落为号。	杨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莫日登 (Merden)	莫日登本意为河流悬崖处或是河水弯流处。以莫日登河名为号。地图记为波罗穆达河，这是译文不准确之故，本名为德热莫日登河。莫日登河是一条小河，位于雅克萨城以东鄂嫩河以西离爱辉城西北约一千里。	孟 莫	苍嘎日 (Sanggaar)	居住在莫日登河一带，起因不详。	苍
			冲罗 (Congloo)	同上、冲罗本意为“罐”，可能是部落座落在罐形地方或是原部落长名为冲罗。	莫
			朱如格 (jurug)	同上、朱如格本意为“心”，可能以原部落长名为朱如格而来。	
			和勒格 (Heleg)	和勒格，本意为肝，可能以部落长人名而来。	
			山大奇 (Xandaqi)	同上、莫昆起因不详。	
鄂勒特 (elet)	鄂勒特哈拉以鄂哩河名为号，鄂哩河又写做鄂尔河，本意为葱原，是石勒喀河北的一条小河，位于雅克萨城以西。	鄂	海伦 (Haileng)	居住在海伦城者，以海伦莫昆为号。史籍说位于瑷珲城西北一千三百里处。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沃日（Weer）	沃日本意为上源，以沃日迪河为号，史籍为乌勒尔喜河，是汉译文有误之故，是石勒喀河北的一支小川，位于雅克萨城以西数百里处。沃日哈勒又因早期部落战争，由西移向东即黑龙江中游左岸一带，另立倭勒等部落。	沃	沃日（Weer）	居住在倭勒屯者，以沃日莫昆为号。倭勒屯史籍说在爱辉城西北九百里处。	
			霍提（Hooti）	在黑龙江中游左岸。霍提本意为葫芦，因盛产瓢葫芦，以霍提莫昆为号。	
			扎木（Jaam）	居住在黑龙江中游左岸。扎木本意为刺木果，因盛产刺棵，以扎木莫昆为号。	张
			多勒公（Duulgun	居住在黑龙江中游左岸，莫昆起因不详	
克殷（Keyin）	以克殷河为号，克殷河是精奇里河即结雅河下游右岸的一个小河，位于瑷珲城北百余里处。		克殷	居住在克殷河畔的克殷屯以克殷莫昆为号。克殷又写为“何音”本意为“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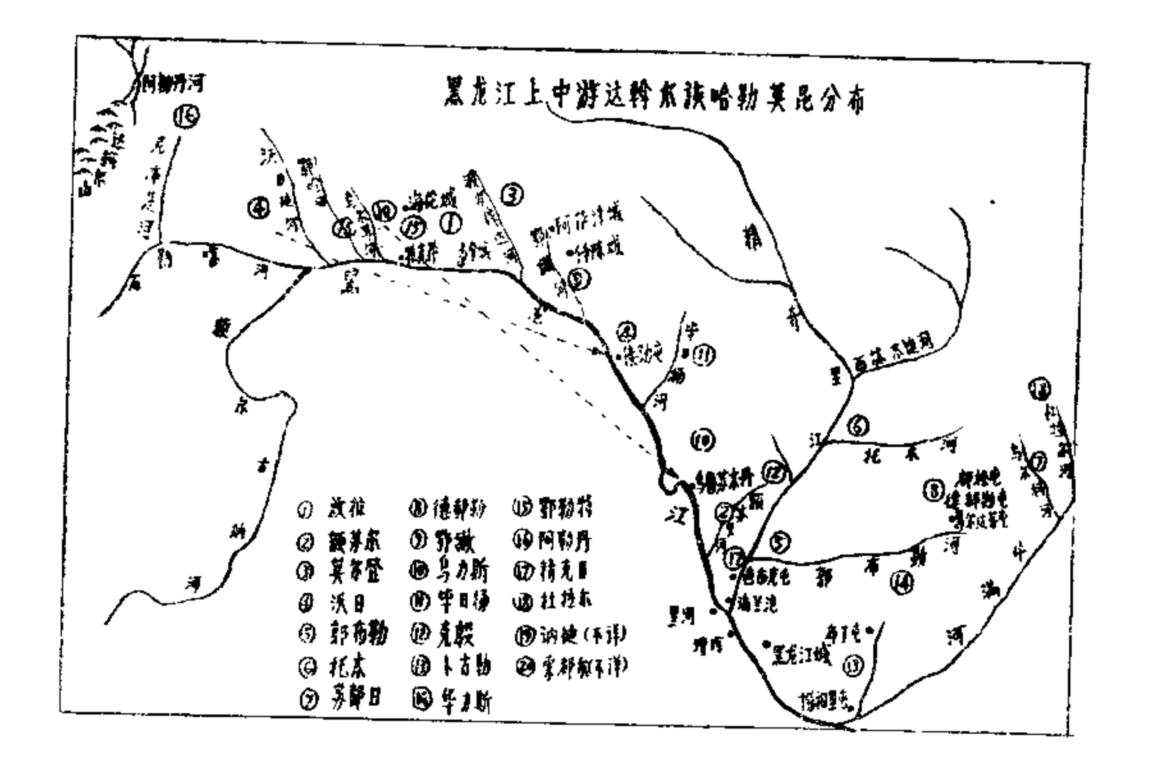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德都勒（Deedul）	哈勒起因待查。德都勒哈勒分布精奇里下游左岸，位于爱辉城以北一百余里处。	德	德都勒	居住在德都勒屯者，以德都勒莫昆为号。	
			噶日达苏（Gardaas）	居住在噶日达苏屯者，以噶日达苏莫昆为号，史籍为噶尔达逊，位于爱辉城东北一百余里处。	
			都松（Duxiun）	居住在都松屯者，以都松莫昆为号，史记为都逊、都孙，位于爱辉城东北百余里处。	
乌力斯（ulis）	以乌力斯河名为号，史籍为乌尔苏或乌尔木河，是石勒喀北岸的一条小河，位于雅克萨城以西数里处。因早期部落战争频繁，由西东移至黑龙江中游左岸的乌鲁苏木丹一带，左岸北的小河，史籍记为乌鲁苏河，位于爱辉城西北三百二十里处		乌力斯	居住在乌鲁苏屯者，以乌力斯莫昆为号。	
			库尔喀	居住在库尔喀屯者，以库尔喀莫昆为号，此屯在明代为库尔 喀（呼 尔哈）部所在地。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鄂嫩 (Onoon)	以鄂嫩河名为号，鄂嫩河是黑龙江上游左岸的一条小河，原是黑龙江上源斡难河入江口，后因河岸填平割断上源。后人仍以鄂嫩或斡难之称命名，位于雅克萨城以东二百余里处。	鄂	阿协津 (Axiejin)	居住在阿协津城者，以阿协津莫昆为号，史籍为阿萨津。位于爱辉城西北九百里处。	鄂 吴
			昆吉 (Kunji)	居住鄂嫩河一带的昆都吉屯者，以昆吉莫昆为号，史籍为昆都。	吴
郭布勒 (Gobol)	以郭布勒河名为号。郭布勒河是精奇里河左岸的一条小河，史籍认为在爱辉城以北一百里处。有些学者记为布丹河。郭布勒史籍称郭贝勒。	郭	郭布勒	居住在郭布勒屯者，以郭布勒莫昆为号。	
			额日根浅 (Ergenqian)	居住在郭布勒河一带，额日根浅本意为“居河岸者”，以居河岸为莫昆号。	
			瓦日格 (Warge)	居住瓦日格河一带，以瓦日格莫昆为号，史籍为乌喇格河，是精奇里河左岸一条小河。可见，郭布勒哈勒跨居精奇里河左右两岸之地。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托木（Toom）	以托木河名为号，托木河是精奇里河左岸的一条小河，史记为脱木河，位于爱辉城稍东北二百里处。	陶	图沁（Tuqin）	居住在托木河一带，莫昆起因不详。	
			固荣（Guruun）	居住在托木河一带，固荣本意为“国”，具体起因不详。	
			瓦仍（Waran）	居住在瓦仍屯者，以瓦仍莫昆为号，史籍为乌兰、瓦然、吴然，而布特哈地区自称瓦仍哈勒。瓦仍本意为“技巧”。	乔
精克日（JinKer）	以精克日河名为号。精奇里是汉译文有误，精克日者，现名为结雅河。位于爱辉城北，即精奇里江，精克日哈勒分布于精奇里下游右岸，距爱辉城北三十余里处。	金	色布克（SebuKi）	居住在精奇里河下游右畔色布克屯者，以色布克莫昆为号。史籍为塞布克，色布克为山峰名。	—
			索曲（Seqiu）	居住在精奇里河下游右岸，莫昆起因不详。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卜古勒 (Buguul)	以卜古勒峰和卜古勒河名为号，史籍为博阔里、博和里、布库尔等。黑龙江中游左岸的一条小河，位于爱辉城东南一百五十里处，后北移至布丹河一带定居。	卜鲁	卜迪 (Budi)	居住在卜迪屯，引屯名为号，史籍为布丁。	
苏都日 (Sudur)	以苏都尔河为号，苏都尔河是牛满河（布列亚河）上游右岸的一条小河，位于爱辉城以东二百余里处。	苏	乌如克 (uruke)	居住在牛满河上游右岸的乌尔科河畔。乌尔科，屯名。以乌尔科莫昆为号。乌尔科本意为“边缘”。	
胡拉斯 (Hulas)	在精奇里河下游左岸一带，哈勒起因不详。	胡	胡拉斯蒂	胡拉斯蒂一词本意为“坑”，莫昆起因不详。	栗
讷迪 (Nedi)	哈勒起因不详，讷迪居住地不详。	讷鄂			

哈勒	哈勒起因	借汉姓	莫昆	莫昆起因	借汉姓
杜拉日 (Dulaar)	以杜拉日河名为号，史籍为多拉尔。杜拉日河是牛满河上游的一条小河，位于爱辉城东三百余里处。	杜	杜如塔勒 (Durtal)	以杜拉日河的杜如塔莫昆为号，史籍为都黑屯。	
			塔哈日 (Tahar)	杜拉日河一带有塔哈日山，以塔拉日莫昆为号，史籍为塔哈山或塔哈勒，为明代奴儿干都司的一个卫所。	
			刻衣吉日		
索都尔 (Sudur)	是敖拉哈勒的索都尔莫昆，后世改为哈勒的，还是起初是单一哈勒，尚不清楚。	索			
扎拉日 (Jaalr)	此哈勒后世由外族流入，不属于黑龙江以北的达斡尔族哈勒之列。	张			
挂尔佳 (Guuarqa)	此哈勒后世由外族流入。	关			
祁布祁日	此哈勒后世由外族流入	祁			
达呼尔	以达呼尔山为号，后东移，在达日部一带，此“哈勒”已消失。				


黑龙江上中游达斡尔族哈勒莫昆分布
①敖拉
②额苏尔
③莫尔登
④沃日
⑤郭布勒
⑥托木
⑦苏都日
⑧德都勒
⑨鄂嫩
⑩乌力斯
⑪毕日扬
⑫克殷
⑬卜古勒
⑭毕力斯
⑮鄂勒特
⑯阿勒丹
⑰精克日
⑱杜拉尔
⑲讷德(不详)
⑳索都尔(不详)

达斡尔族人的日常礼俗

高　瓦

春节期间的礼俗

达斡尔人在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本民族的一套特殊的风俗，有些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即使是在汉族中发源的民间节日，达斡尔族也有一些自己的欢度特点，如“唉涅”——春节就是。为迎接“唉涅”，进入腊月，就开始准备，杀年猪，请亲朋来吃血肠、手扒肉，亲朋临走还要送些带上，带给没来的老幼。过腊八，男主人领儿子进城办年货。过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以后，妇女们忙着搞卫生，室内扫尘，窗明几净，物见本色，房内的大粱柁擦得明亮，墙用白土刷的雪白，被褥早已拆洗，新衣、鞋袜早已做完，屋里院内收拾的干干净净。晚上包冻饺子，白天蒸各种饽饽，一切准备都必须在年三十前结束。这些举动和汉族是相同的，但是在达族中，“唉涅”期间还有几个有趣的活动。

1．“胡它腾贝克”——放烟火堆。年三十的白天，各户的男主人在大门外村路中间用干燥的牛马粪和“格脑”堆上两大堆，堆高一米多，直径两米左右，外层拍些积雪，在日头偏西时，由主事的男人去点燃。先是起明火，谁家点的明火高，谁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就兴旺。然后用积雪覆盖，将明火压住，只有白烟冉冉升起，可燃烧五至七天。主妇们忙做晚饭，小伙子们忙着张贴年画、春联、挂钱。在晚饭、日落前，都要梳洗穿戴好，全家出

动，把过除夕的丰盛饭菜各拿一点，带上酒壶，送到烟火堆旁由长者焚香敬酒，祝福辞旧迎新，去邪免灾，生活兴旺，同时，也表示对已故去亲朋的怀念。在达族中，认为除夕的夜（吾古杜里唉涅”）是死魂节，传说这天夜里，死去的人的魂都回家来探望，有些游魂也要到处游荡串，所以每家窗户上的小缝都堵严，以防鬼魂进来。那一夜，也不准在屋外叫小孩的名，怕被鬼带走。所以，在火堆旁，对死者总得要好好敬上一香。除夕饭是以猪肉为主的带骨肉——手扒肉，还有牛、羊、鸡、鱼肉等。用饭时，祖辈坐在正桌的正位，儿孙围在两边，媳妇来往关照不能上桌。猪肉的“达勒”（肩胛肉）、“瓦奇”（臀肉）要敬长辈享用。吃过饭，日已落山，就开始“库吉力日贝”——烧香敬香，由长子焚香并依次向各位神龛进香。第一位是天——七星北斗，然后是祖宗、灶王爷等十几位。在敬香的同时还点燃“出库其”——用面做的油灯。

2. “唉涅艾勒贝”——拜年。在除夕（布图）晚上和初一（希嫩）早晨，向家中长辈各叩一次头，是最重的礼节，各位长辈在受礼时，都要给予最好的“希若”——赐语，给儿孙们的“希若”里，既有吉祥的祝福，也有因人而异的正面教导。有时长辈假装不给“希若”，那么跪着的挑皮蛋也就故意不起来，逗个乐趣。

除夕晚上，吃罢晚饭，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衣裳，老太太也都戴上一朵鲜艳的绢花，新过门的媳妇打扮得如新婚那天的样子。全家人给长辈第二次请安叩头，吃罢冻饺子，然后男人领着儿子到本屯的直系亲属家向长辈叩头。先到“莫昆”（同姓）亲叔伯家，再到姑、舅、姨家，最后到同屯的长辈家。初一早，天刚放亮，各家来拜年叩头的人们成群结队，屋里盛不下，就敞着里外屋门，大人在前，小孩在后一起先请安后叩头。坐在南炕上的长者则大声给予最好的“希若”，如说“起来起来！新的一年有个

大丰收，过个富裕又太平的日子”，“行啦！行啦！新的一年生个大胖小子”等等。总之盼着新的一年老少太平，儿孙健壮，六畜兴旺，庄稼丰收，生活幸福，万事如意。去直系长辈家叩头，还要带上一壶好酒，请安后斟上一杯酒给长者，然后跪下，这时长者左手端着酒盅，用右手中指蘸酒往上往下各弹三次，嘴上叨念着敬祖、敬神和赐给晚辈的“希若”。拜年的人群常常持续到小晌。到了中午，就有女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到亲属家拜年，同样是中年的领着年轻的和小孩们，走街串巷热闹非常。

3. “奥日珠格贝”——摆灵位。长辈逝世后，从当年算起，头三个春节从三十那天开始都要摆上灵位直到初三。灵位摆在南炕的炕头，因为那里是长者住的位置。这几天，要把洗的干干净净的褥子铺上，把绣花枕头顺着褥子放在中间，盖上被子，把装好的烟的长烟袋锅点着，把有烟袋嘴的一头插在枕头下边，旁边放上小饭桌，上边摆着酒壶和酒盅。从卅晚上开始到初三，本屯和远屯的亲友都要先后来给长辈的灵位拜年叩头、敬酒、装烟。

4. “豪日瓦日贝”——打春。达斡尔人把打春这一天，看做是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象征，热气腾腾的农忙开始了。这一天，家家户户的窗纸上、屋门、大门、仓房门上都用红色画上大大的“十”字，连牛角、羊角、白马或浅色马的脑门上也涂上红色，表示人们迎新春避邪免灾的心情。青年人自发的在村外的开阔地去赛马，小孩子骑驴乱串，老人们去看热闹，一片喜气洋洋的闹春场面。

5. “哈日吾得日”——抹灰节

正月十六日，达斡尔老奶奶们鸡叫起炕，从烧北炕的大锅脐下用勺抠下一点黑灰，在睡得正熟的儿孙们的脑门中间点个拇指头大的黑点，为的是避邪免灾，太平一年。这天，家中当嫂子的倒霉，小伙子们用锅底黑灰，拌上豆油或猪油，有的甚至用老牛车轴上的黑油，揣在兜里，走家串户，趁嫂子们冷不防时给抹上

一脸黑。这种时候，有些挑皮的嫂子也有准备，几个人抓住一个小伙子就给他抹个够，甚至扬言“扒下裤子再给抹上”，结果往往是小伙子告饶或老人们给说情才罢。这一天很热闹，老人和大姑娘们看热闹，媳妇们战战竞竞地最怕挨抹。屯中遇上过路人，小伙子们也要骑上马追上去给抹灰，表示一路顺风，驱邪免灾，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抹灰节晚上，老人、小孩都洗头发，洗脚，为了一年太平无灾。

从年三十到二月二，整个“唉涅”期间，达族村屯是非常热闹的，老人们到各娱乐场合坐阵助威，高高兴兴看热闹，有时也下场去比划几下。小伙子们吃过晚饭后，在日落黄昏时都跑出来分几伙打“布勒克”——曲棍球。到天黑后就要“傲古勒迪”，用翻穿皮袄摹仿各种动物，连唱代耍，串户做游戏，小孩们成群跟随看热闹。姑娘们白天玩“萨克”——嘎拉哈，摆“哈涅卡”——小纸人”过家家玩。晚间是妇女们的天地，集中几伙跳“哈肯伯”舞一直到深夜。

晚辈款待长辈的礼俗

达族人很注重传统礼节和规矩，在社会上老人倍受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在敬老方面也有几点可以介绍。

1. 对长辈不准呼名字。晚辈们对直系的祖辈、上辈亲人，都严禁叫名。对本村的老人的名也不准叫。要说就得说同辈人某某的父或爷。

2. 老人进屋，晚辈站起来，老人出远门或三天没见面，都要请安。年轻的儿女、媳妇都站起来迎上去问候并接下帽子或手杖等物，然后让坐、装烟，服侍休息。

3. 当老人叫晚辈的时候，晚辈一般要站起来，答应“哲”，如果答应“啊”，是不礼貌的。

4. 出远门或外来的客人、亲友临走时都要向老人请安告别，

老人则嘱咐他们一路平安、办事如意。

5. 和老人说话，是什么辈的就称呼什么，不能叫“你”，如同爷爷对话，就要声声称爷爷。

6. 晚辈人进屋，先坐北炕，也不能背向老人坐下，因为那是不懂礼节的表现。

7. 早晚装烟。儿媳在早晨起来梳洗完毕后给公婆装好烟点着火。晚上临睡前还要装一袋烟。

8. 给老人铺放和收叠被褥。女儿或儿媳必须每天给老人捂好被褥。早晨起来后给叠好，不能让老人干这个活。

9. 吃新鲜东西，让老人先尝第一口。这是孝顺；不准小孩子们先抓，先吃，这是家规。让孩子们先给祖辈吃第一口，使小孩从小养成孝敬老人的习惯。

10. 晚辈们喝酒必须经老人允许，更不能同桌共饮。若允许喝酒也必备另桌，在北炕或外屋喝。

11. 老人和孙儿一起在南炕吃饭。其余人在西炕或北炕吃，儿媳站在一旁，边吃边盛，不准大盆端上炕。

12. 不在老人面前互相说脏话，要安静，要严肃正经。

13. 老爷子出门，一般都骑马，年轻的要喂好马、备好鞍，要搀扶上马送上一程，目送远去，才能返回。

14. 有老人在世，哥儿们不准分家。如要分家，认为不孝，受到社会舆论的遣责。

15. 老人死了，不准说“死”，说“巴日坎博勒增”（成佛了）。

16. 晚辈后睡先起。长辈在南炕坐着，晚辈们不准在北炕或西炕横躺竖卧，那是极不礼貌的。

待客的几种礼节

1. 请安、问好。同客人见面，按着排辈的顺序，先称呼，

再行请安礼，叫一声“三希”（您好）。请坐下后首先问家里老人好，孩子们好，之后才能谈有关事情。行请安礼，如果是生人，必有长辈引见或自我介绍后，才能行礼。没出嫁的大姑娘不能给兄嫂请安。请安的姿式：男左腿女右腿前跨一步，双手悬垂在伸出的膝盖上，全身慢慢蹲下头稍前低。

2．装烟、沏茶。不论老人或年轻的客人，行过礼坐下后，先装烟点火，沏茶。装烟者说声“阿勒”要烟袋。装好烟，点着火，擦净咀，双手敬上。

3．到大门口接客人。见长辈来作客，要到大门口迎接，先请客人进屋并让坐，晚辈们则要站在一旁，不经长辈说话，不能坐下。

4．和同辈客人谈话不准称呼对方长辈的名，也不能以“他”代之，一定要用辈称，如“叔”，“婶”等。

5．遇有年轻的男客人，家里的大姑娘都要回避，若是直系亲属就不必了。

6．迎车、马。客人进院后，屋内的年轻人要立刻出去迎接，将车或马缰绳接过来，加以安顿并请客人上屋。

7．来客人就要烧火做饭。主人不准问客人吃不吃饭，也不能问什么时间走，所以，客人进屋，妇女就要下地准备做饭，如客人无意吃饭，便到外屋劝阻，表示谢意。

认为不礼貌的几种行为

在达族中，特别是在老人中深感没礼节的几个行为是：

1．在院内不准打主人的狗，“打狗看主人”，打了，这是对主人的小瞧。

2．拿鞭子的客人必须把鞭子放在门外，才能进屋。拿鞭子进屋是认为不礼貌。

3．任何人不准踩门槛，因为这样显得没规矩。小孩子更不

准踩门槛，老人常用"踩门槛不长个子"话哄他们改正。

4. 进屋不准背向墙上的神龛。一般人家将神龛都挂在西墙，所以客人进屋必先坐在北炕，不能坐西炕，也不能坐两炕接头的炕角上。

5. 进屋不准坐南炕，因为那里是主人家长辈享用的地方。

6. 大伯哥不准和弟媳随便说笑，而且如有事也要通过第三者传话。

禁　　忌

达斡尔人，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多方面的禁忌，其中有些在这里道不清其所以，但的确是从祖辈传至现在，不妨先列出来。

1. "唉涅"——春节时，从除夕这天收拾干净之后直到初五，屋内的垃圾不准往外倒，怕破财，福根不能扔了；除夕夜和初一不能动剪子；三十那天吃的水要挑满缸，初一不准挑水。

2. 打鱼下网和鱼亮子，不准妇女去，怕冲了财气。

3. 不准砍神庙旁的树，因为是神树。如砍了，非遇大祸不可。

4. 有病人，请大神祈祷或还愿驱鬼魂后，忌门七天，不准外人进院，怕把鬼魂带进来。

5. 病人和有慢性病的人，不准吃鲶鱼、老头鱼以及自已死的畜禽肉。

6. 生小孩，忌门一个月，不准外人进产房。有产妇的大门旁都插有标志，如生女孩就在一尺来长的棍上系块小红布，生男孩就在棍上绑个小草疙瘩。

7. 小孩出天花、麻疹时，大门上插小三角白旗忌门，不准外人出入。这期间家里不准炒菜、炒黄豆，也不准抓虱子和做针线活。

8. 用一手指或有尖的刀、剪指人也属禁忌。

9. 不能在房西修厕所和大小便。

10. 妇女不能跨男人的衣帽，更不能跨越身体，如跨了要立刻拿起衣帽在男人头顶上画上三个圈。

达斡尔族人的食俗

高　瓦

一、主　食

主食来源于稑子（“芒鲁木”）和荞麦（“哈吾勒”）加工成米和面，在达斡尔族中有几种加工和吃法。

（一）稑子的吃法

“敖斯莫”——稑子米。把收获的稑子用大锅装满，添上没过稑子的水，用柴火烧开锅，将稑子煮到外壳开个小口为止。然后放到外边晾晒，待基本干燥，再收到外屋的“鄂鲁古”——连着锅台的小炕上，烙干透之后再碾成米。

1．“敖斯莫巴达”——稑子米干饭。开水下米，八成熟时捞进盆里，然后隔水蒸炖一刻时间。这样做的干饭粒粒松散入口清香。假如有鲫鱼炖汤相配就更鲜美了。如果加红云豆做成干饭，泡上酸牛奶，那更是吃也吃不够的。

2．“希日莫勒巴达”——稑子米肉粥或鱼汤粥。猪、羊、牛、鸡、野味肉切成块或条，用油炒去生，放上葱、盐、花椒等佐料，填上汤，等煮开后，下稑子米煮成粥。一般在冬季天冷的晚上或年节晚上大家搞了各种娱乐活动后，老妈妈、老嫂子们就会到“哈什”（仓房）拿块肉进来做肉粥，很快就做好了。大家吃的又热乎又喷香解饿。

用鱼汤做粥时，都是先将鱼煮成汤，再下米。一般都用大鱼或鲶鱼，鱼煮到半熟时，把鱼刺剥出来，再下米，出锅时，放上

各种佐料，这个粥营养最好，老人最喜欢。

3. “苏提茶”——稷子米奶粥。把米炒成焦黄色，再添进鲜牛奶煮烂即成。吃时可放点奶油或奶皮子。

4. “布古勒哈格”——炒米，“那仁哈格”——炒面。炒米，把带壳的稷子用文火炒，壳可炒焦，米变成深黄色即熟，然后用碾子加工成米。炒米可以干嚼着吃，也可泡在热奶或酸牛奶里吃，还可以放糖和奶皮子。

5. “希基莫吾图莫”——稷子面的蒸食。将米碾成面，用开水烫一半合好，发酵好，用上碱，可蒸发糕或或包成豆包，也可用勺一个个的扣在大锅里烙勺糕。

把炒米碾成炒面，它和炒米都是达族人出远门常携带的干粮。炒米也用来待客或供小孩当零食。

（二）“哈吾勒”——荞麦的吃法

过去与达斡尔族的面食，主要是荞麦。

1. “托古罗”。将荞面擀成薄薄的片，切菱形块下在开水中，见熟就捞到已熬好的鲜奶里，成了有奶有面片的饭。吃时可放些白糖或红糖以及奶油或猪油。

2. “克路”也就是饸饹。达斡尔族吃饸饹，在做卤时大多用野味，如野鸡汤或飞龙、野鸭汤，也用猪肉做五花肉汤或肥牛肉汤，调汤一般不用酱油，只用盐，以保持原味。

3. “打勒巴达”，也是轧出的面条。使用的工具是把大犍牛的肩甲骨，锥成许多排筷子粗的眼，然后把和好的荞面在“打勒”上一下一下推挤，漏下来的面条，直接下锅煮熟，吃浇卤或原汤都可以。用玉米面也能做“打勒巴达”。

4. “卓仁根莫勒巴达”——刀削面。荞面用开水烫一半，和成面团，用快片刀往开水锅里削，面片约三四寸长，半寸宽，中间有二分厚。可用原汤也可用野味调汤，一般多在冬季食用。

5. “剎波日当”。用猪、羊、牛肉或野味炝锅调汤，等开

锅后下小米，做成稀稀的粥，再把和好的荞面，削条或切成细条下锅，这个饭是粥又是面条。是冬季最好的热乎饭。

6. 奇克乌图莫——荞面蒸饺。将荞面用开水烫过，揪成剂子，再用手压成皮子，打上大馅包成。饺子馅通常都用酸菜和白肥肉，加上各种佐料拌成。荞面蒸饺是达族在正月十六日抹灰节吃的上等饭。

7. "尼吉拉勒"，是用加工荞面后筛下的糁子做成的干粘粥。出锅前在锅里用勺来回碾压糁粒，最终成为粘稠和银白又透明的粥。吃时把盛在碗里的粥抠个坑，放上猪油或奶油，加上红糖溶化后蘸着吃。这个饭，住家姑娘常在中午当点心吃，有时远方客人进家门，也做些当做临时垫补。

8. "阿鲁木巴达"，将荞麦蒸熟晒干再碾成米，是雪白透明的米，捞干饭或做"拉勒"，泡鲜奶子或酸奶子吃，非常滑爽，好消化，适合老人小孩吃。

9. "哈吾勒郭勒吾特莫"——荞面饼。荞面烫熟，加点生面和成软面，揪出饼剂，然后用两手来回拍薄，锅里刷上油，放进去用文火烙。出锅后可以蘸奶油吃，也可用"巴勒"——苏子做馅烙饼。苏子炒熟加点盐，擀成面状就是馅。

10. "额日克莫勒吾图莫"——蒸饼。用荞面糊煎成薄薄的大饼。吃时卷上炒好的酸菜粉、绿豆芽等等，是招待客人的好饭。也可加葱、盐、烙成薄饼。

11. "毛格勒吾特莫"。把筛荞面落下的糁麸，用开水烫一半，与另一半干面一同揉成团，做成发面，用菜作馅，烙饽饽吃。这个面也可做"努克提吾图莫"即中间有大眼的饼。它是把饼剂埋在灶膛里的火灰里焖熟的。冬季夜长，吃饭后大人给小孩们馆上几个，面香味大，大家都争抢着吃，最有乐趣。

12. "哈吾勒郭勒巴达"——荞面条。达族妇女做荞面条是最拿手的。荞面用凉水和好、醒好，再切成面条，切的非常

细。煮熟后过一下凉水，再浇热汤吃。汤主要用猪的五花三层肉或野鸡等调成。吃的时候还配有达族人常说的"四个小碟"压桌，如辣菜、辣椒沫、韭菜花、小花菜等。

（三）"木如古勒"大麦的吃法

大麦蒸熟后碾成米，可以做成干饭或粥。吃时可加上鲜牛奶或酸奶子

（四）"拉勒"——干粘饭。达族用各种米做"拉勒"。如用小麦加上芸豆、土豆块做，也用荞麦糁子或苞米小楂子做。最好吃的是"瓦日勒"拉勒，即把母牛下犊后头七天的奶子都放到一个罐里，发酵后，成了又香又酸甜的疙瘩奶，用小米作拉勒，泡上疙瘩奶吃。吃这个"拉勒"，常常都把一些亲朋长辈和孩们请来一同品尝。

（五）"皮苏格"——粘糜子

一种吃法是"皮苏格拉拉"，即粘干粥，是达族的"腊八粥"，用奶油或猪肉加上白、红糖蘸着吃。

再一种吃法是"皮苏格郭勒"，即粘糜面饼。把面团在手上拍成小薄饼再煎熟，也是蘸奶油或猪油加糖吃。

另一种吃法是做粘豆包。用大芸豆或红小豆作馅。面用锅炒，去掉生面味，然后趁热用温水和好，放在热炕头稍微发酵，待有点酸味时，就让有力气的小伙子给揉面。揉好后包成馅大皮薄的豆包，每个都有馒头那么大，蒸熟就可以吃了。吃时也是用奶油或猪油加糖。

二、奶制品

达斡尔族人由于长期居住在嫩江草原上，善于经营牧业生产，所以牛奶、奶制品在膳食中，就如达斡尔尔人常说的"有奶不用吃菜"，占有主要地位。

1，"苏"——鲜牛奶。将牛奶挤下后，熬熟喝、泡饭吃。

也有的挤下的生奶子趁热喝或泡饭、泡 饽 饽、泡“拉 勒”吃。斡尔族人还认为大人、小孩喝生奶不上火、容易吸收。

2. “起嘎”——酸奶子。将鲜奶装罐，放在温热地方，经三五天发酵后，从盖的中间抠个眼，用带眼的耙子上下搅动，过一天或两天，这时奶油和奶水分解，把浮层的奶油捞出来，在锅内靠干水份就是黄油，罐里剩下的就成酸奶子。达族人家，一家打出酸奶子，亲属、四邻都共同享受，吃个鲜，品品味，比比谁家发的酸奶子香甜。吃酸奶子也有药用价值，老人、小 孩 闹 肚子，喝些就好，能补肚子。夏天下田铲地带饭罐子，装的大都是稔子米饭泡的酸奶子，吃了既抗饿解渴，又能去暑。

3. “艾日勒”——疙瘩奶。鲜牛奶发酵后搅动撤碎即成。吃起来又香又不太酸。到夏季，来了亲朋作客都要盛上一碗解解渴。平时吃“拉勒”干饭都愿泡“艾日勒”，因为它没撇油，更好吃。

4. “吾如莫”——奶皮子，其中又分熟的和生的两种。做熟奶皮子是达家人最讲究的东西，是奶制品中最美味的部分。在秋季，奶牛吃最好的草和料，出的奶子很稠，质量好，能熬出好奶子来。做法是把鲜奶子用大锅烧开后，用干牛粪作火炭，使锅底下保持一定的温度，锅里的奶子既不能翻开花，又有一定热度。晚上熬开，第二天早晨牛粪火炭也已熄灭，锅里奶子上边已凝成半公分厚的奶皮子，用两手各拿一只从两边插进奶皮下边，再对接两支筷子头往上平挑，一个合成半圆形的奶皮了就出来了。放在盖帘子上淋干后，就成熟奶皮子。它是最好吃的，一般都是招待贵客和住家姑娘、小孩吃。

生奶皮子——“推棍”吾如莫。将鲜奶子放在凉地方，搁一宿，第二天，上边就凝一层油皮子，用勺轻轻撇下来，装在容器里，就是生奶皮子，吃“拉勒”、饽饽都可用。

5. “瓦日勒苏”，母牛下崽后头七天的奶。每天挤的奶，

都装进罐里，发酵后就能吃，是营养最好的疙瘩奶。

6. “阿日其”、“额吉格”——奶酪。将发好的奶子，用锅熬开，等奶和水分解后，将奶疙瘩用“笊篱”打出来烤干晾开，待凉透后，把用手挤出来的奶片晒干就成了“阿日其”。若用木刻的模子扣出各种花样的饼，晾干后就是“额吉格”。这两种奶酪耐贮存，吃起来像炒的苞米花，越嚼越香。

三、几种腌制的家常菜

在达族人吃饭的桌上，常年必有几样小菜压桌，否则会被讥笑这家人不会过日子。压桌小菜主要有：

① “音得曾奴嘎”——菜末。秋天用好白菜切成两公分的小段，少放些小青辣椒、香菜、芹菜、蒜瓣洗净空干用碾子压成菜泥，随压随放盐，咸淡要适口，压好后用缸盛起来。每做一回一般都够从秋吃到春天，除了生吃也可以炖野兔、野鸡肉，可以炒小杂鱼以及牛羊肉的边脚料，也可以炒土豆丝、酸菜等。

② “尼敖曾”——盘酱。达族人自己做盘酱，把大豆炒熟，用碾子压成豆面，再用开水烫熟并稀释成酱状，放盐装坛，封严发酵七天即可食用。盘酱香气扑鼻，酱色喜人，可用葱和鲜菜蘸着吃，可以当炝锅作汤的鲜美调料。

③ “克日其莫勒奴嘎”——花菜。用白菜嫩帮斜切成丝，和胡罗卜丝、芹菜段、碎香菜一起用红辣椒和大蒜泥拌上，放好盐，用缸装好。从秋吃到春，一般都生吃，也可以炖野味或炖土豆。

④ “额沃奴嘎”——老太太菜。把小胡罗卜煮熟，白菜心用开水汆好切成段，拌上香菜段、红辣椒沫、蒜泥等，放好盐，装进小坛，放在锅台根上稍发一发便成。

⑤ “索日则”——韭菜花。进到八月，妇女们成群结队到野外去采野韭菜花。采回来以后，摘洗好，放上盐，用碾子压成原汁

的菜泥就成了。韭菜花是达族人吃手把肉、吃面食离不了的菜。

此外还有许多种家制小菜，像酸黄瓜、蒜茄子、豆角辣椒沫等等。

四、野菜的吃法

达族人采集野菜是传统的习惯，野菜既吃鲜，也晒干供冬春青黄不接时食用。

① “曼齐”——小根蒜。青草刚露头时，“曼齐”就出土了，这正是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时节，达族姑娘、媳妇们，绝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她们头裹白巾、围上整洁的围裙，三五成群地到地里挖“曼齐”。各家通常都用“曼齐”炒鸡蛋、做馅烙合子、炒土豆丝、卷荞面饼。秋天的“曼齐”挖回来大多腌上当咸菜吃。“曼齐”也是吃“拉勒”做汤少不了的菜。

② “苦木勒”——柳蒿芽。是达族人非常喜欢吃的野菜。开春后，柳蒿放出两三片叶时采回来，用开水汆后挤干，剁碎，然后炝锅，把剁碎的柳蒿菜、土豆块、煮好的芸豆一起炖。如果用柳蒿芽炖鱼，最好是用鲶鱼或“嘎牙子”鱼。先炖鱼除刺，再放上柳蒿芽炖一会儿。这是最好吃的菜。如果吃凉拌柳蒿菜，就把剁好的菜放上盐，加上葱花、辣椒油、小米饭汤，拌成粥样即可。凉拌柳蒿菜配上小米干饭，吃也吃不够。初春时节，风和日丽，是达族妇女出野外采柳蒿菜的最好时候，妇女们束装整洁，头围白毛巾，身系黑或蓝围裙，带上干粮、水瓶，还烟有袋，一路哼着小曲，有的放声高歌“扎恩那”（达族民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到了目地的地，一般是在河边，岗坡下，她们一边采着柳蒿菜，一边三三两两的叙着家常。忙碌一天，每人都背上一大袋，有的顶在头上，迎着晚霞，返回家来。采来的菜，吃不完就晾晒贮存起来留着到冬季吃个鲜。

③ “莽格则”——野小葱。长在沙包岗地里，像小葱但是

叶扁，也没有辣味，采回来，炒、炖都可以。过去在旧社会，苦难深重的达族人，野菜也是半年粮。除了以上几种，还有"可日勒"——灰菜、"巴勒额吾则"——线菜。小孩子们也有自己喜欢吃的零嘴，比如一开春就到地里挖"特木勒库"——红根吃，在村头墙根下挖"郭库莫勒"——"拉拉罐"吃。

五、常采集的野果和山货

达族人能吃的野果，在以前生长得满山遍野，在长期居住的嫩江畔，在沿江的起伏岗地上，长满了各种茂盛的野果。对这种地方，达族人叫"俄勒日"。"俄勒日"，上起嫩江发源地下至嫩江、松花江汇流处。江北是农田和草源，江中的鱼虾成群，江南却是各种果树成荫。每到夏季，大人小孩成帮结队地或去采集果实，或去打鱼摸虾。劳动所得除自食外，还能提供市场，增加收入。从四十年代开始至六十年代，由于人为的原因，自然生态被破坏，茂密的树林全被毁掉，水面已被污染，草原被开垦而所剩无几。

"俄勒日"出产的野果：

1. "挂勒斯"——山杏。山杏长在小灌木上，满山遍野都是，五月节前后铲头遍地时，就可以采集了。除了吃鲜，也可以剥掉核后拌白糖放上一两天，供老人小孩吃，既软乎又甜酸。

2. "尼牙莫勒"——桑粒。在初夏季节，在桑粒树下铺上一块布，只要用棍子敲打树枝，熟的桑粒就会掉到布上。它是又甜又香的野果，收获时间最短，几天不采，就都会落地腐烂。

3. "歆勒克"——灯笼果。长在连成片的小灌木上，夏季采集，果子又酸又甜，但不能贮存。

4. "扎木"——刺木果。也长在小灌木上，果浆是酸的，还带小绒毛毛。

5. "胡拉讷"——草莓。长在草丛中，初夏采集，是最

嫩且清香可口的小红果，但不能贮存。

6. “胡日勒”——山丁子。山丁子树长的高又大，像榆树，每到春季开满了白花。到秋季果子由绿转为了鲜红，是又甜又酸的肉果。采集回来，将小果捣碎做成小饼凉干，贮存好。也可以压成粉，夹在熟奶皮中吃，营养价值很高。

7. “昏普热”——山里红。类似小山楂，树像榆树大。深秋时节，采集回来保存好。每当饭后茶余时，老人和孩子团团围坐，吃“昏普热”，也是一种家庭乐趣。把“昏普热”装进大坛子里盖严，埋在地下，待快上大冻前取出来，“昏普热”已变得又红又软，肉也很厚了也最好吃了。在冬季，晚上吃过肉食或野味后，吃点“昏普热”既解渴又助消化。

8. “灭勒”——稠李子。树大，小果子好吃，清香可口。

9. “讷日”——橛柿。也是小灌木果。大家常带个桦树皮做的小桶去采集。小果子甜但有些涩。

10. “牙布”——菱角。水泡子里生长，小园叶浮在水面上，开小黄花，到秋季即采果实。把一大筐一大筐的菱角采回来以后，使用大锅煮热并收藏起来，到冬季切开硬壳，抠下雪白的果肉当零食吃。

有些野果子还可以晒干后压成粉，留着做为冲水喝的最好饮料。当然也可做成果酱吃。

山货：

11. “出出”——榛子。在深秋从山上采回来时是青的，要放成堆，用草盖好使外边的绿皮捂烂掉，然后把榛子晒干、炒熟。靠山住的达族人家，家家贮存很多“出出”，每当冬夜在听老人讲故事时，大家就砸“出出”吃。

12. 蘑菇是达族常年吃的干货，有“齐嘎莫格”——白蘑，“库克莫格”——花脸蘑，“哈勒斯莫格”——树蘑，“额吾斯莫格”——草蘑。入伏后，雨过天晴，老幼妇孺挎筐出去拣蘑

菇。一筐筐、一袋袋的蘑菇采回来，用线串起来晒干，就成了冬季和年节炒菜、炖肉、做野味的上等菜。

13．“巴科日特”——木耳。在柞木和桦木的倒木上，三年后就有木耳生长出来。依山的达族人家围院的障子上或院内贮放的木头堆上，到处长满新鲜的木耳，随取随吃，方便极了。多余的晒干后也常拿到市上去卖。

14．“给罗其”——黄花。嫩江两岸的大草原上，一到夏季，一沟沟地长满黄花。采回来的，以花苞为最好。黄花用开水抄一下再晾干，用它做菜，炖、炒、调汤都行。

六、日常渔猎食物

达族人历来善于狩猎，野味不仅吃鲜，还要晒干贮存，做成出远门带的食品。常见的猎物有：

1．“火日果勒”——野鸡，“陶勒”——兔子。过去达族的老人们都有养“喜瓦”——猎鹰的风俗。给“喜瓦”盖上小草屋，中间栓一根木桩，“喜瓦”就落在木桩上。一到深秋和初冬，就放出去抓野鸡和兔子，飞去很远也能听到“喜瓦”的铜铃声。主人跟上，将猎物拣回来，一天能抓到三四十。一般的达族家里都养猎狗、猎马，到冬季一遇下雪就出去撵野物。收获回来的野鸡和兔子做“合鲁”巴达的鲜汤。

2．“博登”——鹌鹑、“依套”——沙半鸡。在冬季老人们遇有风和日丽的天气，就赏出去下套子逮野禽，而赶“依套”最为有趣。大雪地上常落有一群“依套”，老人就放一个铁丝围的大笼子，用白布围上全身，然后从一头慢慢驱赶，成群的“依套”就傻乎乎地往笼子里走，只要把长绳子一拉就都扣住了。山里的“库得”——飞龙、“特格嫩”——乌鸡，主要是下套子捕捉。这些都是老人的好酒菜。至于“主日”——狍子、“者仁”——黄羊、“河里勒格”——野猪、“包古”——鹿等大动物，通常都是骑马追猎。

达斡尔人世代居住在嫩江边上，素有爱吃鱼的习惯，一年四季捕捞，会用各种渔具。嫩江出产的上等鱼是“敖古”——敖花，最讲究的是“克勒特格”——鲫鱼，其次是“木日格”——鲤鱼，还能上数的是“阿木日”——草根鱼、“好勒布日”——哲里鱼、“拉格”——怀头、“他库”——胖头。这些鱼，常是炝锅后白水炖保持原汤的鲜味，其次是煎吃。其他杂鱼，如“碟古”——鲶鱼，“华日”——黑鱼，“齐日齐木”——狗鱼，“爱快”——“嘎牙子”，除炖吃，还常盐卤后晒干贮存起来，随时蒸、炖做为下饭的菜。但对黑鱼、鲶鱼、老头鱼，一般人家禁吃，老人、妇女、病人吃了怕犯老病，小孩子吃了更不好。小杂鱼很多，“布格勒扎日莫”——船丁子，“其嘎扎日莫”——白漂子，“苏嘎斯”——黄姑子，“嘎苏克勒博”——葫芦籽等等小鱼，常是煎咸鱼吃，也晒干后随时蒸着吃。

达斡尔族人的婚姻习俗

鄂 庆 祥

达斡尔族实行一夫一妻制，极少数上层人物有纳妾之举，其名声也就可怜了。

达斡尔族由家庭包办的婚姻，在过去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为反抗这种包办而造成悲剧的有之，因私下恋爱受孕 遭 到 本“莫昆”处死灭迹者，亦有之。

家庭包办婚姻中也禁忌近亲通婚，认为这是血缘倒流，婚姻的事还注意要辈分相同，一般也不与外族通婚。在齐齐 哈 尔 地区，后来也有因为择亲困难而在同一哈拉的远族亲中通婚的，有因家境贫寒只好在穷表亲之间通婚的，以及和鄂温克、蒙古、满洲等民族通婚的。

尽管婚姻属父母包办，但不拿儿女做交易，按婚俗由男方所纳的彩礼，除了为报答母乳养育女儿之恩的乳牛之外，全数随女儿带走，甚至还要再尽可能地为女儿添置许多。如果真出现了见钱眼开的家长，肯定会被人指责为出卖亲骨肉的败类。

订 亲

可分成指腹为亲、娃娃亲、童养媳、娶女婿、成年婚。结亲方式可分为双方父母直接商定和媒人中介两种。

指腹亲　指儿女出生前就定下的婚约，在知心好友间常有这种举动。当双方婴儿出生后，都是男孩结为义兄弟，都是女孩结

为义姊妹，果真是一男一女，就结成未来的夫妻。

指腹亲的婚约形式是，男孩父亲携酒去女孩家，给女孩家庭最高长者如祖父母敬酒致磕头礼，以其女方家庭最高长者许婚视为婚约成立，双方从此严格恪守婚约。

娃娃亲　女儿还在幼小时，由双方父母包办婚约。这种娃娃亲，在达斡尔族婚约形式中占居首位，是亲套亲包办婚姻的延续。婚约形式与指腹亲相同。

童养媳　女孩幼小时失去父母，因家贫无人照料者，把女孩托交同龄左右的男孩家作未来的儿媳，到了十五至十七岁后成婚。这种婚事一般不常见。

娶女婿　女方父母年高又无子嗣或是虽有男孩但年幼不能养家，经媒介绍，可把女婿娶到家，以补家庭劳力。这种婚姻一般不受任何彩礼。一旦儿子成人能担负起抚养父母义务时，女婿可以分出去另过。

成年婚　在清代以十五岁入旗视为成年，民国以后，以十七岁为成年。成年婚就是指男女双方达到成人年令以后的婚事。成年婚一般富余家庭儿女占居多数，要求彼此门户相当，贫富挑剔也较严。

成年婚一般求媒人中间作媒，而且是由男方家庭求媒，求一位结识面广并在当地德高望重者，或是与女方有亲友关系的长者作媒。

被委托的媒人，携带红纸瓶塞的喜酒，前去会见女方父母，女方父母一见就知道是红媒登门，以烟茶殷勤接待。闲聊片刻之后，媒人便借用主人家酒壶盛满喜酒，然后斟满盅，向女方父母敬酒。女方父母总是先发问一句："你敬酒是有何用意？"媒人就婉转说明来意："男女成人男娶女嫁，是天伦之道，你家有一位拿剪子会做巧活儿的美丽姑娘，我知道有一位射箭万发万的中骠悍男郎，为合拢这一对男女，为亲睦彼此的门宇，我特意登门拜

访，我甘心磨破靰鞡底，我情愿累酸腰和背，为这件婚事效劳，今天得见您二位，怎么能让我空手而归。”媒人详细介绍男方的年龄、长相、人品、健康以及家里人口、家产等情况。如果女方父母认为可以通婚但是家里还有最高长者时，就将斟满盅的酒转请最高长者接受喜酒，媒人也过去致以磕头礼，以表认亲。再过几日后，媒人率男方又携带酒肉到女家，向女方父母及长者敬酒致磕礼，达语叫做“贺客目如格贝”，即致磕礼订亲之意。然而，在两地生疏素不往来的双方家庭之间，为谨慎从事起见，女方父母在媒人面前一般不表态，媒人有时为此跑上三、五次。女方对男方及其家庭，从侧面充分了解后，若认为这桩婚事可订时，才接受敬酒磕礼。女方要求的彩礼一般都是在接受“贺客目如格贝”订亲礼之前协商定妥，男方必须在婚前给女方送过彩礼去。

“贺客目如格贝”是订婚的前奏曲，是婚约的一种形式，一旦男女双方有了婚约，受到社会嫁舆论的约束，第三者再不准插入已婚约的双方。过彩礼中间，因男方失信或是无力如数缴纳彩礼者，有时受到女方的冷遇，也有解除婚约的。

过 彩 礼

过彩礼仪式，在齐齐哈尔地区称为“阿木布库勒贝”即过礼为信之意，在布特哈地区称为“察恩特依奇贝”，后者称呼较为普遍。过彩礼的多寡，主要取决于女方，也取决于男女双方家产状况。

在富裕家庭的彩礼，一般均有乘马一匹、乳牛一头、犍牛一头、活猪一口、酒一坛，还有羊羔皮袄、夹单旗袍、金银首饰等。贫困家庭的过礼，一般是乳牛一头，酒肉若干和少量婚事衣装。

过彩礼仪式，由女方选定吉日举行，男方父母一般不去参加过礼仪式，而是请富有阅历而又机敏的同辈或长辈为代表，在媒

人陪同下，由堂叔或堂兄赶车前往，女婿乘马跟随于车后。礼车牵着的牛马，都披戴红布条的“哈达格”，酒坛贴有红纸，过路人一见就知道这是礼车。

当礼车到达女方家时，待聘的姑娘要到别处回避。男方陪来的人马常是假托借地歇脚要求将礼车赶进院内，女家的人便用各种借口拒绝开门，这时礼车上的人员一律下车，在大街等候。门内门外的舌战中，男方总是谦让一些，但双方仍然力争以言语技巧胜过对方。例如男方说：“途路遥远天气严寒，请主人留宿，解除身腰之寒”，女方答：“不速之客临门，飞马入院圈不容，龙牛进圈门不容，有何要事快说清”。男方说明来因之后，从腰包取出喜酒，向女方接应人捧杯敬酒，女方接应人还会问：“试问您敬的是什么用意的酒？”答：“两家亲事有良缘，两家亲事代代传，今携牛马礼物送亲人，别嫌弃薄礼请收下”。女方长者认为过的彩礼可以，便打开大门放进礼车。若认为彩礼还不太满意，就有意唆使接应人数落男方：“老马小马都是马，一步一晃荡的‘领勒布热’（有缰绳的乘马）怎么能拿得出手？大牛小牛都是牛，拉不动车儿算什么牛，挤不出疙瘩盆奶的算什么‘绰斯’牛（补偿岳母哺育女儿所耗乳汁的乳牛）”。等到男方再向女方道歉时，女方家庭主人便出院说情了：“双方有缘的结为亲，什么物厚物薄的，天气寒冷，叫客人在外边挨冻很不应该，赶快请进院来”，这才允许进院。等待女方莫昆长者对礼物无争议时，由女方长者吩咐卸礼，

“阿木布库勒贝”（或“察恩特依奇贝）过彩礼仪式，在女方氏族内部很为重视，要请本“莫昆”长者以及所有亲戚来参加过彩礼的盛宴。宴席是先上糕点奶茶，后摆酒席。席间有两方面的人带领新婿，按辈分次序向在坐的女方长辈和岳父母一一敬酒，行磕礼认亲。次日再由女方亲友陪同到女方亲友及长辈家拜访，各家都拿出一份小礼物回敬。当女婿启程返回时，岳父母要

给男方亲家赠送肉酒等回敬，给女婿的荷包袋里装进钱，有的岳父还把心爱的乘马送给女婿。

过礼是超越婚约的正式订婚形式，一旦订亲过礼完毕，便受到约束。

送结婚衣物通知婿日

男方选定结婚吉日后，二次去女方家过结婚衣物，通知结婚吉日，并携酒肉设宴酬谢女方父母，达语叫做“甘珠格乌库贝”或“托列依奇贝”（即送马鞍上驮的礼物）。

“甘珠格乌库贝”一般在婚前两个月左右进行，给女方留有准备结婚衣着的时间。男方所送的衣着及大件，大体有羊羔皮袄、绸缎、金银手镯、耳环、戒指等，女方送物有各种衣物、被褥、挂联、红衣柜“浩如告”一柜两箱四匣一套，另有女方亲友们的结婚赠物。有的男方因家庭生活贫寒，为应付“甘珠格”的场面，就借用某些衣着项数，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事，男女方事先都能有谅解。

在“甘珠格”仪式上，男方设宴招待女方父母及其长者，这是酬谢女方父母为抚养女儿所费心血的一次宴会。在席间男方代理人，向女方长者敬酒的同时，通知结婚的大体时间，征求女方的意见，婚日一般定为双日。

达斡尔人对婚姻衣着的打扮，非常讲究，请来手艺技巧的姐姐嫂嫂，紧张地为新妇衣装绣花套边、给枕头及夹鞋绣花等，有些风景刺绣如松鹤图、鹿松图等工艺，甚为引人夺目。“艺巧工细”，以取得男方亲友的褒扬为荣。

结　婚

达斡尔族女性结婚都选在十七、十九、二十一、二十三岁等奇数年，如男方也适为奇数岁，那么两奇相对配成偶，就太好不过

了。后来由于同族间婚姻范围缩小，只有女孩仍守成规，对男方就早已放宽了。

男女双方订好婚日后，男方亲友帮助杀猪宰羊备酒席，准备迎新娘。女方则邀妥送亲者男女各三人，达语称男者为“华达”，女为“霍都格”，一般都是新娘的长者。“华达”中间的首席称为“图荣华达”或称“达华达”，次者称为“结奇华达”，第三位称为“古他日华达”；“霍都格”也如例并分别称为“图荣浩都格”、“结奇浩都格”、“古他日浩都格”（或“乎珠日浩都格”）。唯有这第三女送亲人兼任伴娘，也称“乌根库特勒格霍都格”。以上六位都从有儿女、夫妻健在的亲戚中间聘请。女方家只派新娘兄弟辈参加婚礼。

送亲的喜车在前一天午夜过后离开娘家，路途近者可在凌晨起程，路途遥远者，可在半路投宿或赶至新郎村屯某家借宿。

喜车一般备有三辆，前一辆搭有红篷由新娘和伴娘共同乘坐，后面装载一些嫁妆，由新娘近亲弟辈担当车夫，第二辆苇棚车由另两位“霍都格”乘坐，第三辆由前两位“华达”乘坐，后面装载一些红柜等家俱，第三位“华达”与新娘的胞弟等人乘马跟随婚车之后。

送亲车行到新郎村屯三、五里处都要停下来，生起篝火休息等候，少量进些酒食，解解饥寒，达语称为“它恩格贝”即等待之意。如遇来往路人，不管相识与否都会受到邀请招待。

男方认为迎喜车时辰已到，便派一老一少骑手和新郎前往迎接，达语称为“敖如套鲁”即派使者之意。迎上喜车后，新郎（齐齐哈尔地区新郎一般不接喜车）一一向女方长者致礼请安，老使者则上前问寒问暖，从怀中取出酒壶，把两只盅托在碟上，由另一青年使者斟上酒，从首席开始顺次向“华达”“霍都格”敬过去。新郎则向其余送亲客人一一敬酒问候。有些地区，女方送亲的队伍还故意不理会男方使者的迎接，继续驱车前行。达种情

况下，虽然经男方老使者的恳求停了车，但是，能言善辩的伴娘常会端出点有趣的“难题”来，因此还得磨上一阵嘴皮子，然后才再互相亲切问候，接受敬酒礼。这么办是为了“表示”女方娘家的威风和身价。

“敖如套鲁”迎喜车仪式之后，就迅速派青年使者驰回屯里报信，喜车则由老使者引路，新郎随车殿后，重又启行。

喜车进屯，必须是迎太阳方向而进，因为一切邪妖都害怕光明。新人拜天地选在卯时，卯为兔，借寓夫妻温顺柔和。喜车进屯所经过的井口要用红布遮上以防新娘灵魂坠井。还有，所有无子女的夫妇、孕妇及孤寡女人、与新娘子生肖相克者，在新人拜天地之前都要一律实行回避。

喜车到达男方大门口时，除新娘与伴娘之外，其余送亲人员均在大门外下车下马，由男方的人向女方贵宾们一一敬酒问候，再请客人进门并派人将喜车赶进院内。男方亲友在院中男左女右站立两侧夹道欢迎，在鞭炮声中伴娘搀扶新娘下车，开始举行拜天地仪式。新郎新娘面向南，并跪在拜天地台前行三磕礼，然后由伴娘搀扶新娘踏着红布毯走向新房。进房门前，新郎以藤马鞭挑去新娘遮面的红巾，扔在房檐上，伴娘再引导新娘背向里盘膝坐在南炕的西南角上。

新娘入室后，便开始招待送亲来的女方贵宾。先上奶茶和糕点，再由男方父母出面向女方贵宾敬“接风酒”，互相问候，然后就排设迎亲宴。南炕为女宾，西炕为男宾，北炕为车夫席，女方首席“霍都格”和“华达”各就上座(席桌以中间者为贵)，其余送亲的客人也都请到每个桌的上座，各桌都由身分相应而胜任接待的男家亲朋作陪。这个宴席要以全羊或全猪招待，即将带骨节的肉，分部位盛于方盘中，南炕上胸骨肉（“额日初”），西炕上肩胛骨肉（“达勒”），北炕上胯骨肉（“走吉”）。肉上都插有几把猎刀，桌上摆放韭菜花末、菜沫、虾酱等调料供大家

使用。肉食过后，便是饭菜席。席间，作陪者致词劝酒，宾主间还不时地说些善意而吉祥的风趣话助兴。

宴席进行期间，新娘开始下地亮相。新娘一般是头戴有花翎的“勤子”帽，身着艳丽的镶边旗袍，脚穿绣鞋，手持白细纱巾，端立在室内门的北侧。这个时候，总会立刻在室内外出现一次争睹新娘芳容的小小高潮。

继而，新婚夫妇要一同到席前装烟敬酒，按辈分逐一向男方、女方在座者认亲，对长辈行磕礼。此时，新娘也要正式拜认公婆。长者此时接过敬酒，先用指沾酒弹出三次用以敬神，然后饮干并向新婚夫妇祝福，达语称“西若勒格”或“西若勒格乌斯格”。祝福语没有什么成规格式，常见祝福内容有：“月牙儿喜盼月圆时，两木相合必成元，天赐良缘贵在久，夫妻相亲如一人”；也有的借比喻告诉要珍爱获得的幸福，“牛郎织女隔河不相会，嫦娥望人间珠泪涟涟，这样那样是命运安排，人间福祸全听凭天仙，你二人今天完成婚配，从此风雨同舟共命运，愿神佛多多爱护保佑，让鸳鸯偕老直到白头。”

席间新郎的内弟辈常常乘机故意地将酒盅或酒碟偷藏在怀中，准备在告辞时再戏弄戏弄姐夫。

招待女方送亲客人的席宴结束，便开始准备送行或安排留宿。客人启程时，男方的父母要送上给亲家的酒肉并立于门内侧给客人敬酒话别，新娘新郎与男方亲友在大门外再敬酒相拜，热情欢送，新郎还要乘马护送到屯外。常在这个时候，偷着藏了盅碟的内弟辈开始作弄姐夫，而最后也常是姐夫依照要求下保证，什么“保证疼你姐姐”“保证到时候送去住娘家”等等，至此，才能把拿来的东西“完璧归赵”。

女方客人走后，开始招待男方的亲友。按辈分次序入席，南炕设女席，西炕为男席，北炕招待朋友。席间，新郎新娘逐桌逐人敬酒，接受磕礼的长者有的不但嘴上祝福，而且在酒碟里放进

钱或首饰送给新婚夫妻。新郎新娘敬酒磕礼时，除长辈和年老的兄长之外，其余的人都起立回避。敬酒过后，新娘仍退下去恭立在屋门北侧，直到宴席结束。

婚礼毕后，一般亲友退席各回各的家，新娘以装烟礼而送别。

达斡尔族没有闹洞房的习俗。在齐齐哈尔地区达斡尔族农村，新郎新娘入寝之前，要举行“欢特格浩勒薄贝”的仪式，即以轮流饮干喜酒誓为终身夫妇之意。这个仪式由平辈中有儿有女的一男一女主持。在炕桌的四角，新夫妻相向对坐，男女主持者也对角坐下，先由男主持者将酒碟上放置的双杯酒捧给新郎饮干，之后由女主持人接过去并在饭桌面上绕一圈，再同样向新娘让酒，说是这样能给下辈子女招来吉祥。然后，盛来滚热的“拉拉”粥饭，由男女主持人用木筷挑些送进新婚夫妻的嘴里，至少要吃下一口。最后由女主持人代为铺妥被褥，放下幔帐，整个仪式就算结束了。

达斡尔族有敬老爱友的风尚，对未参加喜宴的长者，事后都挨家送上喜酒和饭菜，达语叫做“散仁特沃贝”。

婚后三天，由妯娌领新娘到长辈亲友家认亲，施以装烟及磕礼。

新娘娘家也同住一屯者，七天后可以回娘家探望，隔屯路远者，一般在婚后二十九天（即阴历一个平月）由新郎亲自赶车送妻回门。回门住亲一个月后，由女方兄弟套车送回婆家。另有女方亲友前来婆家认亲者，都由婆母准假，可到认亲长者家住亲数日，认亲的亲友一般赠送衣物一件。

离婚与再婚

达斡尔族旧俗，将离婚视为败坏门声，是不孝不敬的不道德行为，所以，在达斡尔族夫妻之间，一般不轻易离婚，离婚率一

直是微乎其微。因家庭包办婚姻，配偶的双方全是凭天由命，在年令品德健康状况智力等不相称的情况下，不能不怨恨父母，但同时却又忍受其痛苦，这样甘愿做终身夫妻者甚多。

女性因受婆母的虐待或遭到丈夫的痛打而跑回娘家躲避之例，也不少见。经过双方“莫昆”长者之间的协调，男方做出不再虐待的保证时都能和解并把媳妇接回家。男方背弃诺言再次虐待时，女方“莫昆”兄弟会去强行接回姑娘。男女双方“莫昆”长者如果又加调解时，女方“莫昆”氏族常要提出要求条件，如让男方在女方祖坟前磕礼宣誓改正等。一旦屡教不改，女方可以提出离婚但不退赔任何过礼财物。

女方无故提出离婚时，往往被娘家赶出来，若发现女方与另一男性有不正常往来时，会遭到“莫昆”氏族家庭的痛打并强行送回男方家庭，若再不安分守己，允许男家给戴上脚镣实行软禁。

男方无故提出离婚时，男方“莫昆”氏族常给予谴责，也允许女方“莫昆”兄弟们前来“教训”男方，男方“莫昆”氏族不加干预。

因为达斡尔人最厌恶离婚行为，所以在多次调解之后实在不可愈合的条件下，将聘请无儿无女的文化人作裁决。为了防止污染其他青年，都是选择野外无人之处由双方在离婚书上画押，各执其半以为离婚凭据。达斡尔人将这种办离婚的地点，认为是晦气不吉之地，在民间有“写离婚文书之处三年不长草”之说。离婚后子女全归男方。

在旧社会，提倡妇女守贞节，丈夫去世要终身守寡。对于个别居孀终身者，地方政府呈报朝廷，死后树碑立坊，常题为“竹考松贞”，“流芳千古”等词，鼓励女性终身守寡。而男性则不然，主妇故去不久，另娶女性为妻，自以为然。当然，守寡后因自身无力抚养儿女，在男女“莫昆”长者规劝下再嫁者也是有的。但是再嫁者微服满三年孝期，否则，将会遇到男方“莫

民”的干涉。

到了新社会，达斡尔族妇女从族权父权夫权的统治下彻底解放出来，按照婚姻法男女双方自主地选择对象，那种繁琐的婚俗早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达斡尔族人的丧葬习俗

郭 庆 祥

达斡尔族的丧葬旧俗，里面说道多，也繁琐，就连“死”字都忌讳。比如，长辈死去叫“成佛了”，少辈死去叫“少活了”，婴儿死则叫“没站住”。如果萨满死了，就说成“上尚德了”（上了神坛之意）。

坟地与葬制　达斡尔族每个莫昆原来都有公共的“蒙干”（坟地），个别富裕人家单有自己的“华然”（坟墓），并树碑立传。近年来，随着土地开发利用，以莫昆为单位的“蒙干”少了，只有山区还有保存着的。

莫昆墓地的埋葬安排，是顺着岗坡，高处埋先辈，往下世代相接，兄左弟右，夫左妻右。亡者都是头部朝北安放。

对于死者，由于死因不同以致葬法也不同。正常死亡者为土葬，而因难产、传染病或恶病、雷殛死亡者，还有暴徒、客死后尸体腐烂或肢体不全者，均行火葬，骨灰不能进莫昆公墓。终生未娶的单身汉，死后也不能进莫昆公墓，以避讳人丁不旺。出天花或麻疹死的小孩，包裹后放在村外支起的木架上施以天葬，百日后就地收拾掩埋。萨满死亡，要在其生前选定的地方支起三个人字形木架，上置棺柩，是为风葬，过几年后再将遗骨埋入土里。

停灵与入殓　对中年以上的死去者均办丧事，这里只举长者去世为例加以介绍。

老人咽气，先给开光正甲、更衣袜穿着，然后将遗体头南脚

北停放于西炕沿下的铺板上，板上有枕和褥，头面遮有白布或纸。亡者头前设小桌，供着煮熟的鸡和饭菜、糕点。在遗体右侧身傍放上点燃的烟袋，由儿子、儿媳及时装换新烟。儿子头系白布，儿媳披着散发，要分别跪在亡者足侧和头旁守灵。守灵的女儿位于亡者头前，长辈则可以坐于炕上。夜间供桌上置放一盏点着的灯。从早到晚，还要三奠三哭哀。室内停灵至多三天，这期间严禁猫、狗入室，免得亡魂受干扰，同时派出人去驰告外地亲戚，并宰杀家畜备用。前来吊唁者，近亲行哭吊，远戚晚辈则向亡者行磕头装烟礼，遗眷陪以哭礼并为来的长者敬烟。

停灵的第三天，用箔纸剪金日、银月各一个贴于棺内两侧，左为日右为月，以示亡者永享天神和光明保佑。等到近亲聚齐后就开始入殓。先抬起遗体在室内由东面西循太阳出没方向转三周，再脚在先抬出室外，殓入棺内，其生前所用餐具、烟具、首饰及心爱的遗物也同时放入。殓毕，将灵柩停放在房前西侧搭好的灵棚内，灵前设桌供放祭馔，由子、媳继续守灵直到出殡。

达斡尔族在以前，是用桦树皮制成筒形为棺，使用木棺则是后来从汉族方面引用的。

祭灵与埋葬　出殡选吉日并举行仪式。仪式上，到场者按辈分和关系站位，前排为女儿，二排为儿子，三排为侄辈，四排为近亲，五排为亲友，晚辈跪着，平、长辈站立。先由一位与死者同辈分并懂满语的兄长跪在祭桌前宣读告灵文，文中包括死者姓名、年令、卒因及卒日、籍贯、简历、祭牲和焚化箔镪数目、亲友赙仪等。读毕，焚化金银箔镪和告灵文，在场者泣声举哀。在这同时，执事人卸下灵前备妥的套车的马，由人牵出院外，经死者儿子洒酒在马的四蹄上并磕头后宰杀，以取殉马之意。

出殡时，由长子在前，其他亲友在左右抬灵去墓地。如路远，也可以车马代之，马缰由长子扛在肩上牵行，其余的人随行于灵柩后面。如果途中遇有河水，则要祭灵，以便使亡者灵魂安

全渡过。当灵柩放进墓坑以后，先由长子在四方各培一锹土，然后大家动手填土。这时，将祭供的食物、死者常用的衣物和亲友送的冥钱，也都在墓前一同烧掉。

送葬归来，要把卸下的灵车在村外或院外掀翻置放，人们也要从门前点燃的火堆上迈进来，都是为了避免死者的灵魂再跟回来。此时，死者的所有子孙后人都在跪在大门两侧，向参加葬礼的亲朋磕头致谢。然后请大家入室，再以殉马的心肺和牛马或猪羊肉招待，再次敬酒磕头表示感谢。

死者如果是女性，那么葬礼过程中娘亲地位就最为显要了。他们通常携带金银箔纸和钱款等赙仪来参加，还常带一口猪来用为献祭。娘亲可挑剔葬礼中的差错，所以在接待中格外殷勤谨慎。

送葬当晚，近亲中的年长者都留下来守夜，葬后第三天，直系亲属去坟前烧纸、培坟。以后每逢清明、七月初七、都要去坟前祭扫。

达斡尔族人十分注重丧事。过去，当家中有老人去世时，因家境贫困无力安排，可先予安葬，以后有条件时则一定要补办。

服孝　服孝（“申讷格温苏贝”）从开吊之日起，因与死者辈分、亲疏不同，所以服期和孝服也不相同。

例如男性长者去世，妻子及子女和亲侄、侄女穿全身白孝服，服孝三个月，脱孝后再素服至三年。死者的三代叔伯侄和弟弟，孝服是只腰系白孝带，男经左肩女经右肩跨过，带端下垂至脚踵，服孝两个月。莫昆近亲只在腰上系孝带，带端垂至衣的下摆处，服孝一个月。

服孝期内，妇女不佩戴手饰，男子不理发，不参加婚礼或娱乐活动，不与他人吵架，不受磕头礼，不外出拜年，不出嫁，而且三年内不贴年画和红对联(可贴兰对联)。在孝期第九十九天，举行祭奠活动，由近亲参加，祭后脱下孝服捆成一束并在烧纸的火焰上摆晃三次，从此孝期结束。

此外，在头一年的除夕夜，还要在死者生前的寝位铺置枕褥，旁边桌上摆上祭品，枕下插放点燃的烟袋，由儿媳跪着守护表示侍候之情意。凡是来拜年的晚辈都向死者的寝位磕头敬酒，表示怀念和问候。寝位祭供在过了午夜后收起，第二天初一早再摆放，止于正月初三。第二年不祭，第三年必须祭，以告结束。

解放后，达斡尔族的丧葬已移风易俗，变化很大了，居住城郊的已实行火葬，有害于公共卫生和能传播疾病的风葬已不再见了。

达斡尔族的居所

鄂 庆 祥

达斡尔族由黑龙江左岸迁徙嫩江两岸后形成许多村落。达斡尔族在居民点地形的选择、房屋结构和设施方面，均有其民族特点。

一、屯居址选择

古老的屯子都座落在后有山林，阳光充足，靠近江河的河谷平原上。依山便于狩猎，又能采伐木材和砍取烧柴，傍水便于捕鱼，又能饲养牲畜，而且利用河谷两岸的夹谷平地或丘陵地带耕种庄稼。屯基宽阔，因此也便于各家选定房基，并圈占一定面积的园田地。每家房屋后面和左右两侧是成片的园田地，周围用土垡子或泥土砌成围墙，山区则用柞木、桦木或柳条篱笆为障，以防畜害。

屯内各家房屋成行，街道笔直，很是整齐。

二、院落配置

院套四周多用泥土和土垡子砌成高墙，山区用木材或柳条编笆。院内有住房、仓房、碾房、畜圈、猪舍和狗窝等。院门有单层或二层（大门或二门）。富户的正房有三间或五间，座北面南。两侧是厢房、仓房和碾房，西南、东北、西北是畜圈或猪

圈。有的还在大门两侧建有耳房，中间为院门。

三、住房

一般家庭的住房以二间为普遍，三间也不少，五间则不多。过去人口多的家庭也盖厢房作住室。二间房，东间是开有房门的厨间，沿北墙盘有池式火炕，用以干燥谷物，西间为住室。三间房，东西两间为住室，中间是开有房门的厨间，沿北墙盘有池式火炕，用以干燥谷物。达斡尔人以西屋（称“博德格日”）为贵，盘有南西北三连炕，上面铺有炕席，边远地区或贫者则铺桦树皮。南炕东侧炕头为长者起居位置，贴墙放置着两头开门、中间是空格可摆放酒具杂物的“群妞勒”（类似炕琴柜），柜顶上摆设座钟、掸瓶等。西侧炕柜旁为女儿的位置。东屋（达语称“给雅鲁库”）由已婚儿媳居住。西炕为客座。兄弟多者，分别住厢房。

各家南炕西侧和西炕北侧（东屋在南炕东侧）都放有“霍如古”（炕柜）。“霍如古”的顶上配有同样木质色泽装饰的“皮占”（对箱）和四个“可义阿机”（小箱）。

达斡尔族的房子以多窗著称，家家开有西窗。窗户多用“高丽”纸从外面糊，然后喷豆油，使其透明耐雨，室内又显得明亮，现在，纸窗已经过时，基本上被玻璃窗取代了。原来父子不可分居的习俗也已改变，不少父子开始分居，所以盖房单独组家庭的越来越多。

达斡尔族的住房都是草房。建造房屋，先堆起一尺到一尺半的厚土，夯实地基，然后埋设柱角，后上房架子。先上大柁、二柁，后上檩子，在檩子上每隔一尺多远横钉杨木或松木椽子，椽子上铺柳笆或芦苇后抹二、三寸厚的羊芥泥，再上苫房草。房屋的墙壁用垡子或土坯砌成，然后里外抹平。有的房屋用马架子型的木架压在房脊上，以防苫房草被风刮散。

四、仓房

达斡尔族建造的仓房（“它日特”）是别具一格的。仓房底都是离地面二尺多高架起来的地板，仓壁直到房檐都用圆木嵌刻垒起，顶部同建房屋一样有柁、檩子、椽子，盖上苫房草。这种仓房通风好，防潮湿，存放粮食不易霉烂。

从民国以后，木材的利用面越来越大，木材也越来越珍贵，圆木的“它日特”已成为稀有的建筑物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达斡尔族居住的村屯出现了砖瓦结构的房屋，房屋造型雅致，室内宽敞明亮，达斡尔族的房屋建造已逐渐跨入了新阶段。

达斡尔族的房屋和庭院

乌力斯·卫戎

在明末清初，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族，已经能建造既舒适又讲究的房舍。一六五〇年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头目哈巴罗夫在日记中写道："阿穆尔河上游有自称达呼尔的人居住，他们从事农牧业生产，那里三、四十里地就有防备很好的城寨，城寨里有石造的建筑。窗户上糊的纸是他们自己造的（按窗户纸是从高丽国交换来的——作者）。有的房屋住六十人以上。"这是对达斡尔人房屋进行比较真实描述的最早的资料。

达斡尔族的房屋是起脊式、有骨架的草房，达斡尔人称之谓"雅曾格日"。房屋不仅南面有窗户，而且西面也开窗户，这样室内光线充足。现将达斡尔族房屋的建筑、屋内设置、仓库院落等做一简要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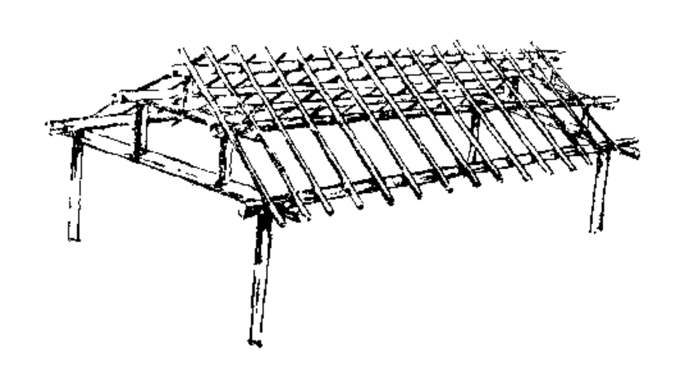
房 屋 建 筑

首先是选地址。一般要选在阳光充沛，能挡住北风的山丘南坡，如果面对平原，距江河较近，或不用挖多深就能出水的山脚则更为合适。

其次是打基础。选好地址后在其上面堆一尺到二尺厚的土，再打夯加固，这样做是为了防潮湿。然后根据建房的需要，挖几处二尺到三尺的深坑，准备埋"托瓦拉嘎"（房的梁柱）两间房

要挖六个坑，三间房八个坑。坑底要垫好“潮乐”（柱脚石）。房柱入土的部分要涂上松子油，再用桦树皮包裹好，防腐蚀。房柱周围要填草木灰和土，再加以夯实。

三是搭房架。达斡尔人建房先搭房架，后砌房墙。搭房架的方法是：按事先勾画好的大约四十五度角的房架要求，把“太布”（大柁，也称大梁）横搭在已埋好的房柱上，两间为三根，三间为四根。然后大柁上竖两根小立柱，再搭上“文沁太布”（二柁也称小柁），上面再竖一根柱子，呈“立”字形。柁立好后，先在最上端的立柱上搭上“果勒尼若”（脊檩子），在二柁两头搭上两根“沟尼若”（二檩子），在大柁两头，紧挨房柱的上面搭上两根“保格尼若”（近檩子）。柁梁和檩子搭好后，开始往檩子上按一尺到一尺二寸间隔的要求，搭上“沙日嘎拉”（椽子）整个房架的搭成不用一根铁钉，都是用榫子接合而成的。



四是篷房顶。在房顶椽子上复盖一层用柳条编成的“海吉”（柳笆），也有用芦苇编织的。柳笆上再用羊芥草合成的泥抹平，厚度一寸左右即可。“海吉”上面铺上“嫩玻”（苫房草），把切成约二尺长的苫房草，从房檐处往上铺，每铺一层要

用泥压住，一直铺到房脊两边的苫房草交汇并用绳捆住，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马鞍形木架压住，以防大风将草刮跑。富有的人家在房顶两侧，顺着房架钉有人字形木板，上面饰有花纹图案，有的还有精美的雕刻。

五是砌房墙。达斡尔族砌房墙不用土坯，而是在草甸子铲草皮为坯，达语为“华柯”，或是用沼泽地挖来的塔头，达语为“玻托勒”，也有的用芦苇根繁密的土皮。无论用哪种当砌块，都要切成一尺长、八寸宽、六寸厚的规格，以便砌成上下约二尺厚的房墙。为了防御冬季寒冷的西北风，一般北墙都再加厚半尺。这种墙壁干透后很坚固，能起防寒保温作用。房墙砌好后，用羊芥草合成泥里外抹好，房的里墙再用细沙泥找平抹光，最后用白土浆粉刷洁白光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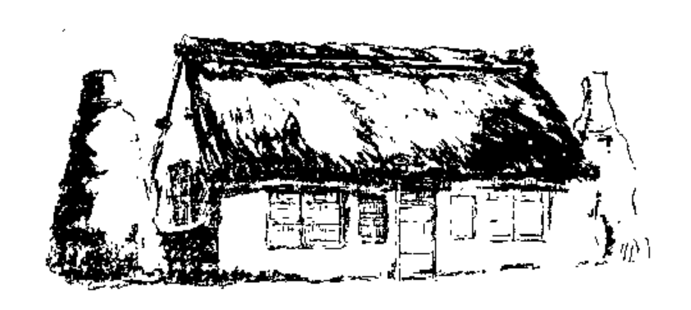
六是安门窗。砌房墙的时候就把门和窗砌在里面。门有里外门，外屋门就是房门，都是单开的木板门。窗户为木格窗，南面、西面都开有很大的窗户，一般要求两间房南面开两扇窗户，西面开两扇窗户，中间房门两侧也各开一个窗户，三间房的窗户就更多了，窗户多，采光好。木格窗框上，从外面糊“高丽纸”，这种纸坚固耐久，纸上再喷洒盐水拌成的酥油，既能提高亮度，又增加了防御雨雪的能力。

七是垒烟囱。达斡尔人在房子的南山墙东西两端约五尺远的地方，各垒一个烟囱。烟囱脖从屋里炕洞接上去再连结到烟囱底部。烟囱砌成底大上小的圆锥形，要高过房顶，这样抽力大好烧，还可以防止屋顶苫房草着火。

房屋内的设置

达斡尔人的住房主要是正房，其间数两间房多，三间也不少，五间的稀少。以三间房为例，分有“玻得格日”（西屋）“给雅库格日”（东屋）和中间的“布达格日”（厨房）。要是

两间房，西为里屋，东为厨房，东西屋之间有一道通到屋顶的间壁，屋门两侧板壁上镶有象征吉祥幸福的花鸟图案，叫做“隔扇”。屋内南西北有环绕连结的土炕，俗称“蔓子炕”，炕上铺苇席，有木炕沿，同土炕平整地连在一起。外屋厨房烧火的烟和余热都经过里屋三面炕的炕洞，再顺到烟突冒出去。达斡尔族家庭一般不设火炉，防寒取暖就是靠的这些火炕。



房屋里的安排是按以西为尊的习惯。西屋为上等屋，是家庭主要成员起居的所在，东屋为地位较低的人的住处。居住的位置，西屋南炕为尊位，是上座，是家庭中辈分高的主人和妻子在那里起居。西炕为第二位，是客座，宾客居住，平时为孩子们起居的地方。北炕为第三位，是儿子和儿媳妇起居处。炕柜放在南炕的炕稍上。媳妇结婚的柜放在西炕靠北墙的炕稍上，炕柜后面留出约二尺空隙，将全家的被褥整齐地叠在那里。屋地中间近房顶处东西向有一横杆，是挂小孩摇车用的。

在正房西屋供神佛，各种神都有它一定的位置。祖神供在东南墙角上方，天神供在西墙正中的上方，财神供在西南墙角上方，娘娘神供在西北墙角上方。也有的人家把祖神、娘娘神供在炕柜上。其它神佛用纸画其偶像供在家庙里。外来女子和孕妇不能任意坐西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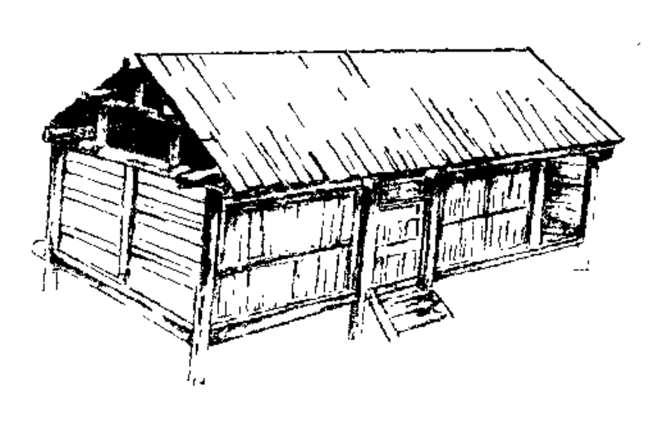
三间正房的东屋，虽设置比较简陋，但也是南东北有三面

炕。南炕仍为上，由主人的弟弟或近亲等起居，东炕也是供主人的孩子们居住。北炕为“俄鲁格”（烘干粮食的地方），一般不住人，过去官宦人家的家奴有在北炕居住的。

厢房、仓库、圈舍与围墙

厢房，达斡尔人称为“哈什格日”，分东厢房和西厢房，也叫陪房。住人的厢房不是所有人家都盖，只有富有的大户人家，因为人口多，且雇有长工，为了安排住人才盖东厢房。而西厢房多为“音格日”（碾房或作放杂乱物资和生产工具用，一般没有住人的。）

在靠东厢房的南头盖有坚固耐用的“乌如格格日”或“塔日特格日”（板仓库）。达斡尔人的仓库别开生面，很有讲究。盖仓库的方法是先将四根圆木柱子埋在地下（仓库大的有八根柱子），仓库的地板距地悬空有二尺多高，墙壁是用圆木咬合起来，房顶为木板遮盖，也有象正房那样用草苫起来的。这种仓库不怕风雨，不怕潮湿，不怕鼠害，是保管谷物和长期存放物品的理想的场所。《黑龙江志稿》里记载说：“柱子埋于地，露二尺许，造屋其上，贮不耐潮湿之物，望之如水榭，然楼曰房”。这形象地说明了达斡尔人板仓房的建造及其特点。



达斡尔人讲究住宅院落的配置。正房南的东西两侧有厢房，再向南有仓房、碾房，再向南有畜圈，分别圈养牛马大牲畜。正房的西侧是羊圈，东侧是猪圈和简易女厕所，厕所不允许设在房子的西侧。正房西屋的南窗西侧有狗窝，东屋南窗东侧是鸡架。从正房北墙开始，东西延伸三丈左右，将羊圈、猪圈划到里边，再向南围绕东西厢房直到畜圈南端修筑成长方形的院墙，院墙一般是用柳条编成的篱笆，也有用土坯筑成的，在围墙的正南面开大门。

（本文曾得到达斡尔族著名老木匠乌力斯·冠阁指导，由关书章同志绘制插图。——笔者）

达斡尔族人的衣着穿戴

鄂 庆 祥

达斡尔族过去有自己的着装，在清代受满洲族影响较大，由于居住分散，住地环境不同，因此衣着方面也有所不同。

一、男装

过去在半耕半猎的山区，冬季男人穿不吊面的皮袍和皮裤，内着布衫和衬裤。春秋穿“哈热密”（用去毛的狍皮或羊皮制成的皮袍、皮裤），夏季穿布衫和布裤。皮袍前后下摆正中各开一衩，这样，骑马方便。有的人在皮袍上加着鹿皮或犴皮马褂。平原地区耕种的达斡尔人多数穿棉裤、棉袄、棉袍，但也有一些人穿不吊面的皮袍、皮裤，也穿“哈热密”。男人剃掉头周围头发，然后梳辫子盘在头顶。冬季男人头戴用狐貂等皮做的大耳帽或毡制圆形四耳帽，春夏秋则戴礼帽或瓜皮帽头和草帽。冬季脚穿“奇卡密”，是用鞣好的狍或羊的腿皮毛朝外缝成靴靿，用狍脖子或牛皮为底制成的。内套布、毛或毡袜，也有的用靰鞡草和布裹脚。踝部系上软皮带，行走于冰雪上暖而不滑，轻而无声，适于狩猎。春夏秋三季则穿布靿布底或布靿皮底的“格奥绰日”靰鞡。在劳动时裤子上套皮或水龙布制的“随毕”（套裤），上端有带，系于腰带。它能保护裤子不受磨损，也有抗寒护膝作用。公职人员或富者则穿细布或彩线刺绣、金丝缀点的绸缎长袍、马

褂等，猎人们为了伪装，头戴狍头皮帽，毛朝外，狍耳竖挺，并嵌有两只眼睛，藉此靠近野兽，缩短射程。冬季在外劳动时常戴“罕奇日特”（皮套袖），以免冻手。此外，为了美观，男人的“哈热密”袖口、领边、襟衩、下摆等处常用约半寸宽的黑大绒或黑色的皮板镶边。成年男子腰间均扎“博斯”，是用黑或兰色布扯成的腰带（也有的用浅绿色绸），围腰系一周后掖在两胯上，使腰带两头下垂一尺左右。身前左侧通常挂有烟具，猎人还要佩带上猎刀。民国以后出外学习和谋事的人多改穿西装和时代特点的服装。

二、女装

因女子冬季不在外劳动，所以很少穿皮衣。平时穿布制旗袍，又称大褂，立领，身长至脚面，右襟钉以同一布料盘结成的排扣至下摆膝部，袖子和上身自上至下渐宽，下摆不开衩。单袍称“您都日勤奇”或“嘎嘎日”，夹袍称“夹德勤奇”或“夹底”，棉袍称“库滚勤奇”或“库勤奇”。女子不穿靰鞡，而穿自家做的布靿布底鞋。

每逢年节和喜庆日子，或走亲串友时，按年龄或辈分穿着适宜的红、绿、褐等色的绸缎旗袍。在旗袍的襟衩、袖口、下摆和领边上都配有绣金或颜色鲜艳的绸缎镶边。青年妇女外罩比旗袍稍短而美丽的长坎肩。成年妇女，在冬季加着绸缎面吊有貂、灰鼠、山猫等皮的斜襟短坎肩，也称“奥勒情”。已婚妇女，在右侧大襟上一律佩挂缎面刺绣花烟荷包和绸手帕。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妇女的发式：未婚前在颈后中心编一根发辫垂在身后，辫根和辫稍扎以红头绳；少妇头发盘于脑后；已成婆母或近老年，发髻盘在头顶部，插上银簪。逢节庆、婚礼等，青年妇女发髻上插金属簪笄和绢花朵。戴金银或玉制耳环、耳坠、手镯、戒指较为普遍。少女和少妇，还以凤仙花染红指甲为美。妇女一般不戴帽，

春夏二季喜以白毛巾包头，冬季则戴皮制里外皆毛的平顶圆帽或缎面的双缨皮帽，脚穿靿上绣有各种花卉的布或缎面鞋。

现在，除了少数老年人还穿着旧式服装外，一般青年男女的穿戴和当地的汉族人区别不多。

达斡尔族的体育和游戏

郭 庆 祥

一、“贝阔·塔日克贝”（打曲棍球）

达斡尔人历来喜欢打曲棍球（贝阔·塔日克贝）。从十几岁的小孩到中年男子均爱好这项运动。这种运动一般多在冬季农闲时进行，而旧历正月和二月间是打曲棍球的盛季。

曲棍球的规则是：将参加的人员均分甲乙两队，每队为六七人乃至十余人，场地是利用村屯的宽敞街道，中间划一道界限，在两端各划两队的界限，在中线发球，打入对方界限者为胜。较为正规的打法是在场地两端各设“阿讷格”（营门），每队设守门员一人，其他为前锋和后卫。球由场地中心线发出，打入对方的营门者为胜。

球棍长约三尺，下端弯曲，是用根部弯曲的水曲柳制成。曲棍球的大小与网球相似，达斡尔语称“坡列”，有木球、毛球、火球三种。木球用杏树根旋而制成；毛球用牛毛团制而成；火球用桦树上硬化了的白菌疙瘩制成，球上穿通数孔，填进松明或其它易燃物点燃，夜晚可正常进行，打出的火球在场地飞滚，别有风趣，围观者拍手赞赏。

现在，传统的曲棍球运动，已纳入国家竞赛运动项目。

二 “索木·哈日布贝”（射箭）

射箭在达斡尔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是由于早期达斡尔人狩猎生产的主要工具是弓箭，清代视为八旗劲旅的达斡尔族八旗兵又以弓箭为重要武器的缘故。

射箭活动多在祭敖包等公众集会上举行。比赛时用的靶，达斡尔语称“通库”。射靶分为骑马射和立地射两种，以五箭为限，中靶多者为胜。百发百中者，授予“莫日根”称号。

弓，达斡尔语称“讷莫”，是以桦木、榆木为料，截一人多长，中间把手的两边在内侧刮削成扁平至末端，再上弦，弓即制成。用于征战或猎大兽之弓，则用藤木为材，为增强其弓力并耐用，还把两层弓木片用胶粘合在一起，上边用蛇皮包上，这种弓称为“瓦德热讷莫”。

箭，达斡尔语称“索木”，是用硬质的树条或藤竹为杆，箭头配以铁尖或骨制的箭镞，称为“奇日达勒”，箭尾嵌上两排对称的雕或鹰的羽毛，使箭在飞行中保持平衡。

少年男孩玩的弓，一般用稠李子树枝刮削弯成。箭头是以母指粗的柳条切成两公分长中心有孔的木头段，安在箭杆头上端，称为“依奥热”。常以射“萨克”（嘎拉哈）做游戏。

靶，用二寸多厚的毛毡制成，呈圆环型，用木架固定于比赛场上。靶环直径约一尺八寸，靶环为五道，红白二色相间，环的中心为洞眼，比赛射程30至50米不等。射箭多以莫昆为单位组织比赛，双方选出人数相等的射手，中环多者为胜。参加比赛的双方莫昆族众男女老幼前来围观助兴。

射箭比赛是一种庄重的体育活动，赛前杀一口猪供射手们共餐，其费用由败者承担，如继续进行下一场比赛，则杀一头三岁乳牛，其费用仍由数者承担。

三、"莫日·敖勒都贝"（赛马）

从前达斡尔人各家都饲养有一匹好马。挑选个头高、腿细长、蹄子小、前胸宽、鼻孔大、毛色适中的幼马，从三岁口起开驯，白天吊夜间喂，饲养定时定量，每天定时定距离蹓马，练习跑步法，赛马以加快"哈特热格"（快步垫腿跑）步法为主，要训练到抵过普通马的大跑速度为止。一个骏马的驯育约需一年时间，一匹在比赛中常常取胜的马，其优秀者奉为神马，或被征为贡马，其主人也名声在外。

春节或重大集会期间都进行赛马活动。赛马除了争高低趣乐而外，也是弦耀自己的驯马和骑术的好机会。

达斡尔人赛马分竞速和竞力两种。竞速赛程短，一般为二三公里，主要赛马的速度。竞力赛距离十公里乃至二十公里，主要赛马的耐力。大型集会的赛马优胜者，受到的奖励必以活对活，大者奖一匹马，小者奖一支活羊。

四、"拜列达贝"（摔跤）

摔跤是达斡尔族男性壮年、青少年中比较盛行的体育活动。在田间休息或众人闲暇集聚时常以摔跤消遣、取乐。每当有集会（敖包）时，必有摔跤活动。

达斡尔人把摔跤能手称为"布库"（大力士）。在达斡尔族民间传说故事中有不少取材于摔跤能手，称颂他们的机智勇敢和真挚忠厚的品德。达斡尔人的摔跤手没有特殊的服装，只腰间系宽布带，以蒙古跤为准。摔跤方法大体分两种：

1. "牟日德勒奇贝"（拽肩头），双方彼此拽住肩头衣服后便开始摔。

2. "博斯勒日奇贝"（拽腰带），双方彼此拽住腰带后便开始摔。摔跤方式繁多，有勾、绊、压、背、晃、旋、踢、抬等多

种，均以倒地为败。

成年人摔跤多为淘汰赛，一人被摔倒后围观者中任何人均可上场，经与多人较量不败者为优胜。青少年摔跤另有普遍采用的赛法，把参加比赛的人分成势力均衡的两组，分别列队，首先由双方的排头交手，摔倒者下场，其队内一名下场与胜者摔，直到有一方的全体队员下场并被淘汰为止，这一场比赛算结束。

五、“毛得·塔特贝”（拉杆子）

二人对面坐在平地或炕上，伸直双腿，脚心相对，双方互相交错握住二尺多长的一根木棍或锄杆，待裁判令下，二人用力拉，臀部被拉起离地者为败。

六、“库珠·莫勒者贝”（颈力赛）

双方坐地或炕上，脚心对脚心伸直双腿，用一条宽布带结环套在二人的脖劲上，双手按住各自的大腿。比赛一开始，双方用力后仰，努力把对方以颈力拉起，臀部离地者为败。颈力赛同拉杆子一样，不得分脚、侧倒。

它与拉杆子全属简单的体育项目，在田间劳动休息时或人多场合均可随时进行。

七、“陶奥勒·塔日克贝”（陶力棒）

每逢白雪皑皑的冬天，野兔进场院觅食，屯民经常用棒打击，便形成了这种运动。

陶力棒是一种模仿打兔子的比赛项目。约二十米远处立一根高一尺的木桩，参加人数不限，依次用一尺半左右长的木棒抛兔，中者为胜。

八、“呼恩帕贝”（游泳）

从旧历端午节开始，男男女女、三五结伴地去江河游泳，特

别是劳动归来后。有时互相比赛或打水仗玩。游泳有侧泳、自由泳、踩水、蛙泳、潜水和“狗刨”等姿势。

九、“修仁恩得贝”（滑冰）

冬季，在江河冰上或用井水浇成宽二尺多，长达五十米的冰道，青少年们排成行列，你追我赶地打滑溜溜。什么蹲坐、双脚并齐跳障碍以及哈腰拾帽子，玩的姿势挺多。

十、“奴格·额日克贝”（掷坑）

在相距十四米远的两端各挖一坑（直径四至五公分，深度约五公分的圆坑），参加人数不限，各持“撇子”（铅砣）一个，从一端的坑沿投向另一端的坑里，如此往返投坑，投进为最优，其他成绩以离坑远近排列。这是一种青少年的体育活动，此项运动多在冬季和春节期间进行。

十一、“莫日得热·阿罗勒奇贝”（马上交战）

此种游戏由九人组成：一人裁判，二人当士兵，六人分两组各做一匹马（一人在前面做马头，二人在其后做马身，立于左右两侧并各将内侧臂搭在马头的双肩上，这是鞍座，另将外侧的手在左右和马头的手插指相握成为马蹬，士兵则骑在这匹马上。裁判员一声令下，开始交战，被对方推下马或拉下马者为败。交战中，当马头的人前后左右移动，进退灵活迎战，对胜败起着决定性作用。

十二、“哈尼卡·纳得贝”（玩纸人）

达斡尔族姑娘普遍喜欢玩“哈尼卡”。“哈尼卡”是用各种彩纸叠成或用布条缝成人形的玩具。喜爱“哈尼卡”的姑娘们积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以其数量之多，造型之美，颜色之艳，

相互争先。

玩"哈尼卡"需两人以上。先用纸盒或硬纸片，以及借其它家用精小物件摆成庭院房屋、室内装饰，"哈尼卡"在室内各就其位，各自成为一个家庭。几家的"哈尼卡"互相串门做客，还可做婚礼等游戏。

"哈尼卡"的制作法是先将彩纸叠成细长的等腰三角形，当作长袍（实际是人体），如表示是年长者，就再叠短的三角形套于长袍之外当马褂。头部用硬纸片或鸡蛋壳做好藉火柴棍或苇席棍固定于身体上，剪好的手脚分别粘在袖口和下摆间。"哈尼卡"的体长数寸乃至尺余并依其性别、年龄绘制成各种脸形，服装的式样和颜色也各不相同。

十三、"得日布·塔日克贝"（打枕头）

将枕头立于西炕沿上，用毛巾把一个人的眼睛蒙住，然后使其背对枕头向前走四步再原地旋转多次，每转一次指向枕头一次，以致转得识别不出方向。一旦判错方向，不但打不着枕头，反而误打盘坐在南北炕沿上的围观者，以此取乐。几个人轮换进行。

十四、"阿布嘎里·纳得贝"

这种游戏是由几个人组成一支"阿布嘎里"队，其中有一人装作哑巴，戴上纸制鬼脸，另一个人反穿羊皮袄装作羊，再一个人装做白鹤。哑巴一手牵羊，一手牵鹤，后面跟上二、三人，到人多的人家，刚一进门，哑巴便跨上羊身，羊架不住就趴倒，哑巴也从身上滚下来逗得观众哄笑，跟在后面的人也放声歌唱，以此取乐。然后家主为扮演者敬酒，吃节日食品。此种游戏多在年节期间夜晚进行，增添节日气氛。

十五、“柏勒克·摆热贝”（捉迷藏）

此项游戏与汉族的捉迷藏相同。将一人眼睛用毛巾蒙住，使其立于隔扇前（面向隔扇），同伙者用手拍打其后背，于是“柏勒克”转身追捉，被捉者则当“柏勒克”，以此取乐。

十六、“笊篱姑姑·包勒格贝”

在用柳条编制的笊篱上糊张画有女性脸形的白纸，贴笊篱把上端横插筷子做左右胳膊，笊篱把下部两侧斜插筷子做为腿部，然后给穿小儿衣服，左右各坐一人握住其腿部立直。此刻，有人开始求“笊篱姑姑”回答年景好坏个人吉凶之类问题。如同问者一致，她就点头三次。也有人向她求婚，她便仰身后倒，表示愤慨，大家以此取乐。此项游戏一般在年节期间夜晚进行。

十七、“萨克·那德贝”（玩嘎拉哈）

过去，达斡尔人各家几乎都有上百的嘎拉哈。儿童们以狍子、山羊的踝骨（萨克）为玩具。其玩有有以下几种：

1. “萨克·玛勒特贝”

参加玩耍者，每个人拿出相等数量嘎拉哈投股，归成嘎拉哈堆，坐在堆积百以上的嘎拉哈周围，每人从中选一个做“俄者”（主嘎拉哈）开始选头，其选头的方法是，将“俄者”从手指扔在炕上，若“俄者”站立的凹状朝上，这叫做“塔卡”，为头首。“俄者”站立的平状朝上，这叫做“嘎里昭”可数二头。“俄者”卧倒凸状朝上，这叫做“木苦”，可数三头。“俄者”卧倒凹状朝上，这叫做“出苦”，可排末尾。然后第一个人将“俄者”向上掷约一米高（高低不限），同时由嘎拉哈堆里迅速挠出数个至十个以上，接住将要落地的“俄者”（接不住“俄者”为失利），第二次又把“俄者”掷向上空，同时抓住挠出的

全部嘎拉哈，手心向上接住落下的“俄者”。如接不住或使挠出的嘎拉哈有漏抓或脱手者均为失利，将挠出的嘎拉哈送回原堆。如无失误，则归自己。各人依次进行，一堆嘎拉哈被夺尽，多得者为胜

2． “萨克·策勒贝”

参加的人各把平分的嘎拉哈，用双手捧在手心里，然后向上掷约二尺高，翻手用手背接，再翻手用手心接，接的多者为先，然后把各人的嘎拉哈合在一起，由领先者以双手将嘎拉哈掷向上空，用一只手背接，再用手心接，接得的嘎拉哈归己。接着，再将从手背掉下来的嘎拉哈散堆，按照已得的嘎拉哈是奇数或是偶数，决定再接的规矩，如为奇数，则用“俄者”掷向上空，只允许捉散下的一个或三个嘎拉哈，是偶数则捉二或四个。在捉的时候不准碰旁边的嘎拉哈。一旦触到或接不住落下的“俄者”均为失利，由下一个人进行。最后以多得者为胜。

3． “包子·额日克贝”

二人或四人平分嘎拉哈，然后每人拿出一个，先由第一个开始将这二或四个嘎拉哈离炕面约半尺高处往下一掷，喊声“包子”，如果几个嘎拉哈都处于同一状态，达斡尔语称“包子”，则全部拾起，不然，只准将其中立着的拾回，由第二人先补足缺数再照样比赛，如此轮流，最后多者为胜。

4． “萨克·卓贝”（藏嘎拉哈）

几个少年儿童盘坐在炕上，把均分得的嘎拉哈藏在各自的大腿下，然后从中取出数个（不限），用手心隐住，也可空拳，伸向中间，说声：“你的，我的加一起共三(或五、八、十……)”，随后各自亮出手心中的嘎拉哈，结果全归猜对者。如此连续进行，最后多者为胜。

5． “萨克·泰喜克勒贝”（弹嘎拉哈）

几个人围坐炕上，由第一个人双手捧住一堆（数十个，乃至

百以上）嘎拉哈往炕上一撕，然后用中指弹同一形状的嘎拉哈，弹中者归已，如果误弹或碰其它的嘎拉哈均为失利，由第二人进行。最后弹中多者为胜。

十八、“皮恩吐·皮子苦勒贝”

用猪、牛膀胱做球胆，以熟好的羊皮做球皮，玩法与现在的踢足球基本相同，甲乙二队人员相等，各设大门和一名守门员，以进球多少论胜败。此项运动多在年节期间进行。

十九、“吉嘎的·皮子若勒贝”（踢毽子）

毽子多用铜钱配鸡毛或马鬃制成，其踢法与汉族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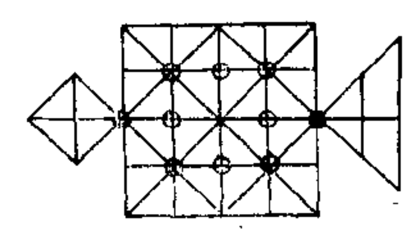
二十、“霍日格勒其·那德贝”（藏猫猫）

此种游戏与汉族完全相同。

二十一、“抛子·额日克贝”

在地面上画半尺多见方的方格，参加者在其中点各放约定数量的铜钱或纸牌（多用烟盒里的画片），然后由三十多米远处按次序用铅砣或鞋底将格里的铜钱或纸牌打出去，出格者归已。

二十二、“包格棋·塔勒贝”（猎鹿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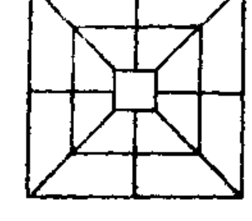
达斡尔语称鹿为“包格”。棋具除棋盘外，用二十四个铜钱或嘎拉哈代表士，另用两个其他稍大的东西代表鹿，二人对弈各代表一方。开棋前，二个鹿摆在两座山口，八个士摆在里层

四方的八个点上。走棋规则先鹿后士，直或斜走均可；鹿越过一士跳入空点，该士被吃掉，由士方再在有利空点补上一士，尽力堵鹿并防止被鹿跳吃。如鹿被士堵死出路或士已损失到无力堵鹿，都判为输棋。

这个包格棋在达斡尔族中流传深广，男女老幼都很喜爱玩它。

二十三、"班德·纳得贝"

二人对弈，各十二个子（彼此区别），轮流摆子，每次一个直至双方摆完，然后轮流走棋，每次一格。规则是，无论摆或走子时，本方有三子在直线上相连即可吃掉对方任意一子，不过，摆子时吃掉的暂时不动，待全部摆完后检出；如一方只剩一子，可越对方一子跳入对方两子间"挑"掉其两侧的子；被对方全吃掉者为败。



二十四、"霍多日·塔勒贝"（井棋）

棋盘画成正四边形，中有二对角线相交，其中一个三角区内画有"井"。

二人对弈，每人二子，各占井侧一边的两个点。每人每次只走一步，"井"后的边禁行，以使对方二子均无出路为胜，但不准先走者第一步就置对方于死地。

达斡尔族的萨满教

乌力斯·卫戌

达斡尔族的萨满——雅达干

有史料考证，中国东北边疆黑龙江境内的达斡尔人自十六世纪以来，以氏族部落的形式，长期居住在靠外兴安岭山脉的沿黑龙江中、上游地区。达斡尔人是最早信仰萨满教的土著民族之一。由于地处边塞，与世交往较少，加之宗法式的氏族制度占主导地位，造成了民族文化之不发达，人们心理上的愚昧落后。萨满教“万物有灵”的理论和天地有鬼神的观点，在达斡尔人的头脑中，流传很久，影响很深。古老的达斡尔人，对天地宇宙间自然界的各种奇异变化无法解释。就认定是鬼神和精灵作祟的结果，天灾地变，人畜疾病，都是由神灵的意志来支配。那么，由谁来调节人世和神灵间的关系呢？这就是萨满教仪式的主持人萨满。

萨满，达斡尔人称“雅达干”（YADEGEN），也有称“亦都罕”、“耶德根”、“亚德干”的，有的布特哈达斡尔人称“萨玛什喀”。“达斡尔人的萨满为氏族萨满，通各种神。没有特殊地位，不脱离生产，平时为氏族成员跳神治病；每年夏历正月十六日或五、六月间举行‘斡米纳’仪式，为全氏族祈福吉祥”。达斡尔族“雅达干”不分男女性别都可以充当。平时在家中生产劳动，在神事活动时则成为神的代言人，他倍受族众尊敬。达斡尔族的萨满教既没有传教之风，也没有寺院等活动场

所，萨满是实行个人单独活动，长期以来，保持了作为自然宗教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达斡尔萨满起源的传说，在齐齐哈尔地区广泛流传着。最近，我们分别找了沃凤久、杨文生、鄂文海、多铁宝四个萨满进行了调查。他们不约而同地讲述了萨满起源的同样一个传说：

今日达斡尔族的所有萨满——雅达干都是“雅僧萨玛”（YA SHEN SA MA）的后人、弟子。

清朝以前，大约有五、六百年了，达斡尔族在黑龙江上游居住的时候，有一个婆媳俩在一起生活的家庭，媳妇的丈夫早年亡故。这个媳妇的名字叫“雅僧萨玛”，她经过神仙点化，成了普渡众生的仙道。她的本事很大，坐上神鼓，可周游所有部落，哪里有妖魔鬼怪，两个肩膀上的神鸟会告诉她，怎样给部落人医病消灾。她还有死而复活的本领，通过她的神道，往返于人世和阴世之间，使冤死的人能重新活过来。她有神帽、神衣、神鼓三种法器，给人治病时要边歌边舞，唱着驱魔经、跳着镇妖舞，救活了不少人命，这样，“雅僧萨玛”便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女巫了。

有一天，部落里巴勒达巴音（巴音，达语财主的意思）的独生儿子，特勒古力·扁华上山打猎，碰到一只瘸腿的梅花鹿，他用八楞箭把鹿射死，没想到这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神鹿。被射死的神鹿把这件事向神告发，神就把特勒古力灵魂给拘走了。巴勒达巴音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就求“雅僧萨玛”给予搭救，“雅僧萨满”答应了他的请求。她拿起念珠捏算，知道这个孩子命不该绝，就戴上神帽，穿上神衣，拿上神鼓到阴世去招回来特勒古力·扁华的魂，真的把他救活了。但是，从阴世往回走的途中，却碰上了她的亡夫在地狱里劳动，亡夫哀告她：“看在夫妻一场的情份上，请用你的仙道把我救活吧？”“雅僧萨玛”庄重地告诉他，你已经死好多年，且尸体已腐烂了，我确实不能救活你，但亡夫死缠不放。这样纠缠不休怎么行呢？她狠心地一挥手，就

把丈夫丢进很深很深的黑水潭里了。

“雅僧萨玛”回到家里，婆婆就问她在阴间见到丈夫没有？她如实地告诉婆婆说，他的尸体完全腐烂，无论如何也不能复活了，已把他的灵魂打入黑水潭，以免在地狱劳动受苦。婆婆听了她这样说，就怒发冲冠，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贱人，能救活别人，不救自己的丈夫，你的心坏透了。婆婆在气恼之下，以没有忠孝节义的罪名把她告到朝廷里，然后由官府下令，把“雅僧萨玛”抓起来，锁到一个大铁柜里，外面又用九道铁锁链捆扎好，扔到黑龙江最底层的九泉之下，也有说扔在很深的枯井里的，永远不让她复活出世。

但是，人世间的病魔谁去医治呢？各种灾难又由谁驱除呢？在九泉之下的“雅僧萨玛”，死后还在关心族众的安危。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个方法，她把两个肩膀上的神鸟从铁柜里放出来，并告诉它们，向所有的萨满——雅达干传授自己的医道和法力，让他们世世代代当好治病救人的好雅达干。这就是“雅僧萨玛”的全部故事，达斡尔人的每个雅达干都会唱述这个故事。

据说“雅僧萨玛”死后不久，达斡尔族当中真的有了接替“雅僧萨玛”的萨满——大神——雅达干了。所有的雅达干都说：这是“雅僧萨玛”大神传下来的，我们都是她的忠实信徒。

信仰萨满教的达斡尔人认为神是人类和自然界的主宰者，所以他们供俸各种“巴日肯”（达语神的意思）。诸如腾格日·巴日肯（天神）、嘎吉日·巴日肯（地神）、霍卓日·巴日肯（祖宗神）、华日基·巴日肯（河神）、吉亚其·巴日肯（财畜神）等各种神。当人们生病时，还要宰杀牛、羊、猪、鸡等各种牺牲作祭品，由雅达干祈祷、跳神，以期用神灵的力量，逐除恶魔，平愈疾病。所以雅达干被达斡尔人称之为“圣人”，他在部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利。

达斡尔人的雅达干不是世袭，氏族萨满（达语为莫昆雅达

干）比较多。不论氏族内或氏族外，凡是当萨满的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与众不同，特别是性格和肉体方面与普通人有些不同的地方。如当今齐齐哈村四十六岁的多铁宝，就是多金莫昆（莫昆达语为姓氏）的最年轻的雅达干了。他的大爷为扎恩扎雅达干，祖父为安喜雅达干，曾祖为比较有名气的哈萨玛，高祖名哈日，更是神通广大，是多金莫昆第一代"霍卓日"雅达干（达语霍卓日为祖先）。多铁宝十七岁开始患"萨满病"，那时他正在中学读书，连续闹了三年病，终日精神恍惚，昏昏欲睡，最后在祖神前许诺愿当雅达干，病体才逐渐康复。

究竟什么人能当雅达干这个问题，原布特哈旗内务科乌科长撰写的《萨满论》讲述得很清楚："从来当萨满的人，并非根据自己的意愿当的。本地方的习俗是，凡当萨满的人，生来较多的特征是体弱多病，气色和平常人两样，当萨满后才慢慢成为健全的人。另外，自古相传，萨满有个死而复活的事。究竟真实不真实呢？不能相信。若追究其事实，那实在属于怪事。据传同类的萨满互相都不和，于是便各自令他的精灵在冥间相斗。一方败北了，主使它的萨满就会死去，临死时嘱咐'不许族亲哭奠'。给他穿好法衣之后将法器搁在其旁，悄悄放在村外听不到狗吠声的地方，如果他的精灵能复活，他便自己会苏醒过来，回到家里，云云"。

达斡尔人对活着的雅达干，相信他能神灵附体而无限崇敬，对死去的雅达干，相信他能灵魂复活而无不惧怕。所以，雅达干死后，一般不进行土葬和火化，而是把他的尸体放进棺木送到深山老林岩石或树杈上停放，进行风葬。风葬后的遗骨要用石头掩盖起来，过三年再埋到地里。这是相信雅达干的灵魂能复活而再生的缘故。

凡是当雅达干的，在通常情况下，都要实行领神和通神仪式。达斡尔人的萨满分"额格雅达干"（师傅萨满）和"喀库雅达

干”（徒弟萨满）。新当雅达干的人，必须由“额格雅达干”引导，指点、说教、传艺，才慢慢的成为正式雅达干。起初要紧跟“额格雅达干”学习跳神治病的各种技艺，即使有人请他祈祷看病，也不能穿“扎瓦”（法衣），要经过三个月或半年才能成为被公众认可的正式雅达干。但氏族萨满中情形不完全一样。氏族领神的老萨满可以直接把神灵过继给氏族中下一代的新萨满，叫氏族成员承认他是本氏族的雅达干，这样他就免去了繁琐的领神形式而可以随时穿上“扎瓦”去跳神治病了。

雅达干的等级

这里还应当介绍的是，达斡尔人对能给人以治病、祈祷、正骨、助产的人统称为“雅达干”。其中，身着法衣，手拿神鼓，能与神灵交往，会跳神治病的为“嘎日桑雅达干”（系被承认的萨满），他的等级最高，余者为“布图雅达干”（系有特殊专长的萨满），等级次之。但也是不可少的，他们在人们生老病死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下面就把“图布雅达干”分别说一下。

斡图士（Wo Tu SHi）。专门从事“娘娘神”、“痘神”的祈祷，有一套专用的咒语和咒词。“痘神”是指“天花”（达语为喜格诺彦扎日嘎勒）。“麻疹”（达语为乌其肯诺彦扎日嘎勒）。对这种神只有斡图士能分辨清楚并进行安抚祈祷。使病人恢复健康。斡图士祈祷时穿“挂拉日期”（仙羽裙的意思）。手中拿各色绸缎编串的神扇（达语称“得勒布日”）。有的斡图士还在神衣裙上斜搭着带子，右肩搭黄色，左肩搭青色。也有的斡图士只拿一尺五寸见方的红布或蓝布旗子作祈祷。

巴日喜（BA Ri Xi）。有特殊的本领，不穿神衣，用向病人患病处吹口仙气（达语为“塔仁”）的办法表示治疗。这种仙气（塔仁）治疗要有“火的仪式”（达语为嘎勒塔仁），即迅

速用舌头舔一下烧红的烙铁，向病人痛处吹气，也有的把烧着的十数支线香用嘴嚼碎后向患者喷出去，多数巴日喜是把酒含在嘴里，念念咒语，离两、三米处远向患者疼痛部位吹仙气。据说这种方法能减轻病痛。巴日喜还能对骨折、生疮病人作简单的手术处置。

巴格奇（BA GE Qi）。巴格奇通常作雅达干的助手。当巴格奇的人一般都是能说善辩之士，对跳神活动的各个环节他都精通，祭祀活动中的祈祷词，甚至比雅达干说得都好。他的单独活动主要是搞神前祭祀，被病人家请去看病时，念祭词做祷告。有的巴格奇没有法衣，但有神鼓，有时敲击神鼓作祈祷。

巴热沁（BA RE QiN）。巴热沁专门从事婴儿接生的事。接生前要祈告“娘娘神”，让婴儿平安降生，接生完毕还要祷告，让幼儿消灾避难，平安成长，这些都有一定的祷词。当巴热沁的一律是女人，多半是由四十岁以上并生过孩子的人承当。

雅达干的祈祷

雅达干为病人作祈祷的整个过程，首先是“特热古勒·扎贝”(特热古勒是道路，扎贝是指引方向)，意思是指引神灵下凡帮助治病。同时让作祟病人的恶魔，按指引的方向遁去。其次是“特热古勒·查库勒贝”（堵塞道路，断绝往来）。意思是把恶魔逐除后，把通道坚决堵死，不让恶鬼再返回。那么，用什么方法把神佛引领下来，又把恶魔赶走呢？这就是用宰杀牺牲的肉和血敬献神佛，满足魔鬼，达语为“拜特勒贝”（为治好病人需用供品的意思）。这种祈祷统称为“拜特勒贝”。

“拜特勒贝”仪式的进行，各雅达干之间虽有些不同，但大体上有一个共同遵循的统一程序。先是病人家，在夜间待人们熟睡之后，点上艾蒿和三支香，念念有词地给要请的雅达干磕上三个头，据说雅达干夜里闻到艾蒿香味，就知道谁家在生病，于是

在梦中让他的神灵察看太空，这样便知道是什么神鬼在摧残着病人。梦景中察看病情，达语为“索蓝约贝”。第二天雅达干到病家就说，据梦景中神的旨意，你家病人是什么鬼神在作怪，需用什么牺牲作供品病就好了。然后就着手进行“拜特勒贝”仪式。先是将祭献之牺牲（指牛、羊、猪、多是用羊作祭品）在神前话贡。雅达干手拿方尺、白布哈达立在病人之前，用赤诚的祷词恳求神灵保佑病人康复，让缠绕病人的恶魔逃去。诵毕，将牺牲拿到外边由屠手宰杀，其五脏六腹和头、蹄供向神方。将牺牲之肉按节骨切断，煮于吊锅内。与此同时，必须准备的有草编的鹰类飞禽两只，柳木弓一张，箭三支，还有丈余长中间串白纸条的细麻绳一个，达斡尔人称之为“吉乐”（人世和魔鬼中间界线的意思）。这些都摆列在鞍垫上，拿到外边的“吉乐”处。细麻绳的“吉乐”，系在两头各用三支柳条棍支起来的架子上。当肉煮熟之后，拿到“吉乐”处，仍由雅达干向神灵、魔鬼祈祷一次，并切上几块上好的肉扔向“吉乐”之外，表示已供神、鬼吃了。然后凡是在场的人同雅达干席地而坐共食祭献之肉，同时要留数十块拿给病人食用。食毕，由雅达干先把两个嘴上浸沾牺牲血的草鹰扔向“吉乐”之外，使其作飞翔之状，意思是让带血之鹰禽飞上天空，告慰上界之神。再将三支箭用木弓射向“吉乐”之外，意思是让魔鬼在神箭威力下远远逃遁。最后把“吉乐”连支架一起拔下来，扔出去，意思是人世和鬼怪彻底断绝了来往。至此，“拜特勒贝”仪式才算告终。

雅达干的跳神

跳神治病。一般轻病患者只做一次“拜特勒贝”。对重病人，雅达干还要夜间穿上“扎瓦”(法衣)，手拿“浑图日”(神鼓)在病人家跳神驱鬼。其作法是雅达干坐于屋中事先准备好的凳子或垫子上，轻声细语边击鼓边唱述某家某姓之人患了疾病。请神佛指点治病

的道理，等等。这种唱词还须两个人伴随唱诵。待祈祷神灵和病魔退散之词唱述完毕，雅达干即行起立，开始跳神。在跳神中还要围绕病人反复震荡手鼓驱赶病魔，达语为“搭日客贝”(镇慑的意思)，还有对病人实行喷吹仙气（达语为塔仁）和用铜镜抹擦患处的巫术。跳神到高潮时，雅达干在旋转如飞的同时大声发出“鄂耶，阿耶”等怪声。不久便出现倾倒之状，于是赶紧由手脚灵巧者扶住坐好。雅达干好久不语，只是摇晃着头并小声击着鼓，这是神灵附体，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下来了。此时“巴格奇”（助巫）就陪坐在旁边诉说，某家某姓之人，久病不愈，请神佛再指引退病魔的明路，接着雅达干就转达神意，说这个病已经判明什么怨鬼在作祟，还需用什么牺牲作祭品才能退去，或者说我的神灵已把鬼魂镇住并远远赶跑，不出几天病人就可复原。最后，雅达干问还有什么事相求？“巴格奇”答道：“没什么事了，请你走马吧”！随后雅达干猛击几声神鼓，吟诵一段咒词，把鼓按在膝上，身体也停止了颤动，恢复了常态。

笃信雅达干能治百病的达斡尔族民众，其中少数庆幸活命者，实在是幸运，多数丧生者，则怪命运不佳，没有一个说雅达干不好的。

雅达干跳神的唱词中，有暗喻，有明示，有和句也有迭句。有时即席创造，按一定音律咏唱，或高歌或低吟，时而独唱时而伴唱，很为动听。跳神中的请神、显神、祈祷吉祥和周游“三界”驱邪逐鬼，都通过相应的唱词实现。下面把请神、显神、吉祥神歌中的唱段简要介绍如下：

《请神歌》

天门地门全打开，列格莫，列格
萨满信徒请神来，列格莫，列格
部落有难真着急，列格莫，列格

何鬼作怪请指点，列格莫，列格

………

《显神歌》

万能神仙已显灵，归勒耶，归勒
作祟妖怪已遁去，归勒耶，归勒
霞光香气照人间，归勒耶，归勒
消灾灭病幸福长，归勒耶，归勒

………

《吉祥神歌》

诚心供神寿命长，德扬奎，德奎
实心敬神有好境，德扬奎，德奎
烧香供佛能吉祥，德扬奎，德奎
跳神拜佛消灾难，德扬奎，德奎

………

这种唱词，曲调各异，有好多种唱法，此外，对各种神灵还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专门祭词，它很象诗歌，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有一条禁忌是，对雅达干的跳神说唱和祈祷祭词，不能作贬低非议，更不能讽刺讥笑，因为这样做是对雅达干的不尊重，也就是对神的不敬仰。然而，除了跳神的场合外，任何人又都可以将萨满歌吟唱。

雅达干的巫术

据说，每一个雅达干都领一对成仙的动物精灵作他的神。其中有青白大蟒神、黑白二胡仙、雌雄对疯狼、凶猛黑狗熊…等等。雅达干身上不单有精灵协助治病，还能用各种邪术驱魔。于是，人们对雅达干能通神、会巫术越加深信不疑了。雅达干的巫术主要

有：

“走铡刀”，即“上刀山”。夜间把灯吹灭后，雅达干在垒成梯子形的铡刀刃上，赤脚往返走动。也有赤身在身上“打铡刀”的，旨意是威慑魔鬼迅速遁去。

“踏铁鞋”，也称为“穿红鞋”。雅达干趁黑天脚上涂醋或沾油，在烧得通红的几个犁铧上来回蹦跳，作各种驱赶魔怪的动作。

“结红带”，“走火池”。雅达干裸露上身把烧红的锁链缠绕在腰上，谓之“结红带”。光身赤足在火池里跳动的为“走火池”。

“舌舔红熨斗”。雅达干把烧得火红的熨斗，或用牙刁，或用舌舔。也有的把烧红的熨斗，用舌舔的刹那，瞄准病人的痛部冲奔过去，好吓跑恶鬼。

“翻滚石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华木村瓦然氏（姓乔）“特木热”雅达干据说他有“石头神”，他在下神后，躺在地上，用两只手能把百多斤重的石磨，左右上下来回翻滚，同时还唱诵除病驱魔的咒词，凡是观看的人无不惊叹。

雅达干说这些都是神的力量在支配。有时不慎，偶尔损伤身体，也不能说有疼痛的感觉，绝不能对神灵有抱怨的行径。雅达干的邪术越是使人惊愕和颤栗，越能叫人相信给了神的威力，更增加了人们对萨满的无限信仰。

雅达干的祭典

雅达干按照宗教的规矩，定期举行祭祀典礼活动。其中以“斡米纳”祭最为隆重。“斡米纳”者，达斡尔人称为“托若·托力贝”（为上天立宇宙树的意思）。祭典或在家里或在寨边野外举行。其目的是通过“托若”仪式，用牺牲和果酒向诸神献礼，以求雅达干本人及族众安然无恙。每次盛典时，本莫昆（同姓家

族）成员和“尼玛嘎热特”亦称“库热克库”（曾请该雅达干治病的老姓人或恳求该雅达干保护的人）都带些礼物来参加。礼物大的是牛羊，小的是果酒哈达等。还有全村的男女老幼以及周围村屯的群众都来参加，使得盛会更加热闹。雅达干的“托若”仪式，每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正月里过“元宵节”后，也有在五、六月间举行的。这种祭典活动，需聘请“额格雅达干”（师萨满）充当陪祭者和引导者。主祭者在这里称“喀库雅达干”（徒萨满），两个人密切配合才能顺利进行。

举行“托若”仪式，要先搭起一个“谢仍格”（席棚子）。席棚之内竖起两根丈余长的桦树，其上面横拴三根稠李子树，呈梯状，其名为“格力·托若”（家柱的意思）。离家柱向南约六丈（二十米）远的地方也要竖一根丈余长的同样桦树，其名为“博迪·托若”（外柱的意思）。上述三根“托若”（柱子）不埋在地里，而是绑在“阿拉塔·蒙棍·嘎特斯”（金银桩的意思）上。在三根“托若”的顶端，都绑上带有青枝绿叶的树枝，上面挂上雅达干神灵的偶像和五颜六色的“哈德格”（指哈达彩带）。在两个“托若”（内外柱）之间，拉上一根红棉绳，绳的中间串上带五彩绸的一个铜环，名为“拴那”（神佛往返跑动的地方）。总起来说，“托若”的三根柱子，象征着“宇宙树”，雅达干的神灵爬在树上可以通向太空宇宙。在家柱树上横绑着三根稠李子树，是代表上中下“三界”的。“托若”上的树枝和偶象，是欢迎各位神灵下界落座歇息的意思。

每举行一次“托若”仪式，要连续跳神三天三夜，每天分午前、午后、夜晚三个阶段来进行，每跳完一段神，雅达干就脱下法衣进餐休息。请来的“额格雅达干”要坐在“家柱”的左侧，“喀库雅达干”坐在“家柱”右侧，在地上铺褥垫静坐歇息。每段跳神开始时，先由“额格雅达干”击鼓念词，向神祷告，请“喀库雅达干”的诸神光临祭典，参加盛会。然后由两个雅达干

围绕“家柱”一面鸣鼓跳跃，一面唱诵祭词。站于旁侧之观众，随合跳神曲调，以示赞助，更显活跃。跳到高潮时，主祭雅达干忽然仰倒，浑身颤抖，是所请之神已经附体。降临的神，借雅达干的口唱说自己的历史和地位，这样人们就知道是哪个神和精灵降临了。此时，有幸还愿的和求神保护的人，在小木碗里盛上果酒或牛奶，跪在雅达干之前，叙述自己还愿献牢和请求消灾除害的意思。神灵借雅达干之口唱出某某人有病，我如何为他消灾解难，今后他们还应该防备什么鬼神的加害。同时，神灵还要告诉主祭雅达干在什么时间，受什么鬼神的阻挠，给什么人 治 错 了病，要谨慎注意等等。唱述完毕，两个雅达干合跳送神舞，即告这段跳神结束。所有参加盛会的人们开始餐用祭典的肉食。每日三段的跳神都这样进行，每结束一段跳神，都用肉食款待客人。

第三天，主祭雅达干的所有神灵都请来降临了，就在当天的上午举行“库热”即“围圈”仪式（保护所有请雅达干 看 病 的人）。凡是参加仪式的氏族（莫昆）成员和委托雅达干保护的异姓家族成员，在主祭雅达干划定的圆圈内或坐在献牢的羊上，或站在供品的牛旁，禁忌孕妇及经期妇女在内，然后由两个雅达干手持用整张牛皮割成没有接结的六丈余长的皮条，围绕圆圈往返猛拉三次。如果皮条比原来尺寸见长，便是人丁兴旺，人口增长的征兆。“围圈”仪式完结后，把皮条剪成三段，两个雅达干各拿一端，让人们从皮条下通过。这种仪式的意思是所有寄托雅达干保护的人，都在他神灵之圈内被神保护着。还有的雅达干把法衣上的“恍嘎日特”（铜铃）摘下一个给“库热 克 库”（被 雅达干保护的儿童），作随时随地跟踪保护之用。“库热”仪式之后，两个雅达干一前一后的跳跃，从“家柱”跳到“外柱”，往返蹦跳三次，并在地上铺一长条白毡或白布，在上面摆上盛牛奶或奶酒的九个“担古拉”（用桦树皮做的饭碗），以献 四 方 诸神。然后，两个雅达干继续跳神，跳到高潮时各由助手扶持，在

地上来回打滚三次，意思是已升到三层神殿，并请诸神下界了。

跳神到最后，在第三天夜里举行献血仪式，达斡尔语为“楚斯奥贝”。事先，在白天杀一头三、四岁小犍牛或三支雪白的羊，将牛、羊血盛在木碗里，上面掺一些牛奶、奶酒，并加上九小段香和九小块心肝肺作好准备，以供降临的诸神尝饮。在请神献血前，将所有灯火息灭，两个雅达干在黑夜里击鼓跳跃，并由众人合曲助兴。当众神降临献血时，两个雅达干发出“噶咕，噶咕”布谷鸟之呼叫声，并各自口含木碗里盛好的血，喷向四方，再绕“家柱”继续唱领蹦跳，达到高潮时再点燃灯火，并为各神偶像嘴上涂抹牛羊血，然后把三柱桦树移植野外，这样整个“托若”仪式即宣告结束。举行“托若”仪式，主祭雅达干都能得到牛、羊、绸缎、铸币、果酒等很多礼物。他从中拿出部分酬劳给请来指导的雅达干。

雅达干的祭词、祈祷、察看病情、诊治病人、请神跳神等各种活动，基本上是按严格的程序规定进行的。但这种活动各雅达干的具体作法也不尽相同，它变换多样，异常复杂。

萨满的法衣和法器

萨满们说，这种法衣和法器起着庇护身心和施展法术的作用。

达斡尔人雅达干的法衣名为“扎瓦”或“萨玛什喀”，作得十分精制和华丽，奇特而罕见。全套法衣重量七十到一百市斤不等，个别也有一百余斤的。现存于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阿尔拉村哈萨满的“扎瓦”重七十九斤半。这可能是最后仅存的唯一“扎瓦”了。

法衣，是以熟软的犴皮或牛犊皮，罩上红绸布做成的对襟长袍，领口至下摆，钉有八个大铜钮，象征八座城门。长袍左右襟中部，钉有三十个青铜小镜，也有多达三十六个的，以为城墙之象征。背悬四小一大青铜镜，大者为“阿尔肯·托力”（护背

镜），以防妖魔从背后下毒手。胸前佩带一个中型青铜护心镜（朱日格·托力），防止恶魔摄去心肺。袖筒及袍子左右下摆绣有花纹的三至五条黑大绒，表示萨满之四肢八节。左右下摆的每一绒条上共钉六十个“恍嘎日特”（小铜铃），也有多达六十二个的，象征城墙之诸卫士，肩部坐落两只布制或木制的雌雄小鸟，雄者在左，雌者在右，名为“博如·绰库日”又称“西博卡”（此鸟能悄声耳语的意思）。据说，小鸟是萨满的使者，小鸟能把神的旨意悄悄的传到萨满的耳朵里。长袍背后腰以下部分，叫“哈勒邦库”（条裙），是由绣着日月和松下站鹿的上下两层共二十四条飘带组成，上层的十二条代表着十二个“杜瓦楞”（即十二种神树和飞禽），而下层的绣有各种美丽花朵的十二条飘带，则为一年十二个月的象征，也是神来往必经之路。长袍外套“扎哈日特”（神坎肩），上嵌三百六十颗同样大小的贝壳（岳宝斯），以示一年三百六十天之意。用这种密集的贝壳，可以防备鬼怪的刀剑。长袍两侧腋下各垂有长约二尺的九个细皮条，名为“阿萨朗”，是萨满请神送神的专用线条。萨满服具的价值是很昂贵的，氏族萨满的服具是由氏族成员共同分担所需费用，后继萨满有继承它们的权利。其它萨满要用自己的钱制作。

雅达干的“神帽”，达语为“扎热玛格勒”。“神帽”的帽架大半都是铜条制作的，内套黑或红大绒帽头，帽顶立有一个铜制神鸟。神帽周围是八瓣高而翘的檐，每片上都坠着半尺长的穗子，它是神鸟外面的屏障，起着保护神的作用。据说，神可以坐在莲花池里，可以并登在神鸟上居高临下察看一切妖魔鬼怪。帽顶神鸟两侧有两只六叉紫铜制的鹿角，鹿角叉数的多少，是识别萨满资历的标志，最初当萨满者，不戴神帽，只用红布包头，三年后有三叉鹿角的神帽，后经“斡米纳”仪式才能有戴六叉鹿角神帽的资格。鹿角上可以悬挂数条二尺许的彩色飘带（达语为哈德格，类同哈达的意思），这种彩带最初有青、红、黄（代表天、

地、人）三种颜色，后变成赤橙黄绿青蓝紫代表彩虹的七种颜色，最后更变成显眼夺目的五颜六色飘带了。神帽前面正中有一圆形小玻璃镜，是驱鬼的“照妖镜”。帽檐下有黑色丝缕，能遮掩萨满的眼睛。当雅达干穿戴上法衣、神帽进行跳神活动时，帽顶上的神鸟和法衣下面的飘带，随着狂舞的旋转，给人以大鹏展翅，飞翔天地之感。

雅达干的法器，主要有两种：一是单面鼓（“浑图日”），二是鼓槌，也称鼓鞭（“盖松珂”或“卓苏如”）。神鼓的制作法是，将二指余宽的榆木或柳木板条，弯曲成直径二尺许的圆圈，以山羊皮或牛犊皮蒙鼓面，据说用狼皮为最好。鼓框内从三个角上各钉一个小铁环，各以等长皮条连于作把手的一个铁环上。同时在鼓框的一个角上用铁丝或皮条串上十多个铜钱，随着击鼓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鼓槌是用藤条作芯子，外面紧套着毛朝外的鹿或狍的腿皮。从鼓槌的手柄处穿眼，再穿上皮条作带，有的鼓槌下端，紧贴手柄处还坠上各种颜色的穗子。神鼓对雅达干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威力甚巨的法器，它是震慑和驱赶魔鬼的法器。在雅达干跳神处于昏迷状态，其神灵同外层世界打交道的时候，在平地神鼓就变成了马和鹿，鼓槌就成了鞭子，在江河上鼓就是舟，鼓槌便是桨。所以神鼓是最重要的法器，通常在不穿“扎瓦”（法衣）的情况下，敲打“浑图日”（神鼓），也可以跳神治病。反之，只穿法衣，没有神鼓就不能跳神治病了。

雅达干的法器中还有念珠。念珠一般都是兽骨做成，珠数为一百零八个，其中有一颗为主的是晶莹透体的白玉或水晶珠。念珠用来掐算，给患者指教病因或判断何方神鬼作祟。

雅达干的“占卜”

古大辽国契丹族，曾用灼羊的枚子骨纹理顺逆而辨吉凶祸福。后来达斡尔人则烧羊胛骨来占卜吉凶。达斡尔人雅达干占

卜，是在祈祷杀牲并将肉食毕后验羊的胛骨，清晰透明纹理通顺是吉祥的征兆，反之，则认为还会有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随着国家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达斡尔民众早已觉悟，不信鬼神了，在广大农村雅达干的活动已近销声匿迹，没有市场了。我们相信全国近十万的达斡尔族人民，将会以文化发达、科学进步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伟大的中华民族之林。

达斡尔萨满跳神行巫见闻追忆

卜　林

萨满教是古代北方民族共同信仰的原始宗教之一，它流传于女真、蒙古、达斡尔、锡伯、鄂温克、鄂伦春以及东西伯利亚广阔地域里。

"萨满"一词是汉译音，满语、鄂温克语都发"萨玛"音，蒙语称为"博"，达语称为"雅达根"。"萨满"是兴奋中狂舞的人之意。萨满教最早在通古斯部落开始盛行，后来波及北方其它民族，后世发展为地区性的共同宗教。

我的青少年是在民国及伪满年间变过的，目睹达斡尔萨满祭祀活动不下二十次，在本民族中，也听说了许多情况，现在把它们分成三个部分追记下来，介绍给各位读者。

一、达斡尔萨满行巫见闻

1932年8月，正是早秋黄金季节，天晴风爽，是不冷不热的好时候。龙江县敖宝屯在达斡尔百姓的恳求下，乌力斯哈勒氏名叫寿铁的萨满，组织了三天为期的祭神萨满跳神会，达斡尔语叫"衮若衮鲁勒"。

那两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大地。地方上出现了兵荒马乱的混乱局面。趁着天下动乱，胡匪、棒子手四方蜂起，1931年冬，敖宝屯遭受天秋绺子的抢劫，大帮

胡子之后又来小帮胡子，全屯被劫一空。过去欣欣向荣生活富足的村庄，变为一片废墟，几乎处于荒芜状态，人们心灰意懒，丧失了生活信心。当年又河水出槽，洪水淹没了全屯的良田，一场牛口蹄疫死亡耕畜百余头，一场天花疫夺去了三十几个小生命。有个叫“金家老头”绰号的老人，进卜奎城摊上鼠疫，回来不到一昼夜就丧了命。乌力斯哈勒氏××，连吐带泻，不到三个钟头咽了气。各种灾难连连临头，村民提心吊胆，一切不幸之根源都归咎于老天爷和神佛。“天不求不应，神不祭不保”，于是就求助于萨满跳神，希望能驱逐潜伏着的妖魔鬼怪，把它们重新打进地狱，争得天下太平和粮丰畜旺人安。敖宝屯是近七十户人家的大屯，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是达斡尔人，他们信仰萨满教，每个家庭奉信的神就有十几种，仅供神驱鬼的烧香烧纸一项的支出，就足占一匹骏马的好价钱。外加供神的猪牛羊鸡的花销，更是惊人的。

寿铁是嫩江西岸有名气的老萨满，驰名齐齐哈尔和布特哈地区。几日来，甘南县绰哈尔屯和布西一带的登子科屯，都派人来求寿萨满祭神。寿萨满出屯跳神去了，屯里又急等着他回来办神事，这可急坏了“噶珊达”（屯长）。

敖宝屯的噶珊达额苏里氏丁贵，大家叫他“丁老客”。他为求萨满跳神一事，特意召集了“西登”（达语公众集会之意），磋商了举办跳神会的应酬问题。萨满跳神本是不讲报酬的，然而，这次是全村公众的乞求下组织的跳神会，跳神会期间的伙食费用，由全村分摊更为合理。所以，“西登”会议决定献活猪一口，其他副食自愿赠送，不搞硬性摊派，至于搭棚子帮助烧茶的差事，全由“噶珊”包了下来。

寿铁萨满接受了办神事以后，又派人到外屯邀请了配合的萨满。我已记不清请来的萨满的准名，只记得人们说他是齐齐哈尔屯的千寿萨满，是年近四十岁的壮年人，嗓子宏亮，唱起神曲优

雅动听。

寿铁和千寿吃过午饭后，嘱咐侍从者（达语叫伊若达嘎奇）要搞个萨满神衣（达语叫做扎瓦）的开箱仪式（达语叫“扎瓦诺古”），至于采用了什么仪式，我没有在场。

举行过神衣开箱仪式后，萨满的侍从人员就一一检点两个萨满神衣和神具，其中包括神帽、神衣、神鼓、鼓槌等。神帽，达语为“扎日阿马嘎勒”，很象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唐僧帽，帽围围着许多穗子，帽顶有铜制树雀。神衣是白里红面，衣外正面饰有数百个海贝壳和一行行小铜铃，前胸挂有一对约半尺直径的圆铜镜，衣背用绊挂有两小一大的圆形铜镜，最大的约八寸直径，神衣的两肩上相向立着两只鸟形制品。神鼓是用木圈围成约二尺直径的单面皮鼓，鼓皮背面中心位置有个用皮条系结固定的铜圈，是鼓的握柄。鼓槌也是用皮子制成，槌把短，槌尖柔软较长。跳萨满之前，两位侍从者也都穿上神衣，相互检查有无缺损。然后脱下神衣，在灶坑口焚起柴火，烘干神鼓，不时地敲着试一试。直到发出当当地干罗声为止。

寿铁和千寿正在商量着跳神会期间的分工。寿铁年事已高，已逾六旬，感到动作和唱曲吃力，他推荐千寿扮主萨满角色，达语叫“额格雅达根”，汉语称做主神，而他自己扮演配角陪萨满，达语叫做“克库雅达根”，汉语称做二神。千寿听了不肯，因为寿铁是萨满爷，资格老，远近闻名，小徒弟怎肯代替主神爷唱主角，师徒间互相谦让起来。然而，面对这个数百人的大场面，寿铁最终还是担起了跳主神的角色。

跳神会场地设在寿铁的大院里。院内有三间正房，东西两侧有厢房，院庭南北足有三十来米。跳神棚设在正房西屋的南窗前，棚门面向东，棚内宽大可容三十几人。由敖宝屯“西登”会派出的十来个小伙子不到一天时间，就苫好了盖。棚内中间有木梯式门，隔开南北，这是跳神的两个萨满对阵到轮换位置所需

要，中间的神门是否搭得合适，是萨满首先所关心的。从神棚中间门的立柱上，用皮条向东拉到东厢房北角的一棵高高的立柱上，沿着这皮条挂着红黄绿白蓝各色的小三角旗，这个神线达语叫“吉勒”，小旗子叫“吉拉”或叫“哈达格”。东头的立柱上系有青树叶、扫帚草，此柱是萨满求神下凡的神柱，达语叫“翁格日海里斯”。寿铁大院的大门顶上，挂起了“达拉巴”三角旗，标志着萨满跳神会场地。

寿铁萨满快要开跳了，屯里亲朋好友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有拎筐送活鸡和鸡蛋的，又有送瓜果蔬菜的，也有专打新鲜鱼送上门的，这是给跳神萨满及侍从人员准备伙食的。

得到跳神会消息的外屯的人们也陆续赶来了。乃门浅哈雅屯的“敖吐西”（指女无神衣萨满），乘坐大轱辘篷车由屯东头赶到寿铁大院。人们提起“哈雅敖吐西”几乎家喻户晓，“敖吐西”光临的喜讯传到寿铁大院，屋内屋外，家人或是帮忙的，全都出去隆重地迎接，就连寿铁本人也提起酒杯，走到大门口敬酒迎客。几十个年青男女打千儿请安，帮助卸车喂牲口。“敖吐西”带一支活羊和三把香，做为跳神会的献礼。“敖吐西”当年已五十几岁了，谁家小孩子闹了不自在，都要请她求神破门，扎针拔罐，养儿育女的幼童父母，都很崇敬她。“敖吐西”进屯后还未得消停，就有好几户人家前来叩拜，求“敖吐西”到家帮助医疗。

晌午刚过，齐齐哈尔屯一名壮年寡妇带领独生女儿，请萨满在跳神会上做“库热库库”（求萨满神保佑），还把活羊一只、红布神衣面料十几尺做为跳神会的献礼。当日晚，又有前后多布台屯的德都勒哈勒氏、敖拉哈勒氏两户人家，携带礼物求萨满给做“库热库库”。那天午后，外屯携带礼物来求的就不下十起，礼物有小犍牛、小毛驴、绵羊、小猪、酒肉、哈达布等等。

跳神会的侍从者，一般由主萨满挑选，人数二至五人，其中

跟唱神曲的更为重要，所以注重挑选熟悉萨满神曲的，即对所谓下凡神会哀求、会配合萨满呼神的。寿铁萨满选中了比力扬哈勒氏龙堂为主唱神曲的侍从人，鄂嫩哈勒氏爱里乌贵为陪角侍从人，另有乌力斯哈勒氏哈拉库库，鄂嫩哈勒氏英寿，当了勤杂的侍从人，担任烤干神鼓，帮助萨满穿脱神衣等。跳神会的准备工作就绪了，跳神会选的吉日良辰一到就开跳了。

我不记得农历七月的哪一天了，吃过早饭后，寿铁和千寿穿好了神衣，手持神鼓和鼓槌步入跳神棚，都面向东托着神鼓静坐着，好象是等候着良辰的到来。两位跟唱神曲的侍从人员，顺着南窗面南面立，紧挨着寿铁萨满的左侧，等待着萨满的起跳。哈雅"敖吐西"、本礼"巴卡奇"（指男无神衣萨满）和一位不知姓名外屯女萨满等，坐在跳神棚的后身，边喝茶边观摩。

侍从人员通知萨满，"时辰已到"，一对萨满起立，慢步走到中间的神门两翼，敲起鼓并肩跳起来，随鼓点左腿起跳右腿垫步，右腿跳左腿垫步。刚开始跳得并不激烈。以后，两个萨满又在中间的神门两侧，一个面向棚里，一个面向棚外，挥动起神衣的前胸后背，大小铜镜也当啷当啷响动起来，接着就又时面互相顶鼓跳，时面错开地跳了一阵子。两位萨满归到神门两侧交换了向背站位，摇晃神衣铜镜当啷当啷响了十几声，又开跳了。由慢跳到急跳，萨满神衣上铜镜一起响动，加上猛烈的鼓声，棚内旁观者，互相听不清说话声，令人捻神捻鬼，毛骨悚然。接着寿铁萨满沿着神线，挥转起神鼓，走一步跳一步，奔向东头的求神杆，到了那里，寿铁的神鼓变为喃喃声，由上到下敲着祈求着上神下凡，嘴里还叨念着什么。不久，随着寿铁猛跳，棚内侍从者和其他随者一齐呼神的"额耶额衣"声笼罩了寿铁大院，这是为下凡神而呼应。寿铁在求神杆前猛跳一阵后，又沿着神线返回棚前，千寿在棚内迎接迎神归来的寿铁，又开始相对相错着比任何时候更加激烈地跳了起来，寿铁后来猛烈地上下左右滚转，神衣

下身的垂带也随着被抡成了足有一米的圆筒，侍从人员的呼神腔也更加宏亮了。在寿铁周围，有不少男子汉照看着以防萨满跌倒受伤，因为无人护救而跌伤，认为是对下凡神极大地虐待，是最大的不吉。晕转迷昏的寿铁，一下就卧倒在椅子上，放下神鼓，象休克般地仰身不动了。千寿这时伴着鼓声，喃喃哀求附体下凡的神要体谅天下子孙的忧愁和安乐，又阐述了求神的目的，把放宝屯几年来的不幸遭遇叨咕了一番，但愿神佛加以保佑。寿铁年老动作急，可能是心脏负担太重，一时挺不起身来，侍从们大声疾呼让在场的人跪伏在地，求神保佑。侍从人龙堂，把神鼓慢慢地放在寿铁的手心，扶助他的右手慢慢敲打着，寿铁的神衣和手鼓开始响动了，逐渐挺身坐了起来。寿铁俯身敲打着神鼓，这可能是思索着要唱的神曲。不一会儿，寿铁开始唱起山神河神曲：“诺莫能奎，诺莫能奎，诺莫能奎得热，诺莫日浩里×××，海拉日诺里哈腾得热，诺莫能奎得热”，通过很押韵的唱词，告诉人们兽神在讷莫尔河海拉尔河之间回旋。从此可见，求的是图腾野鸡神。随后，龙堂等人跟着齐唱，唱一段说一段。中间听到寿铁的哭啼声，使我感到奇怪，懂得的老人告诉我说：“神在野外，经常受到猎手们的威胁，这是对杀生者的痛诉呀！大家要赶紧下地给野神磕头，体量野神的苦境，哀求神多加保佑全屯的安宁。”于是大家一齐下跪磕头。往下，寿铁又说唱了一会儿，便结束了午前这场神事活动。

午后三点左右又开始了，由千寿唱主神。千寿跳的非常卖力气，跳的步法轻快又灵便，唱起神曲很动听，如舞台上歌唱家的声带，吸引了许多的观众。就在午后一个多小时内，全屯男女老少密聚在寿铁大院，争先恐后的抢着看热闹。很少离开家门的年轻妇道和姑娘们，有的把平时不穿戴的花翎帽及刺绣的各种颜色的民族服装全穿戴上赶来看千寿的跳神。许多小伙子们放开农活儿，也赶来看热闹了。

第三天夜晚，是跳神会末尾的日子，也是跳神会的高潮，人们称之为下凡神接受祭物的喝血日子，达语称为“绰斯敖古乌都日”。那天晚上敖宝屯的前后屯观众汇聚在一起了，就连乃门浅屯杜杜家的，二沟屯额莫勒蒂先生家的，海格屯景海家的等等，也不顾道远赶来了，所以院庭内拥挤不堪。

这晚上由寿铁作主神，到求神杆那里乞神归来，又说唱很长的萨满经。在跳神会最后，把“库热库库”都叫到了寿铁的膝前规规距距地跪下，由一个能说能道的侍从者，祈求附体的神保佑这些失兄丧弟的独儿和久病缠身的孩子，他们家庭的长者也跪在一侧，烧香磕头、低声祈祷。记得有一名齐齐哈尔屯的壮年妇女跪在寿铁前，一边合掌拜揖，一边哀求上神说道：“我本为守寡人，唯有独女幸免病灾，乞求神爷保佑他长命百岁，为答谢神的恩赏和保佑，献上活羊一只为祭。”当晚共有四名少年男女要求入神怀，都有大小不同祭物为礼。接着，棚内桌椅全被撤掉，寿萨满围着那几个孩子开跳了。夜间的鼓声响彻天空，萨满绕着四个小生命在跳，神鼓摇转带起的风使小家伙们的头发，一扇一扇地起伏着，在侧面的家长们不时地嘱咐小孩“别怕，要忍住。”小家伙们跪在地上也摇摇晃晃地，有人说这是把潜伏在小家伙们体内的鬼魂撵出体外。

“喝血”安排到很晚才进行。先屠宰了一只小羊，把部分鲜血滴入一个瓷碗里，趁热送到寿萨满前，一个侍从者从黑暗处发出“谷、谷”的怪声，请附体神享用天下人的祭物鲜血。萨满喝完了，在场的信仰者均喜笑颜开，认为是把祭物送到神的嘴了，把神送上天了。这场为期三天的跳神会，属于和平祈祷之类的祭祀活动。

1934年初夏，“大旱不过五月十三”，眼看到了端午节，大田不见一滴雨水，粘土地龟裂，禾苗干枯，村民又请萨满祭祀“道布”（神树）。

新推举的“噶珊达”额苏里氏丁和瓦然氏盛喜，积极张罗祭“道布”的事，大家摊钱抓了一口肥猪，为供神之用。

五月端午刚过，在救宝屯小学校集齐了全村的户主，在校院内关公庙旁的古老树下，人们跪在“道布”前，求本礼“巴嘎奇”念经求神。与会者头顶上都戴着由树条拧成的帽圈，本礼“巴嘎奇”手拿着白巾，在“耶给耶给耶，耶给耶给”地伴唱下，念了祭天求雨的经，然后，在神树下开始屠宰祭物——一口肥猪。祭祀毕，与会者游街求雨。每遇井口就互相泼水，表示盼雨心情。

褪了毛的白条猪，放在神树下供有半小时，以后就在野地下锅煮熟，将猪头又供在神树下，左右两旁的香炉里烧着供香。“巴嘎奇”说几句祭语就又向神树磕头乞雨。祭毕，“巴嘎奇”和“屯不错的”（农村头面人物）饱餐一顿。“巴嘎奇”再拿着“哈拉巴”（肩胛）骨，在阳光照射下判断降雨还是连续干旱？丰年还是灾年？巴嘎奇宣布年景丰欠之后，大家开始享用祭祀物，把煮好的肉分给与会者一勺或两勺。牛肉若有剩余，就再按各户平均分配。

这次祭“道布”的活动，与当年春萨满跳神会有所不同：跳神会必须请有神衣的萨满，祭“道布”一般请无神衣的“巴嘎奇”，跳神会求神下凡，跳后念经，而巴嘎奇不跳神，直接念经，神曲也简单，无须配备专门的侍从者。

1934年春，我在铁匠屯舅父家里，还见过偶子萨满驱鬼的跳神，达语叫做“苏木苏扎日拜”，这是私人请萨满给病人除鬼的跳神活动。

铁匠屯在一棵树西北二十余里处，全屯三十几户人家中，只有我舅一户达斡尔人，额勒特哈勒海伦莫昆氏平福为户主。我舅父兄弟五人，三舅母长期患病，时好时坏，干家务活儿都感到吃累，请几次汉医吃药，总不见病势减退，就认为是冤死鬼缠身，非要请偶子萨满除鬼不可。

愣子萨满是海格屯人，绰号“愣子”，疯疯颠颠真有个愣劲儿。他一见到三舅母的病体，就断言说：“这是冤死鬼魂缠身，非用火除鬼不可”。于是，午前用一只小鸡供了神，愣子萨满又“耶给耶给”多半天。

第二天午后，愣子萨满用羊草缠成四支草鹤，准备跳神用。他指使家人把铡刀刃磨得亮而锋利，又告诉准备两个铁铧子。

到了夜晚，愣子萨满叫找一名跟唱神曲的人，舅家就从外来的客人中选派三棵树屯的景生保担任这个角色。

愣子萨满穿好了神衣，手拿神鼓下了地，走到东屋的三舅母面前，嘱咐她不要害怕，头冲炕沿。他察看了火烧铁铧的情况。嘱咐“越烧红越好”，他又摸了摸铡刀的刃，表示“可以可以”，继而又检查了放在方盘里的草鹤，一切就绪后就开跳了。

这次跳神，没有陪跳的萨满。在三间房的中间屋（达语叫“堂古勒”）跳了一阵，便跳出门外直奔挂好扫帚草的乞神下凡的神杆前，伴着鼓声小声乞求着神灵。接来了神，再从外边跳进屋内。这时迎神的“额耶”声笼罩着屋内，浑身响动的神衣和敲打神鼓的交错声，把人们引入神化世界，旁观者这时都吓的神情紧张得很。愣子萨满念了很长的经，不久，把屋内灯火也全熄灭了，室内漆黑。愣子萨满疯了似地用鼓滚转在患者头前，一阵一阵带起的风，扇向患者脸部，意思是除鬼。接下去，在患者头前，端来了烧红了的铁铧子，铧面冲上，愣子萨满脱光了脚，在呼神声中，用光脚蹬一下铧子，过后冒起一阵火，如此反复有七、八次。这期间，患者的头紧挨着地上的铧子，烤燎惊吓已经浑身是汗，湿透了衣着。然后又把大铡草刀拎了过来，愣子萨满横倒在刀口下面，叫人们用铁郎头狠劲地敲。铁郎头当当地响，愣子萨满不见动静了，人们猜疑萨满被刀铡死了，刚要点灯，愣子萨满突然出声了，制止了照明。就在这时，老太太们走到我这位患病求神的三舅母跟前问：“见好了没有？”哪知患者已吓的不省人事

了。大家见此情形，赶紧把几口凉水喷在患者的脸上，患者才慢慢缓了过来。

最后该是驱鬼了。愣子萨满从西屋跳到东屋，从东屋跳回到西屋，意思想把室内的鬼魂驱到室外。当要开门驱鬼到大门外时，外屋门内已被看热闹的人堵的推不开了。平福舅大院，连老带少不超二十人，现在却足有百八十号人。本来是锁了大门，但好奇的汉族邻居，却从院墙跳进来了。愣子萨满想出门驱鬼，伸出舌头发出羊的“咩咩”的怪里怪气声，做出顶人、咬人的姿态往院外冲，这一下子吓的观众争先恐后往院外跑，把外门板全挤坏了。愣子萨满好容易跳出门外，便直奔大门跳去。跟后有人把沾满血的草鹤，送到野外，这场驱鬼的专场跳神就结束了。

愣子萨满真有魔法吗?我从侧面发现愣萨满在踩铧子时，是脚底沾满了油，未等脚接触铁铧前，油汁滴到滚热的铧子上，一遇炽热的铧子，油便燃成火团，脚部根本未接触到热铧子上。铡身术原来是萨满卧在刀床之后退了出来，侍从者垫上一根短木。我还记得事后曾把我所见说给别人，为此外祖母还当当打了我几个耳光，不准乱说，封着了我的嘴。

二、达斡尔族家庭供神情况

达斡尔族中崇信的神挺多，有家神（内神），有野神（外神）；按神对于人是保护还是附体缠身折磨人，又分成正神（益神）或邪神（恶神）。

家庭里平时祭供的神，达语叫做“道吐里格”即家神或内神，有氏族神、父神、母神等祖神，按不同的祭祀地点分称为“克里者巴日肯”（园田角上的神），“刹容刻巴日肯”（山墙上的神）、“华日米巴日肯”（房檐下的神）等。按祭供形式，可分为“苏木”（庙宇）、“额仁贝”（神塑像）、“哈音”（布制娃

娃神）。家神中，以同一"哈勒莫昆"氏族祖神为贵，达语为"浩卓日"（祖神），必需建庙宇祭供。

大自然界诸神，达语为"博底格"（外神），成精灵的野生兽禽神，达语为"何里格"（野外神）。

"博底格"有：天神（腾格里巴日肯）、地神（嘎吉热巴日肯）、土神（巴拉格巴日肯）、河神（比里格巴日肯）、水神（阿彦巴日肯）、木神（道比巴日肯）、山神（敖里巴日肯），是保护人们安全生产的益神，都有一定的祭祀形式，一般不设庙宇。对于成了精灵的野牲神，认为是有害于人类的邪神，其中包括熊、狐、狼、黄鼠狼、蛇、野鸡等神，为人们所忌讳，因此不予供奉。

信仰萨满教的达斡尔人认为，在家园受到祖神的保护，在野外的大自然里，万物都有神的灵魂，在生产和生活中，顺之者受到外神的保佑，逆之者则受外神的严惩，保佑与惩罚必遇其一。为了取得多神的保佑和避免灾祸，他们认为不能做有损于人类和大自然界的事情，不惹怒诸神，以求得安宁。几百年来，达斡尔人就是在萨满多神教羁绊下度过的。

在这里，我把五十多年前家乡达族同胞的信仰情况介绍一下。

1933年是多灾之年。龙江县敖宝屯共七十户左右人家中间，达斡尔族占六十二户，就在这一年间，达斡尔族住户，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用"活物"祭神治病，有的家庭还不止一次。穷户人家用鸡祭神，一般家底都用羊或是克郎猪，个别的还宰犍牛祭供。我家求寿铁萨满和本礼巴卡奇二人治病，用了五只鸡和一只羊、一口猪，烧的香、纸也不少。以后，父亲和叔叔病故了，置备棺材、孝服和金银箔、香、纸等，又花掉二头大牛钱。那一年，全屯死了十几个大人和二十多个幼婴儿，再加上年祭、"敖宝"祭、"道布"祭，总共用了近百只大小活物祭神，烧了近四百把

香，平均每户花销約占一头大牛钱。

这一年，屯里一位叫怀奇的达族青年，几年来就求神保佑他刚出生的儿子平安，可是生了四五个全没站下。他气急眼便大骂起来："什么他妈的'巴日肯'（神），保佑什么百姓，哪有这么混蛋的神……"，把"克里者巴日肯（园田角的神庙）也踢坍了，"我叫你欺骗我，你有本事就马上要我的命"，边哭边骂。这可把他母亲急坏了，她抡起条帚疙瘩一边打他一边骂："作孽呀！惹了家神不敬不孝，早晚要你的命！"

这件事惊动了敖宝屯北街，人们都出来了。有的青年人说："哪来那么多神，都是瞎胡闹。"老太太听到就忍不住了，"毛约如、毛约如（不吉之意），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得罪了神会缠身作病要人命的"。周围的老头和老太太又过来数 叨 怀 奇："你对祖宗庙作孽了，你们一家子莫昆人也不能答应，赶紧宰一个小鸡供一供祖神，求得宽恕，和些泥赶快把庙修好吧！"这件砸庙的事件，在全屯引起了不同反响。

再把我知道的家庭祭供诸神的方式介绍一下。

祭天神：祭杆也叫天灯杆，设在大门东侧，是一棵约八米长的落叶松木杆，杆顶上有木制的灯楼棚，形似古式庙宇建筑，再经过那里面的铁环穿一条很长的绳，用来起落蜡灯。

每年从除夕三十直到正月十五，每天晚都点燃长蜡送到高高的天灯楼里，高灯下照，别有风味。这是在祭供日月星神。此外，家庭老母还用荞面做出几十个盆状的荞面灯，中间置有棉花搓成的芯子，倒入苏籽油点燃起来，放在大门左侧或者祖庙前。荞面灯达语为"卓鲁"（烛之意），也是用它来祭祀日、月、星神即天神。天神的至尚者是"恩都如"（天仙），是人间大地的守护者。

高灯下照，群烛发光，是要在大年良辰将妖魔鬼怪 撵 回 阴间，祝愿天神给安排个风调雨顺的丰年。

祭山神："敖宝"（石堆）又叫"白那查"，是祭祀山神的一种形式，山区的"敖宝"比起平原地区多得多。

敖宝屯以北约半里处，有很高的"敖宝"堆，这里是乌力斯哈勒早期放牧之地，也是清代在这里搞联合祭祀活动地方。早年入山打猎或是入山伐木时，先有家庭老主妇向祖神烧香磕头，祈祷进山人们的安康太平。一到山区，每逢山顶要隘口处，不到十里路程，准有石头垒起来的"敖宝"，过路人点酒磕头致敬，事后在"敖宝"堆上添石块，多少不限。一路上最少遇到三至五个"敖宝"，都要一一祭祀，求山神保佑免受猛兽之伤害。山区的"敖宝"，也对猎人和伐木人起着标识的作用。另外，还有集会形式的"敖宝会"活动。在清代，山区猎民每年有三、八月两次小祭，三年一次大祭，小祭由部落组织，大祭由周围各部落联合组织。大祭祭祀仪式比较隆重，祭祀仪式后，举行各种"那达慕"的文体活动，也有集市贸易。

祭土神：达斡尔人每逢新开荒时，在野外临时堆成草皮堆，在动犁前，向土神（巴拉格巴日肯）点酒叩拜。

祭河神：达斡尔人在经常摆渡、经常打鱼的江河水面地区，都设有"比里格"河神的小土庙，也有的在一大块木板上钉着许多小钉插上蜡烛，点燃后放入河水中漂流，以此为祭。

祭祖神：达斡尔族家庭，一年中间祭祖神次数最多，认为祖神是保护氏族子孙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至尊的神。

家庭成员得了疾病，家庭老主妇先给祖神烧香磕头，祈求祖神保佑，然后进行驱逐鬼魂的"苏木苏扎热古"的仪式，将剪成的纸人扔到野外，所有家庭成员都吐以吐沫，表示对缠身鬼魂的愤慨。久病不愈了，宰活物供祖神，专请"萨满"和"巴卡奇"跳神逐鬼。

每逢杀年猪，先供"浩卓日"，并在布制娃娃神头部抹上肉汁，表示将"德德音"（头一口）供给先祖品尝。

每逢家庭设酒肉佳肴时，饮酒前，先向祖、父、母诸神三方点酒，把煮熟的肉等膳食也先供在祖神前，同样表示将“德德音”请祖神品尝。而后大家再动筷进餐。

三、信仰上的其他表现

萨满教除了认为万物有灵之外，还认为灵魂不灭。也就是说，人死了归“伊勒布汗”，灵魂游荡于世间，然后又出生于人间，生、死与复生不断循环。但是，不是所有死亡者都可以得到复生，而且人在生前为善积德，“伊勒布汗”还会安排他复生为富贵人，那么，生前作恶者就被安排为小虫复苏在世间。所以，在达斡尔族墨守信条的老人中间，一旦遇到人们有悖社会公德的行为，就“毛约如”“毛约如”地规劝个不停。

因为相信万物有灵和信仰多神，所以，遇上日食、月食出现时，在旧社会的达族村屯里，萨满就喊告大家“天狗捕日头了”或“天狗吞月亮了”，让各家狠劲敲打水桶、犁铧、铁盆等响器，好吓走天狗保护日神或月神。又如，对剧烈的闪电雷鸣，认为是天神（“阿日迪”）发怒，如有人遭雷殛死亡，就说是“道包别”（惩罚），不能进祖墓地方埋葬，以火化了之。再如，有些年份发生龙卷风，就说这是“龙下凡”，到处喊叫，烧香磕头，认为龙下凡将会带来吉祥。

因为敬畏野牲神，所以忌讳直称它的名，敬称虎为“诺音古热斯”（官兽或兽之王）、熊为“博布格”、狼为“阿日衣诺古”（野犬）、狐狸为“布登搜乌勒”（粗尾巴）、黄鼠狼为“夏热”（黄色的）等。虎熊为山中猛兽，对它们表示敬畏，对狐狸、狼、黄鼠狼等，则认为他们成了精灵后，能迷惑人，因而表示忌讳。遇到蜘蛛爬入屋里，认为是鬼魂入室，所以到处忌讳蜘蛛。有时会碰到蛇在掏家雀窝，既不忍心鸟被伤害，又不敢得罪、打死另一方，于是送回野外，平安了事。

信仰者还认为鬼在暗夜里出没，边缘地方有“莽该”（妖怪），所以妇女和小孩在夜晚不大敢出屋，青少年不大敢单独去边缘无人之地。

萨满教做为特定历史时期的原始宗教已成去势，但是它祭祀活动那些说、唱、跳的独特形式和风格，却被吸收并丰富了达斡尔民族的文化艺术。象进山后常跳的篝火舞（鲁如格勒），齐齐哈尔一带妇女跳的“哈坎伯”舞以及民间歌唱的“占达拉格”、“乌钦”等，都可看到很多吸收引入的痕迹。当今达斡尔族农民名歌手何德志，他演唱的《心上人》、《松林里》等，都是在萨满教唱曲的基础上改编成功的。

达斡尔族萨满的着装

德 世 岫

达斡尔族人曾信仰萨玛“教”，俸供“巴 尔 罕”神。解 放前，达斡尔人把驱散病人身上的“鬼魂”，寄托在萨玛（大神）的身上。把萨玛推崇为至高无上的神的化身。每户患病者的达斡尔族人家，首先请来萨玛给病人看病，萨玛认为病人病情严重时，就答应到病人家跳神。每年的正月十六至二月二是萨玛“会神”（达语叫“特斡日斡特斡勒贝”）的时节，当地的萨玛请他（她）的师傅或外地的萨玛到家里或院内双双跳神。方圆几十里或几百里以外的，凡是请过该萨玛的人们都闻讯前来祝贺，有的送钱，有的送猪羊，有的送二岁牛，来报答萨玛的恩情。萨玛跳神时身着非常别致的萨玛服，土改后已失传。这篇小文，就专门介绍一下。

一、帽盔（达语叫“扎阿日阿玛格勒”）

帽盔是由黄铜制成的。铜帽头上，有铜雀，铜雀的下端连接帽盔伸出两片铜树枝。铜帽盔下端周围是用青缎子（或大绒）缝制的外套（达语叫“德勒客”），共九片，形如剑头形，每片外套上端镶一小块圆镜，下端绣一朵丝线花，如荷花、牡丹花等，尖端各缝一条缎子，每条缎子长一尺五寸，共九条。九条缎子九种颜色（禁用黑白两种颜色）。

二、坎肩（马褂达语叫“牟日勒其”）

坎肩是用黑坎布缝制的，前开口两边各横钉一付扣。坎肩的两肩上各置一木雀，头相对。坎肩上镶有一百八十个或三百六十个海布螺（达语叫“依博子”），还竖钉一付扣。

坎肩的背面，在臀部上缝有十二条飘带（达语总称叫“哈勒布勒库”），每条飘带（达语叫“布勒吐热”）上分别绣有二至四只动物如龙、虎、狮、豹、鹿等。也有绣飞禽的，如仙鹤、凤凰、鹰、百灵鸟等。

三、长袍

萨玛的长袍是用紫红色格阿恩绸缝制的，长短到脚脖。长袍似前开口衣裙，在衣裙的腰以下有四排裙摆。每排间隔两寸，幅宽均为一尺二寸，黑布镶有白边，每条裙摆都缝有七只蛙头铜铃（达语叫“华阿昂嘎阿热特”），一直缝置到膝盖上二寸。在膝盖的二寸以上的左右大襟上，有上下半遮压的五层小铜镜（达语叫“依其根特斡勒”），左右各安置三十五面，每面铜镜的直径接近中饭碗口的直径。还要在坎肩的胸口部位挂上一面小铜镜，长袍或坎肩的后背上挂三面大铜镜（也有接五面铜镜的，比较少见），其中一面大铜镜重十八斤，另外两面铜镜各重十二至十四斤。长袍的两腋下各置一条皮条（达语叫“其荣奎依佐斡日”），皮条长至手指外一巴掌处，系上除黑白色以外的一尺二寸见方的带色布（达语叫“哈德格”）。整套吉瓦（萨玛服）约重八十多斤，其中用黄铜六十斤。

祭敖包与“那达慕”

乌力斯·卫戎

据文献记载，十六世纪达斡尔族在黑龙江中上游广阔地域居住的时候，不论是在山的顶端，还是在高坡之上，或是土丘漫岗，河岸湖畔，在地势醒目，“风水好”的地方，到处都能遇见到用石头堆积起来的圆锥形大石堆，找不到石头的地方，就用砂土垒成土堆，这就叫做敖包或鄂博。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行政区划图还标着距今黑河市以北和东北约八百余里的地方，有七八处达斡尔人所立的敖包。祭敖包的起因与古时候人们对自然界的膜拜有关，它是达斡尔族人民(蒙古族也兴盛祭敖包)，最重要、最普遍的崇敬山神土地的祭祀仪式，高大的敖包，在人们心里是神灵所居和享祭的地方。早先敖包神被视为氏族保护神，备受人们敬仰，要定期举行祭祀仪式。行人路经敖包都要下马，献上钱币，叩头施礼，以虔诚心意祈求旅途安全。

最早，每个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敖包，所有氏族成年男性都参加祭祀活动。如今齐齐哈尔市郊区的敖宝村，就是清代随宫屯（现大五家子）达斡尔人乌力斯氏家族祭祀敖包的地方。后来划分旗县乡村，就有了公众敖包，由旗乡的人们共同参加祭祀活动。祭祀敖包活动，一般是在每年夏初种完地后的旧历五月间举行。每当祭日，人们都象过节一样，穿上鲜艳的礼服参加盛会，进行祭典。祭祀前，先在敖包上插上带有青枝绿叶的柳树或桦

树，它象征五谷茂盛和六畜兴旺之意。祭祀的时候先供上煮熟的牛、羊、猪肉，在敖包上奠洒白酒、奶酪等，敖包的四面点火焚香。当主祭人宣读祭文后，由雅达干（萨满）围绕敖包唱求神歌，跳吉祥舞，最后全体向敖包叩头，祈祷风调雨顺，家畜平安，五谷丰登，各业兴旺。结束后，大家用供品会餐一顿，高兴之余，要进行摔跤、赛马、射箭等游艺活动。

此外，达斡尔人每逢夏季干旱时，也必须向敖包祈求降雨。其仪式和祭敖包大体相同，祈雨仪式的最后，是各用桶盆取河水互相泼洒。后来求雨改在屯村的河边或大树下进行，祈祷的程序不变，只是男男女女相互间的泼水更觉欢快热闹了，全身浇透更好，这意味着能下透雨，粮食丰收。现在人们已经破除了迷信，敖包只剩下了土堆或石堆的陈迹，但是人们沿用传统，常在有敖包的地点举行既有民族特点、有新内容又生机活泼的“那达慕”活动。

最近几年来，每当作物成熟，果实累累的金秋时节，居住在齐齐哈尔市周围的达斡尔族，为了纪念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八日卧牛吐达斡尔族自治区的成立，选定这个喜庆日子，每年都举行最隆重的“那达慕”大会，预祝农业、牧业大丰收。“那达慕”大会召开时，远近村民，男女老幼，盛装打扮，喜气洋洋结队前往。当领导人或主持人致开幕词后，“那达慕”活动就正式进行。

“那达慕”一词是达斡尔族和蒙古族的同音同语（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故有的语言有相同之处），“那达慕”汉译为游艺之意。这一名词来源于敖包祭上的摔跤、赛马、射箭等三项游艺活动。追溯历史，达斡尔族摔跤、赛马、射箭为主要的娱乐和习武手段，这种活动是斗智，斗勇，斗力，其冠军者将成为部落的骄子，草原上的雄鹰，故人人奋力拼夺魁首。这种活动和古时候达斡尔族崇武善战，精骑善射和从事狩猎

是分不开的。清朝规定，达斡尔族在册的披甲十五岁到十七岁，入伍出征前的三年内，每年春秋两季举行摔跤、骑马、射箭的训练，成绩优秀者，不但有赏金，而且入伍就当“骁骑校”（类同今天军队的班排长）。今天的“那达慕”除了摔跤、赛马、射箭以外，又增加了曲棍球、陶力棒、颈力、拉棍等有民族特色的游艺活动。同时，还有丰富多彩的扎恩达拉、乌钦、罕肯伯等民歌演唱和舞蹈表演，更增添了“那达慕”的节日气氛。另外，也有在“那达慕”会上进行田径，球类等运动会的。更有意义的是商业服务部门在“那达慕”上搞资物交流，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购销两旺，热闹非凡，体育运动和物资交流都为“那达慕”增添了异彩。

达斡尔族抗俄斗争史料介绍

杜 春 志

电影《敖蕾一兰》，向广大观众介绍了达斡尔族在黑龙江流域时期反抗沙俄侵略斗争的历史故事。我过去对其真实的史料并不了解，直至近几年因有机会参予编写《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志稿》的工作，才接触到中外文献资料，从而晓得达斡尔族在反抗沙俄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斗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为保卫边疆做出了英勇牺牲。本文仅就重点资料加以整理介绍，难免不够详尽。

沙俄当局向东窥探

早在十六世纪末，沙皇俄国的侵略魔爪就伸向远东。在西伯利亚的鄂毕河、叶尼塞河以及这两条河的支流上相继设置了托木斯克、曼加泽亚斯克、叶尼塞斯克等督军辖区的俄罗斯式城堡。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曼加泽亚斯督军派遣的哥萨克们已推进到贝加尔湖以西的勒拿河。至1632年，叶尼塞斯克督军派出的彼得·别克托夫一伙，在勒拿河中游建立了雅库次克。这座城堡，后来便成为沙俄当局向黑龙江流域入侵的大本营。

1637年，叶尼塞斯克督军派遣哥萨克头领马克西姆·佩尔菲耶夫一伙继续向东窥探。次年夏季，他们行至外贝加尔湖北部的齐帕河，从当地猎人中探知：在石勒喀河河口一带，住着名叫巴

托加的达斡尔酋长；距巴托加住地三、四天路程的黑龙江畔，住有另一位达斡尔酋长拉夫凯。他们有很多貂皮，并开采银矿、铜矿，冶炼白银，从事耕作和畜牧，同鄂温克人和其他民族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佩尔菲耶夫获得情报后，于1640年返回叶尼塞斯克的途中，遇到前往雅库次克上任的督军彼得·彼得罗维奇·戈洛文，并向他报告了上述情况。戈洛文听说居然有这样物产丰盛的达斡尔地区，已经是垂涎三尺了。从1640年到1642年期间，他先后派出几支考察队，寻找能到达黑龙江流域的途径。不久他们探知：在雅库次克城下边流入勒拿河的阿尔丹河有许多支流，其上游河源都接近黑龙江。于是戈洛文装备了一支由112名军役人员（哥萨克）和15名志愿人员组成的所谓“考察队”。派文书官瓦西里·达尼洛维奇·波雅尔科夫任领队，带上一门铁炮和所用的火药、铅弹，扬言“用以恫吓不肯归顺的当地居民”。1643年7月15日他们从雅库次克出发，向黑龙江流域侵入。

波雅尔科夫狼狈逃窜

波雅尔科夫为寻找“达斡尔土地”十分卖力，他和同伙们乘船开始沿着勒拿河顺流而下，然后到阿尔丹、乌楚尔、戈诺姆等河流，溯河拉纤逆水行舟。波雅尔科夫在日记中写道：“沿戈诺姆河的路程尤为艰难，过四十二个石滩和二十二个浅滩，拖着小木船贴着石头行进，奋战了三十五个昼夜。在一处石滩上，一条木船遇险，装载的铅弹都沉入河底。在到达努耶姆卡（努亚姆卡）河口的五天路途中，又为冰块所阻。已经来临的严寒迫使哥萨克们停下来过冬。直到第二年才进入外兴安岭山区。他让哥萨克们拖着装载物品的雪橇，在深雪中跋涉三个星期后，1644年冬翻越山岭，到达了精奇里江右支流勃梁塔河的上游。沿此河踏冰下行至精奇里江的一条右支流乌姆列坎河河口处，他们找到了蓄意已久的猎取对象——达斡尔居民。

侵略者一到达达斡尔族住地，就闯入村寨，绑架了当地头人多普带乌尔，强索粮食。达斡尔人却不畏强暴，拒绝提供任何食物。波雅尔科夫等忍不住饥饿，又派出哥萨克去莫尔德基德奇村寨，绑架了多西和科帕两位头人，依然威逼他们交出粮食。这时，达斡尔人被激怒了，向哥萨克们发起了猛烈地攻击，当场杀死10人，打伤50人，俘获重伤10人，将剩余的哥萨克赶到树林中包围了四天。后来，由于达斡尔人放松了警戒，他们乘机逃跑了。

因为抢不到粮食，波雅尔科夫及其伙伴便开始挨饿，忍无可忍地以树皮和深雪下的草根充饥。后来，竟搜寻达斡尔人和同伴的五十多具尸体为食，才保全了生命。

波雅尔科夫率领残兵，流窜达斡尔地区一年多时间，到处碰壁，无一站脚之地，只好狼狈地逃回大本营。当1646年7月中旬他们抵达雅库次克城时，除留在乌利亚河口的20名哥萨克外，还剩33人。

达斡尔人浴血奋战

波雅尔科夫回到雅库次克，向督军呈递了窜犯达斡尔地区的实况报告。报告里说："那个地方鱼虾满江河，野兽遍森林，盛产粮食，人烟稠密，将使国君获得巨大利益。"并建议："如果派三千人到黑龙江和精奇里江，建立三座城堡，就能征服那里的所有居民。"

1649年春，伊利姆斯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接受西伯利亚富商哈巴罗夫的请求，招募70名"远征达斡尔土地"的志愿人员，开始了沙俄当局二次进犯黑龙江地区的罪恶行径。

1650年初，哈巴罗夫带领"远征队"，寻另一条路线窜到黑龙江上游。当他们袭击拉夫凯酋长领地时，达斡尔人因事先得到消息，粮食、牲畜及财物早已尽速转移，哥萨克们连进四座城寨，都是空无一人。哈巴罗夫自知力量不足，退到第一座城，留

下50名哥萨克驻守，自己返回雅克次克搬兵去了。此间，守在拉夫凯城寨的匪帮饥饿难忍，便制造了带车轮的大盾牌，试图攻进阿尔巴西酋长驻地雅克萨城。他们在那里遇到达斡尔人的强烈反击，被箭射死4人后便败退了。

1650年秋，哈巴罗夫从雅库次克带来130多人和三门大炮，再次进攻雅克萨城。阿尔巴西酋长在侵略者的火炮攻击下，力不从心，只好率部众撤到阿图伊城寨。次日清晨，当哈巴罗夫匪帮赶到阿图伊时，达斡尔人将城寨付之一炬，跃身上马，沿黑龙江向东驰去，并在中途同紧追不舍的强盗进行了一场遭遇战。在以火枪洋炮为武器的哥萨克们列队攻击下，使用弓箭、砍刀的达斡尔族，不得不败退，侵略者虏去了117头牲畜。到冬季，达斡尔人退到呼玛河附近时，又同追随而来的哈巴罗夫匪帮进行了一场恶战。战斗从清晨持续到傍晚时，达斡尔酋长们才乘暮色率众撤走。

1651年夏，哈巴罗夫带领200名哥萨克，沿黑龙江窜到贵古达尔酋长的城下。达斡尔人出城反击，虽有50名前来征收贡赋的清军骑兵增援，但仍不能阻止敌人的进攻。清兵借故“寻找援兵”撤离后，贵古达尔酋长令部众退入城堡坚守。当匪徒们包围城堡，并强索贡赋时，贵古达尔向敌人严正宣告：“我们是向霞沙汗（清朝顺治皇帝）缴纳贡赋的，要我们向你们纳贡，除非我们都死光！”说毕，令众万箭齐发（对此，哈巴罗夫记述中形容为田野的箭杆象长满了庄稼一般）。匪徒们无法接近城堡，就用火炮轰击，破寨进城。这时，达斡尔人置生死于不顾，拿起猎熊用的两刃扎枪等为武器，同敌人展开了拼搏，直至壮烈牺牲。野蛮成性的哥萨克，把所剩的妇女强奸了，把儿童用火烧死了，惨无人道至极。事后，哈巴罗夫向沙俄当局报称：“靠上帝的保佑并托皇上的福……所有参加猛攻和激烈战斗的达斡尔人全部被杀，杀死大人和小孩六百六十一人。”实际上，除15人幸免外，一千多人的城寨居民，全被杀害了。

同年7月，位于精奇里江江口对岸的托尔金寨的首领图隆恰、托尔加、澳穆捷和部众，正在寨外草坪上欢宴时，哈巴罗夫匪帮顺黑龙江乘船下行，乘机登陆偷袭了该寨。达斡尔人仓促应战，终因力竭使哥萨克们破寨而入。图隆恰和托尔加两位酋长被绑架了，受了火烧、鞭笞等酷刑，威逼达斡尔人拿出貂皮等财物。托尔加英勇不屈，愤慨地说："既然落到你们的手里，只有一死，要砍头就砍吧！"后因不堪凌辱而投河自尽。哈巴罗夫原想在托尔金寨过冬，但于9月3日晚，全寨达斡尔人突然不知去向，侵略者的粮源断了，于是便残暴地烧毁寨子继续东犯。

侵略者的哭丧哀叹

杀人放火的魔鬼哈巴罗夫，在入侵黑龙江的罪恶行径中，也不免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由于屡遭碰壁，他的队伍士气低落，濒于瓦解。1651年8月11日，就有136名哥萨克乘船三艘潜逃，将沿途掠夺的赃物大部分盗走。8月15日，哈巴罗夫向其雅库次克行政长官报告中哀称："我们不敢在结雅河（即精奇里江口）达斡尔人的地区宿营，怕的是我们会对皇家财富（皮毛）带来损失和徒然无益地让哥萨克人丧失生命……。"因此，他只好带领仅剩200多人于9月17日乘船驶向黑龙江下游。他们在29日进犯赫哲族聚居的地区时，又遭到赫哲人、虎尔哈人和清军的共同反击致使哈巴罗夫一伙不得不离开冬营地点，回头沿黑龙江上溯，直到在精奇里江江口处遇到从雅库次克派来增援的117名武装哥萨克以后，他们才得以继续维持了苟延残喘的命运。

1653年夏，沙皇俄国朝廷派遣西莫维也夫，携带供应物资前来援救侵略军，并将哈巴罗夫调往莫斯科，另派斯捷潘诺夫接替。1654年春，斯捷潘诺夫率队侵入松花江时，也同样遭到各族人民和清军的共同反击。1655年，斯捷潘诺夫向其主子上书中哀叹："粮食全然没有，我们感到非常穷困，吃草和草根……达乌里亚

（即达斡尔）人和杜切尔人及其他异民族都去博古达国（指清朝）”。1658年7月，斯捷潘诺夫再次进犯松花江附近时，当即遭到中国军民的包围，几乎被全部歼灭，斯捷潘诺夫被当场击毙。

上述沙俄侵华事件正当清初崇德、顺治年间，朝廷忙于收复关内关外而无暇北顾，以致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等各族人民深受创伤。后来，顺治皇帝旨令达斡尔、鄂温克二族背井离乡迁徙嫩江流域，从而繁衍后世至今。

达斡尔族人曾为雅克萨之战出力

乌力斯·卫戎

十七世纪中叶，在我国黑龙江北部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雅克萨之战，是中国各族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战斗和第一次胜利。这次战争清朝康熙皇帝亲自部署和统帅，我国东北盛京（沈阳）、乌喇（吉林）、黑龙江（爱辉）官兵参战。战争中，以达斡尔、索伦为主力包括满、汉、锡伯、赫哲、鄂伦春、巴尔虎等各民族群众都出了力，作出了贡献。

雅克萨原本是中国北部领土，是我国达斡尔族人民世居的城镇，本是雅尔斯莫昆（姓氏）中敖勒哈拉部落人的聚居区域。它最早的首长叫阿尔巴津，后来成了达斡尔副总管倍勒尔的故地。据考证，雅克萨在黑龙江城（爱辉）西北约一千三百余华里。在雅克萨城的周围百十里方圆内有铎陈、阿撒津、多金、兀库尔等城屯。明朝在这些地区设了万山卫、木河卫、卜鲁丹河卫等行政管理机构，归黑龙江努尔干都司统辖。清初由宁古塔（宁安）都统管辖此地，并委以各氏族长和部落头人管理族众事宜。但是，从崇德八年（1643年）始，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先后派遣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为头目的侵略军，跨越乌拉尔山。渡过额尔古纳河，入侵我国黑龙江腹地。罪魁哈巴罗夫率领的哥萨克在清顺治七年（1650年）抢占了雅克萨城，改名为“阿尔巴津”。他们构筑工事，加强防御，把周围村落全部毁坏，把所有

居民全部赶跑。他们以雅克萨为据点，不时向东扩张。被侵略者夺走房屋田园、牛马土地的雅克萨人民，过着背井离乡的苦难生活。后来这些人在清政府的保护下由黑龙江流域南徙到嫩江流域重建家园，定居安生。现今齐齐哈尔市江北十八华里，有座达斡尔人居住的村落，名叫雅尔赛，就是雅尔斯莫昆（姓氏）的族众为了纪念世居的故地——雅克萨，而以原地名命名的村落。

沙俄的无端侵略行径和大肆掠夺骚扰，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注意并采取了必要的应变措施。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681年至1682年），朝廷先后两次派使者向沙俄据理抗议并进行和平交涉，但是，均无效果。于是清政府决定对盘踞在雅克萨的侵略者进行军事征讨。1682年康熙皇帝以祭祖为名，亲自出巡东北，视察防务，派出钦差深入北部边陲进行军事侦察，同时调兵遣将，作了军事与物质上的多方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六月，康熙皇帝下达了进军雅克萨的命令。这次战斗朝廷派出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率京师部队配合，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主将，统率兵员一万八千名，大炮一百二十门，水陆两路进取雅克萨。自黑龙江城——爱辉出发，六月二十三日抵达雅克萨城下，六月二十四日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并向俄军头目发出通牒，令其迅速交还雅克萨，立即遁回雅库次克，但是，俄军却置若罔闻，据城抵抗。于是，中国将士从六月二十五日晚上开始攻城，经一夜激战，城被攻破，俄军死伤累累，逼得俄军头目只好率众投降。这就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

当清军自雅克萨撤至爱辉之后，不甘失败的沙俄侵略军又卷土重来。时隔两个多月，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底俄军又重新占据了雅克萨城，遂又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开始的第二次雅克萨之战。清军在萨布素将军的统帅下，再次出动三千余兵，于七月十八日到达雅克萨进行了长期的包围战，断绝了俄军的粮食。俄军由于困饿和疾病蔓延，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到十一月底，这

支原有八百多人的侵略军只剩下了一百五十人。俄军统领多尔布辛也在战争中被击毙。

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后，沙皇政府向清朝政府提出谈判议和。康熙皇帝为了和缓边界局势，为谈判创造条件，下令清军自雅克萨撤退，仍驻防爱辉。和议谈判，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七日正式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东北边疆获得了比较长久的安宁。

在抗击沙俄侵略者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中，达斡尔族人民充当了清军主力和军需给养的支柱，为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首先是积极参军参战。康熙二十二年九月，齐齐哈尔地区索伦、达斡尔兵五百，由八名佐领统率，在黑龙江城——爱辉北的额苏里地方驻防屯垦。这是黑龙江城最早的一支部队。第二年秋连他们的家属也都迁去。这支队伍精骑善射，又熟悉地理，在雅克萨之战中冲锋陷阵，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不仅如此，黑龙江地处边陲，从内地频繁征调部队，因路途遥远，人马劳顿，困难很多。因此康熙皇帝不断下令就近征调达斡尔、索伦补充兵员参加战斗。所以，达斡尔族直接参加雅克萨战役的，不是几百人，实际有数千人之多。如康熙二十四年九月，第一次雅克萨之战刚结束，康熙皇帝便下令道："进征官兵劳苦，暂回乌喇吉林，量拨达斡尔官兵镇守黑龙江城。"达斡尔确实成了这次战斗的主力军。

其次是保证军需供应。在整个雅克萨战争期间军需供应由副都统品级的达斡尔人首领扎木苏担任总管，任副总管职务的是达斡尔人头目博克（即卜魁）、洪吉(即鸿杰）、达尔哈等。他们最为繁忙，如发动族人为战斗驯服和输送科尔沁蒙古军马，战斗中马匹倒毙，他们就从部落里挑选补充。康熙二十三年十月调集黑龙江的官兵一时发生了粮食紧缺，皇帝命令黑龙江将军"将达

斡尔所存之米，动支运往”。达斡尔人便把口粮献了出来，以应军需。部队将士吃的牛羊肉食也由达斡尔人积极供应。此外，军前响导引路、构筑城堡、修造器械、缝制军服军鞋等战争勤务，达斡尔人都积极参加了。他们的愿望就是早一天把罗刹赶跑，就能早一天收复失地并过上合家团聚的太平日子。

三是，参与侦察敌情。这种侦察活动，也几乎都落到了达斡尔人身上。康熙二十二年六月，达斡尔族总管博克（卜魁）率小股轻骑队深入雅克萨前线，抓获罗刹31人，将其头目宜番·米海罗莫罗送京审问。原雅克萨部落达斡尔头人，后提升副总管的倍勒尔，在雅克萨之战中前后进行了三次卓有成效的侦察活动。对这三次刺探，《清实录》都有记载。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二年八月，马喇等奏："臣遣打虎儿副头目贝勒尔等，侦察雅克萨城情形，路遣罗刹，杀其二人，生获一人。知悉雅克萨城已加修造，兵力有所补充等……"，上谕"萨布素等时加侦探，相机以待。倍勒尔等理藩院照例奖赏"。第二次是康熙二十三年五月，"造打虎儿副头目倍勒儿再探雅克萨。……城外复增木栅，所在农人尽入城内，打猎收貂，亦皆罢止，……设五人常番瞭望，所见在雅克萨者约九百人"。第三次是康熙二十四年四月，马喇等奏："遣打虎儿副头目倍勒尔等率三十人，往雅克萨城北侦察，生擒罗刹七人回。已知城池加固，守兵不满千人，援兵尚未到……等"，上谕"倍勒尔等直抵雅克萨，探其情形，生擒罗刹，可嘉，所司如例奖赏"。另外，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在俄兵再犯雅克萨并筑城盘据时，满丕奏："臣派达斡尔副头目乌木布尔代抵雅克萨侦察，生擒鄂克索木果。探知有五百余人，其头目为额礼克谢，粮米足支两年……"，上谕"萨布素等抓紧整备，速行扑剿，不然势必积粮坚守，图之不易"。这些侦察活动，对掌握敌情，部署兵力，夺取战争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是，为北疆涉外活动出力。清初我国北疆的外事活动也以

雅克萨之战为轴而繁忙起来。但这个地区的山川地域唯有当地土著民族达斡尔人最为熟悉，划分疆域，确定边界达斡尔人最有发言权。因此，议和谈判，必有达斡尔人参加。此外，当时在朝廷理藩院任副都统品级职务的达斡尔人孟额德，在外事活动中是个最活跃的人物，通晓满、蒙、汉、俄等语言，这给他的外事活动带来极方便的条件。孟额德随同钦差大臣索尔图经三年时间的外交谈判才得以签订《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几经反复，其情形是很复杂的。这里要提到的是达斡尔族叛逆，原尼布楚部落头目，名为根特木尔的人，他在沙俄的威吓利诱下，屈膝投降，叛国而去。朝廷几次派孟额德交涉引渡都没有奏效，最后他经东正教洗礼改名彼维尔，加入俄籍，彻底背叛祖国。沙俄以后便打出为根特木尔收复故土的旗号，同中国政府争夺地盘，妄图扩大其侵略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我黑龙江地区达斡尔人头目扎木素、倍勒尔、拉夫凯等人为朝廷积极提供真实有力的证据，驳倒了沙俄的无理要求。由于根特木尔叛贼的从中捣乱，以致议和谈判由康熙二十五年冬延续到康熙二十八年秋，经三年之久才达成协议。达斡尔族人为这次谈判取得成功做出了贡献。

前后两次雅克萨之战，达斡尔族劳苦最多，出力最大，为此朝廷曾多次表彰嘉奖。如康熙二十四年上谕："索伦、打虎儿，为黑龙江大兵，安设驿站，效力可念，可免征贡赋"。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又谕："免索伦、打虎儿今岁贡赋。俾之饲秣，并修整器械以备调用。"康熙皇帝很清楚，在征战中达斡尔族出了很多力，并考虑以后的战争中还要达斡尔人报效朝廷，所以御旨连续两年不收所有达斡尔族人的贡赋，这也算是最大的"恩典"吧。

雅克萨之战达斡尔族就以能征贯战初露锋芒，后来清朝廷给达斡尔族冠以"索伦劲旅"的"美名"，不伦异国入侵，还是内地有"乱"，索伦兵（即达斡尔、鄂温克兵）都派上了用场。